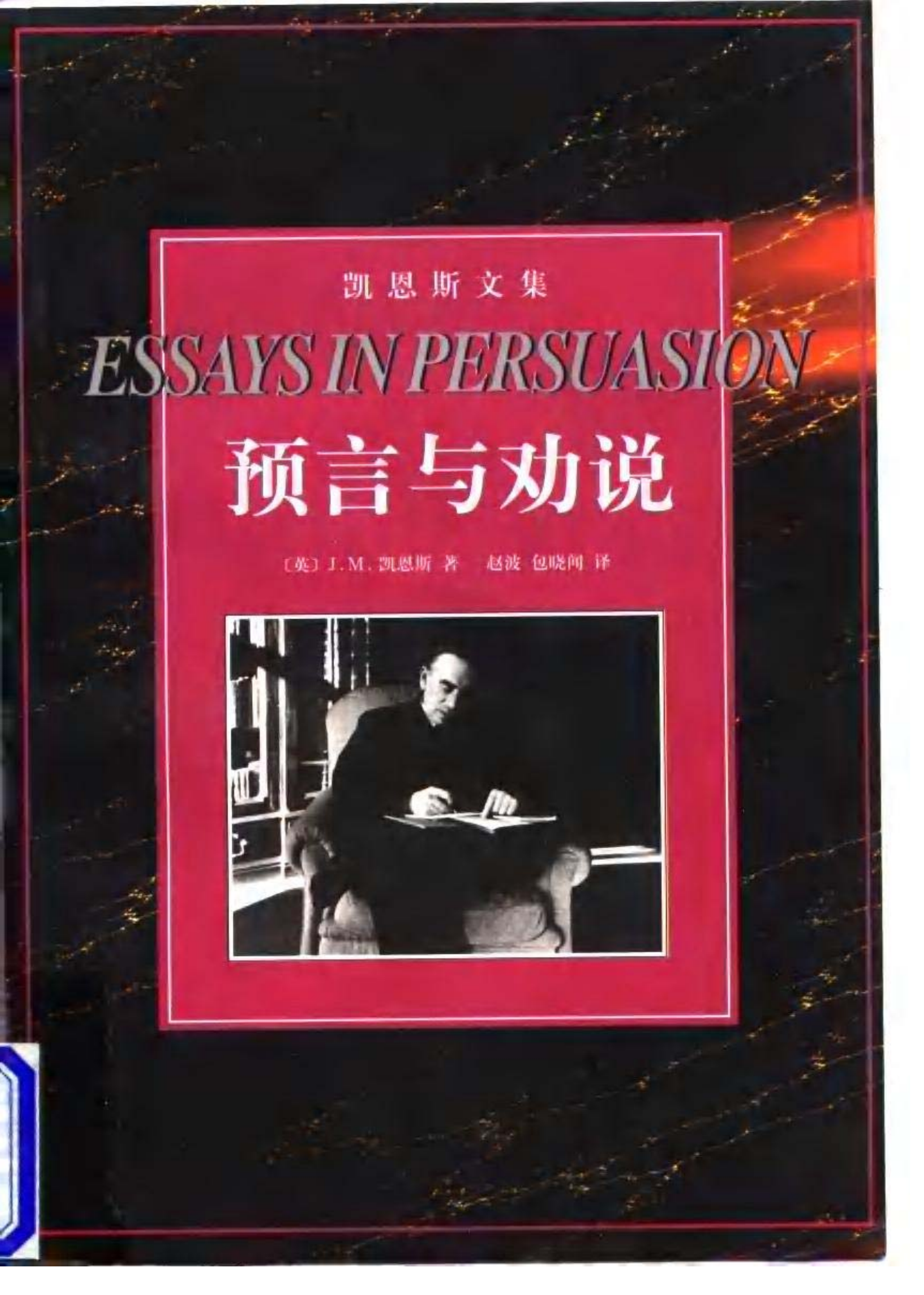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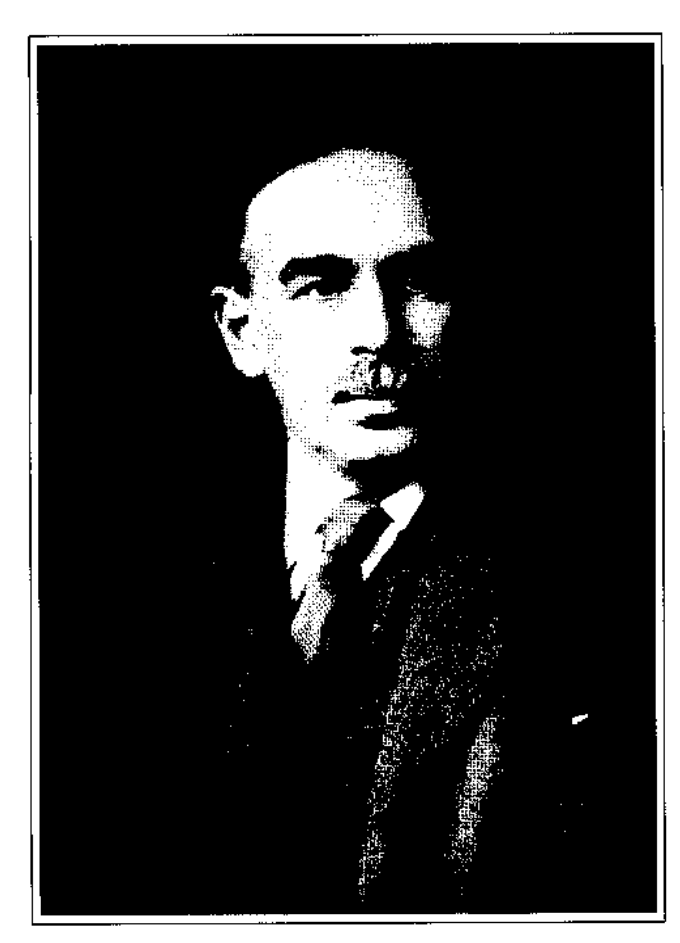

凯恩斯文集
ESSAYS IN PERSUASION
预言与劝说
〔英〕J.M.凯恩斯 著 赵波 包晓闻 译



J.M. 凯恩斯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书　　名　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
著　　者　〔英〕J.M. 凯恩斯
译　　者　赵　波　包晓闻
责任编辑　芮从东　曹富林　刘　焱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插页　2
印　　数　10141—15170 册
字　　数　326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954—X/G·560
定　　价　(软精)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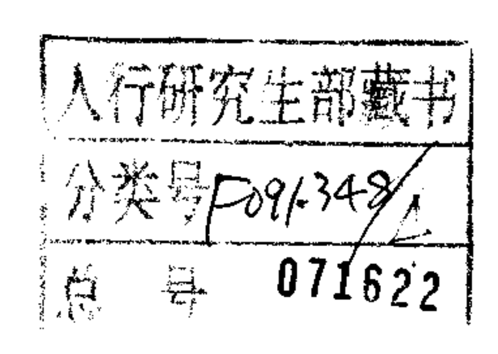
凯 恩 斯 文 集

ESSAYS IN PERSUASION

预 言 与 劝 说

〔英〕J.M.凯恩斯 著　赵波 包晓闻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序　　言

这里收集的是一个预言者12年来的聒噪，但对事态的进展，却没能及时地发生影响。这本集子也许应该命名为“预言与劝说集”，因为不幸的是，预言相对于劝说较为成功。但是撰写其中大部分文章的主旨是在于劝说，在于试图对舆论有所影响。许多文章在开始的时候被看作是出言轻率、措辞偏激的。不过我认为，如果读者今天再阅读一遍，将会承认当初对那些文章的看法主要是由于它们通常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和意见背道而驰，而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特性。尽管我是一个不免带有偏见的证人，但是在我把它们重新阅读一遍之后，根据事后的判断，我感觉正相反，它们所论述

的内容并不是过分夸大了，而是强调得不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当时写这些文章时的环境下的自然结果。当我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就痛苦地意识到肯定会有许多人起来反对我，而支持我的人却非常少，因此我必须对那些我不能加以证实的东西尽量保持沉默。回顾往事，我清楚地记得，我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在我能够确信和论据允许的限度内，言辞上力求谦和。

这些文章根据其内容被分成了五个部分，上面所讲的主要适用于前三个部分而不是后两个部分；也就是说，适用于近十年来的三个重要的争论——和平条约和战争债务、通货紧缩政策、回归金本位①，实际上这三个争论在某些方面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尤其是后两者。对于这些争论，我都毫无保留地参与其中。由于作者迫不及待地想对他的读者进行及时的说服，这些文章都是在匆忙之中完成的。后两部分由于在时间上间隔较远，因而少了一些令人生厌的噪音。作者的着眼点位于较远的将来，他所深思熟虑的问题，需要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才能得到明确的是非判定。对于这些问题，他都是以慎重和冷静的态度来加以考虑的。这里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了他事实上始终坚持的一个中心论点——即确信我们所简称的经济问题，也就是短缺和贫穷的问题，以及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之间

① 1923年，在我们恢复金本位以前，我写了一篇《关于未来货币调节的正面建议》的文章，它作为本书第三部分的第三篇转载于此。我仍然坚持这篇文章的观点。如果我们继续实行金本位，这些建议则有必要暂时搁置。但是如果有人想知道作者对如何解决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通货问题，大体上所持的意见，则可以从这篇文章中获知。

的经济斗争的问题，只是一种可怕的混乱，是一种暂时存在的不必要的混乱。由于西方世界已经拥有资源和技术，如果能够创造出利用这些条件的组织体制，就能够把现在消耗着我们精力和物力的经济问题降低到次要地位。

因此这些文章的作者，尽管有许多聒噪，但仍然希望和相信在将来的某个时期，经济问题将退回到它应处的地位，我们的心智将用来、或重新用来对付我们真正的问题——生活问题、人类关系问题和关于创造、行为与宗教的问题；并且认为，这个时期的到来将指日可待。我偶然发现，从经济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个微妙的推论，它能够说明为什么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作用。如果我们始终遵循着乐观的假设，那么假设会趋向于实现；否则，在悲观的假设下采取行动，那我们将会永远陷于贫乏之中而无法自拔。

这些文章是从作者已出版的作品中收集而来的，有的摘自于整书，有的是独立的小册子，有的是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收集的时候未加区别。汇编时原则上对原文的任何部分，凡是对文章的主要论点来说是多余的或不必要的文字，以及只记述了现已丧失趣味的那些过去事件的部分，都毫不吝惜地加以删除（删除处本书内概未注明）；但是对于保留的部分，则内容一点也没有改动。

我认为选择的这个出版日期是适宜的，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变的时点上，它被称为国家危机。但是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对于英国而言，最主要的危机已经过去，现在是一种暂休阶段。在 1931 年的秋季，我们正在瀑布之间的一个安静的水潭中放松自己。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又获取了选择的自由。在今天的英国，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凡尔赛和约或战前的金本

位或通货紧缩政策。这些战斗已经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事态变化产生的无法抗拒的压力，而固有的偏见的逐渐削弱只是次要原因。但是，我们当中的大部分对于下一步应当怎样做，以及如何利用我们重新获取的选择自由的问题，还仅仅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想法。因此我情愿牢牢地盯住过去，以提醒读者我们是怎样过来的，目前的现象是怎样的，以及过去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

J. M. 凯恩斯
1931年11月8日

第一部分

和平条约

第一篇 巴 黎

（1919 年）

人类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很少有人能够确切地意识到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欧的经济组织结构具有的极端不同寻常的、不稳定的、错综复杂的、不可靠的、短暂的性质。我们近来所取得的某些优势和利益，实际上是最特殊的和极其短暂的，然而我们却把它们假定为自然的、永恒的，并且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我们的计划。在这种脆弱和虚假的基础上，我们计划社会进步、粉饰政党纲领，追求发展我们共同的敌意和不寻常的野心，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助长、而不是缓和欧洲大家庭里的内部冲突。德国人在疯狂的幻想和不顾后果的自私心理的驱动下，推翻了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法国和英国人民的代言人希望通过和约重新建立受到战争动摇和破坏的经济组织

结构，因为只有欧洲人民才能适应这种细致、复杂的结构并生存于其中；然而，他们的良好愿望却可能使开始由德国人造成的破坏达到全面、彻底的地步，因为这样的和约如果付诸实施的话，将会造成越来越深的灾难。

在英国，日常生活的外部表面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或至少意识到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忙于恢复因战争而一度中断的生活方式，现在人们感到唯一不同的是，很多人看起来较过去富裕了许多。在战前，我们是数以百万计地花费，而现在我们是数千万、数亿地花费，但同时我们知道这并不会造成危害。很明显，我们并没有发掘出我们经济生活方面最大的潜力。我们所期望的经济生活不仅要回到 1914 年的水平，而且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和增强。各个阶级都有着类似的打算，富人希望消费得更多而储蓄更少，穷人则想少工作一些而多花费一些。

但是，也许只有在英国（和美国）人们才能够对事态如此漠不关心。在欧洲大陆，整个世界都在痛苦地呻吟着，没有一个人不感受到这种悲惨的呼叫。那里发生的，不仅仅是挥霍浪费或"劳资纠纷"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生存与死亡、饥饿与生命，关系到行将死亡的文明所爆发的可怕的动乱的问题。

对于一个在停战后半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黎度过的人而言，如果他偶然去一趟伦敦，将会有一种奇特的体验。英国仍然置身于欧洲之外，欧洲那种无言的恐怖与战栗并没有流传到英国。欧洲与英国是相分离的，不过就欧洲自身而言却是一个整体。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荷兰，俄罗斯、罗马尼亚和波兰，它们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它们的结构和文化从根本上讲也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兴衰，在战争中都受到巨大的损

害。而我们在战争中尽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同美国相比程度上可能要差一些),但经济上却处于旁观者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巴黎和约"灾难性的意义。欧洲内战结束之后,德国与奥匈帝国已经处于被征服后的屈从地位,但是如果获胜的法国和意大利滥用它们暂时得到的权力去试图摧毁德奥两国,那么它们终究会自取其祸。因为它们与战败国之间,在精神上、经济上存在着无法摆脱的密切联系。无论如何,当一个英国人参加了巴黎会议,并且在那几个月内作为协约国最高经济会议的一位成员时,这种新的经历和体会会使他在心情和观念方面,成为一个欧洲人。在欧洲体系的神经中枢——巴黎,他头脑中所固有的英国式的成见,大部分会消除,而且他也会被其他的更加可怕的幽灵所纠缠。巴黎的经历是一场恶梦,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心智不健全。在那里,人们在并不严重、无关紧要的场面下那种如临大祸的感觉;面临重大事件所表现出的人类的无助和渺小;相互纠缠的各种意见和决策的非现实性;无缘由的轻率、愚昧、狂妄、混乱、迷惘的呼叫——古代戏剧所需要的各种成分都占全了。当某人置身于表演戏剧般的讨论政务的法国沙龙内,看到身着固定色彩服饰和具有坚定不移的个性的威尔逊和克雷蒙梭的颜面时,不免会想他们的脸究竟是真的,还是在某些奇特剧目或木偶戏中用来表演悲剧或喜剧的面具。

巴黎所进行的一切都同时具有这种既特别重要又无关紧要的氛围。作出的决定,看起来会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结果负责,但是舆论却传闻这种决定不是实实在在的,它是没有什么作用、无意义、无效果以及不切实际的。这一切使人深深地感受到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哈迪的《统治者》里所描

述的那种情景——事态的发展趋向于命中注定的归宿，这种趋势不会由于议会的政治家们的褒扬而受到影响和冲击：

岁月之神

看吧，那愚昧的芸芸众生，
他们丧失了一切远见和自制，
被本性的轻率鲁莽驱入了魔窟之门。
剩下来没有别的，
只是强者的复仇火焰，
只是弱者的满腔愤懑。

慈悲之神

为什么人类的意志，
会造成如此昏聩的行为？

岁月之神

我早已说过，
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演进的，
就像鬼使神差一般，
是非曲直他们已无法明辨。

第二篇　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

（1919 年）

德国战败之后，几乎完全失去了它的殖民地、海外关系、商业船只以及国外的财产；它被迫割让了十分之一的领土和人口，三分之一的煤矿和四分之三的铁矿；战争损失了 200 万的青壮年；国内人民四年来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巨大的战争债务；通货膨胀使货币只有原来价值的七分之一；它的盟国和它们的领土都处于分裂状态；国内爆发了革命，边界上也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四年的战争耗尽了一切，最终的失败又使它在实力、信心上遭受了无以估量的沉痛打击。所有这些因素充分说明，德国在战前支付外国黄金的那种能力如今已受到影响。

关于德国的现状及其支付战债的能力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够想像到的、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大部分关于德国支付巨额赔款的估计都源自于这样

一种假定，即认为它在将来开展的贸易在规模上要远远大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为了得到一个赔款总计数字，根据条约的规定，利用现金形式（或者不如说是外汇）或实物形式（煤、染料、木材等等）来衡量，其结果不会有多大差别。但无论如何，德国只有通过出口某些特殊商品才能履行支付义务，相对而言，把出口获取的价值转入专用赔偿账户的具体方法仅仅是一个细节问题。

关于赔款数额方面，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一条首要的准则，并且有可能的话，尽量利用有关的一些统计资料，否则我们只能凭主观假定来行事了。当然，德国只有通过在减少进口的同时增加出口，进而扩大贸易顺差，才能在若干年内逐年支付赔款，而且，贸易顺差对影响国内生产也是很有利的。对于德国而言，长期内支付赔款只能依赖商品支出，这些商品或者是直接流向协约国，或者是卖给中立国家，然后再把获取的中立国债权移交给协约国。要估计这一程序在何种程度上进行，最牢靠的依据是分析德国战争的贸易利润状况。只有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再附加一些有关德国总体生产能力的概括性资料，才能合理地推断出德国出口能够超出进口的最大限度。

1913 年，德国进口额总计 5.38 亿英镑，出口额总计 5.05 亿英镑，运输贸易和生金银块除外。这就是说，进口超过出口约计 3300 万英镑。但是在 1913 年以前五年间，贸易赤字的年平均额为 7400 万英镑。由此可见，德国在战前所有的对外新投资数量——并且还远不止这些——都是来自于当时国外证券的利息和船运行业、海外银行业务等等所获取的利润。现在由于它丧失了其国外资产和商船运输业，它在国外的银行以

及其他各种海外收益的来源已经大部分遭到毁坏，所以目前德国如果仍停留在战前的进出口水平上，那它不仅不可能有剩余来支付国外赔款，而且有可能难以自给自足。因此，德国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对消费和生产进行重新调整以弥补这一赤字。只有对进口商品的使用做到进一步节约，同时对出口做到进一步的促进，才会有余力来支付赔款。

让我们概括地看一看德国出口的主要项目：(1)钢铁产品。由于德国损失了很多钢铁资源，这方面净出口的增长不太可能，也许还会大幅度下降。(2)机器。可能会有一些增长。(3)煤和焦炭。战前德国此项目净出口值是2200万英镑；协约国方面同意目前尽可能大的输出量为2000万吨，在将来某个时期将增长到4000万吨，但事实上能否办得到却是有疑问的。即使在2000万吨的基础上，以战前的价格衡量，我们实际所得到的价值也并没有增加；因而，如果按照这一数额输出的话，那么肯定会出现以煤为原料进行生产的制成品出口额的大幅度下跌。(4)毛织品。如果没有羊毛原料，则出口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目前又存在着对羊毛原料供给的其他方面的需要，看来毛织品出口将会下降。(5)棉织品。情况与毛织品类似。(6)谷物。在此项目上，从来都不会有净出口。(7)皮革制品。也与毛织品情况类似。

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了将近一半的德国战前出口项目，其他的商品没有一种能达到它原来出口总额3%的。对于德国而言，它能用些什么样的商品来支付战债呢？染料吗？它在1913年的总产值为1000万英镑。玩具呢？苛性钾呢？1913年这两项的出口值为300万英镑。即使能够确定有关的商品种类，但在什么市场上出售它们呢——不要忘记，在我们头脑

中，商品的价值不是以每年千万计数的，而是以亿计数的。

关于进口方面，情况相对可能会好一些。通过降低生活标准，在输入品上的消费支出也许会有显著的缩减。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许多大宗进口项目是不能减少的，因为它们与某些出口项目相互密切关联，进口的下降势必会造成出口的相应减少。

现在让我们在尽可能乐观但还不致陷入愚蠢的情况下进行一番推测。假定德国在资源、设备、市场和生产力缩减的情况下，经过一段时期，最终仍能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以至于使其每年的贸易顺差，以战前价格计算时，总计增加1亿英镑。德国要实现这种调整，则首先必须消除贸易逆差，而战前的五年里年均逆差额为7400万英镑；不过我们假定在考虑了这点之后，它能从逆差转为每年顺差，数额为5000万英镑。考虑到战后的价格较战前提高了1倍，那么顺差数额将达到1亿英镑。除了考虑纯经济因素外，再加上政治、社会和人为因素，我对德国能否在30年内每年以这个数额支付持怀疑态度，不过做出它能够做到这点的推测和希望，也不能算是愚蠢的想法。

假定利率为5%，资本报酬率为1%，这一数字所代表的资本总额现值大约为17亿英镑。

因此，我得到的最终结论是：包括一切支付方式——直接转移的财富、割让的财产和每年的赔偿——德国能够确切支付的最大限度的数额为20亿英镑。就实际的一切状况来看，我认为它不能支付这么大的数额。

我认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也许能使按上述论点得来的数字得以增加，这就是：假定德国的劳动力能被派遣到受战争破坏的地区从事重建工作。听说类似于这样的有限度计划已

在考虑之中。由此所得到的增加贡献，一方面取决于德国政府所能派遣的劳动力数量，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比利时和法国居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所能同意容纳的这类劳动力的数量。但无论如何，对于实际的重建工作，即使经过许多年，由输出劳动力所获取的收益净现值，似乎也很难超过（比方说）2.5亿英镑；即使可以这样，对于以其他方式能够获取的年贡献而言，也未必能够证明这是实际的一个净增额。

因此，对德国的支付能力能够达到80亿英镑，或者，即使是50亿英镑的推测和估计，都不在合理的可能限度内。对于那些认为德国能够每年支付好几亿英镑的人而言，他们应该说明一下这样的支付应当由*哪些种类的商品*来承担，并且这些商品应当在*哪些市场*出售。除非他们能够进一步做出某种程度的细节说明，并且提供一些支持其结论的确切证据，否则，他们的论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在这里，我只是提出三个附带的观点，不过并没有一点会影响到我为目前实际目的所提出的论据的确切含义。

第一点，协约国方面在5年或10年的一段时期内，对德国的贸易与工业加以"培养"。在这段时期里，给予其巨额贷款，以及充足的航运、食品和原材料援助，为它建立市场，尽力提供资源和精神方面的帮助，使它成为欧洲的，尽管不是全世界的，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许能够获得一个较上述数字大得多的数额，因为德国具有巨大的生产潜力。

第二点，我的估计是以货币来衡量的，我假定货币的单位价值的购买力不会有重大变化。若黄金的价值跌至其现值的一半或者1/10，那么以黄金来计量的赔款额的实际负担将会相应地减少；如果1英镑的价值只等于现在1先令的价值，德

国以英镑计量的赔偿能力，比我上面所述及的，当然要大得多。

第三点，假定自然力和与人力相关的产出量方面，不会发生变革性的改变。科学的进步能够带来在我们所能达到范围内的方法和设计，借助于这些，整个生活水平会出现难以估量的提高，对于某一既定产出，所消耗的人力只有现在所消耗的一部分。上述情况并不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衡量“能力”的标准将会改变。不过，任何事都是可能的这一事实并不是信口雌黄的借口。

的确，没有一个人能够在1870年就预测出德国在1910年的能力。我们无法期望对一代人或以后的世代做出安排。人类经济环境的逐渐变化，以及人类在预测方面的有限智力，可能会导致为将来所做的安排出现这一点或那一点的错误。作为有理性的人类，我们不会比以证据为基础制定的政策做得更好，也无法使这种政策与未来5年或10年的情况完全适应，而只能是某种程度上的适应，因为我们对未来只能做出一定程度的预测。至于人类生存方面的极端变化和自然法则或人类与自然联系方面的变革性转变，我们可以不予理会，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关于德国的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支付赔款的能力，我们没有充足的认识，但是并不能以此作为它能支付100亿英镑这种论点的理由（我曾听说过某些人宣扬这种理由）。

为什么世人会如此轻易地听信政治家们不真实的言论呢？如果需要解释的话，我认为部分地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首先，战争的巨大支出、价格的上涨以及货币的贬值导致价值单位处于完全不稳定的地步，这使我们对涉及财政事务

方面的数量与规模的大小，失去了一切正常的判断力。过去我们认为的可能的限度，现在已经大大超出了，以过去为基础进行预期的那些人发现他们经常是错误的。现在大街上的某个人，只有在给他出示某种权威时，才会相信被告知的言论，把德国的赔偿数字说得越大，越会有人听得进去。

不过，对一些明白事理的人来说较为可靠的某种谬误有时也会迷惑那些对问题作比较深入的考察的人。类似这样的人也许会依据德国每年生产力的总余额而不是它的出口余额，来估算德国的清偿能力。黑耳弗里希估计德国在 1913 年的年财富增长量是 4 亿到 4.25 亿英镑（现存土地和财产货币价值的增额除外）。在战前，德国的军备支出在 0.5 亿到 1 亿英镑之间，而现在它可以省去这笔开支。因此，它为什么不能向协约国方面每年支付 5 亿英镑呢？通过这种方式，试图把拙劣而不完善的论点表现得非常有力、非常可靠。

这种方式有两点错误。其一，在经历了战争和和约的创伤之后，德国的年储蓄量比以前下降了许多，如果再从中逐年提取的话，它就不可能再达到以前的水平。阿尔萨斯-洛林，波兰，上西利西亚地区丧失之后，关于剩余生产力方面的损失，是不会少于每年 5000 万英镑的。此外，德国过去每年在船运、国外投资、国外银行及其他联系方面获利约为 1000 万英镑，但现在所有这些收入都已不复存在了。它在军备支出上的节

省远远不抵目前估计有 2500 万英镑的抚恤金方面的负担①，两者相抵后的新增支出，体现了生产能力方面的真正损失。其次，德国的内债总计已达 2400 亿马克，即使我们把这一方面看作是内部分配而不是生产力问题，我们仍旧必须考虑到德国在战争期间所造成的外债，考虑到它在原材料存货上的枯竭，牲畜的耗尽，由于肥料和人力的缺乏所造成的土地生产力的减退，在将近 5 年的时期里由于没能保持修理和更新所造成的财富损失等种种情况。德国已不如战前那样富有，它在将来的储蓄量，由于这些原因，当然还排除以前考虑的因素，至少会下降 1/10，即每年 4000 万英镑。

我们已经以其他方面的理由得出德国每年的最大限度支付额为 1 亿英镑，但上述因素已经使德国的年剩余额缩减到 1 亿英镑以下。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即德国作为战败国自然会在生活和舒适的标准方面有所降低；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一因素，这种计量方法仍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每年用于国内投资的余额要想转化为可供对外出口利用的余额，只能借助于工作种类上的剧烈转变。就劳动力而言，它在德国的国内事业方面，也许是可以利用的、有效率的，然而在对外贸易上也许没有什么出路。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在讨论出口贸易时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即德国的劳动力在哪一类出口贸易上能找到一条有巨大增长力的出路？然而

① 此项支出为 50 亿马克。但是马克的贬值使这一支出数字相对于实际支付的货币现值负担而言夸大了。不过，就德国在战争中遭受的伤亡所带来的国民生产力的真正损失来讲，这一数字大概也不能算作是夸张吧。

劳动力只有在损失效率、支出大量资本的情况下，才能转向新行业。德国劳动力能够为国内资本改进所提供的年剩余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能作为衡量它每年能够对外支付黄金的标准。

我不能将这一问题置之不理，好像它的公平处理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誓约或经济事实。使德国陷入受奴役地位达一代之久、降低数百万生灵之生活水平以及剥夺其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幸福，是一项令人深恶痛绝的政策——即使这种政策事实上可行，即使藉此能够养肥我们自己，即使它不会埋下造成欧洲文明生活堕落的种子，也仍然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有人假正义之名为之鼓吹。在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中，在解开各民族复杂命运之症结的过程中，正义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东西。因此，如果正义的内涵竟如此简单，则各国将无权用宗教或自然道德观去使敌人的儿女们承受其父母或统治者恶行的惩罚。

第三篇 关于欧洲复兴方面的建议

（1919 年）

一、和约的修正

如果要修改和约，有没有什么对我们来说易于接受的基本方法呢？威尔逊总统和斯马茨将军认为保证国际联盟盟约的顺利实施可以消除许多由和约带来的弊病。因此，他们建议，为了使欧洲目前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平获得逐渐的提高，我们必须依靠国际联盟。斯马茨将军在和约上签字时曾写道："有些关于领土问题的决定将来需要修正。已经制定的一些保证事项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的，但是，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它们与我们过去的敌人现在所形成的爱好和平的脾性和解除武装后的状态极不协调。有些未雨绸缪的惩戒措施，在比较平静的心情下，也许会被人们渐渐遗忘。有些规定

了的赔款在要求执行时势必会对欧洲工业的复兴造成危害，如果适当缩减赔款，使之趋于更加温和、适度，那么对各方面都有好处。……如何使欧洲摆脱这次大战所带来的灾难呢？我相信，国际联盟最终会找到一条出路的。"1919年7月初，当威尔逊总统向参议院提交和约时，曾经表示："……如果没有国际联盟，对德国在下一代才能完成的赔偿任务的长期持续的监督，可能会完全失败；经过重新考虑之后，对和约原来规定的行政安排和某些限制进行了修正，并加以承认，但也许仍然不能顾及长远利益，也不一定完全公平合理，若强制执行的时期过久，实际上也是无法实行的。"

我们能指望国际联盟保证我们的那些利益吗？对此，国际联盟的两位主要发起人认为我们的期望不会落空。与此相关的内容载于盟约的第十九条，叙述如下：

"如果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认为和约出现了与实际不相适应的情况，认为考虑到国际形势，如此下去将危及世界和平，可以随时向国际联盟理事会提出建议，请它们重新考虑和约。"

但是很可惜。盟约第五条规定："除非本盟约内有明确的规定，或是和约现订的条款，否则任何理事会或议事会会议所做的决议，必须经到会的国际联盟会员的一致同意，方能生效。"就和约内任何一项条款需要及时重新考虑这一点来说，这样的规定，难道不是使国际联盟变成了一个仅仅是浪费时间的机构吗？如果和约的参与各方都一致认为需要在某一点上做出修改，那么就根本不需要一个联盟或盟约来执行这个方案。如果只是国际联盟的议事会意见一致，它也只能"建议"那些有关会员国进行重新考虑。

但是，支持此项规定的人却认为，国际联盟能够通过影响世界的公众舆论发挥其作用，因为多数派意见尽管在法律上不产生效力，但在实际过程中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们都祈祷事实是这样的。然而，由老练奸滑的欧洲外交家控制的国际联盟，也许会变成一个制造障碍、具有拖沓习性的不称职的工具。关于修改和约的工作，主要不是托付给经常举行会议的理事会，而是由议事会操办的，而它举行会议的次数将越来越少，而且，凡具有参加大型盟国会议的亲身经历者肯定知道，这样的会议往往是庞大而难以控制的，参加会议的各方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进行讨论，一些最重要的决议和最好的处理方案，由于那些偏爱现状的人的反对，常常会毫无结果。对于盟约而言，的确存在着两个致命的缺点——一个是盟约第五条，它规定了一致性原则；另一个是广受批评的第十条，根据这一条，"国际联盟各会员国对于一切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保证尊重和维护，反对一切外来侵略"。这两项条款一起以某种方式破坏了把国际联盟看作是一个进步工具的想法，从一开始，它就充斥着一种安于现状的致命偏见。正是这些条款符合了某些最初反对国际联盟的人的意向。现在他们又试图把国际联盟转变成另一个神圣同盟，其目的在于使他们的敌人永远处于经济瘫痪的状态，维持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均势，他们相信，通过和约已经建立了这种均势。

关于修正和约这个特殊问题，在实际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如果我们为了维护"理想主义"而对这些困难视而不见，那将是错误的、愚蠢的。但是无论是谁，都没有理由因此对国际联盟加以指责，也许人类的智慧仍可以将国际联盟改造为

维护和平的强大工具，譬如盟约的第十一条到第十七条①，就已经取得了巨大而有益的成就。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首先借助于国际联盟而不是其他的任何方式来完成和约的修正；其次，我们希望依靠普遍的舆论力量，如果有必要的话，再通过运用金融压力和金融劝诱的办法来阻止少数顽固分子行使他们的否决权。在一些主要的协约国内，会出现新的政府，对于这些执政者，我们应当充满信心，相信他们会表现出比其前任者更加深远的智谋和更加宽宏的气度。

在这里，我不打算涉及细节问题或逐条逐句地讨论和约的修正问题。我只是准备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赔款、煤和铁、关税，因为由这些方面引发的巨大转变对于欧洲的经济生活而言，都是必要的。

1. 赔款问题

如果对赔偿所要求的数额，少于协约国在严格解释和约的基础上有权索取的数额，就没有必要对涉及赔款的每一个项目都加以详述，也毋须听取有关赔款的汇编资料的论证。据此，我建议了以下解决办法：

（1）由德国支付的赔款和外国驻军费用确定在 20 亿英镑左右。

（2）德国根据和约缴出的商船和海底电缆，根据休战条约缴出的军用物资，放弃的割让领土内的国有财产、以公债形

① 这些条款的规定在于防止国际联盟各会员国之间以及会员国与非会员国之间发生战争，这的确是盟约的坚实成就。这些条款，使有组织的强大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低于 1914 年。单凭这一点，国际联盟就值得所有人称赞。

式赔偿这些领土的要求以及德国对其前同盟国债权的要求，这几方面的价值，可以估为5亿英镑，不必逐项加以估计。

（3）其余的15亿英镑，支付时不应再计利息，应当由德国从1923年起，分30年摊付，每年支付5000万英镑。

（4）赔偿委员会应当解散，如果还有一些遗留事务需要它来处理，那可以把它列为国际联盟的一个附属机构，其中应当包括德国与中立国的代表。

（5）德国将以适合的方式自行决定支付每年均摊的赔款额，如果它届时没能履行支付的义务，对它的一切申诉应当向国际联盟提出。这就是说，将不会再没收德国的海外私有财产，除非在协约国和美国已经清算的、或者交由公共保管委员会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掌握的此类财产的收益，还须用来支付德国私有债权的时候；特别是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关于没收德国在公益企业方面收益的事项），应当取消。

（6）不应当向奥地利索取赔偿。

2. 煤和铁问题

（1）附加条件第五条中有关协约国对德国煤矿的选择特权的规定应当取消，不过，由于德国曾对法国的矿产有过破坏，它应当继续履行这方面损失的赔偿义务。但是如果公民投票的最终结果决定德国不再拥有上西利西亚的煤矿区，那么这项赔偿义务应当予以解除。

（2）关于萨尔区的协定仍然有效。不过一方面，德国对这些矿产不再拥有任何所有权；另一方面，10年以后，德国将无偿地、无条件地收回这些矿产及地产。同时应当有一个附加条件，在同一时期内，法国应与德国缔结一项条约，规定由洛林供应德国的铁矿，至少是战前数量的50%，作为交换条件，德

国应向洛林供应煤矿，其数量在考虑了萨尔区的产量之后，应与战前的供应总量相等。

(3) 关于上西利西亚的协定仍然有效。这就是说，应当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各主要协约国和联合力量“应当尊重投票的最终结果所表现的居民愿望，此外还应考虑该地区的地理和经济情况。”但是协约国方面应当申明，除非居民所表现出的意愿绝对相反，否则按照协约国方面的判断，认为“经济情况”要求煤矿区在德国境内。

3. 关税问题

有关国家应当在国际联盟的资助下共同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同盟，规定同盟内各会员国不得向其他会员国征收保护性关税①。德国、波兰、原来构成奥匈和土耳其帝国的现在新成立的国家，以及托管地区应当被强制纳入这个同盟，为期10年，期满以后，由它们自愿选择是否继续加入。其他国家则在自愿的基础上决定参加与否。但是，我们希望，无论如何，英国都应成为此同盟的原始会员。

把德国的赔款数额，适当地确定在其支付能力范围以内，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德国境内希望和进取心的重新树立，就可

---

① 关于“保护性关税”的定义，为方便起见，一般认为这种税制允许：(1) 对某类产品完全禁止进口；(2) 对国内不生产的商品，征收限制性关税或收入性关税；(3) 对国内也生产的同类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但税率不超过对国内同类商品所征收的抵消性消费税的5%；(4) 出口税。此外，在参加同盟的各国多数票通过的情况下，允许有特殊的例外情形。如果某一国家，在加入同盟之前，实行某种关税已达5年，那么在加入同盟以后，可以容许它在5年之内，在每年均摊的情况下，使原有关税逐渐消失。

以避免由于无法完全履行和约条款而造成的压力和长期的摩擦，就不必使用赔偿委员会的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高压手段。

通过把与煤矿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条款修改得温和一些，并允许以铁矿交换煤矿，我们可以保持德国工业活力的继续存在，使它在生产力方面的损失有一定限度；否则由于政治的划界会对钢铁工业的天然地区分布格局造成干扰，从而会造成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损失。

战后，出现了无数新的政治划界以及许多国家主义新政权，它们的特点是贪得无厌、妒忌成性、经验不足，在经济方面存在许多缺陷，因此在组织、经济效率方面会造成损失，如果建议的自由贸易同盟能够成立，则可以使这些方面的损失得到部分补救。只要大片疆土归属于少数几个大帝国，经济上的划分界限还可以容忍；但是当德意志、奥匈、俄罗斯和土耳其这样的大帝国被分割成 20 个左右的独立政权时，经济划界就无法令人忍受了。一个包括整个中部、东部和东南部欧洲、西伯利亚、土耳其，以及英国（我希望）、埃及和印度的自由贸易同盟，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会做出与国际联盟一样大的贡献。我们也希望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不久也加入这个组织。在友邦的支持和要求下，法国和意大利也非常有希望一起加入。

或许有人会反对这个建议，认为这样的计划实际上趋向于实现过去德国的“中欧计划”①梦想。如果某些国家竟如此

① 德国在泛日耳曼主义下的一个野心计划，打算依靠征服或吸收的手段，组成一个包括奥匈、比利时、土耳其、巴尔干各国，以及法国北部、俄国西部等在内的大帝国。——译注

愚蠢，仍然处于同盟之外，而让德国享受它的所有好处，那么这种批评也许有些道理。但是一种可以让每个人都有参与机会，却并没有一个人可以享受特权的经济体系，与以排斥和歧视为目的的拥有特殊利益的、露骨的帝国主义计划，在目标上绝对不一样。对于此项建议的有关批评意见，我们的态度取决于我们对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在整个道义上和感情上的反应。假如我们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至少在未来的一代，不能让德国享受即使是低限度的繁荣，所有近来组成协约国的各国人民都是上帝的宠儿，而所有我们的敌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等等都是天生的恶人，因此必须使德国人年复一年地处于贫穷困乏的境地，让他们的子孙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永受折磨，使它处于其敌国的包围之中；那么本章所有的建议都应当摒弃，特别是其中的某些见解，还可能帮助德国部分地恢复以往的物质繁荣，为它某些城市的工业人口解决生计问题。但是如果西欧的民主国家，对各个国家及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持有本文所主张的观点，再加上美国的财政援助，那么我们大家都会得到上帝的保佑。如果我们处心积虑地以中欧贫困化为目标，则我敢断言，彼此之间的复仇之心将不会淡化。复仇心态的不断加剧，使我们对近来德国所发生的战争的恐惧心理还没有完全消失以前，就会在反动势力与绝望的革命骚动之间最终发生冲突，结果是不论哪一方获取胜利，这场冲突都将毁灭当代的文明和进步。这样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更好的预期之上吗？我们应该相信，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幸福，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相应的促进作用，人类的团结合作并不是一种虚构，国与国之间，还是能够彼此当作同胞来看待的。

我以上所建议的种种修正，对于使欧洲工业人口能够继续维持生计这方面，也许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就这些修正本身而言，还是不够的。特别是，从理论上讲，法国将会有所损失（也仅仅是理论上，因为它目前的要求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满足），要摆脱这种尴尬境地还必须从其他途径加以努力。因此，我认为还应做到以下两点：一个是美国和协约国之间关于赔偿要求的调整；另一个是要有充足的信贷供给，使欧洲能够重新创造它的流动资本存量。

二、协约国之间债务的清算

到此为止，关于建议赔偿条款的修正，我所考虑的仅仅是与德国有联系的方面。但是为公平起见，也需要将协约国各自之间的债务总额大大削减，同时在债务分配方面也必须有所调整。我们的政治家在战争时期的每一次公开场合下的演讲，以及其他方面的意见，都认为，在敌人侵占下受到损害的地区，在接受赔偿方面，当然应该享有优先权。我们说，这一点是我们要争取的最终目标之一，然而，我们所争取的目标中却从来没有包括退役津贴的恢复。因此，我建议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表明我们是有诚意的、可以值得信赖的。为了有利于比利时、塞尔维亚和法国，英国应当放弃有关现金支付的一切要求权。这样，德国支付的赔款，全部可以优先用于补偿那些受到敌人实际侵占的国家和地区的物质损害。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的总额达 15 亿英镑的赔款就足以满足欧洲复兴所需的花费。还有一点，1918 年大选后英国代表们所奉行的政策方针使英国对毁约负有主要责任，因此英国只有

完全放弃它对现金赔偿的权利要求，才能问心无愧地提出修正和约的要求，才能恢复由于毁约而损害的声誉。

赔偿问题这样澄清之后，就有可能在更为宽松、成功希望更大的情况下，提出另外两个财政方面的建议；当然，这两个建议的实现必须依靠美国慷慨大方的援助。

第一个是各协约国之间（也就是各协约国政府之间）由于这次战争而造成的债务应当全部取消。这一建议在某些地区已经实行。我认为，它对世界未来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英国和美国这两个主要的强大国家来说，采取这一建议将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举措。这笔债务，以货币计量时，大致如下表所列（数字单位是百万英镑）①：

借出者 / 借入者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总　计
英　　国	842	—	—	842
法　　国	550	508	—	1058
意 大 利	325	467	35	827
俄　　国	38	568	160	766
比 利 时	80	98	90	268
塞尔维亚与南斯拉夫	20	20	20	60
其他协约国	35	79	50	164
总　　计	1900	1740	355	3995

① 这里所列的数字，部分是估计的，也许在细节上不完全准确。

假定某一协约国的借出与另一国的借入彼此不相抵消的话，根据上表，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额总计约40亿英镑。美国是仅有的一个单纯借出者；英国的借出额约是其借入额的两倍，法国的借入额约为其借出额的3倍；其余的各协约国都是单纯的借入者。

如果上述各协约国之间的债权互相抵消，从理论上讲(即假定一切贷款都是有效的)，美国放弃的债权约达20亿英镑，英国放弃的约为9亿英镑；法国将得到约7亿英镑，意大利得到约8亿英镑。不过这些数字夸大了英国的损失而低估了法国的所得，因为这两国的贷款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给予俄国的，而我们无论如何想像，也不能认为它有回收的把握。如果把英国借给其同盟国的贷款按原额十足价值的50%评定(这是一个武断但很方便的假定，英国的财政大臣曾在许多场合下采用这个数字，以它作为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依据并不比其他任何依据差)，那么这样的建议将使英国既无所失，也无所得。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计算，净结果只是理论上的；如果能利用它使目前的状况清晰化，从而解除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安心理，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在这一条建议方面，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慷慨解囊。

关于英国、美国和其他协约国之间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财务关系，经过深入的了解，我认为，如果欧洲能够在其他方面做出有价值的尝试，不再为政治、经济或别的方面原因继续发生冲突，而是为了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建设，那么欧洲对美国这种慷慨行为的要求是公道的。美国的经济损失同它的全部财富相比，与欧洲各国相比较而言，不知要轻微多少。当然这也是正常的。对于欧洲范围内的这场战争，美国不可能同欧

洲一样倾尽全力，因为这样做，是无法有充足理由向其国民交待的。在美国参战之后，除了美国军队的到来对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之外，它在财政上的援助也是毫不吝惜、无限制的。可以说，没有这种援助，协约国是不能取胜的。

关于美国财政援助的事实固然是这样，但同时我们也心照不宣地假定，我相信美国也是这样假定的，即当初美国出资援助时，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投资来看待的。如果欧洲真的要归还从美国借得的价值 20 亿英镑的财政援助，并且按 5%计收复利，那么这个问题就完全处于另一种状态。如果美国的建议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它相对的财政牺牲的确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目前所建议的债务清偿办法没有被采纳，战争结束以后，协约国之间将形成一个沉重的网状债务关系，债务总额甚至会超过从敌人方面获得的赔款额。于是战争结束之后出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结果，即各协约国相互支付债款，而不是向敌人索取赔款。

由于这个原因，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同欧洲各协约国在赔款问题上的强烈的大众情绪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情绪的出发点，并不是在任何合理计算下，德国事实上能够支付多少赔款；而是建立在一种有根据的认识之上，即除非德国能够支付赔款，否则这些国家的财政情况将处于不堪忍受的境地。试以意大利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正常情况下预计意大利能够支付 8 亿英镑的债务，德国就一定能够、也应当付出比这个数字大得多的赔款。或者，如果认为(事实上就是这样)奥地利所能偿付的几乎等于零，那么得到的结论就是，意大利将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奥地利却逃避了偿还的义

务，这种结论难道能够令人接受吗？或者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当意大利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付出的债款极小或几乎没有时，怎么能够期望它毫无怨言地支付这么大的债款呢？对于处于另一种形势下的英国而言，它的财政状况与意大利非常不同，因此要求我们支付8亿英镑，与对意大利提出同样要求相比，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在感情上的反应却无差别。如果我们必须接受从德国不能获取全部赔款这一事实，向美国支付债务肯定会引起国人痛苦的抗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满足于对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处于破产状态的财产持有债权，而美国却对我们持有优先债权占有权。法国至少存在与我们一样的问题：它从德国所获取的赔款，只能够用来补偿国内遭受的损失；然而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却必须支付它的友邦和其他协约国家的债款，其数额比1870年战败时它付给德国的赔款，还要超过4倍以上。这样看来，俾斯麦的铁腕给法国带来的损失与某一个协约国或同盟国相比，还算是轻的。当各协约国的人民不可避免地面对关于向敌人索取赔偿的真相时，要使他们的心情不至于因为这样无情的现实而过于激动和愤怒失常，则协约国之间债务的清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准备条件。

关于欧洲各协约国不可能支付这些债务的本息的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不过对它们而言，这也的确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因此可以推想而知，它们肯定想千方百计地逃避这项债务；而这种逃避行为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将成为各国之间产生摩擦与不满的一个经常存在的根源。一个债务国家对它的债权国是不会有好感的。如果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由于必须向英国和美国年年偿还债务而使它们的发展前途受到阻碍，

那么期望它们对英美抱有好感简直是异想天开。在这种形势下，它们将会尽力向其他地方寻找它们的盟友，这样在将来和平关系发生破裂时，会给它们带来一个巨大的有利条件，即完全逃避了外部债务的负担。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这笔巨大的债务取消的话，那么对不久前才联合起来的国家之间真诚友谊的巩固无疑是巨大的鼓舞。

巨额战争债务的存在，对任何地方的财政稳定都是一种威胁。债务的拒付问题，在欧洲是迫在眉睫的严重政治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例外。就内债的情况而言，在债权债务两方面上都有利害关系的政党所争执的只是国内财富分配的一个问题。外债的情形有所不同，债权国家不久就会发现，他们的利益与债务国家某种特殊的政权方式或经济组织的维持相互纠缠在一起，国与国之间联盟引起的纠纷根本比不上欠债引起的纠纷。

最终读者对本篇有关建议的态度能被影响到何种程度，主要取决于读者对战时财政遗留下来的在我们国内和国外存在的大量债务纠纷的看法，取决于在他看来，这类纠纷在世界进步中的地位。战争结束以后，双方（无论谁对）都欠下了巨额债款。德国欠协约国一大笔钱；协约国欠英国一大笔钱；而英国又欠美国一大笔钱。就每个国家来讲，政府对战争债券持有人欠下了一笔巨额债款，同时这些债券持有人和其他纳税人又欠了政府一笔巨额债款。整个形势显得非常不自然，令人迷惘和烦恼。除非能解除这些束缚着我们四肢的债务桎梏，否则我们将寸步难行。对于这些债务进行一次普遍的肃清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在肃清过程中做到有条不紊、温和宽厚，对任何人都必须公正合理地对待；否则这种做法最终会造成一

场灾难,使各国遭受严重的破坏。至于内债,有人认为为了消灭债务,可以对资本课税,这对每一个欧战参战国家的财政健全是一个绝对的先决条件;我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各政府之间大规模债务的继续存在却有其独特的危害性。

在19世纪中叶以前,没有一个国家对外国会欠下数目相当大的债款,除非是由于实际武力侵占下的勒索,或是封建主义制度许可下的君主们的命令。诚然,欧洲资本主义出于在新世界中寻找出路的目的,近50年来,甚至现在,在相对比较适中的规模上,使某些国家(如阿根廷)对某些国家(如英国)发生了逐年偿付的债务关系。但是这种体系是不稳固的,它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对支出国家来讲,它的负担并不十分严重,因为这种负担有实际资产作后盾,并普遍与财产制度相结合;还由于已经借出的款额与借入者希望继续借入的数目相比并不十分庞大。银行家们对这种体系已经习以为常,认为这是社会持久状态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至于这次战争所形成的各个政府之间的债务关系,规模非常大而且也是具有强制性的,既没有实际财产作为债务的后盾,与财产制度的联系也较为疏松;但是这些银行家们以他们已经习惯的上述体系为依据,倾向于认为这种政府之间的债务关系也是自然的、合理的,是与人类性情相融的。

我对这种世俗见解很是怀疑。国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博得了许多地区的支持,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实际作用,并且目前的社会组织大部分依赖于它,但它仍然不是十分安全可靠的。即使我们认为这种制度是可靠的,但是如果让欧洲人民的未来一代这样安排他们的生活,即要他们将日常生产中的很大一部分用来应付对外支付,至于支付的原因,

无论是欧洲与美国之间，还是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都不是出于正义感和责任感的驱使，试想，欧洲人民对此能满意吗？

一方面，从长期来看欧洲必须依靠它自己日常的努力，而不能指望美国的慷慨解囊；但是另一方面，要把它每日的努力成果让给别人，它也是非常不愿意的。总之，我认为这类债款的偿付至多不会超过几年，因为这类支付既不符合人类的性格，也不符合时代的精神。

如果说这种思维模式有一些力量的话，那是由于适宜的策略与宽宏大量相互协调存在的结果。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直接友谊关系的政策，是不会同那些乐善好施的国家的长远利益发生冲突的。

三、国际贷款

让我们再看一看第二个财政方面的建议。欧洲对这个建议的需要是刻不容缓的。假使在此后经历的两代过程中，欧洲对英美的沉重债务负担可以免除（而且在重建费用方面还能从德国获得某些资助），就会使欧洲在将来不致出现过度紧张与忧虑的状况。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欧洲目前所面临的病态——严重的贸易逆差、不利的汇率，以及通货的紊乱。如果没有一种短期的外部援助措施，欧洲的重新恢复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对于在法国、德国、英国以及美国的许多地区倡议的某种形式或方式下的国际贷款，我表示拥护。关于偿还贷款的最后责任无论如何分配，贷款来源的主要部分不可避免地要由美国承担。

对于这类计划的各种形式持反对意见的主要论调，据我所看大致是以下所列。美国已经不愿再进一步卷入欧洲的事务(经过最近的某些经历)，而且目前无论如何它也没有余力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至于欧洲获得这项财政援助之后，是否能进行适当的利用，会不会白白地浪费，这都是没有保证的。也许过了两三年后，糟糕的情形依然如故，可以想像这样的情形——克洛茨先生获得这笔钱后，就会把征税的日期向后推迟一些，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由于此项收入又将相互攻击，波兰则会借此完成法国为它设计的军事角色来对付自己的邻邦，罗马尼亚的各统治阶级会私分这些贷款。总之，为了让欧洲在一两年内继续在行动上、政策上以及人力的使用上维持过去 9 个月的水平，美国也许将推迟自己的资本发展，提高自己的生活费用。至于德国，欧洲协约国竭尽全力才把它的最后一点营运资本剥夺过来，但由于与美国财政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主张及立场相反，却反而让美国出资使它得以充分恢复，从而在一两年以后又施展它的掠夺手段，这难道是合理的、能够令人容忍的吗？

就目前而言，对于这些反对意见实在无法答复。如果我能对美国财政部施加影响的话，我肯定不会借给欧洲任何一个现任政府一分一厘。这些援助是不能托付给它们的，因为它们会借此用来扩张那些美国所讨厌的政策。尽管美国总统没能支持其人民的力量或意志，但共和党和民主党对这类政策的态度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在今年冬季，欧洲人民的灵魂能够——当然也是我衷心企盼的——从那些由战争造成的、存留于战争之后的错误观念中摆脱出来，抹去他们心中的仇恨情绪和国家主义观念，而代之以欧洲大家庭幸福和团结一

致的思想和愿望，那时，美国人民一定会被人类固有的同情和恻隐之心所打动，就会抛开由私人利益出发而造成的一切芥蒂，而尽全力去帮助欧洲从有组织的暴力专政中解脱出来，使它能够自力更生。即使欧洲的这种转变不是全面的，即使在欧洲的各个国家中，只有一部分党派奉行这种和解政策，美国仍然能够为这些和平的党派指明前进的方向，并且通过在某种计划和条件下为他们提供重新开始生活所需的援助的方式给予支持。

据说美国目前迫切希望从欧洲混乱的、复杂的、充满暴力的和奢侈浪费的局面中摆脱出来，总之，距离欧洲整个问题难以究诘的种种纠葛越远越好。当然，美国的这种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欧洲一些政治家们的愚蠢和顽固，的确应当受到谴责，关于这一点，相信没有比作者本人感受更深切的了。就像某个怀着恶意的无聊的人说道："欧洲是一个屠宰场，充满着肮脏和堕落的气味，它的希望已化为灰烬，让我们远离欧洲吧！让它自生自灭吧！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

但是美国如果细心回忆一下，会发现欧洲在过去对它很重要，而且现在仍然对它很重要。对于欧洲而言，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它现在仍然是，而且将来也仍然是艺术和科学的源泉所在，难道美国不应该抛弃那些冷漠无情和分离主义的想法，而对那些对全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也许会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产生兴趣吗？

假定美国准备在重建欧洲良好的军事力量过程中提供帮助，而且使我们在完全摧毁了敌国之后不再处于不幸的境地，如果我们想保持未来的希望，美国的援助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呢？

我不打算谈论那些具体问题。不过关于国际贷款的一切

计划在大体纲要上基本上是一致的。能够提供援助的国家，如某些中立国家、英国，以及提供大部分贷款的美国，对欧洲大陆所有的交战国，无论是同盟者还是以前的敌人，都必须一视同仁地提供具有对外购买力的贷款，需要的贷款总额也不必如某些方面所估计的那样巨大，也许初步贷出的约 2 亿英镑的基金就可以起到很大作用。即使协约国之间债务的取消已经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先例，但是这次国际贷款却与以往完全不同，借出者与借入者必须明确，贷款必须全部偿还，而不允许有任何拖欠。在这样的宗旨下，贷款担保就要求尽可能地确切可靠，关于贷款最终偿付的安排也应当尽可能地周全。特别是，这项贷款，在要求资本清偿和利息支付两方面，相对于一切赔偿要求、一切协约国之间的战债、一切国内战债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所有政府债务，享有绝对的优先索取权。那些可以获取赔偿的国家应该保证将这项赔款收入全部用于新贷款的偿还。一切借入国家都应当以金本位安置其关税，并保证将这项收入用于偿还新贷款。

关于贷款的使用应当在原则上，而不是细节上，接受借出国家的监督。

这笔贷款是用于购买食品和原料的。如果除此之外，再设立一项具有同样数额，即 2 亿英镑的保证基金（其中现金也许只需占到一部分），凡属于国际联盟的会员国，都应当根据自身的力量参与其中，这样以此基金为基础进行一次普遍的币制改革也许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办法。

在这种安排下，欧洲就可以获得必要的最低数额的流动资源，从而能够重新唤起它的希望，改革它的经济组织，发挥其巨大财富的作用为工人谋福利。就目前来说，对这类计划作

进一步的详细论述是没有必要的。在本章所提的建议成为政府的实际事务之前，公众舆论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耐心等待事态的进展。

展望前途，我看不到有什么地方会发生突然的或戏剧性的演变的预兆。也许会发生暴动和革命，但在目前形势下，却没有重要的意义。革命用于反抗政治暴君和不公道时，是一件有力的武器。但是当经济贫乏并不是由于分配的不公平而是属于一般现象时，对于那些受苦的人们而言，革命又能带来些什么希望呢？要防止中欧发生革命实际上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要使那些不惜生命而冒险的人明白，革命并不会带来改善现状的任何希望。因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将处于一种半饥饿和生活与舒适水准逐步地稳定地降低的状态之中，而且我们必须要默默地忍受这种状况。欧洲正处于破产和衰落之中，如果我们任其自然，将会影响每一个人，也许影响的方式不是显著的、立即的，但在长期中，这种影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当然也有幸运的一面。我们还有时间来考虑我们的行动方针以及以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在不远的将来，事态的进展将起主导作用，欧洲当前的命运已不再掌握在任何个人的手里。来年事态的演变，不取决于政治家们处心积虑的所做所为，而取决于处于政治历史表面以下的、不停流动的潜在趋势，而趋势的方向没有人能够预料。对于这种潜在趋势，我们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加以影响，那就是动员那些能够改变舆论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扩大想像作用的力量。我们所必须坚持的方法就是坚持真理，破除幻想，消灭仇恨情绪，并进行教育，开阔人们的心胸和提高人们的理性。

第四篇 舆论的转变

（1921年）

近代政治家们的执政手法就是随声附和，民众要求什么，他们也跟着主张什么，所实行的政策也是同民众所讲的那些要求保持一致。他们相信，依据愚蠢言论而实施的愚蠢行为不久就会自行暴露，到那时，他们就有机会丢掉这些愚蠢的政策而偷偷溜回到比较明智的政策，这就是蒙特梭利[①]式的儿童教育法——儿童就是民众。他的所言所行，如果违反了这个儿童的意向，他就得让位于别的老师。因此，对于刺耳的论调，有弊无利的行为，不妨称赞一下，甚至还可以加以鼓励；然而在暗中却要保持谨慎，等待着明智、仁慈的社会救星，一旦时机到来，就突然转向，恢复固有理智。刚才是随声附和，而现在是在一旁静听了。

① 蒙特梭利是意大利女教育家。——译注

对于这种可怕的政治手腕，我称之为狡黠的自卫行为。劳埃德·乔治先生是和约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和约的内容既不明智，有些部分也不可能实行，对欧洲的生活具有危害性。他为自己辩护时可以这样说，这个和约不明智，有些部分也不可能实行，而且对欧洲的生活有危害，这些他都知道；但是民众的热情和愚昧无知在事态的进展中有一定的作用，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领导人，他不能不顾及这一点。凡尔赛和约是最好的暂时解决办法，它同民众要求和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情是两相符合的。至于欧洲的生活，两年来他已经耗尽了他的智慧与力量，去避免或减轻由此造成的危害。

这样的声明未尝不是部分正确的，我们不能一概抹杀，而且劳埃德·乔治先生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就和平会议的内幕经过来说，法国和美国的参与者对他多少有些好评，认为一般说来，在不致使和约过分极端化方面，他已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当然，他的短处在于太看重个人地位。就这两年的公开情况而言，他所表现出来的是，就其权力所及地从多方面使欧洲免除了许多可能由和约造成的不良后果，在这一点上，很少有人能够比他做得更好。他虽然没能保证欧洲的繁荣，但却保持了欧洲的和平。他的言语所表达的真理很少，但在行动上却往往出于真理的驱使。因此，他仍然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个忠实的公务员，是为人类服务的，尽管所遵循的途径是曲折的。

他认为这是在民主制度下能够利用的最好的方法，在正确道路的前进途中，不妨可以使用一些欺骗、奸诈的手段。如果目标是真理或诚挚，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可以用某种审美观或以个人标准为依据的判断，在政治方面，不必与实际的美德相符合。

这是一种令人迷惑的手段。当政治家们在这个时期以前积累起来的声誉逐渐消失时，这种魅力是否仍然能够发挥作用呢？我们不敢断定，即使民众，也是通过经验才知道的。

不管怎样，私人与内阁阁员们是不同的，他无须像他们那样承担为了公众福利而牺牲真诚的义务。对于个人而言，他可以畅所欲言、信笔直书，这是公认的个人自由。也许这种个人自由甚至是政治家们所加以利用、并使之共同发挥作用的一大堆事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为了我们的最终利益。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以对凡尔赛和约的直译，作为《和平的经济后果》一文的依据并没有什么过错。我认为和约中的许多部分都是不可能实行的，但我并不同意许多评论家以此为依据，得出的和约没有害处的结论。内部意见从一开始就对我关于和约的许多主要结论表示赞同，但也不能由此就说，外界意见对这些结论的接受就不重要了。

就目前来说，出现了两种意见或观点，它们不是像以往那样有真假之分，而是有了外界和内部之分。公众的意见由政治家们和报纸来表达，而政治家、新闻记者和文职公务员，以及台上、台下和幕后的意见只是在有限的圈子内流传着。

生活在这种有限的圈子内并共有内部意见的那些人对外界的意见既过于重视又过于轻视。说过于重视，是因为他们对待舆论，不论在口头上，还是作出许诺时，总是准备在一切方面随时让步，认为公开的反对是根本没用的；说过于轻视，是因为他们认为口头之言和许诺在一定的时机下注定要发生转变，因此分析其中的实在意义和具体后果是做作的、令人生厌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他们对评论家所讲的几乎完全明白，因

此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评论者是在浪费他的时间和感情，他所为之冲动与兴奋的那些事物，他自己也明白，是不可能发生的。生活在这种圈子里的人们觉得他消息灵通、见多识广，彼此交谈着外人所不知的内幕情况，在他们看来，内部见闻使他们具有一种优越感，即使是在内部意见向外界意见低头的那一刻。然而，在世界面前公开发表的意见所产生的后果还是比上述的那些窃窃私语所引起的影响，要深刻得多。

但是还存在着进一步的复杂情况。在英国（也许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就有两种外界舆论或意见，一种是由报纸来表达的，还有一种是普通民众私下谈论并信以为真的。当然，这两种外界意见之间的差别程度，较之内、外部意见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在某些方面两者是合二为一的。然而在表面之下两者是有真正区别的：一个是报纸上的教条主义和固定模式；一个是个人的活跃的、变幻莫测的信念。我认为，即使在 1919 年，对于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来说，他也从来没有真正地相信过关于德国赔款的这种事情，他总是留有余地地、带有几分疑虑地去对待它。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他看来似乎这类赔款政策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实际损害，而且，就他当时的情绪而言，他那种认为德国有无限赔偿能力的想法，尽管不是很现实的，但比起与之相反的想法，在感情上还是较好的。因此近来英国外界意见的转变，只部分地属于智力方面，主要的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因为这时他已经看到，再坚持原有赔偿方法必然会造成实际损害，另一方面他在感情上的要求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强烈。于是他也就愿意参与一些讨论，当然这些讨论的内容他以前不是不明白，只是根本不正眼看待它们。

外国观察家很容易忽略这些未经行诸笔墨的感念，但报

纸迟早总会反映出来。内部意见逐渐向外渗透，流传的圈子越来越大，从而影响外界的观念，因此这类观察对事实论证、常识或自我利益有及时的敏感反应。对于现代政治家来说，准确地了解以下三种程度的事务是他分内的事。为了能够了解内部意见，他必须有足够的智力；为了能够发觉内层的外界意见，他必须有丰富的同情心；为了能够表达外层的外界意见，他必须有极厚的脸皮。

这里所做的分析，无论是依据事实的还是出于想像的，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近两年来民众的感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民众最重要的愿望是过上一种恬静的生活、较少地受到约束，以及和邻居们和睦相处。疯狂的战争已经过去，每个人都希望面对现实。由于这些原因，有关凡尔塞和约的赔偿条款正在消亡。现在，实施这些条款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第五篇　战债和美国

一、战债取消问题(1921 年)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此后的一代或两代期间内，协约国对德国政府将施加足够的压力，也就是说，德国政府能够对它的人民充分使用权力，从而不断地、大规模地从强迫劳动中榨取劳动成果。谁会相信这种说法呢？没有人会真心相信的，可以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对此事要想坚持到底，简直一点可能性也没有。否则，若这件事可能做到的话，那么我们根本不值得在两三年间，打乱我们的出口贸易、扰乱我们的工业平衡，更不值得由此而危及欧洲的和平。

关于美国以及它对各协约国政府所欠战债索取问题上的修正，所适用

的原则与以上所述基本一致。美国的工业将会受到损害，其原因主要不是来自协约国方面为了偿还债务而大量出售廉价商品的竞争，而是来自于协约国方面无力再用以往那种规模向美国购买出口品。协约国为了偿还债务，所使用的手段不是在于多卖而是在于少买。这样的状况将导致美国的农场主所受到的损害大于工厂主；要防止进口增加，可以借助于关税，可是要促进处于衰退中的出口，却并不存在简单易行的办法。然而令我们感到惊诧的是，华尔街和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已经准备考虑战债修正问题，而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据说（其间的细节我并不十分清楚）都极力反对。两年来还没有协约国被要求支付现款，在这个期间，英国的工厂主对于当支付实际开始时对他们将发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一点，还完全不明白。目前，协约国方面还不需要开始向美国支付现款，美国的农场主同英国的工厂主一样，对于当协约国认真逐期全额支付时，他们将受到什么样的损害，也一无所知。

对于美国以及英国而言，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对某些特殊利益造成的危害（危害程度会随着时间的进展而逐渐减弱），而在于战债的索取未必能够持久下去，即使在短时期内实现了战债的支付，但不能断定因此就会长期继续下去。我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由于我对欧洲各协约国的偿付能力深表怀疑，而且还由于美国所面临的严重困难问题，因为它无论如何也要在与旧世界体制相比下，使其商业利益保持平衡。

美国的经济学家近来从统计角度出发仔细分析了战后以来的变化情况。根据他们的估计，目前除了所有各协约国政府应付美国战债利息完全不计之外，在外国投资利息上，美国所拖欠的超过了已收到的；在商业航运方面，它从国外赚取的超

过了在同样服务下它向国外支付的。它每年商品出口超过进口约 30 亿美元;在收支平衡表的另一方面,它的对外支出,大都是游客和侨民的汇款,主要是付给欧洲的,估计数额每年不超过 10 亿美元。因此,为了平衡它目前的账目,美国必须以各种形式,每年向外贷出资金,数额不低于 20 亿美元。此外,如果欧洲按年照付各政府的战债本息,那么,美国的贷款要增加 6 亿美元。

因此,美国最近每年都向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贷出约 20 亿美元的资金。幸运的是,对欧洲而言这笔贷款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由于投机性买卖造成纸币贬值而损失掉了。从 1919 年到 1921 年间,美国的商业投机者遭受了损失,而使欧洲得到了实惠。但这种收入的来源只是一时的,不可能是长久的。就一时而言,贷款政策能够满足形势的需要,但是随着贷款利息的逐渐增加,长久下去,必然会造成形势的恶化。

商业国家一般都把大量资金用于海外贸易方面。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国外投资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产物,是非常不稳固的,而且只适于很特别的环境。当某个新兴国家无法单单依靠自身资源而发展时,它可以一时借助于此种方式得到先进国家的帮助而获得发展,这样的做法使双方都能获利,由于借入国家的发展形成了丰富的收益,借出国本息的收回也有了保障。但是这种方式所适用的情形不能颠倒。如果欧洲也效仿美国 19 世纪期间在欧洲发行债券的方法,在美国发行债券,那么这种效仿绝对是错误的,因为,总体而言,其间并没有自然的增长,并没有可靠的偿债基金用以偿还债务的本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够做得到,借入国就会用新贷款来偿还利息,债台将越筑越高,到后来就不必再有幻想认为债务后

面还有坚实的基础。所以说，美国投资者对欧洲债券没有什么兴趣，不愿意购买，是以常识为依据的。

1919年底，我曾提出（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可以由美国向欧洲出借一笔重建贷款，不过有一个条件，欧洲必须整顿一下其内部事务。在过去的两年中，尽管欧洲的看法相反，多有怨言，可实际上美国的确放出了为数极大的贷款，比我原来建议的数目要大得多，虽然在形式上并不主要是那种正规的美金债券。这些贷款并没有附加什么特别的条件，结果其中的大部分都损失殆尽了。尽管浪费了部分资金，可是在休战之后这笔资金还是帮助欧洲渡过了最危急的一段时期。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贷款的继续并不能为欧洲债务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

世界上某些比较落后的新兴地区，如英属自治领地和南美洲，它们所需要的资本，过去是由英国、法国和德国（比较小规模地）提供的，此后这一任务将由美国代为执行，这样对欧洲收支不平衡能够起到部分的调整作用。俄罗斯帝国，不论是在欧洲或是在亚洲的部分，可以被看作是未经开发的处女地，将来也许是外国资本的一个适当的出路。过去英国和法国的投资者常常把资金贷给这些地区，现在美国的投资者也可效仿，这比直接贷给欧洲的古老国家要明智得多。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把美国收支相抵后的差额完全弥补起来。最终，也许不久，美国必须重新调整它的进出口差额。美国必须多买少卖，这是它唯一可采取的方法，否则就得向欧洲年年作无偿的赠送。美国的物价上涨速度必然会超过欧洲（如果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对黄金的流入任其自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美国想人为地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也会由于欧洲外汇的进一

步贬值而导致同样的结果，因为欧洲无力购买，只好缩减其必需品的进口。这样美国的出口就会减退，但出口商总不能立即废弃为出口而设置的生产布局，起初也许可以通过降低价格的办法来适应形势的变化，但这些办法持续下去，譬如说一两年后，就会出现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状况，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要缩小经营范围，或者完全放弃这种经营。

对于美国来说，如果想通过一方面使出口至少维持现状，另一方面借助于关税来限制进口的方法达到平衡状态，可以说，这种打算是不可能的。这正如同协约国一方面对德国提出巨额赔款要求，一方面又费尽心机使它不能支付赔款那样；美国一方面想出种种办法来资助出口，可另一方面关税又使这项资金的偿还尽可能地出现困难。一些愚蠢行为，作为个人行为时我们是不会原谅的，可是一些大国却往往在做这种傻事。

现在世界各地所有的黄金都流向美国，在那里金子堆得像山一样高，这时让这种流势暂时停顿一下，也许对美国是有益的。但是这种做法会导致一种结果，即美国一方面拒绝黄金的流入，可另一方面又要求偿付贷款。这就成了一个新型的米达斯①，他心里想多要一些美酒佳肴，而根据和约他得到的只能是不结果实的金属块。

不管怎样，美国在政策方面的重新调整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会使某些重要的利益受到损害。假如除此之外，美国仍然要求协约国偿还债务，就会出现令人难以接受的情况。如果它坚持到底，放弃它的出口工业，把这方面的资本改作别用；

① 希腊神话中小亚细亚古国佛里加的国王，相传任何东西一碰到他的手就会变成黄金。——译注

同时如果原来作为友邦的欧洲国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偿还债务，那么，我不否认，最终的结果也许会使美国得到利益。然而这种想法是完全虚妄的，是不会发生的。毫无疑问，美国是不会贯彻执行这类政策的；当它体验到了这类政策所导致的初步后果时，它会立即放弃初衷。即使它真的想坚持到底，协约国也不会偿还欠款。这种情形与德国赔偿非常相似。协约国目前对德国提出的赔偿要求无法贯彻执行，同样，美国收回协约国债务的工作，也无法善始善终。归根到底，两者都是未经严肃考虑的政见。几乎所有的消息灵通人士在私下谈话时都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时代里，报纸的言论好像故意设计好似的，总是与消息最不灵通那些方面的意见，而不是消息最灵通那些方面的意见保持协调一致，因为前者的传播范围更广泛一些；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报纸上写的与嘴里说的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有时这些矛盾是非常可笑的、荒谬的。

假如情况果真如此，美国要执行在使它获利之前就应当放弃的政策，必然要导致它与欧洲关系的恶化，还要在两年内打乱它的出口工业，这不会给它带来什么好结果。

有些读者喜欢一种抽象的理论分析，为了他们的方便，我在这里把有关论点归纳一下。国际贸易均衡的基础在于世界各国的农业和工业复杂的平衡关系，以及各国在劳动力与资本使用上的专业化。如果某个国家必须无偿地向另一个国家转让大量商品，那将会破坏平衡，因为上述做法是这种均衡关系所不允许的。由于某些资本和劳动力是固定组织起来用于某种用途的，是不能自由地转向他用的，因此平衡的干扰对于这样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效用会造成破坏作用。现代世界的财

富主要是依靠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组织将受到损害。经过一段时间，新的组织和新的平衡是可以建立的。但是，如果产生干扰的起因是暂时性的，因组织受到损害而造成的损失也许会超过当初无偿获取商品所带来的利益。不仅如此，由于损失主要集中在使用于某些特殊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力上，这会引起该行业劳动者强烈的反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将远远超过整个社会所受到的损失。

我同许多美国人讨论过这类问题，他们多数表示个人赞成取消欧洲的债务，但是必须考虑到他们同胞中大多数人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所以，这项建议目前还不可能成为实际上的政策。因此，他们认为目前有关此事的讨论还为时过早，因为美国必须佯称要求偿付欠款，欧洲也必须佯称要支付债务。的确，这同 1921 年年中时，德国赔偿问题在英国的情形极其相似。毫无疑问，我的美国朋友认为公众的舆论是正确的，舆论具有神秘的本质，也许同卢梭所讲的“共同意志”是一类事物。但是不管怎样，我不会认真对待他们所告知我的东西。公众舆论认为在面子上一定要冠冕堂皇一些；尤其又是在美国，公众舆论有时就像彼此约好的一样，突然转向。

如果公众舆论这个东西是不可改变的，那么讨论公共事务就是在浪费时间。对于新闻记者和政治家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也许是在于确切掌握舆论的一时特征，但对于作家而言，他应当关注的是公众舆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我之所以提到这些陈词滥调，是由于许多美国人都劝告自己不要提出目前公众舆论所不赞同的建议，否则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据我了解，在美国，这类举动会被看成是轻率鲁莽的，会立即被怀疑有某种不正当的动机；犯过这种错误的个人，就会被要

求进一步调查他的个人品质和履历。

让我们再略微深入一步，了解一下构成美国人对欧洲债务问题的态度的那些观念和情绪。他们是想对欧洲慷慨大方的，这一方面是出于善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在有许多人怀疑任何其他措施可能会危及他们自己的利益均衡。但是他们又不想这么做。他们不愿意再次受到别人的指责，说他们到底对付不了那些老奸巨滑的欧洲人。再说，时机也不凑巧，赋税压得很重；美国的许多地区觉得眼下并不十分富足，因此对于这笔可能到手的财富还不能轻易放弃。还有一点，关于共同作战各国之间的债务问题，他们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债务问题非常类似于个人之间的普通商业往来中的债务问题。他们说，这就像一个银行放了一笔没有担保的贷款，开始时他们也知道接受贷款的客户正处于极度困难之中，如果没有这笔援助，他势必会破产；但事后向他索偿时，他却撕毁合约，拒不付款。如果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商业信用的基本原则将受到损害。

我想，普通美国人肯定愿意看到欧洲各国人民向他们走来，手持钞票，眼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说道："美国，多亏你我们才有了今天的自由和生活，现在我们以由衷的感激之情向你还钱来了，但这些钱不是通过强征暴敛从孤儿寡母身上榨取血汗而来，而是由裁减军备、废除黩武主义、取消帝国和放弃内部争论而节省下来的胜利果实。你给我们的无偿援助才使今天的局面成为可能。"普通美国人则回答道："我们对你们的诚笃表示敬意，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谋利或寻找更好的投资场所而参战的。我们已从你们刚才的一席话中得到了补偿。那些贷款已经一笔勾销。回家去吧，用

我们让与的这笔财源去改善穷困不幸者的处境好了。”美国人的回答令人无不为之惊讶，这将是这幕对白中的核心部分。

可悲呀，这人世间的邪恶！我们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得到我们所珍视的感情上的满足。因为只有一些个人是心地善良的，而所有国家概莫例外地都是可鄙、残忍而狡诈的。许多首相、总理们会叮嘱他们的私人秘书，用适当的措词拟稿，在发出的电报中说，美国的行为为世界历史写下了最重要的一页，表现出美国人是人类最高尚的部分。但美国不必认真，决不能就此以为对方真的是怀有确切、真挚的感激之情。

二、贝尔福备忘录(1925 年)

丘吉尔先生在去巴黎之前，发表过关于贝尔福备忘录的中心信条。在从巴黎归来之后，他又再一次提到了这一点。“贝尔福备忘录，”他说，“是我们亲手制定的行动原则，我们必须坚决遵行。”也许正是“我们亲手制定的”这句话或多或少为他的讲话增添了些许光彩。我们衷心地希望丘吉尔先生能改弦易辙，否则我们只好再次摒弃他的解决方案，即使在他看来，这一方案是我们亲手制定的。

贝尔福备忘录坚持认为我们来自德国方面的收入，加上来自协约国方面的收入，必然等于我们向美国的支付。当备忘录刚发表的时候，我们还无法确定它的影响。因为我们不知道法国必须支付多少，也不知道这笔支付额相对于德国支付给它的数额，占多大比例。现在对于这两个总数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体上的估计。

我们必须每年支付美国约 3500 万英镑，以后还会增加到

4000 万英镑。根据道威斯计划，如果计划能够充分实施，在实施过程中，除去先行扣除的各项费用外，每年由德国支付的赔款约为 1 亿英镑。其中法国可以获得约 5400 万英镑，意大利 1000 万英镑(刚开始少一些)，我们所得为 2400 万英镑(我省略了一些较小的协约国应得的数字，因为这样做会使计算复杂化，而且对结果几乎没什么影响)。由此可见，贝尔福备忘录要求法国和意大利每年向英国支付的数额，不得低于 1600 万英镑。以这两个国家的欠款总计，它们欠我们的与欠美国的大致相等(在意大利的负债总额内，我们占的份额较大；而在法国的负债总数内，我们所占的份额较小)，我们假定美国从它们那里收回的债款不会低于我们的所得。如果意大利将所得的赔款全部用于偿债，根据上述的假定，法国应该偿还 2200 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债务清算和道威斯计划的净结果是，各国从德国获取的赔款将按下列份额来分配：

英国	0
意大利	0
法国	3200 万英镑
美国①	5800 万英镑

当然，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谁会相信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但这还不是我们批评贝尔福备忘录的主要理由。如果道威斯计划的完美实施能够实现上述情况，如果道威斯计划只是部分地获得成功，那么根据贝尔福备忘录的原则，法国一方面从德国获取赔款收入，一方面向我们和美国支付债款，两者

① 包括它本身直接所得的部分。

之间的差额则由它自己来弥补。举例来讲，如果道威斯计划所规定的最高赔偿额只能实现一半——这在许多有经验的观察者眼中，已经是相当不错的结果——这时法国将一无所得，甚至还可能更糟，它从德国获取的全部赔款还不够支付给美国的债款。如果道威斯计划实施得相当顺利，法国在事实上将成为美国、英国之后的第三债权人。如果道威斯计划进行的情况不怎么好，法国则成了德国的担保人。难道会有人愚蠢到如此地步，相信这种情况也可以成为现实吗？

显然，法国决不会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不过让我们姑且先假定法国同意这种做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讲，英国和美国对于道威斯计划，不管它执行或进行的情况如何，已经不再有任何利害关系。法国将成为唯一的利害相关者——它不仅是一个债权人，同时也是一个担保人，对于任何缺额，它必须负责补足。

关于贝尔福备忘录的反对意见，是由它的内在性质所决定的，是无法调和的。备忘录的主要精神是，德国支付得越少，法国付出得越多；也就是说，法国越是无力支付，就越是要多付些。不论从外交上还是财政上看，都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颠倒是非的观念。如果贝尔福备忘录果真实施的话，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分一厘，而且，我们作为法国与德国之间的调停者所拥有的外交权威势必完全丧失。外交部为了自己可以获取些许蝇头小利而贸然出卖了国家的威信，结果财政部损失巨大、一无所获。

因此，贝尔福备忘录的原则是极其糟糕的。要获得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所依据的应当是与这个备忘录恰恰相反的原则，即德国支付得越少，法国也应当支付得越少。法国的

支付总额必须与德国的支付总额同方向变化，而不是反方向变化。这就是我最近建议的原则，它表明法国的支付数额应当是来自德国方面收入的一部分。根据最新报道，法国借克雷蒙梭的讲话也提出了同样的原则。在我看来，法国的支付数额应当占到从德国方面的收入的1/3。据悉克雷蒙梭在讲话中提出的数字，在对美条件相等的假定下，约为我所建议的半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讲话没有商量余地，只要解决办法所依据的原则可行，他有可能提高这一数字。

这样的解决办法，将使我们和美国在道威斯计划下的利益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对于道威斯计划，我们比法国有更大的利害关系。在这种方式下，我们或许可以对美国的债款做出适当的贡献，其数额相当于我们间接从法国获取的收入数额。如此，我们对于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法德之间的问题，就可以站在强有力的道义和外交立场上发挥适度的、和平的影响作用。

由此看来，我们最好是把贝尔福备忘录看作是胡言乱语，否则它将产生很危险的后果。如果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仍旧执迷不悟，继续沉溺于贝尔福备忘录的表面合理性，那么他不仅是在浪费他的时间，而且会由于常识而损害自己的声誉。贝尔福备忘录实在是毫无可取之处——除了美国目前存在着某些混乱认识以外。在美国的孤立主义者看来，事实上只有一种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战债的完全取消。

三、再谈战债取消问题(1928年)

九年以来，围绕着战债取消问题，一直进行着尖酸刻薄的

争吵与谩骂，而如今出现了暂时的平息。但是这种状况并不会维持多久，当道威斯计划着手修正之时，毫无疑问，争论将再次展开。这样的结果是迟早要发生的，不过早一些总比晚一些要好。近几年来由于各方的相互妥协，我们对存在的问题一直是敷衍了事，现在该是动真格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些债务的来龙去脉。战争开始以后不久，我们协约国内的某些国家——起初是俄国和比利时，随后是各协约国——明显地需要财务援助。提供援助的具体方式可以是贷款或补助。不过比较而言，贷款要比补助好些，因为贷款要求较强的责任感，从而使用起来会节省些。但是财务援助即使采取贷款形式，也不能由此认为借出国家最初把它看作是普通的投资性质。如果某些国家果真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太不合理了。我们提供的援助往往是货币的形式，这主要是因为援助人力或船只有较大的困难。例如意大利在战争中初次受到严重挫折以后，我们送去了枪炮，它则用贷款来偿还。但是当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不仅送去枪炮，还相应地配备炮手，他们中有许多人为战争而牺牲。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要求获取任何报酬。因而在战争中做出较大贡献的，在前一种情形下是意大利，而后一种情形下却是我们。特别是美国，在它参战以后的一段时期内，贡献主要在财务方面，因为它那时还不愿意提供其他任何方式的援助。只要美国送来了协约国军队使用的物资和军火，它就把这笔费用记在我们账上，这就形成了我们目前欠下的债款。到了后来，美国也运送军队过来，由他们自己来使用军火，这时它就不再向我们索取任何费用。很明显，在导致我们欠美国战债这件事情上没有多少逻辑性，这笔债款并不是由于提供的援助太多了，而是由于，至少

在人力方面，一开始它能帮助我们的太少了。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给予的财务援助对我们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当美国加入战争的时候，我们的资源，作为一个借出者而言，实际上处于完全枯竭状态。那时，我们仅仅能够做到自给，但已经不可能再援助我们的协约国了。因此，美国的财务援助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自从美国参战的那一刻起，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协约国向美国所要的一切，它都尽力出借，其中包括在支持外汇方面提供资助。但是美国却不发放在其境外使用的贷款。所以，英国为了这些开支，不得不继续向他的协约国贷款——结果是在美国参战之后，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协约国发放的贷款总额几乎等于我们向别人借来的总额。更准确地说，我们在美国参战以后向它借入 8.5 亿英镑，而在同一时期，我们向我们的协约国出借了 7.5 亿英镑。因此，实际的情况就是，美国给我们的贷款与其说是资助我们，还不如说是资助我们的协约国，但美国却一贯否认这一点。

战争结束以后，协约国欠我们的大约是 16 亿英镑，而另一方面，我们欠美国 8.5 亿英镑。

自从战事发生以来，就一直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对于这些战债，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是把它看作与普通商业往来一样的投资呢，还是应当考虑到它产生的缘由以及当时的特殊环境？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它不同于普通的商业往来，不应当如此看待。但另一方面，美国的观点却是，既然是借款，就应当作为借款来看待，这就是说，应该把这些借款看作是到期应付的债券，只是考虑到债务人的支付能力，可以缓和处理一下，所以美国接受一个低的利率，实际上是美国单方面的意愿。

在和平会议召开期间，英国政府主张协约国的战债应当全部取消。劳埃德·乔治先生在1920年8月再度向威尔逊总统提出了这个问题。最终于1922年8月，通过贝尔福爵士的那个有名的备忘录，提出了英国方面经过考虑的意见，以后我们就一直坚持这个立场，从未退让。在这个备忘录中，英国政府宣称只要美国同意取消英国欠它的债款，则它也愿意取消协约国欠它的所有债款，并将自己对德国的赔偿要求权转让给其他协约国。通过这样的安排，从名义上说，英国所放弃的是它所获得的利益的两倍以上。这个提案现在仍然有效。

美国没有接受这一政策，它与各国单方面地分别商定了解决方案。根据它与英国的解决方案，全部债款的利率是3.3%，根据它与法国的解决方案，支付利率是1.6%，意大利的是0.4%。这样，关于利息的负担，英国是法国的两倍，是意大利的8倍。另一方面，英国也与法国和意大利签订了协议，它们承受的利息负担，较之它们与美国协商的，甚至还要轻。具体说来，法国对英国的利息负担较之对美国的负担要减轻10%，意大利则减轻33%。这样，其他各协约国的债务负担大大减轻，而唯独英国还需要负责全部偿还任务，不过就利率本身而言，3.3%的名义利率还是适宜的。

这种解决方案的结果是，到1933年止，英国每年须支付给美国约3500万英镑，以后每年的支付额增至近4000万英镑，一直到1984年，债务关系才会解除。当1923年鲍尔文先生与华盛顿政府协议的详情初次公布时，我对于这一协议下我们将要承受的负担，曾加以计算，有所说明。根据此协议，我们须向美国按年付款，为期达60年，这项支付相当于我们海军费用的2/3，几乎等于我们在教育上的国家支出，超过了我

们战前的负债总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项支付比我们从煤矿和商业海运这两者所得的正常利润相加起来的数额还要大。有了这笔巨款，我们可以在60年的每个月里建成一座富丽堂皇的新学校、新医院或研究所，等等。如果在同一时期作出同样的牺牲，就可以使目前居住条件非常恶劣的居民——占我们人口总数的一半——舒舒服服地住在新建的房子里，从而扫除贫民窟。

另一方面，我们目前来自于协约国和德国方面的收入，对于抵消我们对美国的支付，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建立一个关于这方面的粗略的收支平衡表，是很有意义的。

在1928年，我们将从协约国方面收到1280万英镑，应支付给美国3320万英镑；到1933年，这两者将分别上升为1770万英镑和3780万英镑。这样，除了德国赔款的那部分，我们每年需要支付的战债超过了我们的收入，约为2000万英镑。现在如果德国根据道威斯计划按年全额支付，则我们刚好收支平衡。因为根据道威斯计划，每年的名义赔款总额为1.17亿英镑(除去德国借款利息等项)，其中我们应得的份额(大英帝国其他部分地区所得的收入不计)是2200万英镑。丘吉尔先生曾估计，在1928—1929财政年度，我们的战债支出为3284.5万英镑，而我们的全部收入接近于3200万英镑。

这些收入全部实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过如果我们假定这些收入能够实现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一下目前的情况。这时，每个协约国能够支付给美国的都来自从德国方面的收入。根据目前的协定，各协约国对美国支付战债总额的最高限度为每年8300万英镑(从整个还款时期总计，则每年的支付额平均为6100万英镑)。如果我们加上美国在德国赔款

中的直接所得，则美国每年将收入 7800 万英镑，约占到各协约国从德国方面每年获取的 1.17 亿英镑的 67%，此外再加上不是由赔款抵补的、由意大利偿付的 1000 万英镑。这是协约国还债达到最高限度时的情况。如果就平均的支付情况而言，美国将收入 6600 万英镑，约占德国支出的 1.17 亿英镑的 56%。不论哪一种情况，英国的收支大体持平，结果总是一无所得。

根据上述的情况可以推测，如果道威斯计划没有能完全实现，实际的支付额减少了 1/3——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那么当协约国全额支付战债时，美国将成为唯一的受益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战债协定的净结果是，美国在收支相抵后净收入为 7800 万英镑，而其他任何国家都毫无所得。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计算分析，是由于这样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在协约国的想法中，对德国赔偿的进一步减轻问题是与它们自己对美国的偿债义务问题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美国的官方态度认为这两者之间并无联系，这实在是一种极其虚伪的托辞。将来道威斯计划付诸重议时，美国，不论以何种形式，必然是当事人之一。但是，让我多说一句，美国作出的任何退让都会使德国和欧洲各协约国的负担得到减轻，英国将坚持它的原则，即收支相抵后，一无所得。

如果德国支付的赔款，全部或接近全部不是用于修复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用来偿还美国在共同奋斗中所做出的财务贡献，那么会有许多人觉得，从人类的感情上讲，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结果，而且与美国人在参战时和参战后所发表的那一套言论根本不相符合。然而，无论民众有多么深切、

激动的情绪，要想让任何一位居于权要地位的英国人在公共场合下主动说出这种事情，总是很敏感的。明摆的事实就是，我们必须支付契约上规定要支付的，任何其他建议，如果有的话，也只能由美国来开口。在战争期间，英国财政部与各协约国和美国缔结所有财务协定，今天的情势就是由此而形成的。现在这些协定的官方起草人这一职位，落在了我的身上。对于当初拟制财务协定时，支配这些协定特征的理由和动机，我是非常了解的，并且了解程度一天比一天深切。回想起那些日子的情景，我仍然抱有希望，希望英国有一天，在它自己选定的适当时机，告诉我们，它还没有说出它的真心话。

第二部分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第一篇　通货膨胀

（1919 年）

据说列宁曾经宣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办法就是损害货币的声誉。政府凭借通货膨胀的连续过程，可以暗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没收其国民的大量财富。它们运用这种方法不但进行没收，而且是随心所欲地没收，在这一过程使许多人陷入贫困时，它实际上使某些人富了。这种任意重置财富的现象不仅影响经济生活的安全，而且使人们对现存财富分配的公平失去了信心。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获得了意外之财，不仅超出了他们应得的份额，而且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和希望，成了“暴发户”。于是这些人便成了中产阶级的仇恨对象，因为通货膨胀给中产阶级带来的损失并不亚于无产

阶级。一般而言，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持久稳定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主要基础；而通货膨胀的不断进行使通货的实际价值波动剧烈，从而使这种信用关系完全被打乱，结果是获取财富的整个过程堕落为全凭时运的赌博行为。

列宁当然是正确的。要推翻现存社会基础，没有比损害货币声誉更巧妙更可靠的手段了。这一过程在破坏方面动用了经济规律中的全部隐藏力量，而且是很少有人能够觉察到的。

在战争的后期阶段，所有参战国家，或是出于迫不得已，或是由于实力不足，都在实行布尔什维主义者提出的计划方案。即使现在战争已经结束，这些国家中的多数由于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还在继续实行这类不当的计划。不仅如此，许多欧洲国家的现任政府采取的政策手段既软弱无力又轻率鲁莽，然而他们却把明显是由不良政策所造成的恶果推在所谓的“暴发户”阶级身上，从而引起民众对这个阶级的仇视。概括而言，这些“暴发户”是资本家队伍中的企业家阶级，也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活跃分子和积极分子。在价格上涨时期中，无论他们期望或希望与否，都必然会迅速暴富起来。如果价格持续上涨，则每一个拥有存货或拥有地产和工厂的商人都将赚取巨额利润。所以，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蓄意引导民众对这个阶级产生仇恨的心理，而采用的措施却正好是列宁希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所加以利用的手段。暴发户的产生，是价格上涨的自然结果，不是它的前因。通货膨胀必然剧烈而任意地扰乱契约关系和既定的财富平衡，从而造成对社会安全的冲击，再加上对企业家阶级的仇恨，这些政府已经不可能使 19 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继续下去。可是他们又必须面对这种状况，因为还没有取代这一秩序的计划。

第二篇　币值变动的社会后果

（1923 年）

货币的重要性只是在于它可以购买人们所需的物品。因此货币单位的变化并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因为这种变化具有一致性，它对一切交易的影响是均等的。假定价值的既定标准发生了变化，某人的一切权益和一切努力的成果以货币计量时是以往的两倍，但同时对于一切获取之物和一切享受满足，他也必须支付两倍于以往的货币量，那么这种变化对他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由此可见，货币价值，也就是价格水平发生变化对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只是由于它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作用程度是不相同的。类似这样的变化，过去曾经，现在仍在对社会造成巨大的

影响后果，众所周知，这是因为当货币价值发生变化时，它对一切个人或一切计划目标所施加的影响并不是均等的。个人的收入及其支出并不是在同一比例标准下改变的。因此以货币计量的价格和报酬的改变对不同阶级一般都会产生不均等的影响，把财富从这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使某些人突然暴富，而某些人则贫困潦倒，财富的重新分配使既定的计划受到了破坏，令原有的期望无法实现。

自从1914年以来，货币价值的波动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竟使其构成了近代经济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以金、银或纸币计量的价值标准，都曾经发生过前所未有的剧烈波动。不仅如此，这种波动所侵扰的社会，与以往任何时代的社会相比，一般认为价值标准应该是相当稳定的。

在拿破仑战争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内，英国的物价在波动最猛烈时，一年间的涨落差距达22%；在19世纪初期，价格水平达到了最高点，尽管我们一向把这个时期看作是货币史上最紊乱的一个时期，但就价格水平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比较而言，在长达13年的时期内，两者相差也还不到1倍。我们可以把上述情形与近9年来不同寻常的变化作一比较。从1914年到1920年间，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也就是说，相对于可购买的物品供给而言，支出货币的供给出现了极大的扩张。从1920年起，重新恢复对其金融局势的控制的那些国家，并不满足于仅仅消灭通货膨胀，因而过分缩减了其货币供给，于是又尝到了通货紧缩的苦果。而那些没能重新控制金融局势的国家，随后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比以往更加严重。

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害。两

者都会改变财富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不过相比而言，通货膨胀更为严重一些。两者对财富的生产也同样会产生影响，前者具有过度刺激的作用，而后者具有阻碍作用，在这一点上，通货紧缩更具危害性。对于我们来说，把讨论的问题像以上这样分类研究，应该是最便利的方法——首先考虑货币价值变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作用，这时主要关注的应是通货膨胀；其次分析对财富生产的影响作用，这时主要关注的应是通货紧缩。

一、币值变动对分配的影响

1. 投资者

在货币的各种职能中，有些主要是以其实际价值在某一时期内几乎固定不变这一假设为依据的。其中主要的是那些与广义的货币投资契约有关的职能。这类契约——即规定在一段时期内支付一定数额货币的那种契约——正是我们为方便起见所称呼的投资制度（区别于一般的财产制度）的特色所在。

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这一阶段中，许多举措都是为了使财产的管理权从其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这些举措主要有三种类型：(1) 财产所有者失去对财产的管理权，但仍保留着对他的财产，即实际的土地、建筑物、机器或成为其财产的任何其他东西的所有权，保留所有权的典型方式是持有股份公司的普通股；(2) 财产所有者暂时同其财产脱离关系，并在此期间每年收取一定数额的货币，但最终财产所有权仍由他收回，此类型的典型模式是租赁；(3) 财产所有者同其财

产永久地脱离关系，由此获取的报酬或者是无限期的以货币计量的固定年金，或者是有限期的年金，在期满之时归还以货币计量的本金，此类型的典型形式是抵押贷款、债券、公司债券和优先股。第三种类型体现了投资的充分发展形态。

只要有货币的借出和借入，就必然存在规定在将来某一时期收回一定数额货币的契约（至于将来收回之际货币实际价值出现的变化，契约内并没有加以规定）。租赁和抵押的形式，以及对政府和少数私营实体如东印度公司的永久性贷款形式，在18世纪就已经很常见。但在19世纪，这些方面有了新的进展，进一步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到20世纪初叶，有产阶级分化为两种类群，一种是“企业家”，一种是“投资者”，两者在利害关系上存在着某些区别。这种区别在个人之间并不是十分严格的，因为企业家也可以是投资者，而投资者也可以持有普通股；但是这种区分又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很少被关注就忽视它的重要意义。

借助于这样的制度，活跃的企业家阶级，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还可以运用整个社会的储蓄来资助他们的企业；另一方面，从事专门职业的阶级和有产阶级则找到了利用他们资源的一种方式，这一资源利用方式使他们既减少麻烦，又无责任，而且（据说）风险也很小。

这种制度在整个欧洲实行了整整100年，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使物质财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增长。储蓄和投资，对于一个大的阶级来说，既是一种义务，又是他们所喜好的事物。储蓄很少被提取，在复利的条件下，储蓄的积累使物质的充裕成为可能，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点是理所当

然的。这个时代的伦理、政治、文学和宗教共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伟大的默契，其目的就在于促进储蓄。上帝和财神和谐一致。有钱人在尘世中寻到了祥和。富有之人毕竟是可以进入天国的——只要他储蓄。天国响起了新的福音。天使们唱道："这真是不可思议，通过上帝贤明、仁慈的安排，当人们尽管只是为自身利益考虑行事时，却对民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①。

由此营造的氛围使扩张企业的要求以及日益增长人口的需要与一个安逸富足的非企业阶级的发展和谐一致，相辅而行。在这种制度下，投资者的命运主要寄托于货币的稳定；但是在普遍享受舒适和进步的过程中，对于货币是否能够稳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稳定，缺乏必要的关注，而大都抱有一种毫不怀疑的信念，认为这些事情会自行解决，而无须顾虑。于是投资之风气越来越广泛，数额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对于中产阶级而言，金边债券成为最持久、最有保障的财产的代表。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货币契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传统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英国的法律，鼓励财产受托人把他们的信托资金全部用于此类交易，而且事实上，除了地产交易以外（这是一个例外，它本身就是早期情况下的一个遗留产物），信托资金是禁止用于其他任何目的的②。

---

① 《供青年使用的货币学入门》，基督教教义促进会出版，1850年第12版。

② 在德国，直到1923年财产受托人才解除了与上述相类似的责任，因为到那个时候，以货币所有权形式投放的信托资金，其价值已经完全化为乌有。

19世纪总是深信自己的幸福经历会永久持续下去，而对以往发生的不幸事件的教训，却置之不理；在这方面是这样，在别的方面也是这样。人们也许忘记了，货币即使用某一金属的固定量来体现时，在历史上也没有保证货币绝对稳定的范例；现在要指望以不变购买力所体现的货币趋于稳定，那希望就更加渺茫了。货币实际上只是一种由国家随时宣布的、履行货币契约的适当的法定清偿物而已。到1914年时，黄金不再作为英国的价值标准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在其他国家，黄金不再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每一次长期战争或严重的社会动荡都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法定货币的变化，但每一个国家关于货币的历史记载表明，从有经济记载时起，代表货币的法定货币的实际价值是几乎不断下降的。

不仅如此，贯穿历史的货币价值不断下降的过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在其背后，有两个巨大的推动力——政府的贫困和债务者阶级的强大政治势力。

由货币贬值而引发的征税权，自从罗马帝国首次使用以来，已经成为国家所固有的一项权利。法定货币的铸造，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政府最后的储备，任何国家或政府，只要仍保留这一手段而未加以使用，就不会宣告自己的破产或倒台。

此外，我们在下面还将看到，从通货贬值中获取益处的不仅仅是政府。农民、债务人以及到期偿还固定数额货币的一切责任人都会从其中分享益处。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活跃、积极的因子是企业家，而在早期年代中，居于这种地位的却是上述那些阶级。那些在过去促使货币贬值的世俗变化，对新兴人物起了协助作用，把他们从毫无生气的过去解脱出来；他们以牺牲旧财富为代价而获取了新财富，以建立企业的方式代替了

以往的财富堆积。货币的贬值倾向，在过去是对由复利产生的累积成果和财产继承的一个强大抵消力量，而现在则是对旧有财富的严格分配，对财富所有权和行为权划分的一个松弛的影响力量。在这种方式下，每一代所继承的遗产，都会部分地受到剥夺；因此除非整个社会能自觉地慎重考虑，以其他某种更为公平、更为适宜的方法来代替此种方式，否则，建立永久性财产制度的计划肯定会遭受挫折。

总之，在这两种力量——政府的财政需要和债务人阶级的政治势力——时而是这一种，时而是那一种的影响下，通货膨胀的进展是连续不断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自从公元前6世纪最早发明使用货币时起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种趋势是一目了然的。有时价值标准会自然下跌，如果这一点没有发生的话，货币的贬值就会来完成这项工作。

但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货币，因此很容易忽略货币的本质内容，而把货币本身看作是绝对的价值标准；此外，对于普通人来说，当百年的实际经历并没有干扰他上述的原有观念时，他就会把错觉看作是事实，就会把经历三代不变的事实看作是持久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19世纪的事态发展历程支持了这种观念。在世纪最初的二十几年中，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物价高涨伴随着货币价值相当迅速的增长。在随后的70年里，除了某些暂时波动以外，价格是趋于不断下降的，到1896年时达到了最低点。就趋势而言，价格的确是不断下降的，但从整个长期过程来看，显著特征却是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1826、1841、1855、1862、1867、1871和1915年，以及与各该年相近的时期内，价格水平大约

处于相同的水平。1844、1881 和 1914 年①也基本上保持着同样的价格水平。如果我们把这三年的物价指数规定为 100，我们会发觉，从 1826 年起到大战爆发止接近于一个世纪的时期内，物价指数向上或向下的最大波动限度，都不超出 30 点，也就是说，物价指数从来没有超过 130 或低于 70。难怪我们对长期货币契约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心。黄金作为一种人为规定的标准，并不具有所有的理论上的优点，但是其价值并不是能够随意操纵的，实践证明它是可靠的。

与此同时，在 19 世纪的早期阶段，英国统一公债的投资者在三个不同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首先是确保了投资的安全，关于这一点已被认为达到了尽可能完美的地步；其次是投资资本的本金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这一点部分是由于以上述及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利率的逐步下降使体现资本年收入的年购买力指数有了提高②；最后，每年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总体上也有了提高。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对从 1826 年到 1896 年这 70 年间的情形做一番考察（其中滑铁卢战役之后紧接出现的短期显著上涨，这里暂略不计），将会发现，统一公债的资本本金除一度回跌以外，基本上是逐步提高的，具体而言，是从 79 提高到 109（尽管在戈申执政时，公债利率于 1889 年从 3%降到了 2.75%，又于 1903 年降到了 2.5%），同时年息收入的购买力在利率有所降低的情况下仍然提高了 50%。不仅如此，统一公债在稳定性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维多利亚

① 现在可以再补充一点，1931 年的情形也不例外。

② 举例说明，如果利率从 4.5%降到 3%，那么统一公债的价值就从 66 提高到 100。

女王时代，统一公债的价格除了危机时期以外，从未跌落至90以下；即使在1848年，当君主王权行将崩溃之际，其跌幅也仅仅是5点而已。维多利亚女王初登王位时，公债价格是90，而到她举行登基60周年纪念时，价格却达到了最高点。因此也就难怪比我们长一辈的人，要把统一公债看作是一种极好的投资对象了！

于是在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有权有势，而且又极受尊崇的新兴阶级，这些人个个都很富有，其财富总和也相当巨大。他们拥有财产的形式并不是建筑物、土地、企业或金银珠宝，而是一种权利，借助于此项权利，他们每年都可以获取一定的法定货币收入。这种在19世纪造就的特殊产物，成为那个时代值得炫耀的一个事物，结果中产阶级大都把他们的积蓄投入于此。习惯势力和令人满意的经历使此类投资在安全方面享有绝对令人信服的声誉。

在大战前夕，这类中介财产，由于价格以及利率的上升就已经开始蒙受损失（与19世纪中期的鼎盛时期相比较）。伴随着战争爆发而来的一些货币方面的变故，使这类财产的实际价值，在英国损失了一半，在法国损失了7/8，在意大利损失了11/12，而在德国以及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分裂之后又重新成立的那些国家，其价值基本上已损失殆尽。

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由于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所实行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使投资者阶级所有财产实际价值中的一个很大部分，被白白地拿走了。这种损失的发生来势迅猛，同时又与其他一些更糟糕的损失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单就这项损失将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一点来说，人们还没有充分地加以了解。但是尽管如此，它的影响已经使不同阶级之间的相对

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整个欧洲大陆，中产阶级在战前投资于债券、抵押或银行存款方面的积蓄，已经大部分或全部损失殆尽了。毫无疑问，这场经历将改变人们关于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心理。这种过去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行为，现在却被认为是最不安全的了。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既不胡乱花费，也不“投机取巧”，只是“为其家庭谋求适当的准备”，他赞美安全，严格信守从实践中获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老于世故的可敬信条。的确他是最不想侥幸获取财富的，然而结果却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从以上所述能够吸取些什么教训呢？我认为主要的一点是，把 19 世纪发展而来（至今仍保留着）的社会组织体制同对货币价值的自由放任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既不安全，也欠公正。那种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安排进行得很好的说法并不正确。如果我们想要把社会的自愿储蓄，继续吸引到“投资”领域，就应当使体现储蓄和投资的价值标准保持稳定，并以此作为审定国家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遗产法和复利累积结果的影响下，如果不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闲逸分子从从事企业经营的活跃分子收入中获取的份额相对过多时，的确应当重新分配国民财富；但是应当采取其他一些方式，使一切形式下的财富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影响，而不应当单单使相对无所依靠的“投资者”遭受严重的损失。

2. 企业家

长期以来，企业界和经济学家都持有这种观点，即价格上涨对企业有促进作用，对企业家有利。

首先，我们知道，价格上涨会使投资者蒙受损失，但同时

我们也应当看到，企业家在这一过程中却是所得颇丰的。当货币价值下跌时，那些从事于企业经营的活跃分子显然会获取利益，因为他们每年从其所得利润中必须支付的货币数额是固定不变的，而随着货币的贬值，这项固定支出在其货币营业额内所占的比例必然会比以往下降。这种利益的享有，不仅发生于转变的过渡时期，而且当价格定位于新的、较高的水平以后，就原有的债务关系而言，这种利益仍然存在。举例说明，整个欧洲的农场主，凡是以前用抵押贷款方式购置土地来经营农业的，现在都会感到这种债务负担已经几乎不成为什么拖累了，但是他们在债务上的解脱是以牺牲债权人利益为代价的。

不仅如此，在价格逐月上涨的变动时期，企业家还可以获得一个更大的意外财源。无论他是一个商人还是一位实业家，一般总是先买后卖，那么至少他的部分存货要面临价格变动的风险。因此，随着价格的上涨，他手里的存货也会升值，这样他就会处于“待价而沽”的地位，由此获取的利润将超出他原来计算的预期收益。处于这样的时期，做生意就成了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任何人，只要能借到钱，只要时运不是特别糟糕，都会从中获利，尽管这种收益对他来说是很不相称的。因此，当价格上涨时，借钱经营的企业家就会处于有利地位，他所偿还的货币借款，以实际价值衡量时，不仅没有体现出借款利息，而且比原先借得的本金还要少。

货币的贬值的确为企业家提供了一条致富捷径，但同时也使他们成为大众所指责和非难的对象。在消费者看来，企业家的意外收益是造成令人厌恶的价格上涨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与此同时，企业家本人在财富的纷繁变化过程中，也逐渐

失去了其原有的安分本性，他所关注的，只是当前的巨大利益，而对于在正常经营下所获取的相对较少但却是持久稳定的利润，已经逐渐失去了兴趣。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重视企业的长远利益，他头脑中所充斥的，全是赚取暴利的念头。不过这种暴利并不是他蓄意谋求的，他原来并没有这样的阴谋或打算，然而一旦他尝过这种甜头，他就决不肯轻易放弃，而会竭尽所能，争取继续占有这种意外之财。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有这样的欲望，可以想像，他本人在心情上不会很舒畅。过去，他对同社会的关系充满自信，认为自己在经济结构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今天他却丧失了这种自信。他对自己未来的事业以及本阶级的前途，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理，他对财富把持得越紧，就越是感到缺少保障。企业家，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前途发展的建设者，他的经营活动和所获报酬，在不久以前，还几乎得到了宗教的认可，他被认为是一切人类、一切阶级中最应受到尊敬和赞许的、是最不可缺乏的一分子，而且如果他的活动受到阻挠的话，一般认为这不仅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而且是一种失敬、无礼的行为；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人人对他侧目而视，他自己也感到是被人猜忌、受人攻击的对象，是这种不公平的有害法律条例的受害者，觉得自己简直是不免有些罪行的，是一个“暴发户”。

在这个世界上有富人，也有穷人，如果一旦认为富人的所得只是凭了幸运的赌博，那么凡是有血气的人决不会甘心安于贫困。企业家蜕变而成奸商的事实，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它打破了人们心理上的平衡，而这种心理平衡正是保持不平等收入继续存在的先决条件。所谓正常利润

的经济原则，每个人只是有一种模糊的认识，但它却是资本主义合理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企业家的收益，只有在大体上、在某种意义上跟他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活动发生联系时，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

以上所讲的，是由货币贬值造成的对现存经济秩序的第二种干扰。如果说货币价值的下跌会使投资活动受到打击，那么它对企业也同样会造成伤害。

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家也不允许独自享有其额外利润的全部。为了消除当前存在的弊端，我们采取了许多人所共知的补救措施，如补助金、价格和租金方面的规定，以及不正当利润的取缔、超额利润的课税等等，然而这些措施不仅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到头来它们自身也变成了弊端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当经济进入萧条时期，价格趋于下降时，这对拥有存货的那些人所造成的影响，与价格上涨时的情况恰恰相反。意外的损失代替了意外的所得，而这种现象与企业经营的效率是毫无干系的。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将存货减少到最低限度，结果使整个工业陷入停顿状态。这一点，同以前竭力囤积存货的过度兴奋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失业取代了非法暴利，而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

3. 工资收入者

经济常识告诉我们，工资变动总是落后于价格变动的，因此当价格上涨时，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所得将会减少。在过去，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即使在今天，对于某些处境不利、组织混乱的工人阶级来说，他们在改善自己地位时，情况也依然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在英国，还有美国，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已经

开始在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充分利用当前的形势，力争使所得货币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不仅同以前一样，而且事实上要有所增加，使工资的增长同工作时间（或者是工作量）的缩减结合起来。在英国，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好是在整个社会总财富趋于减少的时候。这种违反常规的现象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其中肯定有一些可察觉的确定缘由。

有些工人，如铁路员工、矿工、码头工人等等，为了争取货币工资的增长，其组织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进。军队中的生活，也许是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在许多方面都提高了传统的要求标准。士兵们比以前穿得好，饮食方面也往往好于工人阶级，他们的妻子，除了在战时有机会享有分居津贴以外，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比以往有所提高。

这些影响作用，固然是引发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动机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另一个因素，即企业家非法获取的意外之财，那么还缺少达到目的的手段。众所周知，企业家获取的巨额利润，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商业利润的一般水准，这一点使他们很容易地招致来自其雇员以及公众舆论的非难之词，不过由于财力上非常充裕，他们能够有效地应付这些方面的压力。事实上，他们为了息事宁人，也愿意支付一笔赎金，与工人共同分享所得的意外横财。

结果是在战争结束以后的若干年中，工人阶级的地位，除了“暴发户”以外，相对于其他任何阶级，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他们的绝对地位也有了改进——工作时间缩短了，货币工资增加了，劳动力价格提高了，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付出每一单位的努力和劳动所获得的实际报酬，也比过去提高了。工人阶级当然欢迎这种发展势头，

但是这种状态是否稳定，我们却无法加以估测，除非能够确切了解他们报酬增长的来源所在。一般说来，各阶级之间收入发生变化可能是由于确定国内产值在不同阶级之间分配的那些经济因素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变化后的收入状况是稳定的；也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价值标准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变化后的收入是不可靠的，会有反复。那么我们在这里述及的工人收入增长情况，究竟是出于前一种原因还是后一种原因呢？

在经济萧条时期，工人阶级也难免受到不利影响，但不利情况并不表现为实际工资的降低，而表现为失业，不过由于国家的资助，失业带来的严重后果已被大大地缓解了。随着价格的下降，货币工资也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在 1921 年到 1922 年的萧条时期，工人阶级在若干年前取得的对中产阶级的相对优势，不仅没有逆转，而且甚至没有明显的减退。1923 年，英国的工资率，如果把工作时间缩短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与战前相比，显然要比生活费用提高得更快。

二、币值变动对生产的影响

对于企业界而言，任何原因，不管正确与否，只要由此预计价格要下跌，生产进程肯定会停顿下来；反之，如果预计价格要上涨，则生产将会受到过度的刺激。价值标准的波动根本不会改变世界财富、需求或生产力的状况。因此，价值标准的波动，对生产的性质和数量两方面都不会产生影响。至于相对价格，即各种不同商品之间的对比价格，如果有了变动，则会影响生产的性质，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动表明各种不同商品彼

此之间的生产比率，与原来的已经不完全相同。但一般价格水平发生变动时，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预期会影响生产进程的事实，源于社会现存经济结构的特有本质。我们已经看到，当一般价格水平发生变动时，也就是当确定货币借入者(生产如何进行，是由他们主动决定的)对借出者(一旦把货币借出以后，他们在生产方面就处于被动地位)所负债务的价值标准发生变动时，将会对这两个集团之间实际财富的再分配产生影响。此外，居于主动地位的借入者集团，如果能事先预见到这种变化，就可以提前采取行动，从而使自己在价格变化后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把它转嫁给另一个集团，或者以另一集团的牺牲为代价，从中增加他们的收益。如果借入者集团预计价格要下跌，他们就会故意压低生产，这样做对他们也许是有利的，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这种人为的怠工将造成贫困。如果他们预计价格要上涨，就会增加借入资金扩大生产，由于我们曾经说过他们由此获得的实际报酬需要补偿社会整体的损失，因此生产的规模必然要扩大到足以提供这种补偿的程度以上。当然，有些时候价值标准的变化，特别是当这一变化事先没能预料到的时候，会使某一集团受益，而使另一集团受损，不过利益的偏差程度与这一变化对生产量所产生的影响相比，也许并不相称；但是处于主动地位的集团如果预期到这一变化的话，那么总体趋势就会同上面所描述的一样。其实这也就等于说，生产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在现时条件下企业家预期的实际利润。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个适宜的判断标准，然而这种判断只有在各方面利益的微妙调节没有被价值标准所打乱时，才具有正确性。

货币价值的不稳定，也会直接带来很大的风险。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企业内会有一些货币支出，如货币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费用的支出等等，而在企业产品售卖之后，就可以补偿这类支出。这就是说，以整个企业界而言，它必然经常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价格上涨时有所收益，而价格下跌时有所损失。不管企业界愿意与否，货币契约制度下的生产技术总是迫使其行为具有很大的投机特性；如果它要摆脱这种局面，生产过程必然要陷入停顿状态。在企业界范围内，未尝没有一定程度的职能专业化，其中有一种专业投机者，他们对正常生产者有所援助，会替他分担一部分风险。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上面的论点。

由此可见，不仅是当价格变动实际发生时，某些阶级会受益，另一些阶级会受损（这一点是本篇第一部分的主题），而且由于价格下跌而引发的普遍恐惧心理，也许会使整个生产过程陷入停顿。因为如果预期价格将趋于下降，肯定不会有许多冒险者愿意处于先买进后卖出的投机地位，这就意味着，企业家不愿意从事于先预支货币、事后才能收回的长期生产过程——由此必然会产生失业。价格的下跌事实上的确会对企业家造成损害，因此对价格下跌的恐惧心理将促使他们减少经营活动，借此来保护自己免受损失。然而生产活动和就业，实际上主要取决于单个企业家对风险估计的总和，取决于他们整体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更为严重的是，关于价格变动趋势的预期如果相当普遍的话，就会造成价格的累积性变动。企业界如果预计价格将上涨，并且以这一预期为依据来开展其经营活动，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就会造成价格一时的上涨，而价格的上涨则证实了原来

的预期，结果是又进一步增强了对价格变动的预期心理；同样，当价格下跌时，情形也是类似的。所以说，一个相对微小的起因，也许会引起巨大的波动。

要消除个人主义的这种致命弊病，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釜底抽薪，使关于价格将普遍上涨或下跌的任何有信心的预期根本失去存在的可能；或是采取某种措施，价格即使发生了变动，也不致扩大到很大的地步，不会由此引起严重的风险。这样的话，即使出于意外或偶然的原因，价格也只会出现有一定限度的变动，尽管由此必然会导致财富的再分配，但财富总量却不会因此而减少。

要想获得上述的那种结果，就必须消除由初始变动引发的一切可能影响，但看起来这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可能的补救措施也许应当是对价值标准严格控制。无论何时，只要事态的自然进展会引起对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预期，管理当局就应采取措施，把与当前预期趋势相反的某些因素发动起来。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消除预期，避免发生实际变动，尽管行使的结果没有能完全奏效，但总比采取袖手旁观、不闻不问的政策要好些。如果让价值标准完全受制于偶然因素，而故意使之脱离中央的管理控制，那么预期造成的后果是，生产活动要么陷于瘫痪状态，要么处于过度兴奋状态。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价格上涨与价格下跌各有各的不利作用。通货膨胀对个人和某些阶级，特别是食利者，会造成不公道的后果，因此对储蓄是不利的。通货紧缩促使价格下跌，企业家为了避免损失将限制生产，从而对工人阶级和企业造成贫困的后果，因此对就业是不利的。当然，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两者的影响性质，也不是绝对泾渭分明的，后者对借入者

来说，也同样会造成不公道的后果；而前者使工业活动过度兴奋，也同样是一个不利因素。但是这些影响后果，并没有像以上所着重指出的那样明显；因为借入者在保卫自己避免受到通货紧缩最坏的影响时，相比借出者在保卫自己避免受到通货膨胀最坏的影响时，总是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而且工人阶级在经济过度繁荣的情况下进行自卫，总比在就业不足的糟糕局面下进行自卫要容易得多、有利得多。

由此看来，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后果是不公道的，而通货紧缩的结局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如果把极度恶化的通货膨胀，如发生在德国的那种情况除外，那么两者之中，通货紧缩似乎更糟糕一些，因为在世界处于贫困的情况下，它所引起的失业问题，比之使食利者受到打击要糟糕得多。但是我们对这两种不利情况作轻重权衡，却是不必要的。容易达成一致的看法认为两者都是应当竭力避免的弊端。在当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储蓄是委托给个人投资者的，生产是交付给个人雇主的。正因为如此，就必须保证价值标准的稳定，否则，资本主义是不能行之有效的，也许是不能存在的。

我们曾有这样的怀疑，认为价值标准的调节，不是一个能够随意加以决定的问题；基于上述的那些严重原因，我们必须打破这种观念，从这种怀疑中解脱出来。我们过去常常认为，价值标准具有别具一格的特性，在不同程度上这是由天气、人口出生率和组织结构等等一些自然原因造成的；或者是许多个体独立行为的结果；或者认为除非通过变革，否则难以改变这些特性。这样的观念已使我们受害匪浅、今天，我们决不能再听其自然，决不能再把价值标准问题列入此类范畴来考虑了。

第三篇 法国法郎

一、给法国财政部长(不管他是谁、或可能是谁)的一封公开信

(1926 年 1 月)

先生:

我曾在日报上读到了您自己以及您的前任们关于编制新预算和筹集偿付旧债本息资金的日常计划,使寄居于伦敦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看来属于技术性分析方面的问题,巴黎几乎未加以讨论,这样的预算提交国会的结果只能是枉费心力。因此,我恳请您暂时把注意力转向某些基本方面的考虑。

近年来我曾多次著书谈到过法国法郎,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改变原有

的看法。两年多以前我曾写道:"法郎的价格水平将来总是要确定的,而决定因素不是投机活动或贸易差额,甚至也不是鲁尔事件的结果,而是法国纳税人容许从其劳动所得中取走以支付给法国食利者的比率。"现在我仍旧认为,这一点才是您制定计划应当依据的基本概念。

现在情况很明显,要想达到期望中的平衡,不外乎通过两种办法。您要么增加纳税人的负担,要么降低食利者的权利要求。如果您选用前一种办法,法国国民收入的 1/4 左右将被租税所吸收。这一点果能办得到吗?我是一个异邦人,对于另一国的政治氛围若确实看得真切的话,那么根据近来的迹象,我敢断言,要增加纳税负担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足以满足在现有水平上食利者的要求,法国民众是决不会答应的。这样的租税,即使在政治上可能办得到,在行政管理上也难免要出问题。法国财政部当前的迫切任务,不是在于设法增加租税,而是在于建立一个能够胜任的行政管理机构,从事现有租税的征收工作。因此,如果我处于您的地位,作为一个政治家,我将不再对新税计划予以考虑,哪怕是一分钟的考虑;就我的职务所辖属的财政部分来说,我将专心于已有税收制度的巩固和管理。

仅仅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因此您的下一步任务——前提是您接受我关于法国民众思想情绪方面的结论——应当是冷静地仔细考虑一下,怎样通过最适当的方式,来降低食利者的权利要求。在这一点上,有三个方法可供采用:第一个是实行普遍的资本课税;第二个是强制降低公债利率;第三个是提高价格,借此来降低食利者货币债权的实际价值。毫无疑问,从效能、公道和理论根据上来看,第一个方法是最为可取

的。若是英国也处于类似的境地，我肯定会建议采取这一方法。但就法国今天的情况说来，进一步的征税计划，将遇到政治方面和管理方面的困难，这一建议难免会因此而破产，所以我不必在这一点上枉费时间。第二个方法如果、而且也只是因为不会引起管理方面的困难，肯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相信，法国的某些当局人士是赞成这个办法的。然而，如果我处于您的地位，我将拒绝这一表面上的权宜之策，因为与一般的资本课税或货币贬值不同，这纯粹是赤裸裸的赖债行为，是背信弃义的举动，在财政措施中使用这样的手段是极端危险的，除非在非常紧急关头，否则绝对不能轻易采用。

因此，在经过逐项排除之后，我们只剩下一条出路，即提高国内价格。但从这一点出发，将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财政领域，而转移到价格水平、外汇、法国银行的黄金储备、国外投资量以及贸易差额等方面。这里我必须请您特别注意关于法郎的一种很有趣的矛盾现状。

事实上，历任财政部长，都曾竭尽所能，期望能从我指出的出路中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他们都曾大规模地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因此法郎的金值，除中间短期回升以外，一直在逐步地下降。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要告诉您，您的那些前任者们，虽然已经尽力而为，但结果都失败了，他们没能使法郎的国内购买力充分地降低。您目前的困难，并不是由于纸币的膨胀或汇率的下跌（其实这些现象对您困难的解决总是有帮助的），而是由于这些因素没能成比例地降低食利者货币债权的国内购买力。

以下所列举的数字，足以说明您的困难问题的症结所在。1925 年 12 月，以外汇汇价核算的法郎金值，是其战前平价的

19%；而当时世界金价大约是其战前水平的158%；因此以战前水平为基础时，纸币流通和法郎价格水平应该达到战前数字的830%(158÷19≒8.3)。现在的纸币流通，约为战前数字的1000%，这同外汇汇价的水平大体上是相称的；不过，考虑到领土的扩大，以及金银币从流通中的退出，这一数字与外汇汇价相比，以战前水平为依据，似乎不是过高，而是过低。

至于国内法郎价格水平，情形则完全不同。进口原料的价格，已经无可避免地上涨到国际平价水平。但是列入生活费用指数项下的那类商品，如食品和其他日用品，主要是由国内生产的，却远远低于平衡价值。1925年11月，食品批发价格是战前的490%，巴黎(包括13类商品)的零售物价是战前的433%，1925年巴黎第三季度的生活费用指数达到了401%。这些数字也许低估了价格的实际上涨幅度，但是似乎可以肯定，法国国内价格的上涨，比之战前，当不会超过5倍。这意味着，法国纯国内产品的价格，按目前汇率折算时，还不到世界价格的一半，实际上低于以金计的战前水平。由此可见，通货膨胀，在汇率方面，也就是在进口商品价格方面，充分发挥了作用，但在国内产品价格方面，却基本上没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至于分摊到纳税人身上的食利者的负担，却是以法郎的国内购买力来衡量的，前者必须从中拿出一部分移交给后者。因此，如果国内价格的上涨速度，能与汇率的下跌速度一样迅速，国家债务的实际负担就可以减轻至少1/3。所以我认为，要解决您所面临的财政困难，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提高国内价格水平；而且非常清楚的一点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无须进一步实施通货膨胀，也无须使汇率作进一步的下跌。

至于您认为国内价格达到怎样的水平，才有希望使预算平衡，则要由您自行决定。在此之后，您下一步的工作是，想方设法，在您尽可能做到的有组织和科学化的方式下，实现价格的上涨。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使国内价格水平提高到战前的8倍到9倍之间，似乎就非常充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再进一步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和降低法郎汇价。您所必须做的一切，目的就在于使纸币流通和法郎汇价稳定在目前的水平，同时，让国内价格能有充裕的时间，作相应的上涨。

目前法郎价格处于较低的水平，究竟是出于什么缘故呢？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1) 时间因素——国内价格行动迟缓，但只要假以时日，迟早会达到它应有的水平；(2) 纸币的贮藏，在规模上甚至比以前还要大，致使现有通货的流通趋于迟缓；(3) 由于信心的缺乏，导致法国的对外投资出现了过度的发展，结果使汇率下降到与商业形势相适应的水平以下；(4) 在地租等方面的法律限制。

这些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第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会自然有所改观，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主要是内部信心恢复的问题。因此正确的策略应当是致力于信心的恢复，然后静观事态的发展。关于恢复信心的方式，当然不是依靠大量增加租税，而是在于使法郎汇价稳定在接近于目前的水平上，以避免引起猜忌或非难。

那么，如何来稳定法郎的汇价呢？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并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那样困难。贸易差额的现状对法国是非常有利的。目前的国内价格水平，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进口。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以目前汇率折算，约占纸币发行额的40%。处于这样的形势，我认为，只需做一件事，即法兰西银行

应明确宣布，至少在两年内，只要美元对法郎的汇率不低于已经公开确定的水平，该行可以无限制地凭法郎供应美元；同时该行也做好准备，为了贯彻这一措施，于必要时不惜使用黄金储备。至于公开确定的汇率，大体上应当保持在 1 美元兑换 25 法郎至 30 法郎之间。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先选定后一比率，希望通过努力，争取最终达到前一比率①。要顺利实现这一计划，别无他择，关键就在于对银行所采取的措施予以充分的信任。有了这样的稳定局势为基础，您可以毫无困难地借入充足的资金，而不必依靠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来渡过这一时期。

至于其他一些问题，您尽可以静候时机来加以解决。随着国内价格水平逐渐上涨到与汇率保持平衡，以及随着征税机构的逐步改善，您的预算收入也必将逐月提高，一直到与支出相抵。此外，凡是以法郎计收的、非从价的那些租税，也必然会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同步提高。

法国政府在两个问题上的处理应当有坚强的决心——一个是法郎最低限度汇价的保持，在这一点上应不顾一切，即使动用黄金也在所不惜；另一个是最大限度地集中税款。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处于目前阶段，有勇无谋地提高税率，是在错误方向下的努力，是不会取得成就的。

有些人对上面提出的主张会有反对意见。细细斟酌一下，不难看出，这些反对意见的论据完全是政治性的。反对者认为，依靠大幅度提高价格的任何政策，势必引起生活费用的提高，这在广大民众中是不会受到欢迎的。此外，凡是促使国内

---

① 这是一种巧合，两年半以后，实际采用的汇率果真是 1 美元兑换 25.5 法郎。

价格与国外价格保持平衡的政策，势必有损于出口业的利益，因为出口业的兴旺发达，就是由于这两种价格的不平衡。我们可以把情况分析一下，告诉他们，关于第一点，除非纳税人甘愿为了食利者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否则国内价格是迟早要上涨的；关于第二点，除非让法郎汇价一直下跌，否则国内和国外价格的平衡也是迟早难免的。但是这种说法，在偏重现实的人们面前，恐怕未必有足够的说服力量。

但是，另一方面，也的确需要考虑一些很有分量的政治因素。农场主和农业生产者，一直是在过度低廉的价格下出售其产品，因此，他们肯定会欢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而且，政府若明智的话，就应当事前明确说明，政府无意于使工薪阶层和公务人员遭受损失；应当明文规定，在此后的两年期间，一切工资和薪金，每一季度作一次自动调整，使之与生活费用的增长幅度相适应。

我认为值得考虑的意见都已经摆到这里了。无论它们是否合您的意，我相信，以下问题是您必须仔细加以考虑的：

(1) 国内价格水平的提高，果真能解决困难吗？

(2) 不依靠提高价格，您能不能解决困难？

(3) 想最终阻止价格上涨的目的是不是能够达到？

(4) 如果达不到的话，还不如因势利导，促使价格做有条理、有组织的上涨，这难道不是一种明智的抉择吗？

(5) 无论您采取的是这里所建议的还是别的方针政策，对于利用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以稳定法郎汇价这一点，有没有充分的反对理由呢？

您忠实的仆人

J. M. 凯恩斯

二、法郎的稳定(1928年)

我们对政治家心存不满，不是由于他们政策上的不能始终如一，而是由于他们的顽固不化。他们只是命运的解释者，而不是主宰者。简而言之，他们的任务就是记录既成事实。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普恩加莱先生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他不在乎受到政策上不能始终如一所引发的批评，没有让这一点成为他推行政策的绊脚石。多年以来他一直认为，法郎贬值将会导致国家处于破产的地位，造成民族的耻辱。他把法郎定位于约合战前金值的1/5，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绩，当任何人想对此加以阻挠时，他甚至以辞职威胁来抗争。

最终选定的法郎价值水平大体上是适当的。法国当局的某些高层人士却宣称，把法郎定位于战前金值的1/6(即150法郎兑换1英镑)，应当更为恰当、更为可靠。但把法郎定位于战前金值的1/5，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这与最近18个月以来汇率的实际水平基本上相一致。有人认为普恩加莱先生犯了一个错误，他把法郎稳定在一个将引起通货紧缩的水平上；但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证明，这不是事实。在1925年12月到1926年11月的12个月内，汇率的波动异常强烈，以致国内价格根本来不及与这一变动趋势相适应；但除此之外，法郎价值(以金计)从来就没有低于现在所选定的水平。此外，预算的平衡，还必须依赖纳税人按目前水平所能承受的公债利息负担。因此，依我之见，没有充足的理由把法郎定位于比目前更低的水平上。

那么选定的法郎价值是不是过低了呢?在这一点上，法国

国内存在着某些批评意见。批评者所依据的理由主要有两个：其一，法郎价值是否低于与国内价格相适应的水平；其二，它要求食利者所放弃的权利要求，是否有些过多。官方公布的物价指数——若以所包括商品的表面价格为依据——表明，与价格相一致的法郎金值，较为接近战前价值的1/4（100法郎兑换1英镑），而与战前价值的1/5距离较远。但法国的物价指数是非常粗略的，其间的误差可能很大；况且两年半以前，法郎的价值就高于现在所选定的水平，两年半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足以使物价从容地向上调整；再者，物价向上调整总是比向下调整要迅速得多。毫无疑问，房租必然会有所提高；至于其他物价，即使有所提高，与国外金价相对照，上升幅度大概也不会十分显著。就食利者来说，相当苛刻的资本课税已经令他们心惊胆颤了，不过特别尴尬的局面总算没有发生，现在如果在原有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这种要求也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了。也许普恩加莱先生更相信另外三个与实际情况相联系的论点：其一，法郎的价值如果选定得过高，也许会破坏预算平衡，而这一点却是费尽心力才达到的；其二，过高的法郎价值，将导致出口业的企业家濒临破产，而这些人在政治上却有着相当的影响势力；其三，也许是最现实的一点，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法兰西银行按现有汇率已经购入了3亿英镑的外汇，因此法郎价值的提高，将使该行蒙受损失。例如，若把汇率固定在100法郎兑换1英镑的水平上，法兰西银行也许会损失6000万英镑，而外国人将受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关于这一点的利弊得失，普恩加莱先生和其他任何一个法国人都是非常清楚的。

因此，普恩加莱先生排除异议，坚持其原有的立场行事。

这一决定完全消除了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和证券交易所中关于法郎汇价的不稳定因素，使法国的进口商和制造商不再踌躇不前，于是原来处于闲置状态的大量购买力，现在可以重新发挥对生产原有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普恩加莱先生的确是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这也许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说实话，我们都为他的这一决定而感到高兴。

将战后英法两国的若干演变情况进行一番比较也许是很有意思的。在英国，我们的当权者从来闭口不谈他们的法国同行所说的那些看似毫无价值的话，也从来不草率地违背稳健的财政原则。但是，英国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从过渡时期挣扎出来的，这种特殊情况就是战争债务的负担日益沉重、所欠美国的待付款丝毫没有削减，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仍居主导地位，结果是一方面税收的负担加重，一方面数百万人陷于失业困境。法国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它的战争内债减少了4/5，而且通过与盟国的协商，使其外债减免了约一半以上，因此它现在正在避免通货紧缩造成的损失。法国在争取实现这些目的的同时，并没有违反稳健财政政策和资本主义原则，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丝毫的信誉损失。结果法兰西银行显得比英格兰银行要强大得多，人们依然认为法国是坚持储蓄和利息心理的最后堡垒。由此看来，英国并没有从它的行事原则中获取任何好处。

或许我们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法国的确背弃了原则，也未能始终如一，但它一贯是把那些可以避免的损失拒之门外，归根到底，它是遵从经验教训的。而我们英国既没有听从理论上的警告，又置事实的压力于不顾，惟条约之命是从。

第四篇　劳埃德·乔治办得到吗？

序　言

早在1924年4月，《民族》周刊就开辟了专栏以讨论英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这一讨论一直是这家刊物的主要特色。许多当时的权威经济学家和工业家纷纷投稿《民族》周刊，各抒己见，其中包括诸如威廉·贝弗里奇爵士、鲍利教授、R.H.布兰德先生、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威尔勋爵、以及已故的博拉尤的蒙塔古勋爵、威廉·阿克沃思爵士等杰出人物。讨论的起点源于当时的一种流行见解，同时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

的一种固有观念，即认为英国战后的经济困难甚至比战后遗留的世界贫困和混乱还要严重得多，因此迫切需要实施一项积极的、切合实际的国家发展政策来解决战后的失业问题。

在我们的大力建议之下，劳埃德·乔治先生首先引发了这次讨论，因为劳埃德·乔治先生那时是一位持有这种观点的杰出公众人物，他曾公开斥责过当时存在的一种乐观主义假定，这一假定认为我们战后的失业问题不久就会自行解决，而无须采取任何的特殊措施。由此他也受到了某些愚蠢无知的谴责，称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目前对劳埃德·乔治先生的责难之声此起彼伏，认为他的国家发展政策对于竞选目的而言，未免有些过时了。然而劳埃德·乔治先生于 1924 年 4 月 12 日写给《民族》周刊的那封信却完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且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些责难是毫无理由、毫无根据的。

《民族》周刊上的讨论与自由党夏令学校委员会正在考虑的问题不谋而合，于是该委员会与劳埃德·乔治先生一道，共同成立了自由党工业调查委员会。在国内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协助下，该机构耗时两年，搜集了与问题相关的尽可能详细的资料。他们的调查成果于 1928 年初发表在“自由党黄皮书”(即《英国工业前景》)上。自由党在“黄皮书”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决议，并于 1928 年 3 月末，由民族自由党联盟召开了一次特别集会，呼吁与会各方讨论研究这些决议。

《英国工业前景》一书完整、全面地阐述了自由党的行动纲领。最近自由党人士发表了一本名为《我们能够战胜失业》的小册子，它的突出成就在于把问题的抽象本质具体化为若

干个简明扼要的提议。这里我们对此补充一些另外的材料，其目的在于专门答复最近以来的有关批评意见。

在劳埃德·乔治先生发表承诺之前，他经过了四年细致周密的准备工作，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承诺是建立在严肃而长久的思考和研究基础之上的。

J.M. 凯恩斯　H.D. 亨德森

1929 年 5 月 1 日

承　　诺

如果在下次大选中，自由党能有幸博取国民的信任，委以主持政府事务的重任，我们准备立即执行一项公共工程计划，这一工程不仅本身大有裨益，而且对国民福利的增进至关重要。这一工程的实施将在短短的一年内，把目前可怕的失业数字削减至正常水平；而且，当这一过程结束之时，国家的财富和各项设备都会出现相应的提高和改善，从而使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与对手竞争时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计划不会给政府或地方税收带来一分一厘的负担。

当然，若想实现这一承诺，必须付出大量而艰辛的努力，但在座的各位当中，有一部分人为了国家利益，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比这一承诺更为艰苦卓绝的任务。

摘自劳埃德·乔治先生对
自由党候选人的即席演讲

1929 年 3 月 1 日

一、劳埃德·乔治先生的承诺

劳埃德·乔治先生发表的关于削减失业的承诺得到了大多数民众强烈的赞同和热忱的支持。某些人认为这个承诺无疑有些夸大其词了。但是几乎每个人，包括其他各政党，都对这个承诺抱有信心，相信其中终究会有一些实质性内容。

由此可见，即使在不愿轻易全面接受乐观主义论调的那些人之中，也有许多人全心全意地支持自由党的政策方针。对于这些人而言，尽管这项政策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可以正式实施，尽管它会给纳税人带来一些负担，尽管它只能创造仅仅40万或50万个就业机会，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它是一个在正确方向上的行动方案。较之于其他两个政党的“雷声大、雨点小的政策”，它无疑要高明得多。在这个观点上，没有人能像格雷勋爵那样表述得如此清晰，他说：“即使这项政策不能完全实现我们所有的希望，即使这个承诺结果证明是过于乐观了，即使这项政策需要两年或三年、甚至四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我们企盼的所有结果，它也决不是一次失败的举措，它仍旧是一项正确的政策。”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打算考察一下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出现的猜疑、犹豫、批评背后的种种原因；同时还准备回答一些有理性的人提出的有关问题。我们不会逃避任何困难，即使对于所需答复的问题，很难用流行的语言来表达。

我们希望通过本文说明自由党的政策方针不仅是一种常识，而且是经过对我们经济形势之基础的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之后才得到的正确适宜的补救办法。

承诺是不是有些过于乐观了呢?劳埃德·乔治办得到吗?

要实现这个承诺,需要一定数量的立法,然而这一立法过程会被哪些精心设置的障碍所延误,却没有人能事先说得清。但是如果劳埃德·乔治先生能在毫无耽搁、毫无阻碍的条件下开展他的工作,也就是说,劳埃德·乔治先生在限定时期内实现承诺所假定的条件均已具备,则我们的结论是,他对未来保持乐观的情绪是有道理的。

我们相信,复苏的经济繁荣所产生的累积效果,将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或许实践的结果将表明,比《我们能够战胜失业》一书中所提出的框架性计划小一些的计划,就足以使局势重新走上正轨,使国家从萧条走向繁荣,从而改变国家的整体面貌。病人看起来的确有些弱不禁风,但一旦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其健康恢复速度之迅速,即使是为他治疗的医生也会万分惊诧。

有些人对劳埃德·乔治先生在限定时期内实践其承诺表示疑惑。据我们调查,他们之所以这样,最充分的理由并不在于创造工作机会的困难或为此提供资金方面的困难,而在于"劳动力转移"问题,即把劳动力从他们总是多余的行业内转移出来,并安置到新的工作岗位这一过程中的困难。

但是这一困难——如果的确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我们延缓耽搁、踌躇不前、胆小怯懦的理由,而应当是鞭策我们加倍努力前进的动力。因为我们延误得越久,"转移"问题就会越严重,而且为那些由于被迫长期失业而形成"失业"习性的闲置人员提供工作的任务也会越困难。

要想真正地解决"转移"问题,首要条件是为失业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同时雇主对劳动力有所需求;除此之外,其他的

办法都只能是事倍功半。这也正是政府目前在处理"转移"问题上徒劳无功的原因之所在。说到底,"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只有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才可能有劳动力的转移。对于雇主而言,除非劳动力变得易于吸收,比方说,大量效率低下的矿工都可以找到工作,否则,他们不仅不会同意劳动力的流动,而且还会强烈地加以抗拒。

因此,我们预计,在自由党政策实施的初始阶段,许多行业都会明显地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接下来就是大量吸收劳动力的阶段,而这一阶段正是我们全力以赴解决"转移"问题的时候。劳埃德·乔治先生是否能在限定时期内实践其承诺,将主要取决于第二阶段的问题能否迅速地得到解决。

有些人对这项宏大的国家发展计划表示异议,怀疑是否值得这样做,怀疑是否有充足的财政予以支持,并以此为理由延缓计划第一阶段的实施,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希望能给读者一个透彻的说明。

因此,我们应当具有在战争时期克服千难万险时的那种必胜的信心、无畏的乐观情绪,奋发向上、精神饱满地面对这项艰巨的任务,争取在预定的时期内,不负重望地实现计划的各项目标。

二、问题之常识

自由党政策是一个浅显易懂的常识。保守党则相信,某种自然法则决定了一部分人必然要处于失业状态;而设法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举动则是"轻率的、鲁莽的";从财政上讲,在大多数时期内把失业人数维持在人口总数的 1/10 左右是"比

较合理的”。然而保守党的这一信条是荒谬的、脱离现实的，没有人会相信，除非他的头脑中多年来一直充斥着愚蠢无聊的想法。

最近以来出现了许多反对意见，但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由那些有亲身经历的或有实际经验的人提出的，而是由那些依据高度抽象理论的人提出的；然而他们对这些受人尊重、深奥难懂的理论只是一知半解，他们所依据的理论假设恰恰与事实相反。

鲍尔文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简直是一派胡言，任何心明眼亮的人，只要对此稍作一番清醒的、未加偏见的思考，都会看出他的讲话是愚蠢之极的。既然有工作可做，且有人愿意做，那么为什么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呢?对此鲍尔文先生说道:“是的，两者的确不能结合，高级财政学和经济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两者为什么不可能结合，不过其中的理由深奥难懂，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倘若非要使两者结合，则是非常轻率、非常鲁莽的，而且结果也许会导致整个国家的毁灭。有得必有失。如果没有人失业，我们的处境就如同又来了一次战争，而且即使每个人现在都有工作，也无法完全保证他们在此后的三年内就一定不失业。如果我们大力修建房屋，积极发展交通设施，汲尽我们土地的潜力，全面保卫我们的海岸，那么还能有什么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去做呢? 不!”鲍尔文先生大声呼喊道:“这样的做法太不公平了!我们现在工作得越多，留给后世可做的事情就越少。失业问题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命中注定的。我们这代人应当去做我们应做的那份工作，公正地看待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不应当牢骚满腹、愤愤不平。凡事均须适度而行，切记‘欲速则不达’。”

然而事实上，鲍尔文和他的同僚们并不能用经济学来阐明这一问题，就同他们无法解释最近爱因斯坦发表的物理学定理一样。如果他们能像劳埃德·乔治先生那样立足于常识，他们就会少犯些错误，这些常识是得到经济科学多方面支持的。

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证读者的直觉，那些乍看起来是合理的其实就是合理的，而那些乍看起来是荒谬的其实就是荒谬的。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向读者阐明我们的结论：其一，新的就业方式将使更多的人找到工作，这是一目了然的结果，其间并不存在着隐伏的障碍；其二，失业人员重新回到创造财富的工作岗位，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加；其三，那种莫名其妙地认为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改善生活就会在财政上陷入困境的观点，简直是奇谈怪论！

三、失业之事实

这个国家的劳动人民，至少有十分之一，八年以来（中间除 1924 年在恢复金本位前夕一个短促的复苏时期以外）一直处于失业境地，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自从 1923 年劳工部着手统计以来，由于失业而获得失业保险的人数，从来没有低于 100 万。今天（1929 年 4 月）失业人员总计为 114 万。

在这样的失业水平下，我们每年必须从失业基金中支出约 5000 万英镑的现款，而且这一数字还不包括贫民救济。自从 1921 年以来，我们对失业人员的现款支出已经达到 5 亿英镑之多，然而此举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这笔钱可以用来

修建100万所房屋，它几乎是邮政储蓄、银行全部储蓄额的两倍，远远超过所有各种矿产价值的总和，足够用来彻底更新整个国家的工业设备，或者我们把对比对象从上述较为重要的方面转向较为轻松的方面，可以说，这笔钱足以为全国每个家庭配备一辆汽车，或者提供一笔基金，让全国人民终年免费观看电影。

但损失还不仅仅如此。更大的损失是在失业者自身方面，体现在失业津贴与全额工资之间的差额，以及在体力、精力和信心上所遭受的打击。雇主的利润、财政大臣的税收收入，都难免因此而受到损失。就整个国家而言，持续十年之久的失业给经济进步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根据1924年的生产调查，一个英国工人一年净产出的平均价值，约合220英镑。依此推算，从1921年起由失业造成的损失约达20亿英镑，而这笔巨额资金足以将全国的铁路重新修筑两遍。它几乎是我们欠美国全部债款的两倍，各协约国向德国索要的赔款，全部加起来也不到这个数目。

我在这里之所以提到这些数字，是为了让读者对此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体会，而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由此对劳埃德·乔治先生计划中所需花费的估计数字，可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根据他的计算，每年投资1亿英镑的发展计划将带来50万个就业机会。与由于失业而年复一年累积起来的浪费和损耗相比，这项支出并不是很大，通过与上面引用的数字相比较，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项支出，只占到从1921年以来由失业所造成损失的5%；大致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5%。如果每年投资1亿英镑的发展计划持续3年，即使所有的支出假定最终完全被损耗，那么这项支出后的每年应付利息也只不

过使预算增加不到2%。总之，这是一项非常适度的计划。有人认为这个计划未免小题大做，所要医治的创伤并不怎么严重，所使用的方法，却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事实恰恰相反，所冒的风险无足轻重，而所要挽救的却是一个可怕的反常现象。

就这项计划的本身目的而言，它所包括的内容都是适宜的、切实可行的。即使计划支出的一半最终都在无形中被损耗了，我们还是能从中获取好处，以改善我们的处境。对此，难道我们不应该果敢一些，冒险尝试一下吗？

当然，我们也可以静坐一旁，对任何建议总是挑三拣四，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样的消极态度也许是非常明智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当我们冷眼旁观的时候，失业者的那份未经利用的劳动力是不可能存放在银行的账户上，供我们日后支取的。这些劳动力最终将白白地浪费，由此造成的损失也无可挽回。因此，鲍尔文先生每抽一口烟的功夫，好几千英镑就跟着化为烟云了。

四、自由党计划

自由党希望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发展计划来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他们的政策目的一方面在于及时为大量的失业人员提供工作，另一方面在于使商业和工业从它们因袭陈规的处境中摆脱出来，重新回到高速发展的正轨上，使它们此后可以借助于自身的力量向前发展。

国家发展所需进行的各项工作由于迟迟未能落实而积压得非常之多，以致整个计划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能得

以完成；而在这一时期结束之时，劳动力从旧行业到新行业的转移过程已经完成，而且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方法已渐趋合理化。政府方面的观点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或许在 2 年至 5 年之内就能得以解决。特别是劳工部曾指出，在下一个五年期间内，后继的年轻一代对工业就业所产生的压力将会大大减弱。有些人反对这一政策的理由是以我们的现有实力永远也不可能维持这项规模如此巨大的计划，但以上分析表明，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英国工业前景》一书对自由党计划进行了全面、完整的阐述；此外，关于计划中某些部分进一步的详细论述，可参阅《我们能够战胜失业》。

这两本书不约而同地表明了一点，即我们目前并不是无事可做。如果一个积极的、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政府能够深入细致地分析问题，毫无疑问，这将给它带来许多机会以作出明智的选择。当然，事先很难确定哪一项计划是最迫切需要的、最切合实际的、以及实施过程中遇到麻烦最少的。为了尽量减少需要“转移”的劳动力数量，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仔细选择一项得失均衡的计划。

如果读者需要更为详细的有关资料，我们建议你们参阅以上提及的两本书。这里我们只是给出了一个简短的概要。

1. 国家运输系统

自由党计划中最大的一个项目是对公路和铁路系统进行改造以适应现代运输的需要，使两者所能提供的最好服务与其他方面所能提供的最好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公路完全是国有的，而铁路的一半所有权则为私人拥有。从外部来看，前者现代化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于后者而

言，更易于在数量上加以确定。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我们能够战胜失业》一书中拟定的各种具体项目中，公路项目是居于首要地位的。

这一点也许使一部分人认为自由党计划实际上主要局限于公路建设，而铁路（或许还包括其他大部分发展项目）却未在考虑之列。这种想法纯属一种误解，是不正确的，他们可以从以上推荐的两本书里对计划的解释中体会到这一点。例如，《英国工业前景》一书就强调指出，那种以牺牲铁路交通为代价来发展公路运输的想法从原则上讲是完全错误的。

因此，有些人极力主张公路计划与铁路现代化应当协调一致，齐头并进，应当享有同等的重要地位，对此我们完全赞同。以此为宗旨实施一项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将是非常有利的，它可以改善铁路车场和铁路终点站的必要设施；可以促使某些铁路线实现电气化；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改造目前的铁路系统，以国外铁路系统普遍使用的大型货车取代我们的小型货车。在今年的预算中，政府已经意识到改造这类公共设施的必要性。他们已经免征铁路旅客税，不过前提条件是铁路公司必须把等额的一笔资金用于铁路基本设施的改造。政府的这一举措就其本身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可惜的是，它能够发挥的作用却极其微小。因为，这笔资金总额（650 万英镑）显然不足以为铁路系统配置载重 20 吨的大型货车。

“自由党黄皮书”提出的建议是，依据商业辅助计划的方针，以提供担保贷款的方式来资助这类公共工程。具体运用的方法可效仿工业事务联席会议为萧条工业的合并和重组计划供给新的所需资金时建议的方法。

我们认为，这类对国家发展极为有利的公共工程所涉及

的范围将是极其广泛的。当然，现在不可能确切地说出这类工程具体实施规模的大小，因为这一点将主要取决于政府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以铁路为例，政府的确可以对铁路公司予以鼓励、支援，甚至有所要求，但具体的工作仍应在铁路公司的控制之下进行的。由此显然可见，这类公共工程，同《我们能够战胜失业》一书建议的其他计划一样，不利于提供关于支出和就业方面的详细数据。但是铁路的改造不能作为实践承诺坚实而可靠的基础的这一事实，并不能构成对这个承诺可取性和迫切性进行非难的理由。事实上，实践将表明，这类公共工程的实施规模是非常宏大的，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至于公路和桥梁建设，计划打算在今后的两年内支出1.45亿英镑。投资于公路改造方面的这笔资金基本上是适度的，我们对此非常满意。彻底更新我们现存的公路系统也许需要花费至少15亿英镑，而计划建议的公路扩建和重建规模只需开销这一数字的10%；因此相对而言，这项公路计划是非常适度可行的。鉴于公路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巨大的增长潜力，像这样规模的公路系统改造计划决不能说是过度的。某些当局高层决策人士，如亨利·梅伯里爵士、蒙塔古勋爵等，一直认为近年来交通系统的发展未能赶上时代的步伐，因而需要利用一切力量积极地发展公共事业。

实际上我们认为，实现劳埃德·乔治先生的承诺，只需要实施一定程度的公路计划，而没必要把全部力量都投入于此，即使这样做是可行的。

2. 国家住宅建筑业

读者若想了解自由党计划中关于国家住宅建筑业的详细资料，除了参考以上推荐的两本书之外，还应当参阅E.D.西

蒙先生所著的《如何消除贫民窟》。

保守党削减津贴的政策势必将限制建筑业的发展，每年修建10万多所住宅(战前水平)的希望也将因此而破灭。自由党则打算此后每年修建20万所住宅，同时发放必要的津贴。

保守党的政策勉强能够满足人口增长对住房的需求，重建那些由于工业需要和其他原因必须要拆毁的房屋。这一政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住宅以改善贫民窟目前的拥挤状况，没有考虑为贫民窟留有些许间隙空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可以做一些修整工作，贫民窟的状况也决不会趋于好转，而只会是日趋恶化。

另一方面，自由党政策为了解决贫民窟的住房问题，将在今后的10年内，每年修建100万所住宅。这一政策对缓解贫民窟的拥挤状况，以及清除大部分最易出现瘟疫疾病的贫民居住点，势必会大有帮助。同时，它还将持续提供15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在这10年期间，由此节省的失业救济金总计当不低于7500万英镑。否则，这笔救济金将在10年内每年给国家带来1200万英镑的财政负担；而且10年后，这一负担还将每年增加600万英镑。

此外，建筑业是目前失业现象最普遍的行业之一。

在国家运输和住宅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保护乡村的现有面貌。现在该由国家采取措施来保护我们的草原、荒野、湖泊、森林、丘陵以及乡村的公地，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美丽而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景观。的确，我们非常感谢

私人的慷慨之举，感谢诸如国家文物保管委员会①和公地与步行道路保护协会等民间团体。但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居民定居点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越来越均匀，随着公路、动力运输和电力供给方面的改善而带来的工业和人口分布的合理化，个人或私人团体参与社会公共福利的能力和范围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因而需要国家来管理全国公共地区的保护工作。因此，自由党政策准备逐步采取措施，把全国的公共区域，如萨里公地、南部丘陵、索尔兹伯里平原、达特穆尔高地、埃克斯穆尔高沼和皮克山区与湖区的部分地带等地区的管理权控制在政府手中。这一措施需要的花费并不是很大，而由此产生的未来收益却是无法估量的。

3. 其他发展项目

国家运输和住宅无疑是自由党计划中最大的项目，但我们却不能由此而忽视其他为数众多的小项目，它们汇集起来也是非常巨大的。同以上两个项目一样，这些小项目也由于最近消极政策的延误而迟迟未能实施。

近几年来，皇家委员会、部门委员会、政府各部门、公众委员会、地方当局和某些半官方团体，都曾提出过各自满意的政策方案，但无一例外地被财政部扼杀了。在政府机关内，搁置着大量的计划方案，无人问津；而在这个国家内有许多头脑活跃、思想进步的人才，他们广泛地分散于各个阶级和各个地区，我们只有通过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方式才能够发掘出

① 创立于1895年的一个非政府机构，其任务是保护和保存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个地区的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纪念碑、自然风景区等。

这些人才。

当我们对反对意见不再采取回避、延误、甚至扼杀的态度，而是形成一种干实事的新的氛围时，每个人的思维都会高度紧张起来，大量的有识之士会主动地提出种种权利要求，而他们这种严谨的作风事先是不可能表现出来的。

许多具有这种性质的计划方案，在以前出版的各种自由党刊物中，都曾有过框架性说明。按照规模排列依次为电话通讯项目、电力发展项目和排水系统项目，据估计，这三个项目可以提供15万个就业机会。

这些类型不一的计划，仅就个体而言的确很小，但其数量众多，总体而言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它们的实施势必对国家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对此我们抱有极大的信心。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到，为了支持私营企业，有必要扩大商业辅助方案的实施范围。

显然，我们现在应当积蓄一切力量以推进国家的发展与重建工作，其中影响范围最广、产生效果最大是公共工程建设，如公路、住宅、电力、电话通讯，以及铁路、码头、港口等。

我们认为，自由党发表的《我们能够战胜失业》这本小册子不是高估，而是低估了现在需要完成的工作量，而且低估了计划所需的定额支出对就业产生的影响。自从自由党小册子问世以来，许多评论家非常重视铁路改造计划，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目前的情况下，具有发展性质的可行公共工程，不仅影响的范围极其广泛，而且由此涉及的行业种类繁多。

五、政府的论辩

劳埃德·乔治先生是在3月1日自由党候选人的午餐聚会上宣布其承诺的。在此之前，对国家发展计划持反对意见的那些人采取了一种迂缓策略，他们并不直接攻击这一计划，而是对此漠不关心、不屑一顾，企图通过缄默的方式使这一计划实施的可能性减到最低的程度。在罕见的严重失业情况下，一般认为，推行适当的公共工程建设计划从原则上讲是正确合理的；但有迹象表明（或者说是暗示）政府的行动方案却是以现在不存在实施国家发展计划的可能性为原则的。关于这项引人注目的提案最权威的表述，公布在贝尔福工业与商业委员会最终决定的报告中。贝尔福委员会首先表示，“有关论据一致赞同”在罕见的严重失业情况下，尽快实施一项“必要的公共工程计划”，接着，该委员会说：

“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能指望这类行动方案能够产生十分巨大的效果。公共工程的很大一部分建设项目并不能在各自的行业内为相当大数量的失业人员提供应有的就业机会，这种特性决定了公共工程建设可以推迟进行，也可以加速实施。不仅如此，在战前的萧条时期，政府为了尽快解决当时的失业问题，曾年复一年地对地方当局使用了相当多的劝诱措施以及其他手段以加速必要的公共工程的完成，然而实际的结果却无情地表明，在长期的萧条状态下，我们在解决失业问题上的真诚愿望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如此方式提供的就业会渐渐失去它原有的经济特性，而且会渐渐地沦落到与普通的救济工作没什么区别。”

近来，有些人企图从另一个方面来证明国家发展政策是"毫无可取之处"的，他们指出，这一政策将使一定数量的资本支出所能提供的就业数量减少到最低程度。于是丘吉尔先生在去年11月8日的下院发言中宣称：

"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公共部门对各种可能的救济工作进行非常细致周密的研究……"(丘吉尔先生这里使用的"救济工作"，是用以描述资本支出计划的，这是内阁阁员们借以混淆争论问题的惯用手法。)

"从一般立场出发，我们是反对这类计划的，尤其是由国家来直接指导实施的时候。根据我们最近的实例研究，我们惊奇地发现，与其他任何情况下的支出效果相比，我们为解决失业问题而实施的公共工程建设实际上所取得的成效小得可怜，实在是令人大失所望。"

丘吉尔先生的这番讲话，使内阁阁员们进一步坚定了支持官方调查的决心。因此工业运输委员会在他们的报告中，讨论了"人工创造就业"的问题；不过这一部分的论据之贫乏、内容之枯燥使该委员会的报告逊色许多。其部分内容现援引如下：

"根据目前的成本实例分析，我们估计，1350个非熟练工人从事为期一年的主干公路改建将耗费100万英镑。同样数目的一笔资金用于排水系统改造时，可以为大约1000个非熟练工人提供两到三年的工作。国家为了解决当前面临的失业问题，试图建立一个规模足以影响就业形势的人工替代性就业市场，但以上的数字显然表明，为此而采取的任何措施所需要的费用之高，令人不敢问津。"

官方委员会作出的报告及其数字，均是利用官方信息而

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引起英国民众的重视。凡是有理解能力的、思想开放的人，在以往是不会听信这类说辞的；但在贝尔福委员会和工业运输委员会等权威组织的大力灌输之下，他们也渐渐认可了政府的结论，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发展政策虽然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对就业能够产生的影响却微不足道。内阁阁员们利用一切手段，就是为了让民众相信他们的观点。“你们总是振振有辞地要求我们干实事，那么请说明你们究竟想让我们做哪些工作”——这就是内阁阁员们多年以来颇为自得的反驳之词。例如，在上面引述的丘吉尔先生的发言中，他对那些批评者质问道：

“某位正大光明的绅士曾说，我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支付失业救济金，要么投资公共工程。当然，如果他能说明我们如何才能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那么我们会毫不困难地作出选择。”

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工程所能提供的工作不仅数量不足，而且种类也不适宜。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讨论这一观点。自由党人士在《我们能够战胜失业》一书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别具一格的驳斥，他们把计划依据的理由分解为若干个具体的条件。自由党的国家发展计划最初来源于“自由党黄皮书”(即《英国工业前景》)的有关建议，后来在 1928 年 3 月，自由党正式决定把该计划作为本党派的行动纲领。现在内阁阁员们若再想把自由党政策看作仅仅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方案，恐怕已经不太可能了。

因此，内阁阁员们已经改变了反对自由党计划的策略。现在他们承认确实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又坚持认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只是把就业从某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总体而

言，对就业的影响微乎其微。我们将在第九篇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政府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按其既定原则行事。在 1927 年 9 月以前的一年里，新建房屋的数量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点，总计为 21.2 万所，但由于政府削减津贴，国家计划在下一年仅仅新建 10.1 万所房屋。公路改造工程也同样受到了限制，蒙塔古勋爵生前曾经说："在过去的两年里，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新建主干公路的计划或行动。"我们从这两个事实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就业形势会如此令人沮丧，而丘吉尔先生却宣称："这是我自 1914 年以来记忆当中头脑清晰时间最长的时期。"

六、自由党计划能够提供多少就业机会？

在分析自由党宣言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两个问题，即：(1) 既定数量的资本支出能够提供多少就业机会；(2) 提供的工作种类是否适合当前的失业人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数字计算，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我们能够战胜失业》一书中，自由党利用实例为自己的结论辩解。因此，为方便起见，我们就先看一看第一个问题。

1. 每 100 万英镑的支出能够提供的就业数量

在《我们能够战胜失业》这本小册子中，自由党宣称，每年向公路改造投资 100 万英镑将直接或间接地提供 5000 个就业机会。具体说明援引如下：

"专家的估计是，总支出中大约有 80% 将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工资的支付。这就意味着每 100 万英镑的支出能提供大

约 5500 个就业机会。其中直接提供的就业数量是 2000—2500，其余的则由材料的生产和运输间接提供。总之，每 100 万英镑的支出提供 5000 个就业机会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可以看出，这一数字几乎是工业运输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提及数字的 4 倍。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他们的估计是“为 1350 个非熟练工人提供一年的公路重建工作将耗费 100 万英镑”。他们在报告中强调了“非熟练工人”，的确，这一点很容易解释这两者估计之间的偏差。但是他们忽略了两点：(1)直接受雇于公路建设的熟练工人；(2)由生产公路建设所需原料而间接创造的就业数量。然而工业运输委员会却一直以为，1350 这一数字已经充分估计了公路改造所能提供的就业数量。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间接就业的创造；而且以 1350 这一数字为依据，作出了国家发展政策对失业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的结论。

幸运的是，这一争论问题现在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澄清。内阁阁员们太轻率、太鲁莽了，以致武断地认定自由党的估计数字显然是夸大了。1929 年 3 月 4 日，也就是劳埃德·乔治先生宣布其承诺几天之后，经济部部长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曾向运输部询问，实施一项公路改造计划可以提供多少个就业机会。他们的回答是，100 万英镑的支出只能为 2000 个人提供一年的工作。”

当然，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也同样忽略了间接就业的创造。在此之后，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交由下院审议，结果作为提供数据的运输部部长，阿什利上校不得不道出实情：

"如果工程的实施所在地主要是在城市范围内，那么在最大限度厉行节约的条件下，每100万英镑的支出能够直接地为2000名工人提供一年的工作，这基本上是一个合理可靠的估计数字。如果整个工程所包括的大部分计划项目均在城市范围内执行，而且很大一部分手工劳动者由此能够获得就业机会，则这一数字也许会增加到2500左右。

至于整个工程在实施范围以外的地区能够提供的就业数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资料可以给出一个合适的估计数字。但是有一种假定认为，对于受雇于实际工程的每一个人而言，将相应地有另一个人通过生产和运输工程所需原料以及其他途径而间接地获得就业机会，一般说来，这种假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看来，官方事实上也承认自由党的估计绝非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实际调查表明，直接提供的就业数量在2000到2500之间，阿什利上校由此断定，自由党小册子的估计数字是相当准确的，因为考虑到间接创造的就业数量，这一数字"基本上是合理可靠的"。但是鉴于内阁阁员们以前对此有过定论，阿什利上校自然采取了一种低调处理的方式，他只是轻描淡写般地提到了实质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间接就业的创造问题。因此，我们相信，关于公共工程所能提供的就业数量，自由党的小册子并没有夸大其词，应当说，5000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稳妥确切的总体估计"。阿什利上校在下院的陈述足以表明，自由党小册子对公路建设将提供的就业数量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而内阁阁员们和工业运输委员会所竭力散播的结论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

一般言之，我们认为每100万英镑的资本支出能够提供

大约5000个就业机会，考虑到自由党计划包括众多类型不一的项目，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平均估计数字。

2. 间接就业创造的重要性

间接就业的创造在好几个方面都大有裨益。在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我们能够战胜失业》一书中的计算问题一直是某些人士之所以质疑自由党计划的焦点所在。这场争论无形中有益于问题的澄清，最终的结果表明，小册子的计算数字完全是基于可靠的专业技术分析。这一事实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由党关于住宅建设、电话通讯等方面的资本支出对就业影响的估计。但公共工程的支出对就业的影响还不止于此。现在，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官方借以反对国家发展计划的理由或依据是非常不切实际和轻率的。工业运输委员会则完全忽视了与公路建设有关的整个间接就业创造的因素，也许他们认为这样做很合理；进一步说，凡是断言国家发展支出效果"不理想"的那些人，均忽略了这一因素的存在。但是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人都忽略了这一因素呢？其实，自由党的提议并无任何奇异、微妙之处。公路建设必然对原材料有所需求，而原材料的生产则需要劳动力和其他一些商品，同样，这些商品的生产也需要劳动力。诸如此类的连锁反应实际上就是工业活动过程中的本质特征。因此，正确理解经济科学的第一步应当是，一方面对于这类连锁反应所波及的范围之广要有充分的了解，另一方面对于普通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行业之众要有足够的认识。例如，一套服装的制作产生了对布料的需求；对布料的需求则产生了对棉纱和毛线的需求；由此又产生了对原毛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农场主、商人、工程师、矿工、运输工人、店员所提供的劳务互为因果，有机地形成一个整

体——这就是经济科学的基本常识。然而我们的内阁阁员们和工业运输委员会却孤立地看待服装的制作，似乎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裁缝铺之外，再没有任何行业与此有联系。显然这种看法是一种低级错误；然而可悲的是，近些年来，正是这类谬误主宰着我们的政策方针。

一般而言，资本支出计划提供的间接就业数量要远远超过直接创造的就业数量。因为随着这类计划的不断推进，它将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由此提供的就业数量中绝大部分将广泛地分布于整个国家的各个行业内，这就是间接就业的创造过程。倘若有人以“范围过大”为托辞，认为间接就业数量至少是无法估测的、甚至是凭空想像的，则是毫无理由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在适度的范围内，这一数量是完全可以估算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对《我们能够战胜失业》一书中谨慎的保守估计表示满意，因为从总体上讲，低估要比高估更可靠一些。

3. 商业活动的累积效应

资本支出计划对就业的影响还不止上述的两个方面。除了间接就业的创造，国家发展政策还将以其他方式促进就业。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目前领取失业津贴的闲置人员重新找到了工作，有了工资收入，那么就意味着有效购买力将有所增长，对商业而言，这无疑是一针兴奋剂。不仅如此，商业活动具有自我加速促进的特性，也就是说，在商业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能够产生累积效应的力量；当然，在商业萧条时期也存在这种力量，只不过发挥作用的方向不同而已。具体说来，当商业处于萧条阶段时，会出现延期订货的趋势，人们普遍不愿保留存货，对未来充满疑惑，在风险面前踌躇不前；

然而当商业开始复苏时，这种力量就会加速地促进商业活动的发展，这时，整个企业界普遍存在着创建新企业、进行资本扩张的乐观情绪，于是，商业扩张之势越来越强，最终达到繁荣的顶峰。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准确地衡量这种累积效应，因此，在《我们能够战胜失业》一书中对这方面几乎未予以说明。但是，在我看来，这方面的影响对就业具有重大意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既定资本支出对就业产生的实际效果要远远大于自由党小册子的估计。从劳埃德·乔治先生的承诺中可以看出，他所考虑的诸多事项均与时间因素有关。从公路建设工程开始实施到这项工程对就业产生全部影响时为止，其间有一段很长的间隔时期，某些人认为这一时期将白白流逝，毫无意义，对此我表示反对，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俗话说："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经济科学告诉我们，一旦公共工程计划开始实施，那么会立即对这个国家的整个商业和工业产生刺激效应。

4. 就业工种的适宜性问题

关于国家发展计划，存在着一种最常见的反对意见，即认为由此提供的就业在工作种类上不适合绝大多数失业人员。

如果完全无视间接就业创造因素的存在，这种反对意见似乎是合理的。倘若国家发展政策的目的在于使大量的失业人员从事诸如公路建设等户外工作，则这种结果纯粹是对自由党计划的一种讽刺。其实，劳埃德·乔治早已说明，公路建设将涉及至少 47 个不同的行业，而且由此创造的就业数量中绝大部分并不是在本行业内，而是广泛地分布于其他 47 个相关行业内。因此，以只有一部分失业人员适合做重体力工作的

事实作为争论的依据，是不切主题的。

有些人认为，总失业人数当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称作为永久性失业人员，而绝大部分只是临时下岗人员或短期失业人员，这些人是可以在本行业内再次获得就业机会的。的确，这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但同样与这里讨论的问题不相干，然而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国家发展政策的资本支出将对各行各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促进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许多行业将重新吸收熟悉本行业的失业人员或临时下岗人员。随着劳动力的不断吸收，失业人数就会逐渐减少。

举例来说，国家发展计划需要大量的钢铁原料。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求，钢铁工业需要吸收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以扩大生产，但它没有必要雇用不熟悉本行业的工人，因为它可以雇用那些有经验的失业工人或临时下岗人员。劳动力的吸收就意味着失业的减少，因此，那种认为这一计划无法"利用"短期失业人员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那些由于钢铁工业开工不足而临时下岗的工人是完全可以利用的。而且，全日制工作替代非全日制工作，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统计上，都意味着实际失业人数的减少。

我们在分析失业问题时，通常是把过去 8 年里每一年的失业总数作一番比较，这一做法往往使我们忽略了失业人数在各个行业内分布的变化情况，而这一点却是最重要的。1924 年，各煤矿公司的注册员工大约为 120 万人；到 1928 年 8 月时，已经不超过 90 万人。在前一时期，失业矿工总计仅为 2.6 万人；而后一时期却几乎接近 30 万人；到目前为止，失业矿工的人数已经减少到 14.5 万人，这一结果部分是由于煤矿业的复苏，然而主要是由于失业矿工向其他行业的转移。另一方

面。建筑业的失业人数从 1926 年 3 月的 6.4 万人增加到 1929 年 3 月的 10.4 万人；在同一时期内，诸如公路改造等建设工程行业的失业人数从 2.6 万人增加到 3.7 万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普遍的行业援助计划并不是一项适宜的补救措施，它不能解决建筑业以及某些衰退行业的失业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缺乏根据的臆断。在某种程度上，失业广泛地存在于各个行业，当某些行业的就业形势不断恶化时，自然会发生劳动力的转移，也就是说，劳动力会流向那些就业机会较多的行业。如果总体失业水平一直居高不下，从表面上看是由于行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不足，然而从本质上讲，是由于行业系统出了问题。

5. 目标的实现需要多长时间

某些现任政府官员曾宣称，即使实行充分有力的政策，也无法在一年之内把失业数字降低到正常的水平；然而就在近几个星期里，他们却毫不犹豫把法规的制定立足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失业将在一年之内降低到正常水平，这种言行相背的做法，的确有些讽刺意味。1929 年年底，政府根据布拉内斯堡委员会的建议，审议并通过了一项失业保险法案，其中包括众人皆知的“30 项贡献法令”。在这一法令下，凡是在过去两年里没有做到 30 项贡献的人——例如那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失业状态的人——都没有享受失业津贴的资格。如果这一法令实施的话，绝大多数的失业矿工将失去领取失业津贴的权利。但是法案规定这一法令在未来的 18 个月内暂不生效。为了平息舆论的压力，下议院的政府发言人对这一法令的具体条款进行了辩护，同时声明，政府之所以推迟实施期限，是因为相信失业会在这一法令生效之前降低到正常水平。

到今年年初，实际情况表明，政府的良好期望并没有实现。因此，政府在3月审议了一项修正法案，规定“30项贡献法令”继续延期执行，但期限仅为一年。由此可见，劳工部仍然相信其乐观的假定，尽管已经有些底气不足；同样，内阁阁员们也保持原有的立场，坚信失业会在这一年里回落到正常水平。相比于格雷勋爵，他们相信的是劳埃德·乔治先生承诺的目标，而不是所使用的政策。就自由党计划本身而言，其目的和手段是高度统一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此，既然政府对失业将降低到正常水平的目标假定深信不疑，并以此作为议会法案的依据，那么为什么要拒绝使用这一计划所建议的政策手段呢？这种做法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事实上，只有借助于充分有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策，才可能实现既定的目标。

七、自由党计划的成本

劳埃德·乔治先生在承诺中明确表示，自由党计划的实施将不会带来额外的税收负担。当然，他也承认这一计划不可能是毫无代价的；但是他相信，计划的未来收益将是相当可观的，仅是其中的三项收益——某些其他方面的节省、政府岁入的增加以及诸如军备支出的削减——就足以补偿计划所需耗费的资金。

也许正是承诺的这一部分引起了那些怯懦分子的猛烈抨击。但是这些非难者事实上并不具备发言权，他们对计划的成本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其实，劳埃德·乔治先生本可以很有把握地许诺更低的成本，他实际的做法只不过是为自己

留有更大的余地而已。

下面我们试从一组非常不利于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假定(近乎于极端化的假定)出发,看一看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计划所需的成本。这些假定依次为:(1)计划在实施完毕之前需要耗费3亿英镑;(2)计划中任何一个项目的最终收益均为零;(3)仅仅从最狭义的方面考虑由此造成的预算得失,而不考虑国民收入与福利的得失。此外,我们进一步假定,在计划所需贷款的利息和偿债基金方面,每年必须支付本金的6%。

以上的假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三年内支出3亿英镑最终竟然一个便士也赚不回来,天下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好事。不过我们暂且就这样假定。根据这些假定,每年给预算带来的费用是1800万英镑。

这笔费用大约是目前政府岁入的2.5%。如果就业增加5%能够使目前的税收收入增加1.5%,如果军备支出能够削减7.5%,那么这笔费用无疑是可以获得补偿的。

当然,根据这些假定所估算的费用,肯定会远远超出劳埃德·乔治先生承诺的计划成本。实际上,他的计划需要耗费的资金大大少于1800万英镑。

首先,公路发展计划的必需资金完全可以由改造后公路之"增值"和现有公路基金的专项拨款提供,因此它不会给预算造成任何负担。

其次,住宅建设计划,作为自由党计划中耗资最大的一个项目,的确需要资金援助,但它将来可以以租金的形式逐渐收回投资。E.D. 西蒙先生指出,相比于保守党每年新建10万套住房的计划,自由党计划的20万套虽然规模比较大,但所需资金的主要部分是可以通过出租住宅的方式自我筹集,因

此它给预算带来的费用每年仅是120万英镑，三年累计为360万英镑。此外，这一计划每年必须支付60万英镑的利息，三年累计则是180万英镑，加上前面的支出，所需费用共计540万英镑。另一方面，住宅计划将提供15万个就业机会。

最后，自由党计划中众多种类不一的项目，例如电话通讯和商业辅助贷款，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根据失业部的统计，为了满足计划中需要财政援助项目的资金要求，预算每年要增加250万英镑的支出；鉴于计划的实施期限为三年，总计而言，750万英镑（当然是可以收回的）将是绰绰有余了。

另一方面，政府无须为每年250万英镑的预算支出感到担忧，由这一计划带来的政府岁入的增加与军备支出的削减将足以为财政带来相应的收入，相比于计划的未来收益，这笔费用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当然，我们希望自由党当权的政府能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毕竟，250万英镑只相当于政府岁入的0.33%和军备支出的3%弱。

但是这一计划的收益远不止上述的那些。我们还没有考虑由于失业减少而带来的失业基金方面的收益。严格地说，失业基金是独立于预算的国家专用资金，因此这方面的收益并不会直接地有助于预算状况的好转。但是，它对预算有间接的帮助，因为失业基金的赤字迟早得由预算来承担。

如果失业减少50万人，失业基金每年可节省2500万英镑。读者稍加计算就可以看出，相比于以上估计的计划每年给预算带来的费用，这一数字是多么巨大，具体地说，后者是前者的10倍。而且我们还没有考虑由此节省的实现济贫法方面的支出，当然，还有各项基金的利息支付。

由此可见，这一计划每年所需资本费用的 1/4 可以由失业基金方面的收益于当年之内弥补。

此外，由于国民收入增加而带来的政府岁入的提高部分，或许可以于当年或下一年内抵消其中的 1/8。

由此可见，计划所需资本费用的近一半左右完全可以即时得到补偿。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计划并不会给国家造成任何明显的损失，即使平均而言，每年 5%的成本还能带来一半，也就是 2.5%的收益。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考虑范围仅仅局限于国家财政方面，而丝毫没有涉及到国民福利方面。如果我们试图进一步估算失业人员由于重新就业而获得的持久利益以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当然衡量的标准不是直接的现金收入，而是诸如运输系统改造后的高效率和国民住宅的健康舒适等方面的自然增殖，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计划的未来总收益之高将是无法估量的。

有些人的观点未免过于悲观了，在他们看来，计划的成本之高、风险之大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且由此可能获得的收益相对而言却微小得令人难以置信。现在看来，他们的确是有些杞人忧天了。

八、自由党计划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

面对当前的发展趋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政府要在经济事务中扮演角色？为什么提供给私营企业的鼓励和扶持总是不够充分？

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人们可以在“自由党黄皮书”(即

《英国工业前景》)中找到。凡是拥有大量资本的经济实体,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完全处于政府部门的影响和控制之中。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无法阻止。

目前在运输系统、公用事业和国家住宅建设方面,资本扩张的速度主要取决于财政部和当今执政者的政策;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这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如果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采取限制和缩减政策,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他们听其自然、放任自流,我们将落伍于时代的步伐。相反如果他们采取鼓励和扶持的政策,国家实力将迅速提高。至于选择的是设备精良的、最新式的、领先的工厂,还是高效的国有工厂,则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意愿和政策。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选择私营企业或是国营事业来解决当前的问题。事实上,这一决定已经作出了。在许多方面——虽然不是全部——问题在于政府是亲自介入经济领域还是袖手旁观、放任自流。

公路、造林、垦荒、排水、电气、贫民窟清除和城镇规划,以及运河、码头和海港的建设,目前均需要大量的资本注入,因此政府当局的支援是不可或缺的。

在论证国家参与经济生活之必要性的同时,自由党计划也对许多以援助私营企业为目的的重要项目提出了建议,其中包括振兴农业、资助铁路系统实现机车及必要设备的现代化、扩大商业辅助法案的某些规则以便为私营企业融通资金等。这几项计划的重要意义,丝毫不亚于政府当局着手实施的那些方案。

自由党计划本身的目的并不是发展国有企业,而是试图借助于现有的和易于控制的组织机构的媒介作用,来发展和

增强国家的实力。

因此，自由党计划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特征。关于这一点，某些坚定的反社会主义人士曾在他们的机关刊物《投资者大事记和金融市场评论》——这是一份在中产阶级投资者圈子内颇受好评的金融周报——上予以着重说明。具体的评论文章刊登在1929年4月13日的那一期上，原文援引如下：

选举策略

在大选运动中，很难指望有什么公正精确的政治评论。但像《泰晤士报》发表的名为"失业的解决办法"的标题文章那样，倾向性如此之明显，也是颇为令人惊奇的。这篇文章旨在强调自由党的计划与社会主义劳工团体的主张别无二致，因为两者都建议"通过政府机构来为失业人员寻找工作"。有时，在外来压力下，有道理的观点也会走向彻底的谬误，这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是正是这样一个极好的例子呢？社会主义劳工团体的主张是放弃私营企业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代之以国家控制，从而为每个人都提供(或维持)就业机会；而自由党计划则是在紧急情况下协助政府，国有企业的经营也仅限于那些在性质上不可能由私营企业经营的行业。比如，公路的建设和维护，如果不由公共机构利用公共基金来承担，谁又会来承担呢？私营企业当

然不能胜任这种任务，因为设立
收费站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九、难道自由党计划仅仅是转移就业吗？

近来颇为常见的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政府为资助生产性计划而筹集资金势必会减少正常工业使用的资本供应。如果情况的确如此；国家发展政策就不可能真正增加就业机会，因为这样做无非是以国家计划下的就业替代了正常情况下的就业而已。而且反对者宣称，要么出现这种情况，要么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由此看来，政府在失业问题上的努力几乎不会有什么成效，甚至可以说完全无济于事。当前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只有听天由命。

这就是我们的财政大臣在其预算报告中所持的论点。他向下院说："一般言之，政府举债和政府支出，无论它们在政治上或社会上有何帮助，几乎不可能增加实际的就业机会，即使由此能够促进就业，这个现象事实上也是不能持久的，这就是财政部传统的信条，是我们长期以来一贯遵守的。"最终他的结论是，某些政府支出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类支出，就其本身而言，即使是非常明智合理的，也无法解决失业问题。

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支持这个论点的依据是根本不成立的。

首先，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表明这个论点只适用于国家创办的企事业。如果确有根据证明这个论点适用于国营事业，那么它必然同样适用于任何涉及到资本支出的新工程或新企

业。倘若某些工业巨头决定开创新事业，准备斥巨资（比方说1亿英镑）用于兴建工厂，我们就一定会预料到就业形势由此将大为改观。当然，这样的预期肯定是不会错的。但是财政大臣的论点如果是正确的话，我们的想法就是有问题的。根据他的论点，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富于创业精神的企业家仅仅是把用于其他目的的资金转移到他们兴办的企业中，结果对就业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事实上还不止是这样，我们也许不得不进一步作出更加惊世骇俗的结论，不得不由此断言，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除非是不可思议的通货膨胀）都无法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是别的，只是资本不足。然而这一结论又令我们非常疑惑，因为谁都知道，英国的剩余资金是非常巨大的，它每年出借国外的资金通常都在1亿英镑以上。

由此看来，财政大臣的论点肯定不是从常识中得来的。近年来住宅建设计划使许多人获得了就业机会，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有人认为，即使没有这一计划，也同样会有同样多的就业机会，我想任何一个有判断能力的普通人决不会相信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说法。同样的道理，如果采用了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就业计划，势必会有更多的人找到工作，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财政大臣的论点不仅表面上是不可信的，而且事实证明它的确是错误的。新投资所以能够提供就业净增量，是出于以下三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储蓄，这正是我们现在用以支付失业津贴的资金来源。

第二个来源还是储蓄，由于缺乏适当的信用媒介，这项资

金基本上被消耗殆尽了。

第三个来源则是对外出借资金净额的减少。

下面我们将依次分析这三个来源，首先从第一个说起。所谓个人储蓄，意思就是说某些人所生产的超过了他们所消费的。这个剩余额可以用来、也应当用来增进资本设备。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利用储蓄的唯一方式，它也可以用来使其他人的消费超过他们的生产。

当出现失业现象时，情形正是这样。这时我们是把储蓄用来救济失业人员，而不是用来为国家增加设备。劳埃德·乔治先生计划下所要使用的储蓄，并不是挪用其他资本设备项下的资金，而是部分取之于失业项下的救济金。单就失业津贴一项来说，我们每年就得支出5000万英镑，而这还不是用以援助失业者的全部费用。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来源。应当说明的是，个人储蓄转化为投资并不一定是必然的。用于资本改良的投资量，一方面取决于英格兰银行信用创造的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家的投资欲望，而政府本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主体。在这些因素的支配之下，投资总量并不一定相等于储蓄总量，两者实际上经常有所偏差，而正是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形成了许多困扰我们的难题。

投资大于储蓄的结果是经济的繁荣、高度的就业，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投资小于储蓄的结果则是经济的萧条、不正常的失业，这也正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处境。

关于信用扩张，往往存在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由此势必造成通货膨胀。但并不是所有的信用创造都意味着通货膨胀。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储蓄已经完全耗尽；而我们仍

在继续实行扩张政策时，就像我们在战时和战后一段时期内所做的那样，才会发生通货膨胀。

有人认为资本支出政策将造成通货膨胀，除非同时从正常工业中挪用一部分资本。如果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资本支出政策的实施规模过于庞大，造成对储蓄的需求大于供给，这时上述说法也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目前的情况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境地。我们现在首先需要对付的是严重的通货紧缩，是经济萧条；至于由国家发展政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其危害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以至于可以完全忽略。在目前的情况下，以通货膨胀这个可怕的恶魔作为反对资本支出的理由，就好比是对一个身患痨病、面黄肌瘦的人警告说"过度肥胖是危险的"一样。

迄今为止，英格兰银行一直不敢实行大胆的信用扩张政策，究其原因，可能是害怕信用扩张会引起黄金流失，而该行认为他们还不具备充足的黄金储备以应付这一后果。

英格兰银行如果为了缓解国内企业的疲软态势而扩大信用量，对这项新增的信用量，能否由国内企业按当时的利率加以吸收，是没有确切把握的。由于市场利率将随着信用扩张而下降，这时新增的信用量，也许有很大一部分会流到国外借入者那里，结果银行的黄金将外流。因此，除非英格兰银行能够事先确定，在当时的利率水平下国内的借入者愿意吸收贷款，否则贸然扩大信用是有一定风险的。

自由党计划之所以能够非常适应目前形势下的基本情况，原因就在这里。它提供了保证扩大信用安全的必要条件。

当然，英格兰银行对政府的资本支出计划必须抱有忠实无间的合作态度，竭尽所能，辅助计划得以顺利地实施。因为

英格兰银行的职权足以决定这一计划的成败。如果它为了防止银行信用的扩张而实行通货紧缩政策，那么已经安置妥当的各项政府计划势必受到冲击，财政部为资助计划的资金支出也只能是以牺牲其他企业为代价，这种结果是我们都不愿看到的。

因此我们同意麦肯纳先生的观点，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信用扩张。但是我们如果不为信用在国内的具体用途提供条件，而只是单纯地扩大信用，那我们就难免会起疑心，害怕新增信用量的绝大部分会流到国外借入者手中，从而携走我们的储备黄金。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银行信用的扩大也许是促进就业的一个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实施一项吸收新增信用量的国内投资发展计划却是安全扩大信用的一个必要条件。

自由党政策所需资金的第三个来源是对外出借净额的减少。

目前我们储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投资于国外发行的各类证券。假定庞大的国家发展政策所需的资金，全部取之于对失业救济的现有支出和现在被浪费掉的储蓄这两个部分还不够，再假定为了满足政府的资金需求，势必会有其他借入者无法获得贷款；但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借入者就一定是英国的企业家。因为伦敦目前向国外的政府或国外的地方当局提供了相当大规模的贷款，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技巧，完全有可能收回一部分这方面的贷款而用于政府的支出计划。因此英国政府的贷款行为将主要影响债券市场。

目前英格兰银行由于自身的缘故，对于凡是能减少对外投资量的任何事物，都表示欢迎。外汇的形势总体来说是令人

担忧的，最近银行利率的上调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对外投资量若能有所缩减，外汇的不稳定局面将会趋于缓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格兰银行在一两年前，对外投资还实行半官方的禁令。当然，禁令是一种比较粗暴的手段，只宜做短期内的尝试，我们认为最好不要恢复这种禁令。然而目前的形势虽稍有缓和，但依然严峻，因此，仍旧存在着实施禁令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处于逆差地位，这时对外投资的增长将是非常危险的。对外投资之所以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部分原因就在于储蓄在国内缺乏出路。

由此可见，资本支出政策的结果，不仅可以消除通货紧缩下的萧条现象，而且可以使现在向国外寻找出路的储蓄，大部分转移到国内以求发展。这一结果是值得欢迎的，也是符合英格兰银行自身利益的。

有人反对这种乐观的看法，认为对外投资的减少势必会造成出口业的不景气。我们实在是不明白这种反对意见的理由何在。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对外出借净额的减少将减轻英格兰银行在黄金储备方面的压力。它的主要影响，最终不会导致出口的减少，而会造成进口的增加。因为新计划的实施必然需要一定数量的进口原料，同时现在的失业人员，一旦有了工作，自然会消费更多的进口食品。

这就是我们反对那种无所作为的消极观点的理由所在。劳埃德·乔治先生计划所需的资金并不是从其他资本设备项下挪移而来的，而是部分出自失业项下的救济金；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储蓄，这部分资金现在由于缺乏适当的信用媒介正在无形中浪费掉了。新政策将促进经济走向繁荣，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某些新事物；而借助于对外出借的缩减，我们仍可

以保持局势的平稳。

新政策的实施将使目前的整个失业大军重新获得就业机会，从而会进一步增加国民财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做法势必对财政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按照“安全第一”的原则，我们应当保持一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看法对任何有头脑的人来说，简直是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

我们之所以实施新投资计划，就是为了利用这些闲置的生产资源。

我们的论点简单明确，显然是不容置疑的。在吸收闲置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也许会出现某些实际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设法避免占用其他利用形式下的资源。

这一结论对我们自己、对劳埃德·乔治先生以及他的顾问们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间涉及的理论问题也并不生僻难解。近些年来，经济学家们普遍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资助的资本发展计划是否能够真正促进就业。争论的结果证明本章所做的结论是正确的、合理的，而所谓的财政部信条纯属无稽之谈。例如——援引某些才识过人的权威人士的见解——我们上述的论点与庇古教授的论证结果非常接近，他在最近撰写的《工业波动》一书中（第二部分，第十章），详细阐述了财政部信条，并明确无误地指出它的谬误所在；庇古教授的这一论点得到了乔赛亚·斯坦普先生的赞同；与此同时，麦肯纳先生也积极地支持这一见解（参阅他在1927年对股东们发表的演讲稿，后来再版于《战后的银行政策》，第118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的总裁，他毫不犹豫地坚持扩大投资于企业活动的资金量，在他看来，这种做法并不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

事实上，对上述论点，除了财政部圈子内的某些人士以外，还没有一位有名望的权威经济学家发表过反对意见。鲍尔文先生、丘吉尔先生和拉明·沃辛顿-埃文斯爵士坚持认为政府举债势必会减少供私营企业使用的资源，认为劳埃德·乔治先生反对他们时所玩的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鬼把戏；如果公众相信他们所说的是完善的正统经济理论，那就大错特错了。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反对恰恰是正确的。构成自由党政策的基础理论，是专家们再三权衡之下才决定的。

十、现任政府的消极政策

近些年来，财政部主要关注的是其辖属的各部门的战债转化问题，而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问世的。财政部认为，政府举债越少，把战债转化为利率较低的债款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为了有利于战债的转化，他们尽其所能削减一切公共借款和政府的资本支出，而不管这类支出本身是怎样地有利于生产，怎样地有价值。这种做法究竟会造成怎样巨大而持久、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恐怕公众还一无所知。

对于一切有利于发展、有利于企业的周详计划，他们（只要事实上做得到）总是以“否”的答复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事实上，缩减资本支出，对政府债款利率的降低，的确会产生一些作用；但同样的事实也表明，它会扩大失业，使国家的必要设施停留在战前的水平。

即使是从预算的观点来看，财政部的做法似乎也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有人以这种做法有可取之处而表示赞同，那实在

是不可取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国际市场，对金边证券利息率起决定性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是处于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英国政府通过削减或扩大资本支出对这方面所能引起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假定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利率由此可以降低0.25%。鉴于等待转化的战债是20亿英镑，则这一数字所体现的是每年债务负担将相差500万英镑。试将这个数字与去年的失业基金支出对照一下吧——后者高达5000万英镑以上。

应当说明的是，在今后的10年里（比方说），形势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战前是经常会发生的——由于某些国际因素的作用，利率将降低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比财政部在世界市场利率非常之高的不利环境下千方百计希望达到的水平还要低得多。这时才是顺利实施转化计划的大好时机。因此财政部目前即使能在比现有市场利率低0.25%或0.5%的水平上实现战债的转化，结果也许会证明是极不划算的。如果为了得到一时的微不足道的便宜而过早地实施转化计划，我们最终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应当沉着冷静，等待条件的成熟。一旦时机来临，财政大臣自然会大有所获。

但是除了预算方面的利弊得失的考虑之外，还有一种阻碍国家资本发展的因素，那就是我们当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思想混乱。利率的下降，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而这两个原因是相互对立的。当储蓄供给过多，即可供投资利用的资金过剩时，它会下降；或者当投资需求不足，即花费储蓄的动机欠缺时，它也会下降。如果它的下降是由第一个原因造成的，毫无疑问是非常有利于国家的；但如果它的下降是由于我们故意

限制投资出路而造成的，那无疑是使我们陷于贫困的自我毁灭的举动。

个人不把其收入全部用于当前的消费只是一种节俭行为，单单依靠这样的消极行为，国家是决不会走向富裕的。国家的富裕必须有赖于另一方面的积极行为，要利用这些储蓄来提高国家资本设备的装备水平。

富裕的人不是守财奴，而是那些能够把钱用于有效投资的人。

我们劝告人们厉行节俭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修建房屋、改造公路等等。因此，那种凭借停止资本改良的强制手段来压低利率，从而堵塞了储蓄的出路，使储蓄失去意义的政策，简直是自杀行径。像这样的政策，即使在表面上吹得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人支持。然而，在过去的若干年内，财政部所一贯遵行的，事实上就是这个政策。有时来自公众舆论或政府其他部门或地方当局的压力使他们感到难以抵挡，但是当他们的力量能够扼杀反对意见时，他们就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

这种政策，既缺乏健全的理论依据，在实践中又是无效的，关于这一点，事实最终得到了证明，证据就在于它甚至没有做到使利率下降。因为，我们已经指出，如果投资在国内的出路被堵塞，储蓄将出现外流，而且外流的规模与我们的贸易顺差极不相称，结果造成英格兰银行出现黄金外流的趋势。为了消除这一趋势，银行利率就不得不提高。

在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引导下，我们的处境糟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于没能彻底地更新资本设备，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已处于落后地位。企业利润少得可怜，结果是政府所得税收入连年下降，这使财政大臣非常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

能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也无法实施社会改革计划。失业情况越来越严重。繁荣的缺乏实际上降低了储蓄利率，因此我们最初想降低利率的目的也无法达到。毕竟，当前的利率有些过高。我们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但得到的补偿却仅仅是保守党下台，这无疑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十一、生命活力的勃发

我们面临的困难处境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保守党政府的理论观点体现的必然结果。他们说：

"你不可过早推行电话通讯或电力事业，因为这会导致利率上升。"

"你不可急于进行公路和住宅建设，因为这将耗尽我们将来也许需要的就业机会。"

"你不可使每个人都获得就业，因为这将引发通货膨胀。"

"你不可投资，因为你怎么能肯定这样做就必然有利可图呢？"

"你不可做任何事情，因为除了以上这些事情以外再没有值得可做的了。"

"安全第一啊！支援100万失业人员的政策已经实行了8年，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冒险改变政策呢？"

"除我们能够做到的以外，我们决不轻易许诺。因此我们什么也不许诺。"

这就是他们一直向我们灌输的奇谈怪论。

这是象征着萧条和腐朽的教条，所体现的正是一个日薄西山的行政组织的怯懦、愚笨和阻碍时代进步的绊脚石。

消极、限制、懈怠——这些就是政府信守的至理名言。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被迫勒紧裤带，过着省吃俭用的苦日子。恐慌、猜忌充斥着我们的头脑，我们就像一个忧郁症患者一样，对待任何事物都畏首畏尾，最后只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问世事。然而我们并不是行将就木之人，我们正处于心智健全、精力充沛的成长阶段，我们需要的是生命活力的激发，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相反，未来为我们准备的是大量的物质财富、和谐的经济自由和幸福的个人生活，这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享有的要多得多。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自己缩手缩脚，我们应当更加果敢、更加开放地采取行动，努力创造我们的美好未来。横亘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只是少数道貌岸然、顽固不化的老头子，对待他们无须过于激愤，只消一丝善意的蔑视，就足以使他们像九柱球一般整排倒下。

很有可能的是，当他们从激动的情绪中冷静下来时，他们自己也会感到愉快的。

第五篇 1930年的大萧条

（1930年）

一

今年我们正处于现代历史中一次最严重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中，而世人对此却感觉迟钝。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清楚地明白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不理解其原因所在，于是同以前风波乍起时的情形一样，内心充满了事实证明是过分了的恐惧心理，同时，还存在一种缺乏理性控制的焦躁情绪。他开始对前途产生怀疑。他怀疑，过去的一切是不是只是一个欢乐的梦境，而现在却要从梦中醒来去面对现实的黑暗！否则，目前的灾难是不是只是一场可怕的梦魇，而梦魇不久就会消逝？

他不必心存疑惧。过去的一切确实不是梦境，而当前所发生的一切却只是一个梦魇，它在天明之际，会自然消逝而去。因为现在自然资源和人类创造发明的才能，同过去一样丰富、一样具有生产力。我们解决生活物质需要问题的前进步伐，并没有减慢。同以往一样，我们有能力为每一个人提供高标准的生活水平——所谓高标准，我的意思是指同20年前相比而言——不久还会懂得如何使这一水平更进一步提高。我们在过去并没有上当受骗。但是今天，我们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沼泽之中，在一部微妙、精细的机器控制之下，我们步履蹒跚、惊慌失措，而我们却并不了解这部机器的运转原理。结果是我们创造财富的潜力，在一段时期内——也许是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处于废弃闲置的状态之中。

我有些迟疑，不知在这个问题上，能否依我所希望的那样，把我心里的感受同读者内心的想法有效地贯通起来，彼此呼应。我所要讲的，对于外行来说，也许过多而难以理解；对于专家来说，也许过少而显得肤浅。因为——尽管没有人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技术性的、具有很大困难的学问，甚至也可以称为是一门科学。不管怎样，我将竭尽所能，不惜把有些部分删略掉，因为问题过于复杂，为了让读者对当前事态有全面的了解，就必须如此。

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一次的萧条是极其严重的。在世界上三个主要工业国家——美国、英国和德国中，失业工人已达1000万。无论在哪个地区，各主要工业中几乎没有一个能赚取足够的利润使其进一步扩展，而工业扩展正是进步的标志。与此同时，从事于初级产品生产的那些国家，其矿业和农业中，几乎每一种主要产品的价格都在急剧下降，致使许多甚至

绝大多数生产者不能弥补其生产成本。1921年时，也曾出现过价格的暴跌情况，但那是从过高的价格水平上下跌的，在原来的价格水平上，生产者获取的是不正常的暴利；而这一次价格下跌是从去年的正常水平上开始的，跌幅之巨大，落速之迅疾，在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次经济灾难的深远程度，由此可见。

在生产停顿、失业现象达到最高峰之前要经过一段酝酿时间，由于种种原因，这段时间在初级产品行业中比制造业中要长得多。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规模较小、组织也欠条理的生产单位说来，不容易进行有计划的紧缩；生产周期，尤其是农业，也比较长，生产的暂时停顿，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损失；许多生产者一般都是自己的主人，因此收入减少时，他们也愿意继续工作；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失业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比较严重；对于初级产品几乎是人民的全部生活来源的那些国家，这类产品的生产停顿将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财政问题。虽然如此，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初级产品不久也将面临工业产品所面临的严重限制，由此对制造商们将进一步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到那个时候，初级产品生产者没有任何购买力去买进工业制成品，于是，我们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痛苦地挣扎下去。

处于这样的困境，各个生产者会把虚幻的希望寄托在他们各自的行动方针上，认为只要独自采取这种方针，就会有利于某一生产者或整个生产者阶级；但如果每个人都采取这种方针，则没有一个人能从中获益。例如，对某一初级产品的产量进行限制时，只要使用这种产品的工业，其产量没有限制，则这种初级产品的价格肯定会上涨；但是如果各种产品的产量全面受到限制，那么对初级产品的需求量也将下降，下降到

正好是受到限制的初级产品供给量，这时，没有一个人的处境会更好。再如，如果某一生产者或某一国家削减工资，这时只要其他人不效仿，那么这个生产者或这个国家可以在贸易往来中多获取一些利益。但是如果工资的削减是全面的，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就会与生产成本作同样程度的降低，结果依然是，没有一个人的处境会更好。

由此可见，无论是限制产量，还是削减工资，就其本身作用而言，都不可能达到恢复平衡的目的。

不仅如此，即使我们最终能够按照适合于（比如说）战前价格水平的较低的货币工资水平重新确定产量，我们仍然摆脱不了困境。因为从 1914 年以来，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我们都背上了巨额抵押债务负担，而这些债务都是以货币确定的。所以，每一次的价格下跌都会加重这类债务的负担，因为价格下跌会导致确定债务的货币的价值有所提高。例如，如果我们把价格定位于战前的水平，英国的国家债务总额将比 1924 年增加约 40%，比 1910 年增加 1 倍；原来大家普遍认为德国无法承受道威斯计划所规定的负担，现在看来，杨格计划比道威斯计划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战期间各协约国拖欠美国的债务，以商品和劳务计算时，相比于最初协定的债款总额，将增加 40%～50%；有些债务国家，如南美洲和澳大利亚，除非它们为了债权国家的利益而自愿降低生活水平，否则将无力履行义务；世界各地的农业生产者和房产所有者，凡是以抵押方式借入资金的，这时都将成为债权人的牺牲者。在这样的情势下，破产、违约、赖债等现象，将层出不穷，从而将动摇资本主义体系存在之根基，而一些必要的调整措施，这时是否能够及时防止上述一系列现象的发生，则值得怀疑。于是，在极端混

乱的局势下，这些地区就成了引发暴动、政变和革命的温床。就整个世界来看，有许多地区已经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然而，自然资源和人类发明创造的才能始终同以往一样丰富，一样具有生产力。这次混乱的结果，只不过使资本主义运转机器发生了一时的故障。但我们不必因此而灰心丧气，以为汽车文明已经完结，不久又要回到左摇右摆的马车时代。

二

目前的局势一团糟，我们正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那么，如何才能再起炉灶、重整旗鼓呢?让我们先来追溯一下事件的发展过程。

1. 为什么工人和工厂会处于闲置状态？这是因为工业家预料，再继续生产下去将无利可图，产品售价根本弥补不了成本。

2. 为什么工业家会预料到出售产品将不免蒙受损失呢？这是因为，产品价格的下跌比成本的下跌要迅速得多，实际上，成本的下跌非常微小。

3. 产品价格的下跌，是怎样超过成本的下跌的呢？由于成本是企业家生产商品时所支出的费用，当商品出售时能收回资金的多少，决定于价格。对于各个企业和各个商品而言，很容易理解价格与成本之间的不相称。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企业家所支出的同所收回的，在数量上必然相等，因为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的支出构成了公众的收入，然后由公众在交换产品的过程中把这笔钱付还给企业家。这就是我们对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正常循环的理解。

4. 不！很不幸，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困难的症结、祸害的根源，就在这里。企业家支出生产成本，并不一定非要在产品出售时，如数收回其销售所得。在经济繁荣时期，销售所得往往超过生产成本；而在经济萧条时期，生产成本往往超过销售所得。此外，那种认为借助于降低总成本——无论是限制产量，还是削减回报率——就可以必然恢复平衡的想法，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因为工资收入者同时也是企业家的买主，企业家削减支出必然会削弱这些人的购买力，从而其销售所得也会减少，减少的数量与工资压缩的数量大致相等。

5. 那么，世界上整个企业的生产总成本，怎么会与销售总所得不相等呢？两者之间的不相等，究竟取决于哪些因素呢？我自认为是懂得其中的来龙去脉的。但要我在这里对此作出圆满、彻底的解释，我感到过于复杂，有些无从下手（在别的地方，我曾对此进行过详细地说明①）。因此在这里我只好略而不谈。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市场上出售的消费品状况。这类商品生产者的利润（或亏损）取决于哪些因素呢？生产总成本，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社会总收入，是在消费品成本和资本品成本之间按一定比率分配的。公众的收入与社会总收入其实也是一码事，只不过它是在消费品的购买支出和储蓄之间按一定比率分配的。若前一个比率大于后一个比率，消费品生产者将出现亏损，因为他们的销售所得是与公众在消费品上的支出相等的，在这种情况下，销售所得将低于（稍加分析即可明白）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另一方面，若后一个比率大于前一

① 在我撰写的《货币论》中。

个比率，则消费品生产者将获得额外的盈余。由此说明，只有在公众用于此类商品的支出占其收入的较大部分的情况下(就是说储蓄要少些)，或者，在总产出中资本品所占比例较大的情况下(等于说总产出中消费品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消费品生产者才能获取利润。

但是除非资本品生产者有利可图，否则他们不会在较大的规模上生产这类商品。于是我们面临着第二个问题，即资本品生产者的利润取决于哪些因素？主要因素应该是公众的偏好，公众也许愿意以货币或货币等同物的形式来持有处于流动形态的储蓄，也许愿意用储蓄来购买资本品或资本品等同物。如果公众不愿购买后者，则资本品生产者会亏损，随之而来的就是资本品产量的减少；出于上述的同样原因，消费品生产者也将会亏损。换句话说，所有各类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都将亏损，于是普遍的失业将接踵而来。此时一种恶性循环将在所难免，随着一系列作用和反作用的结果，事态将越发趋于恶化，直到发生某些偶然事件时，才可能有所改观。

这是对于一种复杂现象的一个过度简化的描述。但我相信它包含了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本质内容。尽管可以添加许多变奏曲，但曲调却始终如一。

如果我的见解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困难的根本原因即在于缺乏重整事业的进取心，而进取心之所以不足，是由于资本投资的市场状况不如人意。由于商业是国际性的，整个世界新资本品产量的不足，势必影响每一地区的商品价格，因此所有国家生产者的利润，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

为什么整个世界的新资本品产量会出现不足呢？依我之见，这是由于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由于借出者的

态度,因为新资本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借入资金来生产的。其次,资本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借出者的态度,同时还取决于借入者的态度。

由于若干原因,借出者对于贷款所要求的条件,始终超出了新企业所能接受的程度。首先,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战争带来的巨大损耗需要弥补,使得企业有足够的能力承受较高的利率,这一事实促使借出者形成了一种预期,即习惯于索要高于战前的利率。其次,为了履行条约义务,出现了具有政治色彩的借入者;为了支持新近恢复的金本位,出现了银行借入者;为了从证券交易所的火爆市场中捞取好处,出现了投机性借入者;最近还出现了一种苦恼的借入者,他们由于价格下跌而损失惨重,因此不得不借款以渡过难关;所有这些借入者几乎都处境窘迫。因此只要能借到钱,他们不惜接受任何条件,这种状况使得借出者,能够向这些不同类型的借入者索要较高的利率,高于新企业真正能够负担的限度。最后,由于世界的不安定状态以及各国的投资习性,某些国家的众多借出者根本不打算在任何合理条件下发放贷款,从而限制了这些国家在贷款方面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借出者对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失去了信任,以致为了抵御风险,在贷款时提出苛刻的条件,简直足以扼杀所有新企业的创建可能性。最近两年来,世界上三个主要债权国中的两个,即法国和美国,已经从国际市场上大部分收回了用于长期贷款的资源。

一方面,借出者抱着不愿出借贷款的态度,另一方面,借入者也同样抱着不愿接受贷款的态度。因为价格的下跌对借入资金的那些人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凡是拖延新建企业计

划的人，反而由于拖沓而占了便宜。不仅如此，令借出者担惊受怕的那些风险，同样吓坏了借入者。最后，美国在最近五年内，新资本企业出现了大规模的发展，这一点或多或少地吸尽了目前进一步创建企业的有利机会——不管怎样，只要企业萧条状况继续存在，情形总是如此。到 1929 年中期，除美国外，整个世界范围内正在创建的新企业在规模上已经处于颓势，已经与当时的情况不相称。此后在美国国内，新投资也陷于崩溃状态，企业界由此受到的打击程度也达到了顶点，美国现在的新投资，比 1928 年大概减少了 20%～30%。因此，在某些国家中，新的有利投资机会比以往有了更大的限制，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于是借出者的想法和借入者的想法之间，关于真正新资本投资的目的，存在着很大的隔阂。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借出者的储蓄并不是用于资助新资本企业的发展，而是无形之中被企业亏损和陷于困境的借入者损耗殆尽。

当前由于人们心理上的一些因素，萧条状态的发展有些过分。因此，适度的复苏现象，有可能随时发生。但是，依我之见，除非借出者的想法与借入者的想法能够再度达成一致，否则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复苏势头。而要使两者在想法上趋于一致，一方面在于借出者愿意放宽贷款条件，能在更广泛的地区范围内进行贷款；另一方面在于借入者逐渐恢复其原有的创业进取精神，从而较为主动地承担贷款。

借出者与借入者双方意见悬殊，相互之间的隔阂如此深远，如此难以消除，实为近代史之少见。我已说过，这一点正是我们当前的病根所在。除非我们确信这一诊断是正确的，由此振作精神，集中我们的意志和智慧，沿着这一方向努力寻求解

决方法；否则，若这一诊断果真是正确的，而我们又无所适从，则不景气的局面会进一步恶化而彻底成为严重的大萧条：价格水平的下跌趋势也许要持续好几年，对物质财富和社会稳定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幸免其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寻求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我在本篇开始时所表现出来的乐观论调，才能获得证实——至少是在不远的将来。

至于将来政策方针的阐明，已经超出了本篇的涉及范围。但可以预计，除了主要债权国家的中央银行当局以外，其他国家是无法首先采取措施的；同时，任何一个中央银行要想单独行动，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大多数人为病症所迷惑而产生误解，他们的行为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法兰西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坚决行为所能产生的效果，则比一般想像的要大得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最行之有效的补救办法，就在于这三个主要债权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共同行动。它们应当联合制定出一个大胆的计划，以恢复国际长期贷款市场中借贷双方的信心，从而有助于各地的企业重新焕发活力，有助于价格和利润的恢复。在这样的良好局面下，世界商业不久就可以重新走上正轨。即使法国仍然固守着保持必要黄金存量的旧有观念，不愿参与制造新财富的冒险活动，我相信，英国和美国的同心协力，也一定可以在适当的时限内，排除机器的故障，使之重新正常运转起来。但前提必须是，它们对于机器故障的原因所在有自信的认识，能够循着这一方向发挥力量。因为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两岸的当局，今天之所以踌躇不前，不敢有所作为，主要就是由于对困难之根源缺乏确切的认识。

第六篇 关于节俭

(1931年)

一、节俭与花费

(1931年1月)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场灾难之中，商业的萧条、失业的增加、企业的损失，其严重程度是世界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难。整个世界数百万的家庭，现在都处于极端贫困和恐慌——有时这一点更为严重——的状态之中。据我估计，世界上三个主要工业国家——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失业工人总数大约有1200万。但是我不敢断定，在世界上主要的农业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美洲各国中，人类面临的悲惨境遇，是不是更加严重。那里的数以百万计的小农户，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暴跌，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陷入破产境地，他们的农产品收入，远远低

于所耗费的生产成本。因为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宗产品，如小麦、羊毛、蔗糖、棉花以及其余绝大多数商品，其价格下跌所带来的后果简直是灾难性的。绝大多数产品的价格现在已低于战前水平；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它们的成本却依然远远高于战前水平。据说，一两个星期以前，利物浦的小麦售价，达到了自250年前查理二世统治时代以来的最低价格纪录。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怎么能生活下去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你也许认为——事实上某些头脑简单、冷酷无情的人的确有这种想法——物价的低廉肯定是一个有利条件。因为生产者的所失，也就是消费者的所得。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这些从事工作的人——居于人类中的大多数——只有当有所生产时，才能有所消费。因此，任何阻碍生产过程的不良因素同时也必然会阻碍消费过程。

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对每一个产品成本和价格产生障碍作用的所有各种因素，对两者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例如，绝大多数制造商的工资成本，实际上与以往没多大差别。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恶性的发展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开始，羊毛和小麦的价格下跌。也许有人觉得，对于购买小麦和毛绒衫的英国消费者来说，这肯定是有利的。但随后，羊毛和小麦的生产者就会发现，他们的产品收入太少了，从而无法再像往常一样地购买英国产品。最终，英国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只好面对失业的现实。东西是便宜了，但收入也在减少，便宜又有什么用呢？

当约翰逊博士游览司开岛时，听到那里1个便士可以买20个鸡蛋，于是他感慨道："先生，在我看来，并不是这里的鸡蛋特别多，而是在您这个可怜的岛上，便士实在太少了！"

如果物价的低廉是由于生产在效率和技术上的提高，那的确是一件使各方均受益的事情；但如果物价的低廉是以生产者破产为代价换来的，那也许会发生一次最严重的经济灾害。

那种认为我们对目前情况没有加以重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然而，我们是否有足够的重视，却值得怀疑。在数百万工人被迫失业的情况下，大量的潜在财富损失于无形之中，创造着令人心痛的奇迹。现在处于闲置状态的工人和工厂，原来每天可以生产出价值数百万英镑的产品，那时，工人的心情要愉快得多，处境要好得多。我们应当临危不乱、安定心神，拿出我们在战争期间所具有的那种坚定的气概和不惜一切代价采取行动的精神，去寻求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以改善目前的严重事态。然而一种怠惰的气氛似乎在到处弥漫着，压得我们毫无生气。在我看来，当前局势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特征，即几乎所有提出的补救办法，总要受到一些微词；当然，这些建议有的高明些，有的低劣些。所有这些政策建议在内容上尽管不同，甚至完全对立，但总是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然而我们却紧闭大门，一概不予采纳。

最糟糕的是，我们为自己的袖手旁观、无所事事准备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借口，即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如何采取行动来进行补救不在我们的权力范围之内；这个问题是国际性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依靠对外贸易的国家来说，即使做得很多，取得的成就也只能是极其有限的。但这并不是我们毫无生气、无所作为的唯一理由，而且也不是充分的理由。有些事情，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是能够办到的。依我之见，另一个主要理由在于，关于何种措施有效、何种措施无效，普遍存在着严重误解。

现在有许多人抱有良好的愿望，他们相信，为了改善目前的事态，他们本国以及邻邦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比往常更勤俭一些。他们相信，如果花费的数额占其收入的比例能比往常下降一些，肯定会有助于就业。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是镇议会或州议会的议员，在这个时候应当采取的正确措施是，坚决反对在娱乐设施和公共工程方面的新支出。

诚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很不幸，这种做法则是完全错误的。与事实恰恰相反，这样的举措在指导思想上就是错误的，其结果将是绝对有害的。节俭的目的在于暂停房屋、工厂、公路、机器之类资本品的生产，于是从事于这类资本品生产的工人便无事可做，被闲置起来。但如果可用于这类生产目的的资金，已经有了很大的剩余且没有加以使用，这时进行节俭的结果只是扩大了剩余，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失业人数。不仅如此，当某个人在这种方式或其他方式下失去工作时，他的支出能力自然会有所减弱，从而进一步造成原来为他提供商品的工人的失业，因为他现在已无力支付了。于是情况越来越恶化，造成恶性循环。

据我所能推测的是，无论什么时候你节省了 5 先令，你就要使一个人失去一天的工作。节省 5 先令，可以扩大失业到一人一天的程度，此外可以类推。另一方面，无论什么时候你购买了商品，你就促进了就业——虽然，如果你想要促进英国的就业，就必须购买英国本土制造的商品。说到底，这不过是最简单易懂的常识而已。因为只要你购买商品，肯定会有人为你制造这些商品的。如果你不购买商品，商店里的存货就不能出清，他们就不会再订货，这样肯定会有人要失业了。

因此，爱国的家庭主妇们，明天一早上街就会突然看到，

到处都是广告,到处都是大量的甩卖商品。这对你是太有利了,因为东西从来没有如此便宜过,便宜得出乎意料,简直做梦也想不到。到处是堆积如山的衣料、被单和毯子,总之你需要什么就有什么。此外,还有一点让你们高兴的是,你们在购买这些廉价商品的同时,就是在促进就业,在增加国家的财富,为种种有益的活动得以重新开始,为郎克郡、约克郡和贝尔法斯特提供了机会,带来了希望。

这些只不过是一些例子。凡是为了满足你个人和你家庭的切实需要所必须做的,不论什么,都应当尽力去做,力求改善,促进发展。

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勒紧裤带过日子,而是一种发展扩张、积极活跃的精神状态,要多干一些实事,多买一些东西,多制造一些商品。当然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常识。我们可以看一看极端的情形,假设我们大家把收入全部储蓄起来,完全停止花费。毫无疑问,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失去工作,而且不久我们也不会再有收入以供花费。那时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得以增加1便士的财富,最终我们全都得饿死。这种惨烈的后果无疑是我们应得的报应,谁叫我们彼此拒绝购买、拒绝互助呢——事实上我们大家正是依靠这些才得以生存的啊!对于地方当局的工作,情形也同样如此,甚至更糟些。因此,现在是时候了,各地方当局应当努力工作、积极行动,争取各方面的切实改进。

对于病人来说,他需要的并不是休息,而是运动。凡事只是退缩不前,只是拒绝签约订货,只是消极被动,这种态度和做法是无法使人重新开始工作的。正相反,要使经济进步和财富生产的车轮重新运转起来,唯一可能的手段就是采取各种

形式的积极行动。

就全国范围来说，我同样希望能看到一些宏大的计划付诸实施。几天前我曾在报上看到一则建议，说要开辟一条新路、一条宽阔的公路，在泰晤士河南岸，与河岸相平行，作为连接威斯敏斯特与城市中心的一条通道。这类想法是非常正确的。但我还想看到比这一工程更宏大的计划项目。例如，我们不妨把从威斯敏斯特到格林尼治的整个伦敦南部，彻底改造一番，在他们工作地点附近的便利地区，新建房屋以容纳比现在更多的居民，建筑应尽量考究些，应具备现代生活所要求的一切便利设施；同时还可以为广场、街道、公园和公共场所留下足够的余地。待将来完工之时，不但给我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将为人民生活创造便利条件，也将为我们这一代留下有价值的永久纪念。如此巨大的工程需不需要人手呢？那当然不用说了，肯定需要！现在人们靠救济津贴来度日，无事可做，生活郁闷，是不是让他们继续处于这样的境地就好些呢？当然不是。

这些就是我现在想让你们特别关注的几点：首先要重视当前局势的极端严重性，劳动人民已经约有 1/4 处于闲置状态；其次，这次经济灾害是世界性的，我们无法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摆脱困境；第三，然而我们自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必须具有积极活跃的精神面貌，动手做一些实事，大力提倡消费，使大企业可以重整旗鼓。

最后我还有一个观点要向你们提出。也许有些人会对这个建议感到有些震惊。他们之所以这样，我想是出于一种畏惧心理，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的浪费举动，而我们实在太贫穷了，根本承担不起。他们认为我们目前很穷，比以往要穷得多，因

此首要的任务就是量入为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削减消费，自动降低生活水平，多做勤干，节俭度日，只有这样，才可能摆脱困境。但依我之见，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我们其实并不穷，缺少的只是使用财富的勇气。因此我想为你们提供一些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实，让你们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可以有一个较为详实的了解。

首先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我们可雇用的劳动者约有 1/4 处于闲置状态，但他们依靠失业津贴维持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多数有工人的国家的人所能达到的生活水平，还要高些。即使处于这样的困境，国家财富仍然逐年有所增长。我们支付的工资，远远高于（比方说）法国和德国；同时对 1/4 的失业人员给予津贴支援；对于国内的一些建设，如房屋、道路、电厂等等，仍然在相当大的规模上增加投入；尽管如此，我们仍有一部分剩余资金向国外出借，1929 年时，我们向国外出借的贷款额，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可用于此种用途上的剩余资金都要大，即使美国也不例外。

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悲观主义者认为我们的工作效率非常低下，支出上又毫无节制，于是越来越穷。如果他们的看法果真正确的话，毫无疑问，上述的所有现象，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既然已经做到了这些，那只能说明悲观主义者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能把事态的发展控制得更妥当些，能避免出现现在的困难局面，那么我们肯定会比现在更加富裕。我们并不是毫无效率的，也并不穷，并没有坐吃老本，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我们的工人和工厂现在具有的生产力，比过去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们的国民收入增长也十分迅

速。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了上述的那些结果。

下面我向你们提供一些有关数据。我们的人均产出量，即使同 1924 年这样一个如此接近的时期相比，也提高了约 10%。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减少 10%就业的情况下，生产出与 1924 年同样多的财富。与战前相比，人均产出量增长了约 20%。在扣除货币价值的影响因素之后，国民收入——即使是在最近的 1929 年，当时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当然，现在的情形更加糟糕一些）——每年的增长额约有 1 亿英镑之多，而且这种增长幅度年复一年地曾持续了好多年。与此同时，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一直在大力实施收入分配政策，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几乎相当于一场革命。

因此，对前途要充满信心，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就好比是一个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病痛，但不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所患的不可救药的风湿病。我们没能充分利用现实的机遇，没能为我们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提供适当的出路。因此我们不必畏惧退缩，消极无为；而应该振作精神，再展鸿图。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铲除病根的唯一良剂就是积极活跃、大胆自信和奋力进取。

二、经济委员会的报告

（1931 年 8 月 15 日）

经济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从若干不同角度加以考虑。这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文件，因为它对我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决定采取的这种或那种政策方针，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它要求我们做出决定。是否意在借助国际价格的下跌而向英国的薪金和工资施加压力，从而达到通货紧缩的效果，如果我们的意

图的确是在引发通货紧缩，那么报告中主张不要降低教员和警察的薪金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如果认为通货紧缩的进程会在教员和警察那里停下来，不再继续，那简直是荒谬的想法。委员会的报告未免有些过分了，或者说，还不够彻底。但这一点并不是我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我要说的，只是在我看来似乎被报告所忽略的某些方面。

经济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了他们的计划，但关于计划付诸实施以后、对失业量和税收收入将产生的可能影响，报告里一无说明，他们似乎对此根本未予以考虑。他们建议削减英国国民的购买力，所使用的办法部分是在于减少民众的收入，部分是在于使现在的就业人员失去工作。他们认为，购买力的减退会由于其他方面的增长而相抵，但其中的理由他们并没有给予说明。他们的想法是，政府应当利用他们所建议的节俭方案，采取的方式不在于减少税收，而在于减少借款。也许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存在着这样一种粗略的、不成形的想法，即认为存在着一笔数额固定的贷款基金，而且始终是处于借出状态的，因此如果政府的借款减少，私营企业的借款则必然增加。但他们如果把这个想法用确切的、具体的言语表达出来，仔细考虑之后，就会发觉，这是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的幻想。

他们的建议甚至对我们的贸易余额，也不可能产生有利影响，尽管工业工资的下降是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因为根据建议，生产成本是不会降低的，实际上正相反，由于他们主张增加雇主的无偿捐助的工人生活保证金，成本反而会提高。

因此，我们可以试着填补一下报告中遗漏的部分内容；同时看一看，购买力在所建议的方式下降低以后，可能发生什么

后果。

购买力降低的某一部分，预计将导致减少购买外国商品，例如失业津贴削减以后，失业者不得不勒紧腰带，少消费一些进口食品。这种后果在某种程度上对局势是有所帮助的。某一部分将由于储蓄减少而节省下来，例如教员的薪金削减以后，往往都会减少储蓄，或者为了维持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水平，甚至动用已有的储蓄。但是另一方面，英国的生产者从消费者(警察、教员、失业津贴领取者等等)支出所获取的收入将减少，估计净减额达7000万英镑之多。他们无法弥补这样的损失，除非减少他们自己的支出，或者解雇一部分工人，或者两者同时并举，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效仿政府的行为，于是就会引起一连串的性质相同的后果，产生连锁效应。

收入和利润的降低，其净结果必然是造成领取津贴的失业人数的大量增加，以及政府税收的减少。政府削减赤字的直接后果，实际上与它原来设想的通过此举以促进私营企业增加更多的贷款份额的后果恰恰是相反的。两方面的后果，在数量上是无法做出精确估量的，但大体上是相等的。委员会提出的例如有关道路、房屋和造林等等的若干建议，的确表明，他们对于公共工程用于解决失业问题的一般原则的整个理论基础显然存有误解；然而，他们要求实施的政策，恰恰是根据这一原则应该采取的政策的反面。不仅如此，他们还无意对问题作深入的探讨，认为这是自找麻烦。我猜想他们大概是那类非常单纯、非常幼稚的人，因为对他们而言，不花费钱财的好处是再明显不过了。他们或许单纯、幼稚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对我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压根儿一无所知。但是他们的意见，与有相当影响势力的一部分舆论，是公然对立的。因为对公共工

程这种解决失业的办法持反对意见的人们，主要理由并不是基于一般原则，而是在于拟定合理计划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但目前已付诸实施的委员会的建议，所采取的措施却是完全相反的，因此这一建议不仅在实际可行性方面应当受到质疑，而且在原则方面也应予以否定。

如果按照经济委员会建议的1亿英镑节俭方案实施政策方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呢？为了便于说明，权且对各方面的后果在数值方面作一大致估测，尽管比较粗略，但大体上是可供参考的。据我推测，节俭方案产生的后果，大体如下：

(1) 失业人数将增加25万～40万；

(2) 贸易逆差将减少大约2000万英镑；

(3) 公众储蓄将减少1000万～1500万英镑；

(4) 企业利润将减少2000万～3000万英镑；

(5) 由于利润的降低，依靠利润生活的企业家和其他一些人的个人消费支出，将减少1000万～1500万英镑；

(6) 委员会建议的采纳，对企业经营的"信心"也许会发生一些心理上的有利影响。考虑到这一点，估计由于企业利润水平的降低，在资本构成、流动资本和私营企业的其他国内投资方面，总计将减少500万～1000万英镑；

(7) 原定的1亿英镑节俭方案，由于税收收入的减少和失业扩大而引致的费用的增加，节俭的数额将部分被抵消，因此政府赤字的净减额，估计不会超过5000万英镑。

当然，这里所引用的具体数据，都只是出于推测的。但(2)+(3)+(4)－(5)－(6)＝(7)，这里(7)是政府赤字净减额，这个关系式是正确无疑的，就同二加二必然等于四一样。

除了对各项中的数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外，关于各项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但也许有人持不同的观点，例如，认为在第(6)项中，总计数字应该是增加的，而不是减少的；但依据我的判断，这种观点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如果这一项的数字果真是增加的，鉴于它对所建议政策的至关重要性，也许这一政策就成为了权宜之策。

目前各国政策都存在着巨大的赤字压力，因此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借入资金，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补救措施。在目前如此严重的萧条局势下，此举可以防止损失，避免进一步扩大到使生产完全停顿的地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政府举债的目的都应当是用于资助投资活动——如果投资活动确实多有实效的话，而不是用于支付失业津贴（或退伍老兵的赏金）。但是无论如何，只要目前严重的萧条状态继续存在，我们就只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即政府举债。因此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或者是减少偿债基金，所产生的效果是同样的），政府举债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对某些事物经常持有一种错误的成见，不过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敢断定，人类性格上存在着的弱点将消除这一成见，营救我们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也许是值得庆幸的一个现象。

但我并不是说，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别的自救办法。例如关税政策、货币贬值以及要求降低所有货币收入的全国性规定等，这类措施确有其可取之处，但都不是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我只是在分析，经济委员会的建议被采纳之后，作为减少预算内无法弥补的赤字的一个手段，将会发生的可能后果。为避免造成误解，在这里我附带说明一下，依我之见，他们提出的某些建议，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征收附加税的方案，要可取得

多，关税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既具备详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居心公正，秉公办事。

只要萧条状态持续存在，我就主张，预算政策应当暂停偿债基金的支付，此外继续为失业基金借款，并征收财政关税。为了摆脱目前的萧条境地，我们必须放开眼界，寻求一些别的权宜之策。一旦萧条结束，私营企业对新资本的需求重新恢复正常、就业趋于好转、税收岁入开始增长时，就可以恢复偿债基金的支付，而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生产效率较低的国营企业方面。

三、节 俭 方 案

（1931 年 9 月 19 日）

我们的预算和节俭方案，整篇充斥着既愚蠢又不公正的想法。有许多的确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心怀善意的人，然而他们的精神和热情，却被这些错误的方案所误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作为应付紧急情况的国家政策，其目的首先应当致力于改善贸易状况，其次应当使税收岁入与预算内正常的经常性支出保持均衡，实现的办法应当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产量，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和政府岁入，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公平原则。而政府实际执行的政策却没有一处符合这几项评判标准。它对贸易差额的影响相对而言比较细微，但会造成失业的大量增加以及政府岁入的减少，同时还违背了公平原则，而且违背的严重程度在我看来简直是难以想像的。

我们先从最后一点说起。富裕人们的收入已经削减了2.5％～3.5％。教员除必须承付的额外税收负担外，其薪金还

削减了 15%①。只是由于他们碰巧是政府的雇员，就把这一阶层挑选出来，给予歧视性待遇，这真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因为政府最近几年来还做了一番努力，为了把高素质的教师吸引到教育行业，还曾对他们许下了某些诺言，而现在却要对他们实行歧视性待遇，这种反差使这一措施显得荒谬至极、无理至极。根据建议，甚至要使用权力解除现存的契约关系。挑选教员作为财政祭品的事实充分证明，内阁成员们已经处于完全的歇斯底里状态，已经完全失去责任感。因为教员薪金的削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仅可以节省 600 万英镑，而与此同时，投入到偿债基金的资金却高达 3 200 万英镑；此外对于作为收入来源的糖、茶以及关税却一点也没有触及。首相对此事没有表示任何辩解之意；而他的某些前任同僚们，由于刚从病痛中恢复过来，于是在一时的惊恐之下，也在考虑着某些性质类似的建议。

教员问题是体现政策不公正最典型、最突出的例证。其实政府雇员的收入水平都受到了打击，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他们之所以拿政府机构的服务人员开刀，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这些人软弱可欺，最容易得手，但这一原则是非常错误的。而且他们的方案里还使用了"同等牺牲"之类的招眼词语，如果没有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至少还可以显得大方得体一些。

此外，政府的计划不仅愚不可及，而且是非常错误的。它对就业的直接影响势必是灾难性的，原来计划准备削减失业津贴 10%，现在看来不可能了，而且据可靠推测，失业将增加

① 后来改为削减 10%。

10%以上。自从私人投资崩溃之后，一直有许多局部性的努力措施，希望减轻由此造成的后果，而这次计划所体现的完全是倒行逆施的做法，它不仅抵消了已有的努力，而且还使事态进一步恶化，这就是所谓的“财政部意见”在最极端形式下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购买力将萎缩，而且修筑道路、建设房屋等等的公共工程方面的支出也将趋于减少。地方当局无奈之下只好效仿中央当局。构成这次计划的理论基础如果被广泛认同并接受的话，则最终除了自食其力的极少数幸运儿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获得就业机会；因为为了节俭，我们每个人都拒绝购买彼此的劳务或产品。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偿债基金而挪用道路建设基金，简直是一种近乎疯狂的举措。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贸易差额问题，就我们所关注的紧急情况来说，这一点毕竟是主要的问题。概括地讲，生产成本基本保持不变。削减教员的薪金，对我们重新夺回世界市场并没有什么帮助。实际上，如果想通过采取削减处于政府直接管理范围内的工资、薪金的办法，来促进出口贸易的利益，那么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无济于事。政府一再向大家宣称，说这次降低工资并不是对工资进行全面攻击的前奏，如果有人非要那样认为的话，只能是一种恶意歪曲。然而实际情况表明，的确存在对工资作全面攻击的迹象，凡是有理智的人都会有所觉察。同时，政府自己也注意到，计划中恰恰有一点会导致生产成本的提高，即雇主提供的工人生活保证金的规定，这实际上相当于给每一个就业人员附加征收一种人丁税。由此可见，政府是主张提高生产成本的，这说明政府当局已经愚笨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政府计划对贸易余额的促进，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的。

无论什么时候，一个人失去了工作，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陷入困境，他就不得不减少消费。这种消费的减少，绝大部分只会造成企业的损失以及本国人的失业，只有一小部分，也许是1/5，会促使进口贸易量下降。虽然，如果贸易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即使进口下降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进口的下降必然会导致出口作相应的下降。但是，单纯地依靠削减进口，将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另一种方式是增加失业量，同时增加失业带来的痛苦，因为这样可以使降低工资的要求更容易被接受。节俭的根本目的在于闲置资源，除此别无其他意义。闲置资源中的一小部分对贸易差额的不利状况有改善作用，但其余部分的闲置资源却是国内的工厂和工人，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存在未加利用的剩余资源。

由此可见，政府妄图说服我们相信的这个计划，大部分是以错误原则为指导的，因此，对于我们急需解决的两个紧密相关的失业问题和贸易逆差问题，并没有多少帮助。

关于后一个问题，如果听其自然，不采取补救措施，在不远的将来，将会破坏金本位。到那时，即使把教员的薪金削减至零也于事无补。现在可供我们选择的补救办法，只有货币贬值，利用直接方式大力限制进口，大幅度削减工资和薪金（依我之见，应不低于30%），或者是国际局势发生决定性的转变。削减工资将引起严重的劳资纠纷，结果会在几个星期以内迫使我们脱离金平价，因此实际上这并不是货币贬值的一个替代办法。这样一来，值得内阁考虑的政策方针，只剩下三个。第一个同时也是最温和的策略，是限制进口。第二个策略是设法脱离金平价，同时要避免事态的进一步下滑趋势。第三个策略——曾在上星期的《新政治家与民族》中被提议过——是召

开一次国际会议，为各金本位国家提供一次最后的协商机会，所以会议的各项议案应当具有极其明确的目标，各与会国应当抱着务实的态度主动地寻求解决途径，在这一点上，它应当完全有别于以往举行的任何国际会议。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举措都是枉费心机、无济于事的。国际局势的改善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否则，我们的国外收入将化为乌有，损失规模之大，即使依靠关税和货币贬值也无法弥补。召开国际会议是改善国际局势的唯一途径，因此即使取得成效的希望不大，也要努力争取。

第七篇　币值崩溃对银行的影响
（1931 年 8 月）

一年前，经济形势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农业、矿业、制造业和运输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表现为失业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性资源的浪费。今天，在世界的许多地区中，最令我们担心的是银行业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困境。1931 年 7 月在德国发生的一次毁灭性的危机，实质上只是一次银行系统危机，但由于同时迸发的政治事件和政治恐慌，毫无疑问地加剧了世人对此次危机的惊恐程度。存在于银行系统内的头重脚轻、稳定性极差的局面最终使之彻底陷于崩溃地步。依我之见，这种局面的形成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它同银行业的稳健原则是完全不相容的。我们眼看着这种局面的形成，

内心充满了疑惑和恐惧。但是引起此次危机的主要起因——即金币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结果使固守金本位的各国中约定以黄金偿还债款的债务人的债务负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却不是单个银行家所能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什么人能预见到金币价值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奥地利发生的安斯托特信用危机揭开了德国危机的序幕。当柏林的达姆施塔特尔银行陷入困境的时候，德国危机日益恶化，已经接近顶点。由于伦敦向柏林出借的贷款数额巨大，而危机造成回流英国的流动资源规模与之相比差额甚大，从而导致英国原有金融地位的动摇。在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的同时，危机达到了最高点。它造成的最终后果必然是存放于纽约的外国贸易余额的疯狂而迅速地出逃，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惊慌失措的局面。所有的紧张、歇斯底里以及恐慌正在导演着一场关于通货管理的闹剧，正在促使整个世界的金融机器完全停止运转；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所有的心理变化可以归因于最近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近两年来货币价值的日益崩溃所造成的银行实际资源的缓慢而持续的损耗。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正在于探讨引发危机的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因素。

且让我们从头说起。我们的资本财富是由世界上众多形态不一的实际资产所构成的，如建筑物、商品存货、在产品、在途商品等等。这些资产的名义所有者，往往以借入货币的方式来获取资产的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财富实际所有者的所有权要求并不是体现在实际资产上，而是体现在货币上。这种“资金融通”行为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银行系统实现的。

银行作为介于存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担保人，一方面吸纳存款人的资金，一方面向借款人发放购买实际资产的贷款资金。于是货币就成为了实际资产与财富所有者之间的中介，这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由于近年来对主要银行系统信心的增强，银行业务的扩大已经到了令人惊诧的程度。例如，以各种银行存款合并计算，在美国约达 500 亿美元；在英国约达 200 亿英镑。除此之外，还大量存在着由个人持有的担保或抵押债务。

以上所述全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还有一点也是我们熟悉的：当币值有了变动时，拥有货币索取权的那些人同负有偿还货币义务的那些人之间的相对地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价格的下降实际上相当于提高了货币索取权的价值，这也就意味着实际财富有一部分从债务人转移到了债权人；因此，实际资产的较大部分体现在存款人的所有权上，而为了购买资产借入货币的资产名义所有者，则相对占有实际资产的较小部分。众所周知，这就是价格变化引起混乱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想引起大家注意的，并不是价格下降的这种广为人知的特征。价格下降还会产生进一步的结果，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往往可以不必深究；但是当币值的变化幅度非常大，超过了某个大约固定的限度时，这种进一步的结果就立即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过去经常见到的，大都是币值的温和变动，这对作为存款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担保人的银行没有什么重大影响。因为对某种特殊资产和一般实际资产价值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银行是事先有所准备的，习惯的做法是要求借入者支付所谓的“垫头”。这就是说，当借入者向借出者提供资产，作为贷

款的"担保品"时，银行向他出借的资金，只能达到"担保品"价值的某一比率。根据以往的经验，"垫头"被固定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百分率，在一切通常的情况下，这是相当安全的。当然，根据情况的不同，实际百分率可以在一个宽泛的限度内高低不一。对于易于出售的资产来说，20%～30%的"垫头"，通常被认为已经相当充分了，如果"垫头"达到 50%，一般认为借出者的态度过于谨慎了。因此资产的货币价值的向下变动幅度，如果只是在通常的温和范围以内，银行对此不会十分关注；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一方是它们欠存户的，一方是贷户欠它们的，至于货币价值到底是多少，与它们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设想一下，当资产的货币价值在短期内的向下变动，超过了借以贷款的那些资产中很大一个部分的约定"垫头"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毫无疑问，银行将处于可怕的境地，任何意外事件都有可能立刻发生。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现在我们所遇到的情况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 1931 年以前的近代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先例。在许多国家中，通货膨胀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所以资产的货币价值发生了大幅度的向上变动。这种变化，尽管在其他方面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对银行的处境没有产生任何危险；因为银行所掌握的"垫头"在货币价值上有了增长。在 1921 年的萧条中，价格也曾大幅度下跌，但那是从一个非同寻常的高价格水平上跌落下来的，而且罕见的高昂物价只持续了几个月或几个星期；因此银行以那样高的价格水平为依据的贷款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此外由于持续时间短，各方面对此也未抱有多大的信心。近两年来，实际资产的货币价值，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几乎全面崩溃的态势，如此严峻的局势，是我们以

前从未经历过的。最近几个月——时间如此紧迫，以致银行家们自己对当前的局势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充分的认识——价格的迅速下跌，在许多情况下，已经逐渐超过了约定的“垫头”。用市场的行话来说，就是“垫头”已经逃之夭夭了。这种情况的具体细节通常不为局外人所注意，除非发生某种特殊事件——也许是某种几乎是出人意料的事件——使局势发展到了危急关头。因为，只要银行还能保持镇定，静候时机的好转，同时对它出借的许多贷款的担保品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安全可靠的这一事实，有实力视而不见，那么从表面上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也不存在引起经济恐慌的任何因素。但是，即使在这一阶段，潜在的情形也有可能对银行的新业务产生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因为银行此时已经觉察，它们所发放的贷款，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处于“冻结”状态，所面临的潜在风险，远大于它们自愿负担的水平；于是它们会变得异常谨慎小心。为了尽可能避免风险，它们会使所有资产的其余部分尽可能地避免风险，尽可能地处于高度的流动状态。银行的这种行为就会在种种无声无息的、不易被察觉的方式下，反映到新企业方面。因为这意味着银行对于会使其资源处于固定状态的任何计划，都不会像平常那样乐于资助。

这里讨论的是货币价值变动问题，要估计这一因素在数量上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各种不同类型的财产在价格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国际贸易所涉及的各种主要原料品和食品。这些商品对银行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们不论是处于库存状态的、处于在途状态的，还是属于半制成品形态的、属于未出售的制成品形态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银行的贷款资助来经营的。在过去的 18 个月里，

这些商品的价格平均下降了25%。但这只是一个平均数，银行不能把某一客户的担保品平均给另一个客户。其中有许多商品，在商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价格已经下跌了40%～50%，甚至更多。

其次是一些大公司的普通股，这是世界各地证券交易所里的主要交易对象。在大多数国家中，证券现价已平均下跌40%～50%。这又是一个平均数，它表明有些股票，在两年前还被看作是绩优股的，现在的下跌程度甚至远远高于平均下跌水平。此外还有债券和固定利息证券，其中属于最优等级的，现价事实上还有轻微的提高，有些即使下跌，充其量也没有超过5%，这种状况在某些方面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许多别的固定利息证券——虽然算不上是最优等级的，也不失为优等的证券——其现价却下跌了10%～15%；至于外国政府债券，众所周知，已经发生了惊人的跌价现象。像这样的价格下跌，虽然趋势相对比较温和，但后果也许同样严重，因为这类债券往往(虽然在英国并不是这样的)是由银行自己直接收购的，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垫头"以保障银行避免损失。

大体上讲，商品和证券价格的下跌趋势对大多数国家的影响是相同的。下面我们再谈一谈另一类资产，即不动产，它在数量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情况在各个国家彼此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英国，我相信还有法国，局势之所以较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不动产价值始终保持相对的稳定，在这方面没有发生价格暴跌的现象；因此抵押业务正常进行，以不动产为担保品的大量贷款也没有受到损害。但在许多其他国家，这类财产却没有摆脱价格暴跌的噩运；也许美国的情况相对特别严重，那里的农田价值大幅度下

跌，城市的现代建筑物也同样如此，许多房产的现价只能达到其原来建筑成本的 60%～70%，有时甚至还达不到这一比率。这一点大大加剧了当地局势的恶化程度，一则因为不动产涉及的金额数目相当巨大，再则因为这类财产过去普遍被认为是无风险的。在美国，在这种严峻局势下，抵押银行、抵押和贷款协会以及其他不动产融资机构所持有的大量抵押品，实际上处于一种“冻结”状态，而这些抵押品的“垫头”由于不动产价值的下跌已经损耗殆尽。

最后，还有一类贷款，是银行贷给它们的客户的，目的在于资助这些客户的经营业务。在许多情况下，这类贷款的处境是最糟的。因为这类贷款的担保品主要是被资助企业的实际利润和预期利润；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事态不能迅速趋于好转，许多原料生产者、农场主和制造商根本无利润可言，而且陷入破产境地的可能性极大。

总之，除不动产外，任何类型的财产，不管它对社会的福利多么有贡献、多么重要，它的现时货币价格，几乎没有一种不暴跌的，且跌幅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我已说过，我们的经济社会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在一个广大范围内，介于实际资产和财富所有者之间的，是一道货币遮幕，而上述情况就发生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中。实际资产的名义所有者通过从财富实际所有者那里借入资金，才能购买这项资产。而且，所有的资金借贷活动，大都是通过银行系统的组织和管理来实现的。这就是说，银行作为实际借入者与实际借出者双方之间的担保人，是通过发挥其中介作用而获取报酬的。它们对实际借出者提供担保；然而只有当属于实际借入者的资产货币价值不低于所借贷款的货币价值时，这种担保才能真正有效。

当货币价值出现了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那样严重的下跌时,就会威胁整个金融结构的稳固,之所以会这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银行和银行家,天生就是盲目的,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些银行家,多年来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认为战前的价格水平是公正的、"自然的",而且也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当价格的下跌趋向于战前水平时,他们甚至还表示欢迎。在美国,有些银行家还雇用了一批所谓"经济学家",这些人甚至到今天还在劝告我们,说我们的困难是由于某些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还没有充分下跌这一事实造成的;但是他们没有顾及到,如果他们的补救措施果真实现的话,那么最明显不过的后果就是,银行机构的清偿债务能力将受到严重的威胁。"稳健"的银行家,悲夫!人们不把那些能够规避风险的人称为稳健的银行家,而把那些注定要破产、但却破产得光明磊落而不招致非议的人称为稳健的银行家。

但是事到如今,他们也终于开始有所警觉了。在许多国家,银行家们渐渐无奈地感到,当他们客户的"垫头"趋于枯竭、损耗殆尽之时,他们自己也处于"危险的边缘"。我相信,今天如果对一切有疑问的资产做一番真正细致的评估,就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的银行,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境地;而且随着通货紧缩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比率还将迅速扩大。幸而我们英国国内的银行,由于种种原因,还处于最稳固之列。

但是通货紧缩①总得有一个限度,否则银行迟早会支持不住的。在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包括美国,银行的地位,事实上是整个局势中最脆弱的一个环节,虽然真相由于部分地被掩盖而使公众有所不知。显然,现在的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势必会给某些方面带来崩溃性的打击。如果听其自然,不采取必要措施,在世界的银行范围内,将会出现真正严重的崩溃局面。

在我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正面临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选择道路:一条是寻求某种办法来提高货币价值,直至恢复到其原有的水平;一条是听任破产和违约现象的继续蔓延,直至整个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陷于崩溃。如果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当一切恢复平静之后,我们将从头做起,也许并不像我们预料的那样极度贫困,或许还比现在更愉快些;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不免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时期,要面对无端的浪费、混乱的局势以及社会不公道等丑恶现象,还要忍受私有财产和财富所有权的重组。虽然从总体上看我们同以前没什么两样,但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个人却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不过在困难的压力与激情的引发下,我们也许能够发现更好的办法来处理我们的事务。

① 收录在《劝说集》中的这一段已经在初版的基础上做了某些修改。最初刊登在《浮华世界》的这一段的原文是:为了有利于克服出现的紧急情况,胡佛总统建议采取措施使银行的一部分良好资产保持更高的流动性。但是,除非价格和货币价值的状况有了普遍的改善,否则,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银行方面的恶化趋势,最终,银行的破产也在所难免。但是通货紧缩……——英文版编者注

目前的迹象表明，世界各地的银行家，决意自寻死路。在事态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他们总是不愿采取充分彻底的补救措施。在他们听之任之的暧昧态度下，事态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而此时再想寻求出路，就变得异常困难了。在英国，我们通过废弃金本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局势的严重程度；但不幸的是，这只是解决了我们自己的问题，而那些仍然坚持金本位的国家却由于我们的举措而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对于银行家来说，保持自己衣冠楚楚的外表并表现出超乎人性之上的高贵品质已成为必修课。这种毕生的生活习性使他们成了最富于空想、最不切实际的人。这一点已成为了他们的行事原则，他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地位会因此受到影响；而等到他们有所觉醒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像许多诚实正直的公民一样，他们对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万恶世界的种种危机——当危机完全表面化的时候——感到本能的愤怒，但他们却无法预见到这些危机。这一切难道是银行家的阴谋吗？不！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其实我倒真希望这一切是银行家密谋策划的。这样的话，可以预计，当他们从这场灾难中解脱出来之时，也是他们遭受打击最大之时。

第三部分

恢复金本位

第一篇　黄　金　热

（1930年9月）

选择黄金作为价值衡量标准主要依据传统习惯。在出现具有代表性的货币以前的时期里，人们会选择一种或一种以上的金属作为最适合的商品，用于实现价值贮藏或支配购买力，这是极其自然的，其间的理由已经被反复说明了许多次。

四五千年以前，已开化的世界就已经使用金、银和铜作为英镑、先令和便士，当时最重要的是银，其次是铜。在米锡涅时代(Mycenaeans)，黄金曾一度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接着在凯尔特人(Celt)和维多利亚人的势力影响下，在欧洲和地中海北岸一带，铁曾在一个短时期内，取代了铜而作为货币。后来在阿肯米涅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帝

国、采用了金与银保持固定比率的复本位(直到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倾覆时为止),于是金、银和铜又恢复了作为货币的地位,白银再度居于主要地位。从此白银长期占有领导权(除了在罗马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黄金势力曾一度恢复以外),在此期间,特别是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曾进行过多次有关金银复本位的努力,但始终没有多大成就,白银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直到大战爆发前50年,黄金才取代了白银,获取了最终的胜利。

弗洛伊德博士说,黄金作为一种象征,之所以能够满足人们强烈的本能嗜好,其中是有深藏于我们潜意识之下的特殊原因的。古代的埃及祭司,曾赋予黄色的金属一种神秘的特性,这种特性至今仍没有完全丧失。黄金作为价值贮藏手段由来已久,然而,至于作为购买力的唯一标准,却是它的新生功能。到1914年时,从法律依据上讲,黄金在英国占有这样的地位为期不到100年(虽然事实上已经存在了200多年),在多数其他国家中还不到60年。因为,除了某些极为短暂的时期以外,黄金的数量实在太少了,以至于还不能满足作为世界主要通货的需要。黄金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一种非常稀少的商品。所有7 000年以来采掘出的黄金,一艘现代邮船可以在一次航程中把它运过大西洋。大约每隔500年或1 000年就会发现一处新的黄金供给源,19世纪后半期就是历次中的一次,每当这个时期,就会暂时感到供应充裕。但是一般而言,供应总是不充分的。

近年来对黄金狂热追求的心情隐藏得很深,在这种心情的外面罩上了一件威严的外衣,尽量地使人望而生畏,这种气氛甚至蔓延到男女关系或宗教领域内。当初黄金对复本位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也许是为了获取胜利的必要而披上了这种外衣，而且到现在仍旧没有脱下；因为黄金崇拜者认为要防止不兑换货币的泛滥，黄金是唯一的预防剂。对黄金的追求是不是出于以上原因，还是由于弗洛伊德式的带有几分神秘的精神状态，对此，我们无须在好奇的心理下刨根问底。但是，我们可以向读者提出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事实，即黄金已经成为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工具，在对待这种事情上，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些偏见。

然而，在我们这一代里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也许最终是一个致命的变化。在战争期间，个人纷纷将自己所有的一点点存金投进了国家的熔炉。战争有时会使黄金消散，如亚历山大驱散波斯宇宙里的存金，比萨罗驱散印加人的存金。但是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却把民间的散落存金集中到了几个中央银行的金库，此后，这些银行就再没有把它放出来。这样一来，黄金差不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退出了流通领域。它不再从这只手到那只手传递着，它已经溜出了贪婪的人的手心。原来的那些小财神分散在各家各户的钱袋里、袜子里和铁箱里，现在它们却被在各国中独一无二的大财神一并吞入肚中；它生活在地下，人们再也看不见它的金面。金子不见了，它又钻到泥土中去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再也看不到那些金盔金甲的财神的踪迹，我们只好予以理性的解释，但不久人们也就对此事漠不关心了。

于是曾经长期存在的商品货币最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代表性货币的时代。过去黄金可以铸成钱币，可以用来贮藏，可以作为有实质内容的财富要求权，个人只要牢牢抓住这些东西，它们的价值就不会从掌心溜走。但是目前的黄金却不

能这样使用了，它变成了一种非常抽象的事物——只是一种价值标准。它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名义上的地位，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当各国的中央银行中的某一个出现了它所管理的代表性货币的膨胀和收缩，以至于与其邻邦的行为在相适应的程度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差异时，就需要不时地将为数极小的一部分存金在各中央银行之间进行传递。到了现在，甚至这种传递行为也已经有些过时了，这种不必要的移动可以省去，而代之以最现代的方式，即"另户保管"(ear-marking)，它可以使所有权转变，而无须移动其所在地。我们不妨从这一点出发再稍进一步，那时不必在形式上否认黄金的一般通则，通过现代炼金术，各地中央银行之间就能够做出一种协定，对于埋藏在它们金库里的黄金数量可以为所欲为，而其所代表的价值也可以任凭它们指定。黄金本来与白银并存，两者如日月经天，交相辉映，但在这个时候，黄金将首先蜕去其神圣的属性，而成为世间的一个独裁者，或者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成为一位立宪君主，而各地中央银行则成为这一王朝的内阁阁员，但是，它也许永远也没有成立一个共和国的必要。然而这只是一种设想，还没有真正实现，也许演变的结果与此完全不同。总之，黄金的拥护者如果想避免革命的出现，他们必须拥有卓越的智慧和极端慎重的态度。

第二篇 货币政策的可选择目标

（1923 年）[1]

除美国以外，大多数国家中货币的不稳定状态一般由两种因素的交织作用所造成——一个是，人们用作为价值标准的黄金来衡量的国家通货没能保持稳定；另一个是，黄金本身用购买力衡量时，没能保持稳定。人们（如康利夫委员会）主要关注的一般是上述两种因素的第一个。人们往往认为，恢复金本位，也就是说，使国家通货按固定比率兑换黄金，无论如何也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所在；认为争论的焦点在于国家通货是应当保持在战前的黄金平价水平呢，还是应当规定得低一

① 这就是说，在英国恢复金本位以前。

些，与当前的实际情况更接近一些？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在通货紧缩与货币贬值两者之中进行选择。

这种说法未免近于草率。如果我们浏览一番近五年来价格变动的过程，我们就会明显地发现：美国始终保持金本位，但是它也遭受了与许多国家一样的损害，在英国，与黄金的不稳定性相比，外汇的不稳定性更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同样的情况甚至也出现在法国，意大利的情况也几近相仿。另一方面，印度曾受到过外汇汇率的猛烈波动的损害，然而它的价值标准的稳定程度却一直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

因此，通过固定汇率的办法并不能使我们摆脱通货方面的困难；甚至可能会削弱我们的控制能力。关于通货稳定的问题牵涉到好几方面，我们必须逐一予以考虑。

1. 货币贬值与通货紧缩。在我们确定价值标准时，是使金价接近于现有价值呢，还是使它恢复到战前的价值水平？

2. 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国家通货的价值稳定是应该依据购买力呢，还是应该依据某些国外的通货呢，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一些？

3. 金本位的恢复。根据我们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金本位，不管它在理论上怎样不完善，是不是为达到我们要求目标的可采用的最好方法呢？

一、货币贬值与通货紧缩

为了增加以金或某些商品为依据的通货的交换价值，可以实行降低国家通货的数量与它所需要的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购买力这两者之间比率的政策，为方便起见，可以称之为

通货紧缩政策。

我们也可以使通货的价值稳定在接近于现在价值的某一点，而不考虑它战前的价值，这样的政策，可以称之为货币贬值政策。

直到1922年4月的热那亚会议上，公众对这两种政策之间的区别是不大清楚的，对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后来才逐渐有了认识。即使在今天（1923年10月），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当局作出明确表示，对于它们的通货价值，要采取哪一种政策：是稳定币值呢，还是提高币值？许多国际会议建议认为，在目前水平下稳定币值的同时，许多国家通货的实际价值却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但是，从其他方面的迹象可以判断出，欧洲各国的国家银行，在通货政策方面，不论是实施得顺利的（如捷克斯洛伐克），或不顺利的（如法国），内心都期望提高它们通货的价值。

反对通货紧缩的简单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点，通货紧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的影响总是有害的，它会造成现有价值标准的变化，同时也会导致财富发生不利于企业、也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再分配。我们已经看到，通货紧缩将使财富由社会的其余部分转移到食利者阶级和一切持有货币权利的人们那里，这同通货膨胀所引起的情况正好相反。特别是，通货紧缩将使财富从一切借入者，即工商业者和农民手里转移到借出者手里，从活跃分子的手里转移到不活跃分子的手里。

在通货紧缩下，主要的持久性结果是使纳税人受到压迫，食利者获得利益，然而在转移期间，还存在另一个更加剧烈的干扰因素。假如实行的政策逐渐地提高国家货币的价值，用商

品加以衡量时，使之比现有价值提高100%（比方说），这就等于告诉每一个商人和每一个生产者，在某一时期，他手头的存货和原料的价格将稳步下跌；同时还告诉每一个用借入资金来开展经营的人，在他的债务关系上，他迟早会损失100%（因为以商品作为衡量标准时，他必须用加倍的数目才能偿还他所借入的资金）。现代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势必会使之陷入停顿状态。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经营者，这时暂且退出经营是有益的；对于任何一个打算支出的人，如果他尽可能地推迟这种行动，对他是有益的。精明、务实的人会把他的资产转变为现金，摆脱风险，停止工作活动，赋闲在家园，静候其现金价值向他预期好了的方向稳步提高。若公众对通货紧缩产生了可能性预测，将会导致相当糟糕的后果；一旦对通货紧缩产生了确定性预测，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现代企业的经营机制，对货币价值的向上趋势，相比于它的向下趋势，更加不相适应。

第二点，在许多国家中，即使通货紧缩是令人满意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通货紧缩在充分程度上，足以使通货价值恢复到战前平价，因为这将使纳税人的负担，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这种实际上的不可能也许会使这个政策成为无害的；如果事实上不是这样，它会妨碍另一种政策的实行，将延长不安定状态和严重的季节波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干扰。目前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仍然是要把它们的通货价值恢复到战前平价，这种做法必然会阻碍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对任何通货改革的合理探讨。有些人——在金融界这种人很多——是别有用心，故意说这种政策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只得

在这个问题上胡说八道。在意大利，正确的经济见解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已经相当成熟，足以用于通货改革，但墨索里尼先生却使用威胁手段，把里拉提升到它以前的价值。对意大利纳税人和意大利的企业而言，幸运的是，里拉并不听从独裁者的指挥，独裁者根本没有办法使它俯首贴耳。但是这样的空谈却能够阻碍实在的改革。尽管人们也许要感到惊诧，这样一个干练的政治家，为什么会主张实行这样一种政策，虽然他是在虚张声势。如果他能够理解这种政策，其内容用另一种、但意义相同的措词来表达时不外是这样："我们的政策是要把工资削减一半，把国家债务负担提高1倍，把西西里输出桔子和柠檬时可以获取的报酬减少50%。"

我们说，要把欧洲的多种通货价值恢复到战前平价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也是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多数欧洲国家却把这种不令人满意的不可能的事物作为它们的公开政策。那么，它们采取这一政策到底有哪些理由和论据呢？以下所列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点：

1. 战争压低了国家通货的含金值，现在若听任它处于这样的低水平，那对食利者阶级和其他固定货币收入者是不公平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毁约行径；而恢复通货价值却是履行债务的公正举动

通货价值的降低的确对战前固定利率证券持有人造成了损害，在这一点上是无须争论的。然而，要做到真正的公平，也许不仅仅是恢复他们货币收入的含金值，而且也要恢复货币收入的购买力，这一价值尺度，事实上却没有人建议过；至于名义上的公平，并没有被破坏，因为当初投资所使用的并不是金块，而是当地的法定货币。不管怎样，对于这类投资者如果

能够分别加以处理，在考虑到公平和满足合理预期的情况下，采取权宜之策，那么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强有力的帮助。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战前固定利率证券的持有量早已淹没于大量发行的战时公债之中，整个社会已经同新的局势大体上相适应。利用通货紧缩的办法来恢复战前持有证券的价值，将意味着同时提高战时与战后发行证券的价值，从而提高了食利者阶级的总债权，使其收入不但超过了他们应得的份额，而且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将扩大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时公平在正确衡量之下将偏向另一方面。现在尚待清偿的货币契约，其中绝大部分在签订的时候，货币价值与现在的价值比较接近，与 1913 年时的价值相差较远。这样的结果是，为了维护少数债权人的公平，却对债务人中的大多数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

由此可见，当通货的贬值已经持续了一个很长时期，已经使整个社会与新价值相适应时，通货紧缩造成的后果，甚至比通货膨胀更糟糕。两者都是“不公平”的，都会使合理的预期落空。但是通货膨胀可以减轻国家债务负担，可以刺激企业发展，在造成偏差的同时多少还有一些益处，而通货紧缩却无一可取。

2. 将国家通货恢复到战前的含金值，可以提高国家的财政信誉，促进民众对未来前途的信心

如果某个国家希望能够把它的通货在很早的时候恢复到战前的平价水平，那么这个论点是不容忽视的。在英国、荷兰、瑞典、瑞士和（也许是）西班牙可以这么讲，但在欧洲其他国家就不能这样讲。有些国家，即使能把它们的法定货币价值略微提高些，也不可能使它恢复到原来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这种

观点就不能适用。这个论点的主旨在于，必须满足使货币精确地恢复到战前平价的条件。以意大利而论，令里拉定位于100里拉兑换1英镑的水平还是60里拉兑换1英镑的水平，它的财政信誉并没有什么区别；相对而言，能使里拉稳定在100∶1的比率上要比在60到100之间波动不定的情形好得多。

因此，这个观点的适用只能限于那些通货的含金值与原来价值的差距（比方说）在5%或10%以内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观点的确切意义取决于我们对下述问题所作出的是什么样的回答。问题是，我们在将来，是否打算像过去一样，把我们自己牢牢束缚在彻底的金本位上。如果我们仍旧认为金本位优于其他任何方法，如果我们对通货前途的"信心"并不是取决于其购买力的稳定，而是取决于其含金值的固定不变，那么长期保持5%或10%范围内的通货紧缩，也许是值得的。这种见解，同100年前李嘉图在类似情况下所表达的观点，正相吻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决定的目标是未来价格水平的稳定而不是金平价的固定不变，那么就没什么值得讨论的了。

3. 如果提高国家通货的含金值，工人阶级就会由于生活费用的缩减而受益；国外商品就会变得较为便宜；以金计价的外债（例如对美国的债务）在清偿时也相对容易些

这个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它在实践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并不亚于上述两个论点。这个论点认为，如果法郎的价值有所提高，那么用法郎支付的等额工资肯定可以多买些东西，用法郎偿付的法国输入品的价格会便宜得多。但是事实决不是这样的！如果法郎的价值提高，它不仅可以多购入商品，也可以多购入劳动力，这就是说，工资将下降；用来偿付输入品的法国

输出品，在以法郎计量时，在价值上将同输入品有完全同等程度的下跌。同样，英国为偿还美元债务必须移交给美国的一定数量商品的价值总量，最后结算时所依据的换算率无论是1英镑合4美元还是战前平价，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这项债务的负担决定于黄金的价值，而不决定于英镑的价值，因为债额是以黄金计量的。货币不过是一种媒介物，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从一个人的手里流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收进了又分散了，当它在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额中的任务完成之后就消失了。然而对一般人而言，想看清楚这一点却并不容易。

二、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

在某些限制条件下，一个国家的通货与世界其他各国通货之间的汇兑比率（为简化起见，假定只有一种国外通货），决定于国内价格水平与国外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说，除非国内的与国外的价格水平都能保持稳定，否则汇率是不会稳定的。因此，如果国外价格水平处于我们的控制范围以外，我们自己的价格水平或汇率将受到国外因素的牵制，我们不得不处于屈从地位。如果国外价格水平不稳定，我们就无法同时保持价格水平和汇率的稳定。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而不能兼顾。

在战前，几乎整个世界都实行金本位，那时我们一致偏重的是汇率的稳定，而不是价格的稳定。那时如果由于完全处于我们控制范围以外的一些原因，例如在国外发现了新金矿，或国外银行政策的转变，而使价格水平发生了变动，对于这样的社会影响，我们是随时准备屈从的。我们的这种屈从态度，一

方面是由于我们不相信有人为因素（尽管是比较有理性的）在内的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价格波动事实上是比较缓和的。尽管如此，也出现过政策上改弦易辙的有力倡议。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欧文·费舍尔教授建议的补偿元计划（compensated dollar）。不过，除非所有的国家采取同样的计划，否则这个建议的实践作用只是在于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而不是外部汇率的稳定。

价格稳定和汇率稳定的选择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呢？应该说，各国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正确的选择必须部分取决于对外贸易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所占地位的重要程度。虽然如此，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比较可取的似乎总是价格的稳定，假使这一点真的能够实现的话。汇率的稳定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这一点又可以促进那些从事对外贸易的人们在业务上的效率和繁荣。另一方面，价格的稳定对于上述各种弊端的避免，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各种契约关系与企业的预期，甚至在像英国这样的一个商贸国家中，以汇率稳定为前提总是非常少的，绝大多数都是以国内价格的稳定为前提的。与此不同的反对意见认为汇率的稳定是较容易达到的目标，因为它所要求的只是在国内与国外采取同样的价值标准；然而要把国内标准调整到使之相对于物价指数保持稳定，却还是一个从未实践过的、艰难的科学创新。

无论如何，对这种把恢复固定汇率作为一个争取目标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假说，还需要进行比平常更深一步的探索。目前多数国家采用同样的本位制的前景非常渺茫，在这种情形下，特别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当采用金本位时，我们可以同几乎整个世界保持汇率的稳定，而其他任何本位制都显得孤

僻、反常，所以稳定和便利的确切优点就会支持保守派偏好黄金的心理。但是，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另一种半偶然性的环境，商人的便利和对固体金属的原始热情这两点，依我看来，并不能充分保证黄金王朝的存在，毕竟在过去许多年里，黄金所提供的不仅是汇率的稳定，而且是整体上的价格水平的稳定。事实上，在稳定汇率和稳定价格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在过去并不是一件进退维谷的事情。只是后来情势有了变化，在南非金矿开发的前夕，我们似乎要面对一个价格水平不断下降的局面，当时的本位制与价格的稳定之间发生了严重矛盾，引起了对复本位问题的激烈争论，而争论实质上也反映了当时的不满情绪。

近来在各个国家的价格水平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或突然的差别，利用战前的调节黄金国际流动的制度是否能够处理目前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疑问的。在战前制度下，一国与外界之间的汇率是固定不变的，国内价格水平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一标准（也就是说，主要由国外的影响支配），这种制度的缺陷是在行动上过于迟缓，感觉上过于迟钝；在战后制度下，价格水平主要取决于国内影响（即国内通货和信贷政策），而对外汇率则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一标准，这种制度的缺陷是发生作用时过于迅猛，感觉过于灵敏，结果由于一时偶然的原因，就会导致剧烈的变动。但是，当发生了广泛而突然的波动时，为了保持平衡的确需要有一种迅速的反应，这种迅速反应的需要正是战前方式不能适应战后条件的一个决定因素，而且它使每一个人对最终公布的汇率感到迷惑不解。

变动不定的汇率意味着，政治方面和情感方面瞬间的影

响，以及季节性贸易间或产生的压力，有可能导致相对价格的混乱。但是同时它也意味着，对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调整汇率是一个最迅速有力的纠正方法，当国家的对外支出超过其所有资源时，它是一个相当有效的防范措施。

因此，当国内与国外价格水平之间已经存在的平衡出现了剧烈波动时，战前的方法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失败，原因很简单，就在于它不能充分迅速地促成国内价格的重新调整。从理论上讲，如果允许黄金连续地、无限制地移动，直到价格的涨落达到了必要的程度为止，那么战前的方法迟早总会奏效的。但是事实上，黄金作为实际通货和硬币的支持者，它的外流，在比率上、在数额上，一般是有限度的。如果货币或信贷供给额的缩减速度超过了社会和企业安排所能容许的价格下降速度，将造成不堪忍受的不利后果。

三、恢复金本位

到此为止，我们的结论是，当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和汇率的稳定这两者不能兼得时，一般说来，前者更值得争取；如果出现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也许幸运的是，争取前者而牺牲后者是阻力最小的一个办法。

恢复金本位（不论按照战前平价还是某种别的比率）肯定不会使我们国内价格水平达到完全稳定的地步；如果所有其他国家也恢复金本位，也只能使我们的对外汇率完全稳定。因此，这个制度是否值得恢复，总体上取决于它能否为我们在这两种理想目标之间提供一个可行的折衷方案。

那些主张实行金本位而反对采用进一步科学化体制的人

们，其理由基于两个论点：一个是，黄金所提供的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价格标准，过去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将来也仍然会是这样的；另一个是，鉴于管理当局过去在实际上一再表现出缺乏智谋，因此管理通货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在这里，保守主义和怀疑主义结合起来了——它们往往是这样做的。也许这里还加入了迷信的成分，因为附着于黄金的在色彩和形态上的魔力，到现在仍没有消失。

在19世纪纷繁芜杂的世界，黄金能够保持其价值的稳定的确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在澳洲和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以后，金价的跌幅达到了危险的境地；在南非金矿开采以前，金价的涨幅又达到了危险的境地。然而在每一次危险中，它总能化险为夷，保住了自己的声誉。

但是未来的情况与过去并不一定相同。我们没有充分理由保证在战前保持一种平衡状态所依赖的特殊情况，在现在仍然继续存在。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分析一下，黄金在19世纪的表现之所以能够令人满意，基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第一，金矿发现方面的进展大体上正好与其他方面的进展趋于一致。当然这种相符并不是完全出于巧合，因为在那个时期的进展，其特征就在于对地球表层的逐步探索与开发，因此偏僻地区金矿床的逐渐暴露，也是情理之中的结果。但是这一历史阶段现在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从最近发现了一个重要金矿以后，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此后的物质进步，将有赖于科学与技术知识的发展，由此对采金行业造成的影响也许是间歇性的。采金的方法也许过了许多年都没有重大的改进；过去曾有过许多梦想，想把贱金属变成黄金；也曾有过许

多骗局，说是从海底可以捞取黄金，将来也许会出现一位天才化学家，把这些幻想变为现实。总之黄金既可能会昂贵，也可能会廉价。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期望出现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使金价趋于稳定，未免有些过分了。

但是也存在另一种影响作用，它常常有助于金价的稳定。黄金的价值并不是由人类中的某一单独群体的意志和行为决定的。由于黄金的边际价值是由它在与其他事物相对照时的稳定的心理评估所支配的，因此，其供给中的很大一部分会自动地流入艺术市场或在亚洲被贮藏起来，而且这么大的供给额并不会造成市场泛滥。这也就是说，黄金有其“内在价值”，不存在“管理”通货具有的那些危险性。决定黄金价值的多种多样的独立因素本身就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世界上许多证券发行银行持有的用以抵偿负债的准备金，具有任意决定、变化无常的性质，但并不会由此形成一个难以捉摸的因素，事实上它是一个稳定因素。当黄金的供给相对充裕，流向这些银行时，它们就可以把准备金比率略微提高一些，从而吸收了黄金的增量；当供给相对稀少时，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把准备金利用于任何实际目的上，这样，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对这一变化泰然处之，允许准备金比率的适当下跌。从南非战争结束到1914年期间，南部非洲黄金中的大部分流入了欧洲及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但对价格影响甚微。

但是这次大战却引起了巨大的变化。黄金自身已成为了一种“管理”通货。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学会了贮藏黄金，但是美国积存黄金的动机与印度却不尽相同。现在大多数国家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如果黄金的主要使用者以实际需要为限保有黄金，那么黄金的供给将大大过剩。美国没能让黄金跌

到其“自然”价值，因为它无法面对由此造成的黄金标准下跌的局面。因此，它不得不采用一项代价极其昂贵的政策，即把南非约翰内斯堡矿工辛辛苦苦挖掘出来的金子重新埋在华盛顿的地底下。结果现在黄金的价值完全是“人为的”，金价的未来走势几乎完全取决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黄金的价值，不再是造物主主宰下的产物，不再由许许多多独立行动的执政者和个人所决定。即使其他各国逐步回归金本位，情势也不会有多大改变。现在的趋势是采用某种变相的金汇兑本位，黄金也许会永远地从人们的衣袋中消失，这种趋势可能表明，目前金本位各国中央银行严格需要的准备金数量将远远低于现有的黄金供给量。因此黄金的实际价值将取决于三四个最强大的中央银行的政策，不管它的行动是相互独立的，还是联合一致的。在另一个方面，如果关于黄金在储备和流通方面的使用恢复到战前的习惯方式——依我看来，这一点的实现可能性较小——那么就会出现卡塞尔教授预测的结果，黄金的供给也许会严重不足，从而导致金价逐步提高。

美国也许会通过不再由造币厂吸收黄金的办法，使黄金丧失部分的通货资格，对这一可能情况我们绝对不可以忽视。作为一项临时措施，美国目前所实行的无限制接受黄金输入的政策也许可以认为是有理由的，它能够保持传统，增强过渡时期民众的信心。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长期的安排，那只能说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愚蠢行为。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目的在于保持美元价值的水平不受黄金流入或流出变动的影响，那么美国继续接收那些既不需要又代价昂贵的黄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美国的造币厂停止吸收黄金，除了这一金属的实际价格以外，它在一切其他方面的活动，仍旧同以往一

样照常进行。

因此，对黄金价值未来稳定性方面的信心，取决于完全相反的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简直愚蠢透顶，还在继续接收它并不需要的黄金；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美国聪明极了，接收黄金可以使它保持固定不变的价值。这种模棱两可的事态在民众的一无所知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无所不知的共同作用下，也许还可以显露真相。但是形势是不确定的，对于那些对未来采用何种本位制仍处于徘徊观望之中的国家来讲，这种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对于主张恢复无条件金本位的人们来说，以上关于黄金稳定趋势的讨论部分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论点，即认为这是避免"管理"通货危险的唯一办法。

谨小慎微的人们，在饱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后，迫切要求价值标准的变动独立于财政部长和国家银行，这种心情是极其自然的。目前事态的发展为政治家的愚昧无知和轻佻浮躁提供了很大的机会，这很有可能在经济领域内造成破坏性的严重后果。现在人们感觉到，就政治家和银行家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知识的一般水平而言，任何革新都不可能实行，或者即使实行了，也不可能安全顺利。事实上，稳定汇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限制财政部长的影响力。

人们这种谨慎、犹豫不决的心理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去判断这些政治家和银行家的能力，却有失公道。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些非金属本位制，都不是冷静态度下的科学尝试。它们并不是在自愿的情况下采用的，是战争或膨胀的累积租税造成的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那时国家财政已经处于崩溃境地，对于局面的稳定已失去了控制能力。在

这样的环境下，这些措施自然成了灾难的伴奏和前奏。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在正常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的后果。我就看不出关于价值标准的调节是一个特别难处理的问题，因为有许多高于社会所必需的任务，我们都成功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不能成功地完成这件事呢？

诚然，如果有神灵在监护着黄金，或者上帝已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现成的稳定本位制，那么为了进行一些略微的改进，我是决不会把通货的管理权移交给那些可能是软弱无能或愚昧无知的银行委员会和政府的。但是这并不是实际情况。我们并没有现成的本位制。经验显示，在紧急情况下，财政部长的活动是不能被约束的。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现代纸币流通和银行信用的世界中，我们无法逃避"管理"通货，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至于黄金本身的价值，是取决于中央银行政策的，纸币能否兑换黄金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上节所述的最后一句，值得再推敲推敲。它与战前我们曾学习过的、教导过的准备金原则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没有一个中央银行会如此大方，以至于保持超过它需要的黄金数量；或者如此疏忽，以至于保持低于它需要的黄金数量。黄金会不时地投入货币流通领域或输出海外。经验显示，在这些场合下黄金的需要量大体上是与中央银行的负债成适当比例的。在银行方面，必须要把准备金比率提得高一些，以防万一，并增强民众信心。信用创造主要是以此比率为依据，并随时加以调节。以英格兰银行为例，它在黄金潮流中随波逐流，听任黄金的流进流出，让它产生"自然"的结果，不让它受到关于阻止价格影响方面的任何观念的影响。在大战以前，这种制度就已经由于其中的人为因素而渐趋不稳定。随

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比率关系”已经渐渐与事实脱离联系，而基本上成为一种常规，比这一比率高一些或低一些的其他比率也同样可以完成任务①。大战打破了这个常规，因为黄金退出实际流通领域以后，消灭了处于这一常规背面的一个实际存在因素，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以后又消灭另一个因素。这时的准备金“比率”已失去了它原有的一切意义，因此以这一比率为依据来调整银行利率的做法将是荒唐可笑的，结果在过去的十年里产生了一种新政策。现在的银行利率，尽管在使用上存在着不完善性和带有试验性质，但却在为了企业稳定和价格的持续平衡而调节信用的扩张与收缩。至于利用它取得美元汇率的稳定——这与国内价格的稳定是不一致的——我们还存在着战前政策的遗风，实行的是一种协调政策，试图在这两个不相一致的目标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对于那些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人们而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实践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方针路线。如果我们恢复金本位，银行利率也势必回到战前模式，让黄金潮的涨落任意戏弄国内的价格水平，对于信用循环对价格和就业稳定的严重不利影响，也听其自然，而不设法加以调节，主张恢复金本位的人们，是不是希望我们这样做呢？或者，我们继续进行关于我们现有政策的尝试性革新，而置“银行比率”于不顾，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让黄金的堆积存量远远超过我们的实际需要，或者削减黄金存量使它远远低于必要存量水平，主张恢复金本位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呢？

---

① 我在1914年曾谈到过这一点，可参阅《经济学杂志》第24卷，第621页。

以事实而论，金本位现在已经是一种未开化习俗的残余。从英格兰银行总裁起，所有我们这些人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保持企业、价格和就业的稳定；当不得不从其中选择某一目标的时候，我们决不会为了过时的教条——其价值曾经是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而牺牲这些方面。主张古老的本位制的人没有察觉到这个制度离时代精神的要求有多么遥远。一种管理体制下的非金属本位制已经不知不觉地登台亮相了。它的存在已成为既成事实。正当许多经济学家在打瞌睡的时候，百年来的学术梦想已经脱去了峨冠丽服，穿上了破烂衣裳，悄悄地溜进了现实世界，而引它进来的就是那些离经叛道的财政部长们，他们时常受到指责，不过比起过去的循规蹈矩却还是要有力得多。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一些开明的主张恢复黄金使用的人们，如哈特里先生，并不赞成黄金重新成为"自然"通货，而坚决主张黄金成为一种"管理"通货。他们只允许黄金回归以后，成为一位立宪君主，其古代的专制权力一概取消，强迫它接受银行议会的建议。目前起草关于通货的热那亚决议的那些人头脑中的想法，对于哈特里先生对黄金问题的主张而言，是一个关键条件。他的打算是："各中央发行银行之间应保持连续的合作关系"（决议第三条），应以金汇兑本位为基础形成一种国际常规，"目的在于防止黄金购买力的过度波动"（决议第十一条）①。但是他不赞成在不顾"对于黄金购买力将来出现的困难是否做好了防备"的情况下，恢复金本位。他承认，"国际合作是不容易推进的，如果这一点办不到，则目前最明智的措

① 哈特里：《货币改造问题》，第132页。

施似乎是集中力量于以商品为依据的英镑的稳定，而不是把英镑束缚在一种前途变幻莫测的金属身上。"①

看到这样的建议，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非要把黄金拽进来呢？显然，哈特里先生的这种妥协策略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支持，而主要是出于感情和传统习俗的影响，英国人宁可除去君主的权力，也不愿意把君主本人除去。不过他没有着重说明这一点，他举了另外三个方面的原因：(1)必须用黄金作为一种流动储备，用于国际债务余额的清算；(2) 这种做法可以进行一种尝试，而无须与旧制度完全隔绝；(3) 必须顾及到黄金生产者的既得利益。在以下我自己的建议中，这几点原因都基本上包括于内，因此在这里我就不准备详述了。

另一方面，有些人把恢复金本位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合作这一点上，可我认为这种想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在世界黄金的现存分配格局下，恢复金本位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丧失自己对价格水平和信用循环的调整处置权，而屈从于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即使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英格兰银行之间建立了最亲密、最诚恳的合作关系，但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权力方面，仍然会处于有利地位。前者可以忽视后者的存在而独立行事；但是如果后者忽视了前者，那它随着情况的变化，很容易发生黄金存量的过剩或者不足。不仅如此，我们事前就可以判定，美国方面到那时肯定会多有猜忌(因为他们的性情就是这样的)，疑心英格兰银行为英国的利益，而干预其政策或影响美国的贴现率。此外，为了对付世界上出现的过剩黄金，我们也必须承担一大笔尽管是徒劳的费用。

① 哈特里：《货币改造问题》，第 22 页。

在目前的环境下,使我们的行动自由屈从于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将是一种鲁莽轻率的举动。在紧要关头,对如何在勇敢、独立的精神下采取行动,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追求的目标是摆脱来自局部利益的压力,但是这一愿望是否能够全部实现,我们还没有把握。不过它仍旧有可能屈服于激烈的低息贷款运动。对英国的行为表示疑虑,不但不能增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地位,反而会大大削弱其抵御民众喧哗的能力。还有,除了政策的软弱或错误会引起不良后果之外,即使英美两国同时采取同样的政策也不一定对双方都有利。在大西洋的两岸,信用循环的发展与企业的现状有时是会出现很大的差别的。

我以为,居于首要地位的应该是价格、信用和就业的稳定,对于过时的金本位,我已经失去了信心。尽管它在过去对经济局势的稳定有过贡献,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却怀疑它是否还能这样,因此我不赞成恢复战前形式的金本位。同时,对于哈特里先生关于与美国共同建立"管理"金本位的建议,我也表示怀疑;因为它保留了太多的旧制度下的弊端,而其优点却丧失了,而且它还将使我们过于依赖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和意愿。

第三篇　关于未来货币调节的正面建议

（1923 年）

作为一项健全的、富有建设性的货币调节方案，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

（1）调节通货和信贷供给的方法，目的在于尽可能地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

（2）调节外汇供给的方法，目的是避免由季节性或其他原因引起的纯粹属于短期的波动，而不是由国内和国外价格水平之间的长期偏差所引起的那类波动。

我认为，在英国最恰当、也最容易达到理想制度的途径是采用自战后以来在半偶然状态下发展而来的现实制度。

（1）对于一项良好的建设性方案，我的第一条要求是，必须以更为谨慎

和自觉的方针来拓展我们现有的安排措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一向是以维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尤其是在战前平价水平上的稳定)作为它们的目标。它们是否就是一心坚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而不顾及美元价值(或黄金价值)的波动呢?也就是说,它们在英镑价格的稳定与美元汇率的稳定发生矛盾时,是否将牺牲前者,而迁就后者,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表态。无论如何,我的方案需要它们把英镑价格的稳定作为它们的**首要**目标——尽管这并不会阻止它们与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一般政策上合作时所追求的以汇率稳定作为第二目标。只要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保持美元价格的稳定方面是成功的,那么保持英镑价格稳定的目标就与保持美元—英镑汇价稳定的目标相一致,两者成为合二为一的问题。归根到底,我的建议不过是体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万一联邦储备委员会不能保持美元价格的稳定,如果英镑价格有可能达到稳定的话,就不应当仅仅为了保持稳定的汇率平价而让它也卷入混乱之中。

如果英格兰银行、财政部和伦敦五大银行采用此政策,那么它们在调节银行利率、政府借款和商业贷款各方面,应当以什么作为标准呢?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标准应当是一种刻板的数学公式呢,还是应当以现有的一切资料为基础对当前形势作出一般鉴定?主张价格稳定,反对汇率稳定的先驱者是欧文·费舍尔教授,他提倡的价格稳定的表现形式是"补偿元",它根据物价指数自动调节,无须进行任何的评价或判定。这种方法的长处是,同战前的准备金和金比率制度很容易相融合,他也许正是受到了这种长处的影响而提出了这一建议。然而不管怎样,对于如此枯燥无味的制度,我很怀疑它的明智性与有效性。如果我们等到价格变动已经实际开始以后,再采

取补救措施，也许就太迟了。“我们要对付的不是过去的价格涨势，而是将来的价格涨势”①。信用循环的激烈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即价格的运动是累积性的，每一次运动都会达到某一点，从而推动在同一方向的进一步运动。费舍尔教授的方法用于处理黄金价值的长期变动趋势也许还可以，但对于危害更大的信用循环的短期振荡，却无能为力。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如果能够编制一套官方正式的物价指数用以记录某一标准合成商品的价格，则可以由当局以这种合成商品作为价值标准，其用意在于当局将使用一切资源防止价格的变动，无论在哪一个方向上，偏离正常标准的范围不能超过某一百分率，就像战前使用一切资源防止黄金价格偏差超过某一百分率的情形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办法的缺点固然在于行动迟缓，一直到实际价格发生变动时才发挥作用，但是它却可以助长信心，成为一种客观的价值标准。至于构成标准合成商品的商品种类究竟是哪些，可以根据各种商品在经济上的相对重要性，随时加以调整。

以上所述的决定管理当局行为的标准是实际的价格变动趋势，至于其他的标准，就需要涉及到对信用循环的诊断和分析，而对这个问题的充分讨论不在本篇的范围之内。我们对这一问题探讨得越透彻，对于利用银行利率或其他途径来调控信用扩张的正确时间和方法的理解就越准确。同时，我们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当局也可以以此为依据来做出相应的判断。实际的价格运动当然会提供最重要的资料；不过就业情况、生产量、银行方面接收到的关于信用方

① 哈特里：《货币改造问题》，第 105 页。

面的有效需求信息、各种类型投资的利息率、新币增发量、现金流通额、对外贸易的统计资料以及外汇水平，都需要分别加以考虑。主要的一点是，当局在自由使用这些方法时，应当以价格稳定作为它们的首要目标。

（2）我们怎样才能把价格稳定的基本目标与最大限度的外汇稳定最适当地结合起来呢？我们希望获得长期的价格稳定和短期的外汇稳定，我们能够兼得吗？金本位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克服汇率的过度敏感所造成的短期影响。我们的目标，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要保存这一优点，同时又不使我们随着黄金价值的巨大变动而波动。

如果英格兰银行承担起调节黄金价格的责任，就如同以往调节贴现率那样，那么我相信，我们会在上述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应当明确的是，“调节”并不是“钉住不动”。英格兰银行应当有黄金的买入价格和卖出价格，就同战前的方式一样；这些价格也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不变，就同银行的利率一样，但是它们也不能永远不变。银行的黄金价格与银行的贴现率同时在每星期四早上公布，买价与卖价之间的差额相当于战前每盎司 3 英镑 17 先令 10.5 便士与 3 英镑 17 先令 9 便士之间的差额；不过，为了避免价格变动过于频繁，可以把每盎司 1.5 便士的差额适当扩大一些，比如扩大 0.5%～1%。银行把当时愿意买入和卖出黄金的价格确定以后，就可以使美元对英镑的汇率在相应的有限时期内保持稳定，这样汇率就不至于略有风吹草动便产生变动；只有在银行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判断之后，认为为了英镑价格的稳定，有必要对汇率加以变动时才会有变动。

如果互相结合的银行利率和黄金价格引起了黄金的过度

流入或过度流出，英格兰银行就必须加以研究，判断这种流动究竟是由于国内的不稳定状态引起的，还是由于国外的不稳定状态引起的。为了把我们的想法具体化，我们可以假定黄金出现了外流现象。如果外流是由于以商品来衡量的英镑价值的下跌造成的，那么正确的补救办法应该是提高黄金的价格（即黄金的买入价格）；如果外流是由于季节因素或其他一时的影响，那就应当顺其自然，无须纠正（当然，假定银行的黄金储备足以应付任何可能的要求），这种情况，会随着相反的作用力量自动获得纠正。

如果英格兰银行能够公布每日的价格，不仅包括黄金的即期买价和卖价，而且包括 3 个月的远期价格，那么就可以在这里所建议的制度上，实现一项技术改进，而不改变其基本特征。即期价格与远期价格之间的任何差异体现的是后者对前者的贴水或升水，它取决于银行在伦敦的利率是高于还是低于纽约的利率。英格兰银行的远期行市为远期外汇自由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为伦敦与纽约之间短期资金流动提供便利；同时，也与战前的方式一样，使黄金实物的实际往返移动降到了最低限度。

读者会发现，在我建议的制度里，黄金仍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黄金作为最后防线，以及作为对付突然而至的意外所需的储备的地位，还没有更好的媒介物能取代。不过我主张，我们不要盲目地让法定货币追随黄金的变化趋势，因为黄金实际购买力的未来变动是不可预测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利用它的优点，从中获取最大利益。

第四篇 银行行长们的发言
(1924—1927 年)

一、1924 年 2 月

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传统,五大银行行长,每年都要抽出一天的时间举行一次聚会。平时他们一直忙于劝说他们的客户接受贷款,向大家解释银行业务的理论依据;而在这一天他们却可以抛开这些繁琐之事,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以语言为武器,畅谈他们的观点。每逢此时,大家都怀着浓厚的兴趣。这种聚会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们都是金融界的代表人物,提出的都是关于金融的时尚蓝图。那么,关于货币政策,他们在这一年里说了些什么呢?

只有威斯敏斯特银行的华尔特·利夫先生一个人完全没有发言,其他

的四位都讲了一些。他们四人分成了两对：一对是劳埃德银行的波蒙特·皮斯先生和国家地方银行的哈里·戈申爵士，在他们看来，讨论这些事情是不合时宜的，或者至少是令人讨厌的；但是另外一对的巴克利银行的古德纳夫先生和米兰德银行的麦肯纳先生却绝对不反对讨论问题，而且大胆地参与其中。

我已说过，皮斯先生反对思考，他把这称作"精神机能的耗费"。他希望"直截了当地面对事实，而不是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绕过事实"。他认为由货币数量理论引起的那些问题，有空想、也有实质的成分，"在价值方面，后者当然不会亚于前者"。总之，金本位已经被列入了道德或宗教的范畴，在那里，自由思想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地位。他接着说道："就任何一个普通的联合股份银行而言，我不相信它是有意识地把政策的决定建立在纯粹的货币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它主要关注的是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至于是否要遵守某一理论，却不在考虑之列。它的行为不是商业活动的起因，它是跟在商业活动的后面，而不是走在其前面的。"我认为，从大体上讲，这段话倒是对事态的一个正确解释，皮斯先生对这一点的强调，是他发言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由于联合股份银行反应中的无意识成分，才使英格兰银行关于各银行余额和贴现率方面的政策，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皮斯先生的结论是，他在目前不赞成采取任何步骤去建立任何一种本位制。不过，他却"希望将来能逐步回归到金本位，尽管它存在着某些缺点和困难，但事实上它在过去的运作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哈里·戈申爵士的发言比皮斯先生更胜一筹，他所讲述的令人愉快的一节值得全部引述：

“我不禁想到，近来有关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相对优缺点的不负责任的讨论实在太多了。这类讨论只会引起我们邻邦的猜疑，疑心我们是不是要在两者之间选取一个。假使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一切顺其自然吧！”

面对这些天真的感情表露，我们是发笑好呢，还是发怒好呢？也许最好的方式，还是让哈里爵士也“顺其自然”吧！

让我们把这两位未经世故的老处女丢在一边，来看一看古德纳夫先生和麦肯纳先生那既富于理性、又无所顾忌的畅谈吧！关于当前的政策，两者的看法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一致认为货币政策是可以决定价格水平的，因此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应当遵循的方针是多思考、多讨论。古德纳夫先生侧重的是银行利率，而麦肯纳先生侧重的则是掌握在银行手里的现金资源的数额。他们都反对这个时候恢复康利夫委员会的通货紧缩政策。他们都以国内情况而不是外汇作为信用扩张或收缩的依据，不同的是，麦肯纳先生主要关注的是就业水平，而古德纳夫先生特别关切的是国内价格的稳定。后者说：“关于通货问题的意见，总结起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应当是在通货和商品之间尽可能地保持现有的平衡状态。”他们两人对于价格的适度上涨，都不十分反对，但前提条件是（根据麦肯纳先生的观点）国内的生产性资源还没有达到其使用限度；或者是（根据古德纳夫先生的观点）这种价格上涨既不是由于投机性的商品囤积，也不是由于英国价格相对美国价格的上涨。麦肯纳先生建议目前的政策应当是“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实行一条中间路线”，同古德纳夫先生一样，其目的在于在一定的限度内取得一般价格的稳定，并谨慎使用货币政策来减少信用循环的弊病。关于我们提议的最终

目标，他并没有提及，不过从他的发言可以看出，他并不反对把上述目前的建议作为长远的政策。他说："商业发展的兴衰起伏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明智的货币政策却能够防止循环运动走向极端。在膨胀式繁荣下的过度投机行为，以及长期萧条下的贫穷困苦，都是可以避免的。它们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灾难，并不是我们必须服从的、无法理解的或无法阻止的。"另一方面，古德纳夫先生虽然不主张在眼下实行金本位，但是他在上面所引的发言中继续讲道："……尽管我们应当始终牢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回归金本位。"同时，他希望美国发生通货膨胀，通胀的程度正好使英镑恢复到战前的金平价水平，而不致使英镑对商品的现存平价产生任何干扰。

麦肯纳先生的发言特别精彩，也许是他一系列著名讲话中最成功的一次。他对我们货币体制的运行进行了清晰明了的解释，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部加以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有关此次发言的原文。但是应该提及另外一件事情，古德纳夫先生和他都对它着重地加以详述过，即：将由康利夫委员会的建议而形成的财政备忘录强加于我们的货币发行是很不适宜的。

这个备忘录的目标是坚决主张一个连续的通货紧缩过程。此类政策已经被废弃了，但是这个备忘录仍然保存着。两位发言人对此都表示不安。古德纳夫先生指出，只有通过把黄金从英格兰储备银行移交到通货票据账户的办法，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开此备忘录。但是，"我们仍旧需要考虑每一步骤，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对现有的通货发行实行信用限制，那么这种方法也许是令人满意的。然而我认为，必须承认，提前制定任何周全和可靠的规则，是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的，

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最后他的结论是，如果认为额外货币的需求现象“是商业活动真正扩张的表现，那么这种现象应当被看作是健康的，过分地限制显然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麦肯纳先生认为目前的确需要进行某些改变，他明确地指出了有趣的一点，即现在我们的通货数量与战前相比，显得更加没弹性。在战前的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利用注入黄金收回多余的通货，然而现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无法增加所需的通货。

这些发言究竟会产生什么实质结果呢？对于坚信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和信用循环的抑制值得争取、并且是可以达到的那些货币改革者来说，这些发言是有力的支持。发言还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它表明，伦敦的两位极有影响势力的人物，对当前具有实际重要意义的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了解，而且还会在正确的方向上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对此我们是可以给予信任的。麦肯纳先生和古德纳夫先生两人都对上述改革者的目标表示同情。不过如果认为那两位老处女也坚决反对这些想法，那是不公道的（尽管他们有许多不正确之处，头脑思维也欠敏捷，但是在考虑某件事时，他们是朴素诚实、无所偏袒的）。他们的书面格言是“坚持面对事实”和“节俭和艰苦工作”，如果能耐心地劝导他们超越他们的格言，那么我们也许会发现，他们对于促进价格稳定和商业平稳的认真努力，也不会横加反对。尽管他们主张“顺其自然”，对“干预”这种自然秩序的任何建议都表示反感，在他们看来，这就像在小孩未出世之前就要确定其性别一样；但是他们也并不准备对他们内心的偏爱坚持到底，并不是非要用某些纯属偶然的办法来解决这类事情。

二、1925 年 2 月

银行行长们又一次提出了他们在金融方面的时尚蓝图，供我们检阅。标题有所变动，但蓝图的内容与以往大体上一致。第一位发言人把金本位吹得天花乱坠，认为它与所有国家的结合都是最符合意愿的、最迫切需要的、最体面的、最有效的、最有前途的，总之是最令人向往的。另一位发言人则对跃跃欲试的新郎发出警告，说婚姻意味着现在的自由之身要承担沉重的负荷，结果可能会更好，也许会更糟，然而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承受和服从。在他是单身汉的时候，价格和银行利率都符合家庭生计的需要；但在结婚以后，这种快乐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婚后还得承担更多的事务。如果金小姐碰巧是位美国人，那么在将来对他最重要的也许是葡萄和爆米花的价格，而不是鸡蛋和熏肉的价格。总之，还是让他最好不要过早地陷入其中。有的人当被问及是否相信死后会在极乐世界中获得无穷的美妙享受时，他当然会说，对，是这样。但是从根本上，他并不愿意讨论这种令人不快的问题；而我们的某些行长们说的话就同他一样。

同去年一样，这里也有两个明确的问题——金本位的理论优点和回归金本位的期限和方式。关于第一个问题，麦肯纳先生说得很有道理，他说："我们还处于探讨阶段，还没有获得明确统一的意见，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被认为是正统学说的理论体系。"关于货币改革，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我对此较以往有了更大的信心，认为它是在增进经济福利方面我们能够采取的最重要、也最有意义的措施。但是改革的支持者为

了克服旧习惯势力和普遍的愚昧无知，他们就必须对他们的论点作进一步完整而又简明易懂的解释。这不是在一天之内胜败可见分晓的一场斗争。有些人认为迅速地回归金本位，所有的事情就可以永久性地解决了，这是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回归金本位仅仅是一个开端。决定成败的，不是来年的官方决策，而是此后实际发生的经历和对反对派观点的相应澄清与完善的共同影响作用。例如，阅读过伟大的奥弗斯顿爵士作品的人肯定会记得，百年以前的货币改革者，经过了多少岁月，经过了何等艰苦和惨重的历程，才克服了英格兰银行的重重阻挠，建立了以银行利率和银行储备为基础的战前政策（在那个时候，这的确是一个重大进步）。

另外一个问题具有实践的和眼前的重要意义。去年所讨论的是关于利用谨慎的通货紧缩来促进事态的发展是否妥当的问题；今年所讨论的是关于利用取消禁止黄金出口的办法来促进事态的发展是否妥当的问题。今年同去年一样，银行家们在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时，都略有一些紧张不安。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有缘由的，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

同许多人一样，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美国的货币状况迟早要引发一次价格水平的上涨和初期的经济繁荣；同时也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应当实行的正确政策是用通常的办法来控制我们自己的价格水平，防止我们的信用效仿美国而变得脆弱。这一政策如果能运用成功，结果将会使英镑的汇率逐步得到改进；而且在不需要美国出现一次很狂热的繁荣的条件下，就完全可以使英镑的汇率提高到至少与战前平价水平保持一致。因此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一直坚持认为，如果英格兰银行采取健全的货币政策，而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这方面健

全性较差的话，英镑汇率迟早会回归到战前的平价水平，这一结果不但是人们所期望的，而且也是有可能取得的。

实际发生的情况又怎样呢？在 1923 年春天，美国的繁荣状态似乎正在发展之中，但是主要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行动，繁荣的发展势头不久便中止了。然而自 1924 年 7 月起，出现了强劲不断的价格上涨趋势——始终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影响之下——预计还将继续发展下去。随着美国价格的早期上涨趋势，英镑汇率也有了相应的改进；后来退步时也相应出现了退步。类似地，在过去的 6 个月里美国价格的上涨也伴随着英镑汇率的改进，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广泛注意。正如麦肯纳先生指出的那样，英镑的价格在稳定性上已经略微超过了美元的价格，与这种较稳定的物价必然相对应的是，汇率出现了某些不稳定状况。

不过，过去 6 个月的价格运动由于存在一些反常因素而使情况变得错综复杂。英镑汇率的改进，单单由我们的货币政策来说明是不够的。诚然，英国的短期利率曾经保持在高于纽约 0.5%的水平上，英镑的价格上涨幅度也略低于美国。但是一般认为，这些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一切。商业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去年资本账户下的由纽约流向伦敦资金（大部分也许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大约为 1 亿英镑。这种现象的出现部分是由于（在总额内占多大比例难以估算）原先存放于纽约的对外余额的回流；部分是由于道威斯计划引发的华尔街投资热潮的高涨，致使美国在欧洲的投资也有了进展；部分则是由于预期英镑价格对美元价格会有所改进引发的对英镑的投机性购买。这种没有先例的价格运动给形势带来了一个不安定因素——我们无法预期这种情况是否会继续下去，也许在某个时

刻会发生部分逆转现象。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休整时期,来重新调整我们的负债,其方式或者是促进相对于进口的出口,或者是提高长期贷款利率,提高到足以抑止目前的外国投资的流入趋向(依我之见这方面的投资量是过度的)。现在我们正处于一种危险状态,借出的是长期贷款(例如给澳大利亚),而从纽约借入的却是短期贷款。我们战前时的地位之所以得到巩固是由于(通过证券市场)我们借出的大量贷款都是短期的,是可以收回的。而现在我们所处的地位恰恰相反,虽然这也许只是一时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理由。

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呢?有两种主要的选择道路。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美国的初期繁荣状况越来越处于危险的境地,因此应当像两年前一样,把局势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几乎是委员会理所当然应该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处的情势同 18 个月以前极为类似,我们只能就我们面前的两条路中择一而行:要么保持英镑的价格稳定,使之对美元的汇率低于平价水平;要么为了保持汇率在平价水平之上而实行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过早地宣布取消黄金自由输出的禁令将预先把我们限定于后一种选择上,而两年前我们对其曾有意识地加以躲避。这是那些异想天开的人所期望的选择。由于我们的失业数字目前依旧没有改观,这种选择也许不会是明智的。

另外一种选择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听任事态沿着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如果是这样,美元的价格将会有很大的提高。在 1924 年的某一段时期内,委员会在公开市场上决定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后来价格的迅猛上涨主要是由这一政策造

成的。目前他们在政策方面，较以往更加谨慎小心，但是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有任何平稳的或深思熟虑的政策。如果他们对我们提高英镑汇率的努力产生了错误的同感，那么他们就会将其行动推迟；如果他们推迟得过久，繁荣状态也许会真正确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把英镑价值提高到战前平价水平，就不会有什么困难。我们只需实行坚定的货币政策来抑制英镑价格的上涨趋势，不需要借助于任何所谓积极的通货紧缩策略，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这也并不是说，黄金出口的禁令由此就可以取消。美国曾一度出现了繁荣，我们却没有完全分享到，繁荣的结果是美元的价格接近了最高点。这时在信用循环的过程中把英镑价格与美元价格连接起来无疑是自找麻烦，因为当美国的繁荣状态衰落时，我们将要承受萧条带来的全部打击。只有当美元价格的平均水平略高于近一时期的水平，而且看起来已经趋于稳定时，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把英镑价格与美元价格连接起来，而不致立即危及我们的福利状况。

取消黄金出口的禁令意味着对外宣告，英镑与美元是处于平价地位的，而且这一状况将继续存在。而我认为，正确的行动秩序是先确定事实，再宣告；而不是先宣告，再碰运气。因此禁令的取消应该是恢复战前状态的最后一个阶段，而不是开始阶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唯一适宜的声明应当是，只有到英镑处于平价地位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而且所有由此引起的基本调整已经适当完成时，才可以取消黄金出口的禁令。同时——如果我们想回归到平价水平——就应当采取提高银行利率和抑制对外发行的手段来争取实现上述的事实。我并不是有意看重于恢复平价，但我认为这些措施对于我们自己局

势的稳定有很大帮助。我相信，在目前的价格水平趋势下，银行利率的略微提高不会对商业和就业的发展造成危害。不管怎样，为了维持我们自己的均衡，需要较高利率的支持。有几位银行家声明，如果取消黄金出口的禁令不会造成银行利率提高的话，他们将予以赞成。除非他们的观点只是不赞成取消禁令的一种委婉说法，否则我不同意他们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

对我而言，在这里所容许的篇幅内，我不可能详细说明关于我主张实行长期管理通货体制的理由。在这里我只准备列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商业和就业波动是现代社会中最严重的同时也是最有补救希望的病症，它们主要是由我们的信用和银行体制的缺陷所引发的。如果我们把通货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实施挽救办法是比较容易的。不过我们可先将这些基本问题搁置一边，这里我提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论点，当然，它同我在上面所讲的有关联。

实际上，金本位的含义不过是保持同美国一样的价格水平和一样的利率水平（概括而言）。整体目标在于使伦敦和华尔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请求财政大臣和英格兰银行的总裁以及那些暗中左右我们命运的不知名的其他人士仔细地反思一下，这也许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美国正处于规模庞大的迅猛的发展阶段。大范围的波动在我们这里造成了失业和贫困，在美国却消失在一般的向上发展趋势之中。对于美国而言，其整体的经济活动每年都以百分之几的速度在扩张，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暂时的失调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同时也是可以应付得起的。我们在19世纪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情形就类似现在的美国，我们的增长率

太高了，以至于在细节方面的稳定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而现在我们的处境却不是这样。我们的发展速度在最好的时候也算是缓慢的，所以当我们勇往直前的时候，忽视经济结构缺陷所带来的后果，在美国也许还可以承受，但对于我们却是致命的。在 1921 年的萧条中，美国的情形比我们更糟，但是到 1922 年底，它实际上已经完全恢复；然而我们直到 1925 年还带着 100 万的失业人员蹒跚而行。美国在将来的年月里也许还会遭受工业和金融方面的大风暴，但它总能够对付得了；然而如果我们也被拖进了这场风暴，我们也许会完全崩溃。

此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战前我们向世界各地出借了大量随时可以收回的贷款；我们对美国的投资使我们成为它的债权人；我们可供对外投资使用的剩余资金量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由于那时美国还没有联邦储备制度，它的银行业既脆弱又混乱，事实上，我们那时在金本位同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如果现在有人认为回归金本位就意味着过去状况的恢复，那只会是痴人说梦。现在我们是美国的债务人。美国的对外投资额去年是我们的两倍；他们用于对外投资的净余额也许是我们的 10 倍。他们持有的黄金存量六倍于我们。去年联邦储备系统各银行，单单是存款的增加额就几乎达到了我们存款总额的一半。伦敦与纽约之间黄金和短期信贷的一次移动，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小小涟漪，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次大西洋的大风浪。如果对外贷款在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对美国银行家和投资家的影响微乎其微，而给我们经济方面带来的后果却不亚于一场地震。如果黄金、短期信贷和国外债券可以在大西洋两岸之间自由流动，既没有限制，也不存在损失的风险，那么某种程度的波动，对我们的影响和对他们的影

响，是绝对不成比例的。我们向金本位的回归是符合美国意愿的，他们准备在早期阶段为我们承担某种义务。但是如果认为在长期中他们一直会为顾及我们的需要而安排他们的事务，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有没有坚实的利益来抵消这些风险呢？对此我并不知晓。我们的银行家们谈到了"心理"利益。但是如果"十个人里有九个"期望得到利益，而结果却一无所获，那肯定是令人沮丧的。

我们的银行行长们没有别的追求，只是要求"回到1914年"，他们认为这是最值得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他们的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凡是研究此类问题的，大多数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受制于贫困的失业方面的种种混乱，至少部分是由于我们信用制度的缺陷引起的。"五大银行"应当对公众负有重大的责任。它们一方面是那么庞大，但另一方面又是那么脆弱，因此存在着巨大的诱惑使它们迷恋于一些教条、常规和旧习俗。当银行行长们讨论基本经济问题时，其依据的理由大多数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归根结蒂，在这些问题上过分的保守主义态度以及缺乏研究精神，是否会对银行的安全或稳定有帮助，是令人怀疑的。在英国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这时已经不能再单单依靠发展这一因素，我们必须致力于完成改进经济体系结构的科学任务。

三、1927年2月[①]

我们的老朋友银行行长们的发言预示着春天的到来。他

① 在恢复金本位以后。

们关于今年的发言，语气中多少有些拘谨，只有哈里·戈申爵士是个例外，他认为"没有理由使我们垂头丧气"，同往年一样，他觉得"全国的各个行业都有一种期待的心情，再也想不起过去的情况有比现在更乐观的了。"波蒙特·皮斯先生做了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他公布了对劳埃德银行业务的一些重要数字的分析结果，它开创了一种提供信息而不是阻碍信息的新政策。华尔特·利夫先生对最近企业合并的趋向以及股份持有分散化的倾向进行全面的观察，并指出，政府应当负起一定责任，引导这种不可避免的演进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除了麦肯纳先生以外——在某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古德纳夫先生——没有一个人提及货币政策的未来。那么就让哈里·戈申爵士自得其乐吧！让我们同麦肯纳先生一道，进一步深入了解事情的本质所在。

麦肯纳先生提醒我们，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势不可挡的繁荣与我们的萧条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宣称，"英美两国在货币政策上的巨大分歧，至少可以部分解释目前的状况"。他认为两个国家银行存款的相对增长和缩减是衡量这种政策分歧的标准，具体如下(表内存款量以 1922 年为 100)：

年　份	美国	英国
1922	100	100
1923	107	94
1924	115	94
1925	127	93
1926	131	93

他指出，除了严格的限制以外，英国的银行存款量主要不是依靠储户或五大银行，而是借助于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对此他详细加以解释，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然而却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结论是，只有英格兰银行改变它的政策，我们才有可能期望出现生产和就业的重大发展。

尽管我并不同意麦肯纳先生论点的每一个细节，但可以肯定，他的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货币政策的某些基本原则所具有的真理性如日月一般确切无疑。然而整个伦敦却对此一无所知，就像在黑暗中一样；而麦肯纳的功绩正是在于他把这些基本原则及其重要性传授给民众和他的同事们。

但是，依我之见，这一次他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释清楚，实际上他避开了问题的另一半。英格兰银行政策要转变到什么程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与金本位保持一致呢？英格兰银行现在有了一副新打制的金镣铐，它能像麦肯纳先生的政策所要求的那样成为自由的代理人吗？我们只有向本国的读者横向地介绍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情况，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重要的不是称为一般价格水平的抽象概念，而是各种不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这可以在不同的目的上衡量我们货币的价值。繁荣是受货币因素支配的，就这一点而言，繁荣有赖于各种不同价格水平彼此之间的适当调整。英国出现的失业和商业萧条状态是由于国际贸易商品的英镑价格水平与普通英国人货币收入支出所依据的国内英镑价格水平之间原来存在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不仅如此，当英镑价格全面跌落、我们成功地走向一种新的平衡时，国家的债务负担将增加，国家预算将趋于恶化。如果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把保护价格水平

降低到它与原来非保护价格水平形成的平衡的水平，那么国家债务的实际负担，与前两年相比，将增加约 10 亿英镑。

为了概括说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四种价格水平。美国劳动局的批发物价指数是国际贸易中黄金价值的一种准确公正的体现。我们自己的贸易委员会的一般物价指数是上述同类事物的另一种表示方式。这两种物价指数囊括的许多商品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两者在总体上有可能趋于一致——的确，除了一些短暂的偏差以外，这两者非常接近。就黄金价值而言，在过去的 30 个月里，两者在平均数字上是相同的，即 154；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开始和结束阶段也有相同的数字水平，大约为 149。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两种物价指数作为未保护英镑价格的另一种指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英国的生活费用指数和英国的工资指数。这两种指数是同诸如地租、社会保险费用、铁路费用以及国家预算两方面的各种项目等实际上以货币来确定的事物相联系的，因此，它们是保护英镑价格的指标。这些指数都是货币政策的结果，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出口贸易的困难，可以由保护价格对未保护价格的比率来加以估量。

下页表给出了以黄金计量的四种指数，也就是说，那些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人在参考了英镑的黄金价值以后，也应该回心转意了。表中前两列指数的平均水平代表了未保护英镑价格，接下来两列指数的平均水平代表了保护英镑价格，而第五列给出的是英镑保护价格对未保护价格的比率（以黄金计算，战前为 100）：

年份	美国劳动局批发指数	英国			保护价格水平对未保护价格水平的比率
		贸易委员会批发指数	生活费用指数	工资指数	
1924年					
第三季度	149	150	157	163	107
第四季度	154	160	169	168	107
1925年					
第一季度	161	165	173	177	107
第二季度	156	159	173	181	112
第三季度	160	156	174	180	112
第四季度	157	153	176	180	115
1926年					
第一季度	154	147	171	180	117
第二季度	152	145	168	180	117
第三季度	150	150	172	180	117
第四季度	148	150	178	180	120

从表中最后一列数字中可以看出，到现在为止，由于未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两种价格之间的比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缓慢攀升现象。在近两年半的时间里，英镑的保护价格水平实际上一直保持稳定，同时未保护价格水平却一直在下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首先是金本位的恢复；其次是世界黄金价格的恶化，自从1924年中期到1925年中期之间下跌8%以后，黄金价格已跌至其战前的水平。所以说，目前的形势同18个月以前一样糟糕，丝毫没有改观。

可是现在麦肯纳先生却似乎认为，两年前的确存在的不平衡现在已经消失了。他告诉我们，“今天这类问题只是具有

历史的意义”。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支持他的观点。价格水平之间的不相称状态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实际上比前两年更为明显。

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如何谋生的呢?银行行长们发言所流露出来的乐观主义是有理由的;但我认为真正的理由无非是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我们资源的消耗程度并没有达到使我们无法承受的地步。这一点难道真是显得那样令人迷惑,或者真是有那么大的安慰作用吗?

毫无疑问,我们之所以保持收支平衡,部分是由于我们为了确保安全,常常在资源方面留有较大余地;部分是由于在煤矿罢工期间,我们在世界各地短期贷款的增加。大战以前,我们在国际账户上的顺差,除了资本交易以外,以英镑现在价格计量,每年大约为3亿英镑。战争和以固定货币支付的价值的下跌,使每年的余额缩减至约2.25亿英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出口贸易仍像1913年时那样兴旺,则此余额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获取的。我们暂且假定,由于国内价格水平的相对提高,致使我们的出口总值减少了2亿英镑,即大约为贸易总额的1/4,或者可以说净损失是1.5亿英镑。这也就意味着,由于出口损失的部分是由进口原料而来的,因此我们会出现100万失业人员(假定),如果没有这种现象,他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事输出品生产。当然,这里所列举的数字,只是对合理情况的极其粗略的说明,而不是出于统计事实的估计。

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是如何维持的呢?每年我们还有7500万英镑的余额。因此,只要对外投资不超过此数额,我们还可以保持收支平衡。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较高的保护价格水平,不过我们得面对由此造成的1/4的贸易损失和100万的

失业人员，然而即使在这种局面下，我们依然有一定的剩余可供伦敦对外投资，也许最高的成就是金本位并没有受到威胁。金本位同一种可以替代它的货币政策相比较，也许要使国民财富一年减少1.5亿英镑。不用担心！正如利夫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经济的储备力量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所想像的，还要大得多。”用财政大臣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实力，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强大得多。”总之，我们是有能力负担的！

以上内容并没有考虑煤矿罢工期间的损失。损失总额约为1亿英镑，主要是借助于我们短期借款债务的增加来弥补的，部分是由于在逆差的清算过程中，总有一段时间间隔；部分是由于伦敦的贴现率具有相当诱惑力，足以吸引外国余资。

在未来国家政策的决策方面，我们面临三种选择方案：

（1）我们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争取恢复战前大量出口和大量对外投资的平衡。但金本位的恢复却使这一点无法办到，除非对工资全面开刀，但这却是首相所反对的；或者是期待国外黄金价格的提升，然而我们已经等待了许久，仍然杳无结果。

（2）我们可以让上述商业衰败和失业百万的虚假平衡状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种虚假的平衡也许不是英格兰银行的本意，但是实际上却是它到目前为止仍在执行的政策造成的。我还看不出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种状态不久就会转变过来。由于煤矿罢工问题迟迟没有解决，诺曼先生（蒙泰古·诺曼先生是英格兰银行的总裁——编者注）未来的处境也许会相当尴尬。但即使是发生了最坏的情况，只要部分地再度实行禁止对外投资的法令，也许就足够应付了。

（3）第三种方案认为我们应当把出口贸易的损失和对外投资的相应减少作为既成事实，而予以接受；然后把原先使用

于前者的劳动力和原先使用于后者的储蓄转而用于改进国内生产的效率以及提高国内的生活水平。如果回归金本位最终果能带来这样的结果,那么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于此方案牵涉了许多方面的利益,在此文结束之际,我不能不加以考虑。我相信,大众生活标准的进一步提高有赖于我们对此方案的采用。

在这里我们应该再次提到麦肯纳先生。我认为他之所以主张信用扩张,其目的是想在国内工业的逐渐发展过程中吸纳失业人员,在全力生产的同时,也间接地略助于出口行业。总之,他赞成第三种方案。因为他不希望看到,保护价格水平的降低或生产成本的节约是依靠信用扩张而取得的。同前几次一样,麦肯纳先生这次也是表面上对金本位的恢复所带来的影响怀有极大的信心,而实际却不是这样,他的这种做法相对他的想法多少有些不协调。

现在,在金本位的限制范围之内,这是一项非常不容易执行的政策,考虑到在煤矿罢工问题上我们仍欠着 1 亿英镑的债,因此这也许是一项危险的政策。如果麦肯纳先生成为可以自由发号施令的英格兰银行总裁,我相信,他可能会在保持金平价的同时大力削减失业人数。但是诺曼先生只是局限在他自己的智力范围内,我们能指望他这样做吗?

第五篇　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
（1925 年）

一、失业状况为什么日趋恶化？

国际贸易和国内消费均是适度的、健康的——均保持在处于萧条与繁荣之间的一种平稳的水平上。美国度过了一个过度繁荣的年头；印度和英国自治领也做得相当好；法国和意大利的失业已经不存在了或无足轻重了；德国在近 6 个月里领取救济金者的比例急剧下降了一半以上，目前约为 4.5%，而我们却是 10%。世界生产总量也许是自 1914 年以来最大的一年。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困难既不能归咎于世界范围的萧条，也不能归因于国内消费的缩减。导致这种现状的原

因很明显，它是一个关于国内和国外相对价格的问题。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价格太高了。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不同意见的。

为什么出口价格那么高?传统的观点认为，工人应当为此受到责难，因为他们干得很少，拿得却很多。在某些行业和某些劳动等级，特别是不熟练工种中，的确存在这种情况；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如铁路部门，冗员实在太多了。但是同去年一样，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在那些出口行业中，工人并不是干少拿多，那里的失业太严重了。

相反，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得到确定的答案。众所周知，英镑的货币价格在国外上涨了10%，然而它对英国劳动力的购买力却没有变化。英镑的国外价格的这种改变是政府和财政大臣有意识行为的结果，所以，我们的出口行业目前面临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是上述行为必然导致的结果。

我们实行提高英镑外汇价格的政策，使它从比战前含金值低10%提高到战前含金值水平，这一政策意味着，无论我们对外出售何种东西，国外买主若以他的货币支付时，支出将增加10%，而我们若以我们的货币收取收入时，将减少10%。这也就是说，除非国外的价格有了提高，否则为了维持我们的竞争地位，我们只得把煤、铁、运输费或不论是什么的英镑价格，降低10%。由此可见，提高英镑外汇价值10%的政策造成我们出口行业的英镑收入减少10%。

如果这些出口行业在工资、运输、捐税以及其他方面的费用也同时降低10%，它们就能承受这种削价，处境也不会比以往糟糕。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既然它们所使用的、其雇员所消费的一切商品都是在国内生产的，因此除非国内

工业的工资和其他支出普遍下降10%，否则它们是不可能削价10%的。这样的话，相对比较薄弱的出口行业将会陷入破产境地。如果黄金本身的价值不下降，除了国内价格和工资的普遍降低以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们摆脱目前的处境。因此丘吉尔先生提高英镑外汇价格10%的政策，迟早会成为一项降低工资的政策，具体来说，原先拿1镑工资的人将只能拿到18先令。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目的，就会有什么样的手段。现在政府面临的是如何执行自己决策的棘手任务，而这个决策本身既是危险的，又是不必要的。

统计数字更能说明问题。下表的数字本身就是对与一年前相比我们出口行业目前所面临的困难的一个充分解释（以战前为100）：

年　份	美国生活费用以金计	英国生活费用		英国工资	
		以金计	以英镑计	以金计	以英镑计
1924年3月	156	157	178	155	176
6月	154	150	169	157	178
10月	157	162	176	164	178
12月	158	174	181	172	179
1925年3月	158	176	179	177	181
4月	158	172	175	178	181
5月	158①	172	173	180	181
6月	158①	172	172	181	181
7月	158①	173	173	180	180

① 假定的数字。

表中的数据表明，在我国，以金计的生活费用和工资水平（即，若以英镑计，则其价格的下跌与英镑汇价的贬值程度保

持一定比例）一年前同在美国的以美元计的生活费用保持一致。自从那时开始，英镑的汇价上涨了10%，而我们国家生活的英镑费用和工资的英镑水平，与美国生活的美元费用相比，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所以到现在，我们的货币工资和生活费用已经上涨了10%。政府的这种政策造成我们在出口方面减少了10%的英镑收入，然而我们的出口实业家们必须支付像往常一样多的工资，其雇员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标准，也不得不支出像以往一样多的费用。偏离均衡的趋势是从去年12月开始的，以后随着汇率的提升还将逐渐地发展；引发这一现象的首先是对恢复金本位的预期，其次是金本位的恢复已成为事实，而不是英镑国内价格的提升①。贸易委员会主席曾向下院明确表示，金本位的恢复对我们的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一切都好”。而财政大臣的意见却认为，金本位的恢复与煤炭业中的事态发展毫不相干，正同墨西哥湾暖流与英国煤炭业无关的情形一样。这些观点都是轻率的、未经思考的。这些部长们尽可以说，金本位的恢复是值得牺牲的，而且牺牲也是暂时的。他们也可以确切无疑地说，那些面临困境的行业，多数是因为它们自己内部的困难。当某一普遍因素发生作用时，脆弱分子会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而一蹶不振。但是不能因为流行感冒只夺去了虚弱者的生命，就说它是“一切都好”，更不能说它同墨西哥湾暖流一样，对人类的死亡毫无干系。

① 财政部通货委员会也持有这类见解，该会报告认为，如果我们不恢复金本位，去年秋季和春季汇率的提高是不可能维持的；换句话说，在金本位恢复以前，汇率的提高是由于对这一事件的投机性预期，是由于资本的流动，而不是英镑本身国内价格的提高。

由于我们并没有从一年前的困难中摆脱出来，所以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糟糕了。在那个时候，以英镑计的工资和生活费用的价格与美国基本一致，但与欧洲其他各国相比却太高了。我们的出口行业在工厂设备和劳动力方面，都存在着存货过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把一部分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国内工业上，是符合要求的，归根结蒂，这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说，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反对提高英镑国际价格的论点之一所依据的事实在于英镑在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之间的已有差距，由于英镑对外价格的提高，这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加恶化。这种状况使我们只得转入通货紧缩时期，结果势必延缓国内资本扩张的积极势头，阻碍劳动力向国内商业的转移。英国的工资，以黄金衡量时，现在比一年前提高了 15%。英国以金计的生活费用，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相比，显得太高了；那些国家的工人，可以接受低于我们工人 30%的以金计的工资，但以实际工资衡量时，却一点没受损失。这也就难怪我们的出口贸易要陷入困境了。

我们的出口行业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它们是第一个必须接受降低工资 10%的要求的行业。如果每个人都同时接受同样的降低工资要求，那么生活费用将下降，因此较低的货币工资所体现的实际工资，将同以往大致相同。但事实上并不存在影响各方面工资同时下降的手段。因此，蓄意提高英镑在英国的货币价格，就意味着各个独立集团之间要互相地展开斗争，这场斗争并没有获取最终公平结果的希望，而且也无法保证较强的集团为了利益就一定不以牺牲弱者为代价。

工人阶级对于当前情况的了解程度，肯定不如内阁阁员。那些首先遭受打击的人们将面对生活标准的下降，因为他们

的生活费用不会下降,除非所有其他人也同样遭受打击,所以,这些人捍卫自己的处境是有理由的。受到货币工资降低损害的部分阶层,并没有获得保证、说在随后生活费用相应降低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获得补偿;也没有保证说不会以他们的牺牲来换取其他部分阶层的利益。因此,只要他们能够坚持,他们就一定会坚持到底,而这必然会导致一场斗争,一直到那些经济上最薄弱的分子被彻底击垮为止。

目前的事态并不是生产财富能力的下降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健全的管理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平均实际工资必须下降。这是在错误指导下的货币政策的后果。

二、是什么误导了丘吉尔先生?

第一章的论点并不是反对金本位本身的论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我不打算涉及。这些论点所反对的是恢复金本位的时机,即反对在需要对我们所有货币的价值作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回归金本位。如果丘吉尔先生恢复金本位时,把黄金的价值固定在低于战前的平价水平上,或者等到我们的货币价值已经调整到战前平价水平时再恢复金本位,则这些论点将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偏偏在去年春季的现实环境下实施他的主张,这简直是在自找麻烦。因为他应做的是压低货币工资和一切货币价值,但对于这件事如何进行,他却没有一点打算。

丘吉尔先生的行为也许部分是由于他缺乏本能的判断力,以至于无法防止发生错误;另外正是由于他缺乏这种判断力,使他在传统财政的一片嘈杂呼声中无法辨明真伪,失去了

方向；最为重要的是，他的那些专家们使他严重地误入歧途。

我认为他的专家们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对于恢复英镑战前金平价引起的货币价值失调程度，我怀疑他们作了错误的估计，因为他们所注意的物价指数，与当前问题并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是不相称的。如果你要了解英镑价格是否与汇率的提高相适应，仅仅观察利物浦的原棉价格是没有用的。这一价格肯定会同汇率的变化相适应，因为在输入原料的情况下，它们几乎随时与国际价值的平价保持联系。但是如果由此断定码头工人或临时女工的货币工资和邮资或旅费，也随时与汇率的变化相适应，那就是缺乏常识的说法。然而，我猜想财政部的想法，也许正是如此。他们把这里的一般批发物价指数与美国相比较，不过这类指数所包含的商品，其中至少有 2/3 是属于国际贸易的原料品，而它们的价格必然会同汇率的变化相适应，结果是国内价格的实际分歧，被冲淡到了只占其价值的极小一部分。这使他们相信，要弥补的偏差只有2%或 3%，然而生活费用、工资水平和我们制造的出口品价格等方面的指数却显示，真正的分歧数字是 10%或 12%。这些指数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是非常适用的，尤其是如果各项指数相互一致，就比批发物价指数要适用得多。

同时我还认为丘吉尔先生的专家们对于使国内价格普遍降低的这一程序在技术上的困难也过于低估，存有误解。当我们把英镑价格提高 10%时，就意味着我们要把约 10 亿英镑的资金从大家的口袋里拿出来转到食利者的口袋里，这会使国家的债务负担增加约 7.5 亿英镑（这等于把从战争以来对偿债基金的辛勤贡献，一笔抹去）。这种结果的确很糟糕，但却

是无法避免的。不过如果有其他途径能使其他一切货币支付同时降低10%,那么就不会有其他的不良后果。当这个过程结束以后,我们每个人的实际收入,就同战前水平相差不多。我认为,丘吉尔先生的参谋们,头脑仍停留在那种虚幻的、学究气很浓的世界里,在那里尽是报纸编辑、康利夫和通货委员会的成员等等之流,那里的人认为,在英格兰银行的"稳健"政策引导下,必要的调整会"自动"完成的。

这些人的理论是,出口行业首先受到侵袭,出现衰退现象,同时也许会发生货币紧缩和信贷限制现象,进而这种现象会均匀地、平等地迅速渗透到整个社会。但是,提出这种理论的人却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种渗透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关于这类问题,丘吉尔先生曾要求财政部通货委员会为他提供意见。后来他在预算报告中宣称该委员会的意见"包含了一系列言之有理的论点,博取了政府的信任"。他们的论点——如果他们那些含糊、空洞的想法能被称为论点的话——任何人都可以阅读。但是他们应该说的却没有说,在这里,我用一段话来代表这些应说之话:

"由于您一再宣称要恢复金本位,由此引起的预期已经使汇率有所提高,可是货币工资、生活费用和价格,却没能配合出口业的要求,没有与提高的汇率相适应。现在汇率已经过高,偏高程度约1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按照金平价规定汇率,那么结果是要么国内金价提高,从而诱使国外商人支付较高的金价来购买我们的出口品;要么您只得执行某种政策,把货币工资和生活费用压低到必要程度。

"我们必须提醒您,后一种政策的执行并不是简单容易的。这种政策肯定会引起失业和劳资纠纷。如果像某些人想

的那样，认为实际工资在一年前已经过高，那就更糟了，因为必要工资的降低、以货币计量时，将会更大。

“把赌注放在国外金价提高这一点，很可能会成功。但这也不是绝对有把握的，您必须得为其他事态的发展变化作好准备。如果您认为金本位带来的利益的确很重大、很迫切，以至于即使因此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甚至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也在所不惜，那么事态的发展也许是这样的：

“首先出现的将是出口行业的大萧条，这一点本身是有帮助的，它可以营造一种有利于削减工资的氛围。生活费用也将下降一些，这一点也是有帮助的，因为这可以为您提供一个很有力的论据，有利于降低工资。但是生活费用的下降不是充分的，结果除非受保护行业内的工资下降，否则出口行业不可能充分降低它们的产品价格。要知道，受保护行业内的工资不会仅仅由于不受保护行业内出现了失业而下降，因此，只有受保护行业内也出现了失业，其工资才会有所降低。信用限制将促进这一过程。通过英格兰银行实施的信用限制，您可以故意扩大失业到任何需要的程度，直到工资降低了为止。当这个过程结束以后，生活费用也将下降，到那时，我们的处境，将与这一过程开始以前一样。

“我们还应当提醒您——虽然这一点也许有些超出了我们的职责范围——如果您现在为了削减工资而公开承认您是在故意扩大失业，那么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安全。因此您不得不把目前发生的一切归结为可以想像出的原因，而不能说出真正的原因。我们估计，大约在两年内，您不能在大众面前吐露一句关于事实真相的话。两年以后，或者您已经离职了，或者调整过程，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已经结束了。”

三、英格兰银行的政策

汇率提高以后，进口品与出口品的英镑价格都将下降。进口食品价格的下降会导致生活费用的降低。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它并没有对生活费用的降低施加更多的影响。也许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的食品价格上涨；部分是由于时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期望这种情形造成生活费用的进一步降低）；部分是由于当一种商品，甚至是一种进口品，到达消费者手中时，它的费用一般都包括了各种国内的服务费用。但是，第一章的统计表却显示，由此而出现的货币工资的某些下降事实上可以被证明是有理由的——尽管由于这些原因，这一点不容易达到。较高的汇率并不会给予我们较高的实际工资，它只是把这种恩惠给予工人，因为这种恩惠可以尽可能地随时从工人那里拿走。同时，外来品的逐渐廉价可以使我们用同样的支出购买更多的这些物品；出口品英镑价格的下降将减少出口行业的贸易额。

汇率提高的结果是促进进口，但抑制了出口，这样会使贸易余额出现不利于我们的转变。这时英格兰银行就不能袖手旁观了，因为若不采取对策，我们必须用黄金来偿还贸易逆差。于是英格兰银行采取了两种有效的补救措施：第一种措施是借助实施对外贷款禁令来阻碍我们惯有的对外借出，近来，对殖民地也实施贷款限制；第二种措施是使伦敦的证券利率高出纽约1%（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情况），从而鼓励美国借给我们贷款。

这两种措施在恢复收支平衡方面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

的，我相信，它们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效力。因为刚开始时，我们的实力还留有相当余地。根据商业部统计，战前我们的对外借出能力约为 1.81 亿英镑，按现在的价格水平计算，约等于 2.81 亿英镑；甚至在 1923 年，商业部估计我们的净剩余仍有 1.02 亿英镑。由于对外的新投资并不会立即带来收益，因此如果我们减少对外投资 1 亿英镑，则即使在出口方面出现了同额的减少时，也不至于发生缺乏偿还能力的危险。对于维持金本位这一点而言，我们是拥有价值 1 亿英镑的对外投资还是拥有价值 1 亿英镑的失业，是无关紧要的。如果那些过去从事出口品生产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而且以前用那些出口品来偿还的贷款也有了同样程度的缩减，则我们的财政均衡依然安然无恙，英格兰银行的总裁也不会面临黄金外流的危险。而且，作为一个借入者，我们仍能保持良好的信誉。通过支付相当高的利率，我们不仅能弥补一切赤字，而且银行总裁高兴的话，还可以借入任何数量的黄金，给他每周公布的报告增光添彩。

据商业部部长估算，到去年 5 月为止的一年里，我们的贸易账户上并没有出现实际的赤字，收支借贷大体上是相抵的。如果这一估算是准确的，则现在必然会出现大量的赤字。此外对外投资方面的禁令也只能部分奏效。它并不能限制所有类型的对外投资，也不能防止英国投资者直接从纽约购买证券。因此，英格兰银行必须寻找其他的补救措施。我们一方面由于入超而出现贸易逆差；一方面英国投资者在禁令之下，仍然购买对外投资证券，这两方面使我们在收支平衡上出现赤字。面对这种情况，英格兰银行提高伦敦的贴现率，使其比纽约的贴现率高出不少，就可以诱使纽约的金融市场出借一笔相当大

数额① 的资金给伦敦的金融市场,从而弥补赤字、平衡收支。而且一旦我们提高了利率去吸引纽约短期贷款市场的资金,那么即使我们不需要增加借入款,为了保留我们已有的借款,我们也必须继续保持高利率。

法国的政策是借助摩根先生(美国摩根公司的总裁)的贷款来支持汇率,对此我们曾多加指责;但是我们现在把伦敦的货币利率维持在一个足以吸引并保留来自纽约的贷款的水平上,这种政策同法国的政策,基本上没有区别。如果说我们的政策跟法国的政策确实有区别,那么唯一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我们提高贴现率的目的不仅旨在吸引美国的资金,而且也是限制国内信用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必须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为应付失业使我们从一个借出国转变成为一个借入国,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损害极大的举措,我相信英格兰银行也是抱有这种见解的。他们不喜欢限制对外投资,也不喜欢从纽约吸收短期贷款资金。他们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一个喘息的时间。但是,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方针办事,说得含蓄些,他们肯定会利用这个喘息时间来进行所谓"基本调整"。为了达到此目的,在他们权力范围内所能进行的,只有限制信用这一个办法。在目前的环境下,这是实行金本位国家的传统政策;贸易逆差表明我们的价格太高了,使价格降低的方法就是提高利率、限制信用。等药到病除之后,就没有必要再限制对外贷款或向国外借入资金。

① 据哈佛经济服务公司估计,在最近几个月内,美国各银行向伦敦金融市场出借的贷款数额约在 2 亿到 3 亿美元之间。

如果用简明易懂的言语来表达，那么这一点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要降低货币工资，由此进而降低生活费用，当这个圈子绕完之后，实际工资将同以前一样高，或者相差无几。那么信用限制是在怎样的运作方法下，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呢？

实际上，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故意扩大失业这一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信用限制的目标就是向雇主们回收融资手段，使他们无法在现有价格和工资水平上雇佣劳动力。要使政策达到其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无限制地扩大失业，直到工人在严酷的事实压力下，不得不接受货币工资的必要降低为止。

这就是所谓的“稳健”政策，它是把英镑固定在某一金值上的鲁莽轻率行为的必然结果，然而英镑的这一金值，在用英国劳动力的购买力衡量时，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达到。任何通情达理、有判断力的人都会在这一政策面前畏缩不前。根据我的判断，英格兰银行的总裁对此也存有这种畏缩心理。但是他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又能怎么办呢？现在看起来他采取了妥协的策略。他半推半就地奉行着这种“稳健”政策；总是想避免道破事态的真相；他只是希望将来或许会有什么转机，那对他来说，是最幸运的了。

英格兰银行的工作涉及了大量的机密以及大量的不能公开的重要统计资料，因此要想确切地了解它究竟在做些什么，决不是件容易的事。已经实施的信用限制是通过几种方式来进行的，这些方式部分地互相独立。首先，对新币发行实施限制，这也许会减慢货币流通的正常速度；然后在 3 月份提高了银行利率；接着市场利率也有所提高，接近于银行利率；最后——也是所有方式中绝对最重要的一点——英格兰银行通

过某种运用资产和负债的方式，来降低各会员银行作为信用基金的可利用的现金数量。最后一点是信用限制的主要手段。由于无法获取直接的信息，我们能够得到的关于这一限制影响的最可靠反映是各会员银行的存款状况。存款趋于减少的现象表明，信用限制已经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不过，由于季节性波动以及6月底统计表中的人为因素，我们还不可能准确地估计出近3个月来，信用限制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就目前的推测而言，直接限制的影响结果还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实施目前的方针策略，这种限制究竟会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是没有人能够预料的。

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是这样有限度的措施，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来失业之所以扩大，这类措施当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信用限制这种手段具有难以置信的威力，即使略微使用一下，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当局势需要采取相反措施的时候。旨在强制压低工资的主动扩大失业政策，已经在部分实施中。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幸的是，官方硬是要把由错误观点所引导的政策说成是在理论上有根有据的。无论鲍尔文先生的演讲多么动情、多么真诚，没有一个部门的工人，会响应他的观点而愿意接受降低的工资。我们之所以降低工资，是迫于来自失业、罢工和雇主停工方面的压力，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却在主动地扩大失业。

英格兰银行在金本位的规定之下，不得不缩减信用。这种做法是尽职尽责的、“稳健”的。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信用的严格控制——没有人否认该银行的确是这么做的——在国家的目前情况下，必然会使失业扩大。而今天我们要重建繁荣，所需要的却是宽松的信用政策。我们需要鼓励

企业家开创新企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击他们。通货紧缩并不会“自动地”缩减工资。它是通过引起失业的方法来缩减工资的。昂贵的货币，对于正在开始的繁荣，将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有些人，在错误信念的引导下实施了这类政策，从而加剧了萧条，这些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四、煤炭工业的例证

以下我将利用煤炭工业的例证来说明我的上述观点。战后以来，除了鲁尔煤矿区停工期间出现过暂时的正常生产以外，整个煤炭工业一直处于极度的混乱状态之中。这种混乱状态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金本位的恢复，更主要的是其他一些原因。而丘吉尔先生却正是以这些其他的原因为借口，企图编造一个貌似真实的理由，来证实他的所谓结论，即汇率同墨西哥湾暖流一样，没有对煤炭工业造成丝毫的麻烦。因此，这里所挑选的例证也许会对丘吉尔先生有利，因为乍看起来，它明显不利于我的结论。

（1）在《经济学家》（出版于 1925 年 6 月 27 日）上，一位通讯记者写道：“在巴西，当我写作时，美国的煤炭标价为每吨 8.85 美元，而英国的同类产品标价为每吨 39 先令（合 9.32 美元）；美国方面的运费大约是每吨 4 美元，而英国则是 3.76 美元（合 15 先令 9 便士）。”

在这位记者写作的时候，英美两国货币的兑换率约为 4.78。在今天的汇率下，英国的煤炭价格（39 先令）将是 9.48 美元，运费则是 3.83 美元；而在去年 6 月的汇率下，煤炭价格就是 8.40 美元，运费则是 3.40 美元。

由此可见，在去年6月，我们每吨煤炭的标价低于美国45美分；而现在美国的每吨煤炭标价却低于我们63美分，而这一切仅仅是由于汇率条件的改善。在加拿大和整个南美地区，10%的汇率变动已使我们在煤炭方面的竞争地位同美国相比，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或者可以说，代价太高了。在欧洲，由于金本位的恢复，使英镑对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通货的汇价至少提高了10%，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如果没有金本位的恢复，那么现在的局面决不是这样①。

如果我们的煤炭业为了恢复一年前相对于外国的有利竞争地位而被迫降低煤炭价格的话，每吨的英镑价格必须降低1先令9便士②。

难道现在还能说，每吨价格下降1先令9便士同墨西哥湾暖流一样，没有给煤炭工业造成任何困难吗?就拿矿工工资来说，它在矿主所要求的整个价格下降中占据了很大一个部分。在去年的第一季度中，煤炭工业每吨净赚6便士；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却足以使其每吨亏损3便士。

(2) 除了矿区用以支撑坑道顶的支柱以外，煤炭工业几乎不消费任何国外产品。而且，工资支出构成了煤炭生产总成本中很大的一个部分。相比于国内其他行业，煤炭工业不得不以英镑的国外价格售卖其产品，而以英镑的国内价格购买所需物品。因此，提高前者而不提高后者的这种不成比例的做法，肯定会对煤炭工业造成不利的后果。

---

① 对法国和比利时货币汇率的提高已经超过了10%。

② 在煤炭咨询委员会表态之前，矿业协会会长的估计数字是1先令，但他没有指明这一数字借以比较的参照日期。

(3)上述做法不仅对煤炭工业的出口造成了直接影响,使煤炭贸易趋于不景气,而且也使那些大量使用煤炭的工业,如钢铁工业,在贸易上陷入萧条状态。

(4)对于煤炭工业来说,其本身就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目前的煤炭需求状况下,煤矿工人的数量太大了,因此煤炭工业迫切需要削减矿工的数量。然而,由于在煤炭工业内出现了局部化、地方化的趋势(例如,南约克郡的繁荣是以南威尔士和诺森伯兰地区的牺牲为代价的),整个工业实际上反而吸收了大量的新的劳力。对目前事态的发展局势,也许有几种解释。但是,唯一的可能补救措施只能是利用发展其他行业来吸纳煤炭工业的富余劳动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要条件是其他行业必须正处于繁荣扩张状态。而目前实施的信用限制政策却正好阻碍了其他行业的扩张势头,从而间接地造成了煤炭工业的困难局面。

因此,到目前为止煤炭工业存在的困难虽然也出于一些其他缘由,但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正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它使煤炭工业遭受的损害超过了任何其他行业。另一方面,大家认为煤炭工业前景非常黯淡也是事出有因的,这是由于它另有困难,从而已经削弱了它的抵抗能力,因此当遇到了新的困难时,它就再也没有余力去抵抗了。

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煤矿业主提出建议,要求不管生活费用是否有所下降,必须降低工资以弥补亏损,也就是说,要降低矿工的生活水平。他们之所以提出这种以牺牲矿工利益为代价的建议,只是为了适应当前的局势。可以说,他们对于这种局势的形成,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况且,也是无法控制的。

这类建议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我们处理经济事务方式的严

厉批评，因为这样的建议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合理的，虽然要求煤矿业主承担损失，似乎也同样不合理，除非以这样一个原则为依据，即承担风险的应该是资本家。如果矿工可以自由地从本行业转到其他行业，或者当他们失业或所得过少时，可以另谋他就，转变成为面包师、砖瓦匠或铁路搬运工，情愿接受低于这些行业现行的工资水平，那就成了另一问题。但是众所周知，他们并不是如此自由的。就像在过去经济过渡时期中的那些受害者一样，矿工们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忍受饥饿，要么屈服于现实。屈服就意味着牺牲，而牺牲的果实却为别的阶级所得。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力和竞争性工资水平的有效流动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这个原因，我还不能肯定他们目前的处境在某些方面一定好于他们祖父那一辈。

为什么偏偏要让煤矿工人的生活水平低于其他工人呢？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是一群懒惰、无所事事的家伙，工作不认真，工作时间也短。但是，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比其他人更为懒惰、更为无所事事呢？

以社会公德为准则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降低矿工们的工资。他们是贾格纳特①式经济的受害者。为了满足一些市参议员们迫不及待的焦急心情，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采取了所谓的“基本调整”来跨越 4.40 美元与 4.86 美元之间“有限鸿沟”，而矿工们正是这类政策的牺牲品。为了保持金本位制的稳定，肯定还会需要他们（随后还有别人）做出“有限的牺牲”。这就是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在此政策下，陷入困境

① 印度教主神毗瑟拏的称号，其喻义为不可抗拒或摧毁一切的力量。——译注

的，煤矿工人是第一个，但——除非我们运气特别地好——不是最后一个。

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处于两种经济社会理论的十字路口。第一种理论认为，应当在各阶级间，根据“公平”和“合理”的原则来确定工资。第二种理论——属于那种贾格纳特式的经济理论——则认为，工资的确定应当取决于经济压力，或者称为“严酷的事实”，认为我们庞大的经济机器应当勇往直前，在前进道路中只能顾及整体的平衡，至于对单个集团偶然造成的后果，只好置之不顾。

在金本位制下，依靠的是纯粹的时运，信赖的是“自动调整”，对于社会的细枝末节，一般是置之不顾的；而对于位于社会经济机器顶部的那些人来说，这种制度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或偶像。他们对社会细节漠不关心，对前途则抱有模糊的乐观信念，并且认为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态。在我看来，他们的这种态度是非常鲁莽、轻率的。从过去的情形来看，十有八九的确没有出现真正严重的事态，只是某些个人或集团受到了一点损害。我们过去所依据的经济原则建立在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假设基础之上，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却正在迅速地与这类假设相脱离，因此如果我们继续把这种经济原则运用到现实社会中，那么我们就得冒第十次危险。这种行径简直是愚蠢透顶。

五、有没有补救办法？

在1925年年度预算案中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是我们工业发生困难的真正根源，除非改变目前的政策方针，否则不可能

提出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新建议。不过可供政府采用的仍然有几种办法，其中某些办法相比于其他而言，更为可取一些。

一种办法是继续大力实施所谓“稳健”政策，目的在于在传统的方式下进行“基本调整”，为此需要进一步限制信用，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在秋季进一步提高银行利率；这样，通过扩大失业以及利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武器，来压低货币工资。主张这一办法的人们坚信，当这一过程结束之时，生活费用也将会降低，从而使实际平均工资仍然恢复到以前水平。这一政策如果得以贯彻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取得成就的；虽然由于它引起的变化不是均等的，比较强有力的集团会以牺牲弱者为代价而获取利益，因此将遗留许多不公平问题。在利用经济压力的方式下，受到打击最大的是那些比较脆弱的行业，它们的工资本来就很低，结果将使不同行业集团之间现有的工资差距趋于扩大。

问题在于公众舆论对于这样一个政策，将容许它进展到何种程度。尽管通货委员会的成员，在扩大失业问题上，自有一套理由来加以支持，然而要由政府公开承认实行这一政策，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通货紧缩所产生的影响却有可能不被觉察。通货紧缩即使起端甚微，一旦开始以后，便具有过程中的累积性效果。如果企业界内普遍出现了悲观预期心理，货币流通速度将放慢，这时银行不必提高银行利率，也不必降低其存款，通货紧缩仍然会进一步发生作用。由于公众通常所了解的，只是某些个别起因而不是一般的实质性起因，因此会把萧条现象归因于各种具体因素，如劳资纠纷，因为它往往伴随萧条而发生，如道威斯计划、中国、大战不可避免的后果、关税、高税率，总之除却一般货币政策以外的世界上发

生的任何情况，然而正是这类政策导致了整个事态的发展演变。

此外，这一政策并不一定非要在轮廓分明的方式下进行。英格兰银行可以暗地里偷偷地实行信用限制，而鲍尔文先生（在我们的爱戴下，他已经继承了维多利亚女王原有的地位）方面则相机行事，以社会慈善的名义对信用限制所造成的后果加以缓和，提出一系列其实并不合理的补助办法。鲍尔文“女王”的仁慈心肠可以使我们忍住心中的怒火，而这种将会导致严重后果的勾当却在幕后继续进行。由于预算的限制，这类补助在数额上决不会很大。最终，除非社会出现了剧变，否则“基本调整”将如期实现。

有些人也许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趋向处之泰然，而我却不会这样。这类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造成社会收入的巨大损失，而且当它结束之后，还会残留许多不公道的社会问题。但世事是难以预料的，意外的情况也许可能出现，而我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正是寄托于这种可能性之上。它使我想到了另一种补救办法。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促使所希望的事情实现呢？

在目前的局势下，有两点可以转变成为对我们有利的因素。一个是关于金融方面的——如果国外的黄金价格下降，那么就无须使这里的工资水平作出任何重大变动。另一个是关于工业方面的——如果生活费用首先跌落，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要求工人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因为到那时情况非常明显，降低工资的意图并不是为了降低实际工资。

最初宣布恢复金本位的时候，许多权威人士认为我们把前途寄托在美国价格的提高上。然而直到现在，这种情况并没

有发生①。不仅如此,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实际上是在促使美国价格稳定,而不是促使它上涨。事实在于伦敦的利率较高,从而美国的银行愿意向伦敦出借资金,因此造成纽约的利率比不存在这一情况时为高,使世界市场的残余黄金剩余,不流向纽约而流向伦敦。由此可见,我们的政策正好解除了纽约在低息贷款和额外黄金存量方面的压力,否则,这些压力会迫使那里的价格上涨。伦敦与纽约两地利率之间存在的不正常差异,甚至使金本位不能按照其规律发挥应有的作用。根据正常原则,当A的商品价格高于B时,黄金将由A流向B,从而使A的价格趋于下降,而B的价格趋于上涨,最终B的价格上涨趋势与A的价格下降趋势将在中途会合。

目前,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却阻止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因此我建议,应该采取相反的政策方针,不妨降低银行利率,停止实行信用限制。如果由于实施这一措施,使现在威胁伦敦金融市场的"有害的"美国货币开始返流美国,我们不妨用黄金来偿还,或者,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动用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存放于纽约的美元贷款准备金来偿还。在我看来,相对较为可取的是使用黄金,因为所需费用较低,而且黄金的实际流动,对美国的价格水平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我们在黄金库存方面的规定,使黄金存量的3/4根本发挥不出任何作用②。如果能把此规定修改一下,我们就可以减少6000万或7000万

① 依我之见,在这方面我们还不必绝望。美国价格的趋势现在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只需一根火柴,就足以使美国潜伏中的通货膨胀火焰燃烧起来。这一可能情况也是我们不必过于悲观的一个真正理由。

② 参阅本篇最后关于我们黄金储备的注解部分。

英镑的黄金存量，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任何不安，然而它却会使其他国家的情况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做法将使我们在美国有一笔随时可以动用的收支余额。试问，为了买进这些无用的固定黄金而支付 4.5 厘的利息，有什么意义呢？

与此同时，除非英格兰银行放弃信用限制政策，利用其他资产，例如国库券，来取代黄金，否则这样大规模的黄金流动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英格兰银行必须放弃利用经济压力和主动扩大失业的方法，来实现基本调整。但是，这一政策本身也许就会引起众多批评，认为此举把前途过多地寄托在对美国价格上涨的预期上。

为了应付这一点，我建议鲍尔文先生应面对现实，本着以下方针，开诚布公地同工会领导人合作。

内阁阁员们总是佯称现在的工资下降趋势与货币价值毫无关系，只要他们抱有这样的态度，工人阶级自然会把政府政策看作是对实际工资的蓄意攻击。如果财政大臣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货币政策与工资降低无关，就同墨西哥湾暖流与工资降低无关的情形一样，那么可以断定，目前降低工资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一次攻击。只有当政府当局承认的确存在我在这几篇里所指出的病源时，他们才能在公平和合理的基础上，获取工会领导人的合作。

只要政府当局承认当前问题主要是货币问题，他们就可以对工人这样说：

"这并不是对实际工资的蓄意攻击。我们把英镑价格提高10%的含义是货币工资必须降低 10%，但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当调整过程结束之后，生活费用也将降低 10%。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将不会有多大的下降。要降低货币工资，有

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是使用经济压力，通过限制信用来扩大失业，直到工资被迫降低时为止。这是一种可恶的、有害的方法，因为它对强者和弱者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均等的，而且在进行中难免要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无谓损耗。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协议，实行同一标准的工资降低，但前提必须是，让工人明白协议后的实际平均工资同本年第一季度相比，不会有任何降低。实际困难在于货币工资与生活费用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只有货币工资下降以后，生活费用才会下降。因此为了降低生活费用，必须首先降低货币工资。因此我们不妨在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整个就业范围内，货币工资一律降低（比方说）5％。如果经过一段时期，生活费用并没有下降，因而使工资的降低得不到补偿，则工资降低的办法就宣告无效——我们能否在这一尝试上达成一致协议呢？"

如果鲍尔文先生提出这样的建议，工会领导人也许会立即询问，除工资外，关于其他货币支出，如租金、利润和利息，他准备如何处理。关于租金和利润，他可以这样回答，它们都不是根据货币确定的，因此以货币计量时，将随着价格逐步降低。不过令人头痛的是，租金和利润，同工资一样，富有粘性，下降的速度也许不会十分迅速，从而不能充分有助于整个转变的完成。至于债券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他却无法答复。因为降低价格的任何政策，归根到底总是有利于食利者，而损害社会其他人的利益。通货紧缩的这一结果，根源于我们现存的货币契约制度。总之，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应付工人方面的反对。目前也许只有一种粗略但却切实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对就业以外的一切收入征收附加所得税，每英镑征收1先令，直到

实际工资恢复到以前水平时为止①。

这种期望主动自愿地全面降低工资的建议，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此依我之见，我宁愿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外价格提高这一点上，也就是说，英格兰银行现有的政策应当有所改变。此外，我从米德兰银行7月份的《每月评论》获悉，该行高层人士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所有这些建议在实施过程中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是难以避免的。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政府采取的有关主动改变货币价值的任何计划，总会引起以公道和合适名义提出的反对意见。这些建议只能缓解由错误政策所引起的不良后果，但无法消除错误本身。有些悲观人士认为受到攻击的目标不仅仅有货币工资，而且还有实际工资水平，对这些人来说，这些建议是不会得到赞同的。我们目前的政策是利用紧缩信用的手段来主动扩大失业，目的在于通过对个人和某些行业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强制性调整；但由于一些其他原因，这时恰恰需要放宽信用。我之所以提到上述这些建议，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举国上下知道现在所进行的是这样一种政策，是决不会答应的。

① 如果价格最终不再上涨，这种征税办法仍然不能避免债券持有者从中获益这一事实。债券持有者这类有得有失的情况，是不稳定货币本位制下一个无法避免的特征。不过由于价格运动的长期趋势是向上的，因此归根结蒂，债券持有者并不是从此制度中有所得的，而是有所失的。

附 录

一、英国黄金储备的现状

1925年7月15日，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存量接近于1.62亿英镑。银行纸钞和通货金票的有效流通总量约为3.87亿英镑。为了保障货币的正常流通，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必须持有价值1.2亿英镑的黄金存量。因此，我们可用于出口的自由黄金存量，只有4200万英镑，也就是总体的1/4左右。而且由于我们不可能太接近于法定最低点，实际上可以自由支配的黄金数量大约只有原定的1/2，即2200万英镑左右。我们库存的1.2亿英镑的黄金仅仅是满足了法律规定的要求，但就其他目的而言，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二、关于以外国货币衡量的英镑价格上涨的说明

人们通常认为，金本位的恢复是影响英镑对美元汇率唯一的或主要的因素，有鉴于此，我列举了自去年6月以来各主要金本位国家的英镑价格的变化情况（见下页表）：

自 1924 年 6 月以来英镑价格上涨的百分比

1925 年 6 月中旬

国别	%	国别	%
意大利	31	瑞典	11
法国	27	巴西	9
德国	13	荷兰	5
日本	13	中国	3
美国	12	瑞士	2
捷克斯洛伐克	12	印度	−6
比利时	12	阿根廷	−10

从表中可以看出，印度和阿根廷国内的英镑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虽然这种与总体趋势相反的价格运动能够提高这两个国家作为消费者的购买力，但从根本上说，并无多大的帮助，因为它们都不是世界工业领域的有力竞争者。上表还表明，去年的汇率变动使我们的工业竞争地位进一步恶化，与主要对手相比，竞争力下降了 12%，甚至更多。由此可见，我在本文中列举的 10%，还是对目前情况的一个低估数字。

第六篇　借助关税来缓解当前严重的事态[①]

一、关于实行财政关税的建议
(1931年3月7日)

通过增加国外投资、添置国内所需设备，我们的资本财富继续处于增长状态之中；我们中的大多数，生活依然如故，甚至还要比以前好一些；同时还对为数众多的闲散人员给予失业津贴，每个失业者的津贴额，比世界上多数地区全力工作者的收入还要多。然而另一方面，却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① 在金本位垮台以前的几个月，情形已经很明显，除非采取特殊措施来缓解当前问题的严重程度，否则这一制度的崩溃是无法避免的。我曾经不顾一切地提出过种种建议，其中之一就是有关关税方面的建议，并主张，如果可能的话，可与对出口的奖励结合进行。然而斯诺登先生却是异乎寻常地愚昧和顽固，对于与他意见相左的任何替代办法，他都一概反对，以至于使我们陷入了悲惨境地。直到最后自然力量发生作用时，我们才脱离了困境。

1/4的工厂处于停工状态,1/4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试问,这难道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吗?如果我们创造财富的潜在力量并不比我们一向所具有的强大,则这不仅仅是一个矛盾状态,而且也应该是一个不可能有的状态。但这种较以往更强大的潜在力量的确存在。从原因上讲,这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我们工业技术效率的不断提高(我相信,人均产出量,即使同最近的 1924 年相比,也提高了 10%);女性经济产出量的增长,以及目前处于生产岗位上的人口所占比例的扩大。此外,进口品价格相对于出口品有所下降,也是一个促成因素。结果是我们只利用了现有工业力量的 3/4,却生产出来与若干年前动用全部力量时同样多的财富。但是我们若能想出一些办法,利用现在 4/4 的力量,那我们将会是多么富有啊!

由此可见,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在于缺乏物质手段来支持我们舒适的生活水平,而是在于我们相互间买卖活动所赖以存在的组织和结构方面存在着缺陷。

对于这一缺陷,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根据我们的性情,可以产生这样的反应,也可以产生那样的反应。一种是下定决心,要利用我们闲置的生产力量,保持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要扩张、要发展,而把恐惧、乃至谨慎的心理都束之高阁,不予理会。另一种是根源于恐惧心理的本能的收缩。究竟有什么理由要畏缩不前呢?

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是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即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由个体企业家自行决定,他则希望从中获取合理的利润,或者至少要避免实际的损失。作为他生产动力所必需的最低利润,也许只占生产总值的一个极小部分。但是若把这一部分从他那里拿走,则整个生产过程将停止。不幸的

是，现在所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价格相对于成本的下降，加上高税率所引起的心理影响，已经摧毁了必要的生产动因。这就是目前混乱状态的根源所在。因此，进一步恫吓或困扰企业家的做法，也许是非常不明智的。然而一种向前的政策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当一个人发觉自己有入不敷出的危险时，就会谨慎小心，神经往往备受煎熬，此时在一些似是而非的类比影响之下，他往往会成为紧缩论调的支持者，虽然这个论调最终对自己是不利的。

此外还有一个造成神经紧张的因素。我们正在遭受国际局势不稳定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由于国内较高生活水平的影响，我们在出口贸易方面的竞争力，有了显著的减退。同时，由于国内企业无利可图，投资者宁可把资金投放到国外。另一方面，高税率也在同一方向上产生着有害的影响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其他债权国不愿意出借资金（这是本次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从而使伦敦的财政负担过于沉重。这些都是对向前政策不利的明显论据。因为国内就业的增加、生产活动的扩大，将导致入超额的增长，而政府的大规模借款行为，有可能吓得投资者不敢提供贷款（在他们目前的心情下）。

因此，实行扩张政策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引起政府举债，加重预算负担，扩大入超额度。这一政策的反对者指出，目前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信心、税收负担沉重以及国际局势不稳定，而这一政策的实行则会使这些方面更加恶化。

在这一点上，反对扩张者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我们不但应当打消所有的扩张念头，而且应当断然实行紧缩政策，也就是说，要削减工资，大量节约现在的预算支出；另一派，如斯诺登先生，则抱着否定一切的态度，他们既不喜欢紧缩的想

法(以上面的意思来解释),同时也不喜欢扩张的主意。

然而,消极政策却是所有对策中最具危险性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存在着一个越来越大的疑问,即我们的生活水平是否能够支持下去。对于100万的失业人口,我们当然能够支持下去;当失业为200万人时,我们也许还能勉强对付;但如果有了300万失业人口,我们可能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说,在消极政策下,听任失业逐步增长,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生活水平。如果我们不能未雨绸缪,做好长远打算,那么最终我们将一筹莫展。

我必须重复一遍,失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雇主无利可图。利润的损失可以归结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除了走向共产主义这条捷径以外,要解决失业问题,只有让雇主能获取适当的最低利润,除此别无良策。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产出需求,这是扩张主义者的惯用手段;另一种是降低产出成本,这是紧缩主义者的治疗方案。两者都想药到病除,相对而言究竟哪一个更好呢?

削减工资从而降低产出成本,并节省预算支出,的确可以提高国外对我们产品的需求(除非由此引起国外效仿实行类似的紧缩政策,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或许将引起国内需求的下降。因此普遍削减工资使雇主获取的利益,实际上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显著。每一个雇主,对于降低他自己支出的工资,只看到了对他自己产生的利益;但同时他的顾客收入降低了,他的竞争者也同样会享受降低工资的好处,对于这些方面的后果,他却熟视无睹。由于紧缩政策将使某些收入阶级获取极大的利益,而使其他阶级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必将造成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引发强烈的抵触情绪。正是由于这些

原因,使得紧缩政策真正有效的实际可能性变得非常渺茫。

然而对扩张主义补救措施的异议——我们国际地位的不稳定、预算状况以及信心的缺乏——不可能就这样处理。两年以前没有担惊受怕的必要,而今天情况则不同了。惊吓这些企鹅,使它们带着腹中的金蛋展翅离岸而去——是不明智的。一项足够激烈的具有效力的扩张政策也许会迫使我们放弃金本位。此外,两年以前的问题主要是一个英国的问题,而今天则主要是一个国际问题了。就目前来看,仅国内的治疗是难以奏效的,重要的是实行国际范围内的治疗措施。我从英国的领导地位中看到了医治国际萧条的最大希望。而英国若想重新取得领导地位,它必须是强盛的而且被相信是强盛的。我认为这并不难,因为伦敦今天的实力为外国舆论所低估,使这种观点来一次突然扭转的时机已经成熟。我是不赞成恢复金本位的,在这个问题上的不祥预言不幸已经部分应验,因此,我认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现有的外汇地位,使我们重新占有对世界的后继乏人的金融领导权。从公认的实力而不是从软弱的立场出发来说,唯独英国才有当此重任的经验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以国内就业利益为出发点呼吁实行扩张政策的人们,应当在慎重考虑之后,再作决断。我经过仔细思考以后,提出了以下结论。

我的意见是,扩张政策虽然效果是非常好的,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却不一定安全可靠,甚至也不一定切实可行,除非同时采取一些其他措施来抵消它的危险性。这里我提醒读者注意一下它的危险所在,即贸易平衡方面的负担、预算方面的负担、以及对信心的影响。即使扩张政策能大幅度地提高利润水

平和就业量，在预算、信心方面最后的净影响是有利的，而且也许是非常有利的，也只能认为扩张政策最终将证明自己是合理可取的。但这是最后的结果，最初的影响也许并不是这样。

有什么措施可以用来抵消这些危险后果呢？一个值得采取的可行措施是，首先改变目前严重滥用失业津贴的现状，暂缓执行预算内关于社会公用设施的一切新支出；然后把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扩大就业计划方面的需要。但是还有一个主要措施，在我看来，应当是任何明智的财政大臣所必须考虑执行的，即不论他对保护性政策的看法怎样，必须切实实施财政关税政策。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有利的，而且是适宜的，所以毫无疑问，不会再有其他措施比它更好了。我设想中的关税不包括差别保护税，但所包含的范围应力求广泛，可规定一种统一的税率，或者规定两种统一的税率，两者分别适用于范围广泛的商品种类。与出口有关的进口材料，税额应予以部分减免，至于构成出口产值重要部分的原材料，如羊毛和棉花，则应免税。财政税收总额预计相当巨大，应当不低于5000万英镑；可能的话，甚至可以达到7500万英镑。具体来说，对一切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应一律征税15%；对一切食品和某些原材料，应征税5%；至于其他一些原材料，则予以免税①。对于以上税率的规定，我是经过一番考虑的，我认为它对生活费用的影响并不很大——不会大于目前月与月之间的价格波动幅

---

① 在随后的一篇文章里，我承认，根据上述规定的关税税率，恐怕不会取得那样巨大的收入额，看来4000万英镑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估计。

度。不仅如此，任何可以想像到的解决失业的补救办法，都会造成价格上涨的后果，况且实际上这也的确是我们想得到的结果。同样，在考虑了按一般简单方法计算的出口折扣以后，对出口品成本的影响是非常细微的。此外，万一世界价格又恢复到1929年时的水平，则应取消这一关税。至于自由贸易主义者方面，根据其宗旨，他们应当会同意这一决定的。

与其他任何可供我们采用的方法相比，这一措施具有独到之处，即一方面它可以解除预算方面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恢复企业界的信心。如果有人认为在不借助财政关税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拟定出一个明智而又审慎的预算方案，那我要说，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但这还不是它的唯一优点。它能够促进进口国生产进口替代产品，因而会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它还可以解除贸易平衡方面所面临的压力，从而可为支付扩张政策所必需的额外进口增量，以及伦敦给予贫困债务国的财政贷款，提供一笔迫切需要的资金。财政关税的实行限制了某些商品的进口，从而掠夺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购买力。通过增加进口、提供贷款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在另一方面恢复这些地区的购买力。有些不切实际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也许会宣称，进口关税对出口产生的不利影响，将使所有上述想法尽成泡影，但事实上却并不是这样的。

自由贸易主义者可能坚定不移地认为，关税收入是我们紧急备用的干粮，只能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作一次性使用。现在紧急情况已经出现了。凭借喘息的时间和由此提供给我们的财政余力，我们可以拟定一项国际国内的政策和计划，以便向紧缩主义精神和恐惧心理发动进攻。

另一方面，如果自由贸易主义者拒绝这些权宜之策的忠

告，那么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使现任政府四分五裂，代之而起的新内阁，在缺乏信心的混乱状态下，必将全力执行十足的贸易保护主义纲领。我并非不习惯于居于少数派地位，但是这一次，我却相信 90%的同胞将赞同我的观点。

二、金本位取消前夕

（1931 年 9 月 10 日）

整个国民的精神力量正在被引入歧途，除非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刻更进一步地集中心智，分析当前问题的实质，否则严重的困难将降临到我们头上。

目前全国、地方以及个人都不顾一切地把眼光盯在"节俭"这个主意上，而"节俭"就意味着要采取消极措施，对于促使生产力转化为实际生产活动的开支，一概拒绝给予。如果我们把"节俭"作为应尽的职责而大力提倡，也许将产生非常可怕的社会影响，以至于使我们国民生活的整个系统发生动摇。

在 5 月份报告提出的节俭方案中——在一般原则上它是否适用可行，这里暂且忽略——所有列举的条款几乎都会毫无疑问地导致失业的增加、企业利润的降低以及国家岁入的减少。我曾计算过，节俭 1 亿英镑将会削减预算赤字，但净减额不会超过 5000 万英镑。如果认为这样的节俭方案，对于需要救助的失业者人数或者现行税收收入，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那简直是自欺欺人——除非我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国外金融家的利益而故意伪装预算平衡。

假设我们把一切形式的"节俭"措施付诸执行，从逻辑上讲，最终我们将获得预算平衡，因为收支双方都将等于零。由于节俭的缘故，我们都相互拒绝购买彼此的劳务，结果是我们

大家都奄奄一息、坐以待毙。

首相曾经说过，现在就像又来了一次战争一样，对此，许多人深信不疑。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战争期间，制止一切可以暂缓的支出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可以转移资源用于无休止的军事需求。但现在我们节省资源作什么用？难道非要让人站到街道的角落里，靠救济金过活？

目前，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员，而另一方面却有各种类型的资源闲置。在这个时候实行节俭，从国家立场上看，只有一点用处，即可以减少我们对进口品的消费。至于其他方面，它的效果则完全体现在失业、企业亏损和储蓄减少上。就是以减少进口这一点来说，这也是一种非常间接、浪费的方式。

如果节俭的结果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减少了政府雇员的收入，致使受到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那些人无法购买同以前那样多的进口食品，则整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缓和。但这不会占到总节俭额的20%，其余的80%无形中都被浪费掉了，要么成为单纯的亏损转移，要么由于英国国民互相拒绝购买劳务而造成失业。

我所说的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呼吁实行节俭计划，但是我非常怀疑，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对由此产生的真正后果有哪怕是一点点模糊笼统的概念。

我并不否认存在预算问题。恰恰相反，但我认为预算的目前状况主要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而节俭本身不能消除这些起因，反而会起到恶化作用；因此若想单纯从节俭计划着手解决预算问题，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困难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很大程度上可以归

因于世界经济萧条；直接起因是财政当局高层人士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轻率和鲁莽；初始缘由在于我们恢复金本位时，对由此将引起的困难，没有一点点本质上的认识。如果把我们目前的问题说成是预算问题，就跟视而不见德国的战后赔款，而把德国问题也说成是预算问题一样，令人可笑。

关于世界经济萧条，就目前来看，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丧失了获取国际领导地位的力量，而在去年5月，我们似乎获得过这一力量。此外，当局在国际银行业务方面的工作也欠妥当，由此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时无法挽回的。我们面临的选择只能是，对于外汇的现有金平价，要么继续坚持，要么放弃。

有关当局最终决定坚持不变，之所以如此，其中的原因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并不赞同。因为这一决定是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下做出的，对于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条选择道路，它根本没有沉着冷静地加以考虑。当局高层人士对于采取另一条途径时会产生些什么后果，曾有所分析预测，但这类分析在理性讨论中，连10分钟的时间都不到。

现任内阁阁员们，在过去的十年间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但其中大部分都令我们追悔莫及；我相信，这一次我们最终仍会对这一决定感到懊悔的。

然而维持现有金平价并不是当前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已经不惜一切代价，决定继续维持金本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执行这一决定，除明显需要筹集一笔外债以应付眼前急需外，到底还应当做些什么？对此，内阁和公众看起来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而借债的结果，无非是把原来以英镑计的借款，用以法郎和美元计的借款来代替。但我们不可能永远依

靠外债。问题的其余部分主要跟改善当前在收入账户上的贸易差额状况相关联。我认为，这才是内阁应当加以考虑的。

在这一点上，可能采取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种是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它通过直接措施来限制进口（可能的话，同时实行出口补助）；另一种是在国内全面削减货币工资。如果我们拒绝货币贬值，那么最终我们也许不得不同时采取这两种办法。

但眼下的问题是，应当先尝试哪一种办法。从后一种方法来看，它若是充分发挥作用的话，必将引起工资的猛烈降低，导致社会公道和实际执行两方面出现非常困难的、也许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而限制进口的措施则温和得多，所以如果不先试行前一种办法，那简直是愚蠢透顶了。

碰巧前一种办法还有一些别的重大优点。它不仅能够缓和外汇方面的紧张状态，而且相对于其他任何单一措施，它能够更为有效地促使预算保持平衡；此外，如果我们想实际增加企业利润、改善就业状况以及提高企业界的精神面貌和信心，则这是可供我们采用的唯一征税方式。

最后，据我了解，它是能获得民众舆论广泛支持的唯一措施。据可靠报道，前任内阁中有三对一的比率赞成实行进口关税，现任内阁似乎是四比一赞成；只有下一任内阁对此是一致赞同的。但现在的时尚是讲究牺牲，于是在自我牺牲的精神下，我们作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新发明，这就是所谓的“国家主义”政府，其基本宗旨是，只要此政府存在，关于何者为解决当前困难最妥善办法这一点，每个成员同意放弃自己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货币贬值是一个适当的补救办法，但国内还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党以此为行动方针；若排除这个办法，则我们还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是冒险发展国内事业，因为这总比被迫失业好些。

第二条路是普遍削减工资，为了顾及社会公道，对于其他的货币收入者，也应尽可能地采取这一措施。

第三条路是严格限制进口。

如果我对目前局势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所谓的“国家主义”政府实际上根本不准备采取上述三种办法。他们的政策目标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使更多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希望生活水平降低的结果，能部分地对进口支出产生影响。

不采取直接限制进口而非要选择这种方式的想法简直是荒谬绝伦的。或者他们想通过恶化失业者的生活水平，同时确保失业人数在300万以上的手段，来达到削减工资的目的。难道这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吗？

因此，为了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如果这种结果的确是人们所期望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采用直接的方式，而不是争取那些无端浪费的措施。现在，即使是内阁阁员们，也肯定会对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方针产生疑虑。

三、金本位取消之后

（1931年9月29日）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劝告自由党人①和其他一些人士，建议他们实行普遍的财政关税，以此来缓和由国内外货币成

① 我所结识的主张自由贸易的朋友们，并不都是像我以前所想像的那样抱有偏见。当财政关税已经不再需要的时候，他们当中却有许多人赞成这一措施。

本之间明显差别所造成的后果。但上周发生的事件，使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英镑的现有金价下，从许多方面看，英国的生产者也许是处于世界上成本最低者的行列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不能若无其事地听任事态发展下去了。只要通货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就不可能在关税问题上进行理性的讨论。因为，除非我们对与黄金相联系的英镑价格将来可能的水平有更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除非我们知道有多少国家准备效仿我们；否则，关于我们竞争地位的未来走向，就无从谈起。

请允许我声明一下，目前应当关注的不再是关税问题，而是通货问题，只有后者才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它现在还是一个具有超党派特色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政党对此提出过明确的看法。因此，它适宜作为非党派问题来处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非常不适宜与大选发生牵连。通货问题为我国恢复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提供了绝佳机会。我们或许领导整个大英帝国以及世界半数以上其余各国紧随着我们的步伐，从而使伦敦在稳固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其金融主导地位。如果整个国家沉溺于这个问题的纠纷争执，而把另一个迫在眉睫的、至关重要的通货问题置之不顾，将是错误的、愚昧无知的。我们应当全心全意、共同努力，为我们自己和世界其余各国，设定一个健全的国际通货政策。若有人认为没有这样一个政策，也可以重现昨日的繁荣景象，或者认为关税政策可以取而代之，那简直是异想天开！等到通货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坚实的基础上，重新回到保护关税和其他国内问题的讨论。到那个时候，才真正是大选的适当时机。

第七篇 金本位的结束

(1931年9月27日)[①]

我们终于摆脱了黄金枷锁的束缚,英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人不欢呼雀跃的。我们感到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一些有理性的事情了。不切实际的浪漫局面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探讨一下,怎样的政策才算是最佳的选择。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最终给我们带来巨大灾难的金本位,在当初决定实施时,却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拥护。不过惨痛的经历也使我们意识到不能再使用人为手段,强迫通货高出其实际价值,而这一决定对

① 1931年9月21日,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

英国的工商业非常有利。

关于这一决定，内部意见过去之所以不能统一，主要是由于各人的观点不一致。难以决定的是有关道义的问题。伦敦当局认为按照已有的币值，已经从国外接受了大量存款，因此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应当尽一切力量来维持货币价值，即使由此使英国背上难以承受的重负，也在所不惜。那么我要问，在何种程度上，我们才能名正言顺地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呢？这本身就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目前局势的发展已成定局，我们已经摆脱了过去的痛苦磨难，至于满足道义上的要求，根据整个世界的判断，可以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可以问心无愧。因为我们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废除金本位的。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英格兰银行已经支付了价值 2 亿英镑的黄金或其等价物，大约相当于伦敦所有国外债权的半数，而此时，伦敦向国外出借的资金则大部分被冻结。我们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相信没有一个银行家能比我们做得更多了。伦敦当局只好在废墟之上重建河山，当然，它的信誉丝毫没有损伤。为了维持信誉，它几乎使英国的商业完全处于停顿状态，这种冒险行为，已经近乎于唐·吉诃德式的充满幻想的、不切实际的、愚蠢的侠义行径。

这就难怪，在解除了金本位的束缚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丝经济复苏的曙光，证券交易价格扶摇直上，奄奄一息的工业又活跃了起来。因为英镑汇率的降低——比方说，25%——所产生的效果，就等于以同一比率的关税来限制进口；但关税对出口没有帮助，或许还会产生不利影响。而英镑贬值 25%，却等于使出口获得了等量的补助，从而有助于国内生产者抵制进口。

在许多行业中，英国制造商的生产成本，以金衡量时，肯定是目前世界上最低的。我们获得这种有利条件的同时，并没有削减工资，也没有出现劳资纠纷。我们是在一种对社会各个部门绝对公平的方式下取得这一成就的，同时对生活费用也没有任何严重影响。由于我们总消费量的 1/4 是由进口提供的，因此英镑必须贬值 25%以上，才有可能使生活费用提高 10%。英镑贬值对任何人都不会造成严重的困难，它只是恢复两年以前的情况。同时它对就业将会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此后几天内，至于英镑汇率究竟会降低到何种水平，我不愿加以预测。但一时间也许将出现大幅度的降低，甚至低于冷静的核算者认为体现平衡时的水平。到那时，期望从英镑汇率降低中获利的投机活动，将与另一方面出于恐慌心理下的抛售行为，相互抵消。当局最初容许英镑汇率达到如此高的地步，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英镑汇率的未来变动趋势必然是逐步降低，最终达到一个较为真实的水平；但这一下降过程势必将削弱信心，使愚昧无知者产生一种印象，以为下滑趋势将无以挽回。那些对前途过分乐观的人，有可能因此而心虚，从而屈从于过度的悲观主义。但是悲观主义同乐观主义一样，都是没有根据的。英镑的平衡价格同一个月前并无两样。当英镑价格出现过度下降时，自然会有强大的力量来加以支持。根据我的判断，目前没有什么危险因素，会造成英镑价格的灾难性降低。

简而言之，以上所述只是在英国发生的影响后果。那么世界其他各国将受到怎样的影响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影响后果在各地有所不同。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某些债务国家，英国对这些国家，如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印度，过去曾出借了以英镑计

的巨额贷款，其到期利息也是以英镑计的。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英镑的贬值就等于我们在债款方面作出了巨大让步。它们此后在偿还以英镑计的债款时，就可以用数量比以前少的商品来偿还。英国来自国外的未付利息，每年大约有1亿英镑。就这一数额而言，英国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位非常通情达理的债权人。鉴于近来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酌量减少了所要求的债款数额。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一些工业国家，英镑贬值对这些国家所发生的影响，相对而言，比较复杂。由于我们现在在与这些国家的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因此我预计，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将效仿英国降低它们货币的原有含金量。有迹象表明，已经有许多国家不准备再用高昂代价来维持金平价。最近几天，加拿大、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已经转向我们。印度、英属殖民地，包括海峡殖民地，已经自动地紧紧钉住英镑。澳大利亚和整个南美洲也已经放弃了维持外汇金平价的努力。德国不久也会紧随我们之后，如果它对此行动迟缓，我将感到十分惊奇。可想而知，荷兰能听任荷属东印度群岛束缚在金平价上，坐视那里的橡胶业和糖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吗？强烈的动机必将驱使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按照我们的方向行事。尽管由于通货紧缩，使我们遇到了困难，但毕竟还不是很糟。相比之下，大多数国家的困难要严重得多。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以及效仿我们的所有国家，将受益于价格的提高。但我们当中，却并没有一个会牺牲别的国家，而从中获取有利的竞争地位。因此在竞争上处于不利境地的，主要是那些依然保持金本位的少数国家，于是米达斯的噩运将降临到它们头上。由于它们出口商品时除黄金外不愿意

接受别的交易物，长此以往，其出口业必将逐渐萎缩以至于彻底消亡，最终，它们既不能享有对外贸易的顺差，也无法得到来自国外的存款。由于战争和战争协定的结果，使世界其余各国对这些国家欠下了大量的债务，它们则设置关税壁垒，阻止债务国以商品来偿还债款；同时它们也不愿向债务国出借贷款。它们已经吸纳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剩余黄金，结果，对于世界其余各国来说，要保持清偿债务的能力和自尊的荣誉，从逻辑上讲，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停止购买这些国家的出口品。只要金本位继续存在——意味着任何地方的国际商品价格必须保持一致——就必然会引起通货紧缩的竞争性活动，我们每个国家都力图使自己的价格下降速度比其他国家快，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失业扩大，企业亏损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

但是一等到金汇兑本位垮台，问题就解决了。由于法国和美国的货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增值幅度过高，使得两国的出口商无法向国外出售它们的商品。这两个国家如果继续坚持近来所实施的政策，只会造成出口业的困难局面，而不会产生任何别的结果。它们无意毁灭自己的出口业，解铃还须系铃人，也只有由它们自己采取必要步骤，才能有恢复的希望。此外，通货价值的提高，也必然给它们的银行系统造成严重困难。美国事实上是给世界其余各国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各国要想方设法，寻找一条不依靠它的小麦、铜产、棉花和汽车，而独立发展的道路。它提出的问题，也许只有一个答案，我们已经被迫找到了这个答案。

然而，以上有些过激的表述，实际上与我的本意完全是大相径庭的。我们所被迫采取的解决办法，虽然使我们缓解了燃眉之急，把紧张局面转移到了别的国家，但实际上这个办法对

无论哪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没有美国商业的复兴，就没有世界经济繁荣的希望。世界各国之间本身就是紧密相连的，和平和信心以及和谐一致的经济平衡，应该是唯一值得争取的目标。

我相信，上周发生的重大事件，在世界货币史上将掀开新的一页。我希望由此可以冲破国际间存在的似乎难以逾越的森严壁垒。我们现在需要共同进行亲切、坦率的协商，为我们的未来事业作出更好的安排。从去年 6 月起，美国总统似乎进入了睡眠状态。而在此期间，却有许多重大问题值得他关注。然而美国一直保持沉默，无动于衷，这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白宫，到现在似乎还没有消散。是不是我们找到的解决办法总是不够及时，总是来得太迟呢？我们是否可以邀集全世界 3/4 的地区，包括我们整个帝国的代表，请他们在英国同我们一道，设计一个能使商品价格保持稳定的新通货制度呢？或者，我们不妨考虑再度实施金本位，当然，有关内容必须彻底改革，新订条款必须精确、严密。关于这些条款应当如何考虑、确定，金本位各国是否有研究兴趣呢？

第四部分

政　　治



第一篇 俄罗斯一瞥

（1925 年）

前言

这些文章是 1925 年 9 月对俄国一次短暂访问的成果。我对那个国家及其语言一无所知，不过在一位翻译的陪同下，也多少接触了它的人民。这种场面出现在科学院——即从前在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的帝国学会的 200 周年庆典上，在那里我代表着剑桥大学。

这些文章不是以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的知识和深入的体验为基础的，因此得说并不是那么有根有据。就其价值而言，不过是一位观察者的印象而已。这位观察者并没有特意地打算以

他的偏见去歪曲他的见解，他只是尽其所能地传达是如何被俄国所发生的一切震惊的。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有时使用"宗教的"这个特征形容词作为对列宁的追随者的恰当描写。从我所接受的这个词的字面意义看，当这些文章出现在《民族》上时，我相信英国人会懂得我的意思；但在俄国，我猜想几乎没有人会赞同或理解对词语的这种用法。在布尔什维克们看来，使用这个词是愚蠢的和挑衅性的，不过是粗俗的攻击——就像我把坎特伯雷大主教称为布尔什维克一样（然而，如果他能够笃行福音戒律的话，那么也许真的配得上这种称呼）；因为他们都声称要成为对方。宗教、神秘主义、理想主义——这是列宁主义者的信条的一部分——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但是他们自己却是这个粗陋俗世的唯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虽然现在还没有，但谁又能保证，在不久以后的某一天，他们不会规定在无产阶级俱乐部的图书室中"宗教部分只能收纳反宗教文学"呢？

对于究竟为什么宗教在俄国人嘴里有如此恶劣的味道，这里有一个源自历史的也许是较好的解释。在俄国，语言上有一种一贯和通俗的用法，按照这种用法，仅仅只有高教会派神秘主义者才是宗教的，而那些试图在尘世中找出一条更好道路的人们则是非宗教的；跳舞的伊斯兰托钵僧的叫喊是宗教的，而在列宁山上的宣誓则是非宗教的；阿斯布丁是宗教的，而托尔斯泰是非宗教的。因此，让我预先解释清楚，当我说列宁主义也许被灌注了宗教狂热时，并非在暗示人民委员是高教会派神秘主义者、跳舞的托钵僧或身着便衣的阿斯布丁。

对英国读者来说这些解释很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在英国我们一直公认宗教有两个分支：高教会派与低教会派，神秘的

梦游者与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实利主义的利己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升华——在一种方式中自我融合在极其神秘的团体当中，而在另一种中自我则融合在对整个人类社会理想生活的追求当中。前一类的参与者也许忽视或者不理睬后者；而许多后一类的信徒则谴责前者与他们自己相似的痴心妄想和自我欺骗。一些伟大的宗教领袖同时属于这两类，这正是他们的独特之处。无论如何，当我提及宗教时，我的意思是将两者都包含在内的，而不仅仅是前者。

一些来自我们当代某些著名人士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我的解释。某些正被若干美国政客所竭力效仿的法国政治家，例如M. 蓬卡尔，对我而言他们似乎是当今世界上最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托洛茨基、肖伯纳先生以及鲍德温先生，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都可以说是最为虔诚的人士。我不会忘记托洛茨基曾经写道：

"在高度理想的名义下去接受工人的革命，不仅意味着拒绝它，而且意味着诋毁它。人类曾经在宗教、诗歌、伦理或哲学中痴人说梦般呓语过的所有社会幻想，都仅仅是为欺骗的目的服务，并对压迫视而不见。社会主义革命撕去了'幻想'、'崇高'以及令人丢脸的欺骗的面纱，在鲜血中洗去了现实的伪饰。革命强大到如此的程度，以至可以被合乎实际地、理性地、战略地和精确地推行。难道革命，正如今天在我们眼前史无前例的这一场，需要用罗曼蒂克式的爆发来调味，就像用兔肉酱来调配炖鲇鱼一样？"

因为托洛茨基也憧憬"一个使人们免于匮乏之苦和对每日面包的多余担忧的社会……一个使人们解放了的利己心——一种强大的力量——完全被引导到对宇宙的理解、改

造和改善上来的社会”。所以，托洛茨基本人并没有将手段与目的相混淆：

“革命本身还不是‘自由王国’，相反，它将‘必然性’的特征发展到了最高程度……革命文学不能仅仅为社会仇恨的精神所充斥，虽然这种精神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是创造性的历史因素，但在社会主义下团结应成为社会的基础，文学艺术应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基调。所有那些革命者目前为其命名而忧心忡忡的感情——它们已被伪君子和暴发户们糟蹋得所剩无几——例如无私的友谊、同情等，应成为社会主义诗歌的主旋律。”

人们有一种感觉，即这种思想观点不会以同等的真诚、严肃和感情力量出自譬如说墨索里尼先生，或者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之口。前者也许是个易于接受改造的流氓，而后者则是个灵魂不可能得救的正派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我不能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虽然常常是伸手可及的，但在远处却难以弄清。在去俄国之前，我对共产主义者抱有类似的怀疑。这部分是因为我的所思所想是来自我在此处的所见所闻，而在别的地方我一直对这些东西知之甚少。

一、什么是共产主义信仰？

要对俄国不抱偏见是极为困难的。即使持有公正之心，但对于毫无背景知识和经验，并且是如此陌生、变幻莫测和自相矛盾的事物，又该如何表达出真实的印象呢？没有一家英国报纸在俄国有常驻记者。对于苏维埃当局关于他们自身的说法，我们正确地持怀疑态度。但我们的大多数消息不是来源于有

偏见的劳动者代表就是来自于有偏见的流亡者。因此，对于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统治下的另一个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对在其中进行的试验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秩序，我们犹如雾里看花。俄国正遭受着经年累月的所谓“宣传”造成的痛苦，这种“宣传”由于其言辞虚伪而最终使远距离的交流难以实现。

列宁主义是两种事物——宗教和企业——的结合，而几个世纪以来，这两者在欧洲人的精神中是互不相干的。由于这种宗教是崭新的，因此让我们感到震惊；而同时由于其企业是从属于其宗教而非其他范围的，且效率极低，因此又让人轻视。

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列宁主义的威力不是从群众中取得的，而是来自于少数热情的皈依者。他们的热忱和偏执精神使得他们的力量跟宗教感情淡漠的人相比，一个抵得上 100 个。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其领导者的眼界要比他们的追随者更广阔些，前者也许能够诚心诚意地将新精神与那些在政治上多少有些玩世不恭的政治家们结合起来，这些政治家对反复无常的实验主义者可以笑脸相迎，也会冷眼相待；宗教使他们免受真理与慈悲的束缚，但对于事实和利害得失却并非视而不见，因此难免被指责为伪善（虽然这种指责是世俗的和教会的政治家们所关心的，但却是肤浅而无用的）。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它似乎驱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多彩欢快和自由气氛，而代之以信徒们毫无生气的呆板面孔。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它毫无公道和怜悯地迫害那些积极的反抗者。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它充满着传道者的热情和把教义发扬光大到全世界的野心。但是，如果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在伪善者领导下进行宣

传和迫害的少数狂热分子的信仰，那么毕竟是不多不少地，正是把它说成是一种宗教而不仅仅是一个政党；列宁是一个穆罕默德而不是一个俾斯麦。如果我们坐在资本主义的安乐椅上想要吓唬自己，那么不妨把俄国共产主义者想像成在阿提拉领导下的早期基督徒，他们靠宗教裁判法庭和耶稣传教团装备起来，强制施行新约全书记载的经济制度。而如果我们想在这张安乐椅上自我安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满怀希望地认为，由于这些经济制度与人性格格不入，因而不能为传道和军备提供足够的财力，并最终会失败呢？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这种新宗教是否部分地与现代人的精神相符合或相共鸣？它在物质方面是否是如此低效，以致使其无法生存下去？随着时日渐增，当狂热情绪被充分淡化和不纯洁情况有了增长以后，它是否还能够抓住群众？

对于该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那些对基督教资本主义或自我中心资本主义心满意足并且没有被诡辩遁词所迷惑的人将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们或者是已经有了一个宗教，或者是根本不需要宗教。但是，在这个时代有许多尚无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对任何真正新创的宗教，只要它不是新瓶装旧酒并且证明了自己的鼓动力，就必然会产生无法抑制的强烈好奇心。从俄罗斯——这个欧洲家庭中最年轻的儿子，青丝如云，漂亮而又鲁莽——所产生出来的新鲜事物，使得它与其西方已两鬓斑白的兄弟们相比，无论是离尘世还是天堂都更为接近一些。和它的西方兄弟们相比，俄罗斯晚生了两个世纪，还没有失去青春的气质，还没有耽于享乐、囿于习惯，因而还能够从家庭其他成员的中年人的幻灭颓丧中振作起来。正是这一新鲜事物，使得人们的好奇心愈加强烈。所以对于那些企图

从苏俄找到些好东西的人们，我是持同情态度的。

但是当涉及到实际的事物时，我们又作何感想呢？对于我来说，由于是在没有被宗教恐怖污染的自由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天不怕地不怕，红色俄国让我厌恶之处实在是太多了。舒适安逸与习惯势力能够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摒弃红色俄国的生活方式，但在思想上我同样不赞同这种教义。它不关心对日常生活的自由和安全造成了何种程度的损害，还故意使用迫害、破坏和国际斗争作为武器。其政策的一个特有表现是花费无数金钱，在国内每个家庭和团体内收买间谍，在国外挑拨离间制造麻烦，对此我怎能表示赞许呢？与其他政府的贪婪、好战以及帝国主义倾向相比，这一切不见得更坏，也许还更有意义一些，但这远远还不足以使我摆脱成见，改换门庭。它那本不容批评的圣经，是一本陈腐过时的经济学教科书，我知道它不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与现代世界毫不相关、格格不入，我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学说呢？它宁愿要田里的野草而不要禾苗，把粗鲁的无产者抬高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对于这样的教义，我又怎能采纳呢？后两者不管有什么样的缺点，毕竟是人类的精英，他们传播着一切人类进步的种子。即使我们需要一种宗教，但我们能够从红色书铺乱七八糟的垃圾中找到它吗？西欧的受过教育、正派而有理解力的子弟，很难在此找到他的理想，除非他经历过某种奇特而可怕的转变过程，改变了他的一切价值观。

然而如果我们就此止步，那么就将错过对这种新宗教的本质的认识。共产主义者可能会义正词严地回答说这一切都不属于他的最终信仰，而只是革命的策略。因为他深信两件事情：在世界上建立新秩序和以革命的方式作为达到此目标的

唯一手段①。这种新秩序决不能以革命时期的恐怖或过渡时期的贫困来评判。革命可以说是以目的来证明手段之正当合理的最高范例。革命战士必须抑制自己的人性，变得无所顾忌、冷酷无情，并忍受一种朝不保夕、忧患频生的生活——但这一切都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那么，作为世界上的一种新秩序，这种新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从表象上观察，知道得并不怎么清楚。有时按照其代言人的说法，它似乎仅仅是物质的和技术性的，在这一点上它正与现代资本主义意义相同。也就是说，似乎共产主义所最终要求的，也仅仅是成为像资本主义那样获取相同的物质经济利益的更为先进的技术工具，它将最终带来更多的农田产出，并更为严密地驾驭自然力。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宗教，而只是虚张声势以促进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也许会带来经济技术的改进，也许不会。然而，事实上由于我们阵营方面曾经指责这种经济制度的低效率，因此我怀疑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责难的反应，在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的心中，和人类前途有更多利害关系的，是别的一些东西。

在某一方面，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在模仿其他一些著名教派。它抬高普通小人物并使之无所不能，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但它还包含着另一个要素，这个要素本身也并不是新创的，然而它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一种新的背景下，也许会对未来真正的宗教——如果世上真有所谓真正的宗教的话——有所贡献。列宁主义是绝对地、明目张胆地反对超自然主

① 在此当我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术语时，指的是新秩序；而不是像英国工党在其政策实践中那样指的是革命，即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义的，它的情感与伦理的精髓集中在个人与社会对金钱的爱好的态度上。

我并不是说俄国共产主义改变了、甚或是企图去改变人类的本性，使犹太人比原来更少些贪婪、俄罗斯人的奢侈浪费有所收敛。我也并非仅仅是说它树立了一种全新的理想。我的意思是，它在试图去建立一种社会框架，在其中，原先影响人们行为的金钱动机的相对重要性将会发生变化。对各种行为的社会认同程度将会与以前有所不同，原先被认为是正常的、可敬的行为，会被认为是既不正常、也不可敬的。

今天在英国，一个有才能的、正直的青年想要进入社会时，将会在从政与经商的利弊得失间进行权衡。而无论是选择从政还是经商，社会舆论都会予以尊重。尽可能多地赚钱牟利，不会使社会对他的尊敬有所减少；相反，与把一生精力投入政治、宗教、学术或艺术相比，也许还可能获得更多的敬重。然而，在将来的俄国，一个正派的青年在步入社会时，决不应选择赚钱牟利的事业作为可能的开端，如果他执意为之，那就相当于一位绅士执意要成为盗贼或学习营私舞弊的歪门邪道。甚至现存社会对于爱好金钱最为赞同的方面，例如节俭、储蓄、努力获得经济上的安全以及个人和家庭的独立，虽然在道德上不被认为是错误的，却由于障碍重重、难以实行而不值得为之去耗费精力。新教义规定，人人都应该为社会工作，如果他尽职尽责，社会也会对他给予支持。

这种新制度并不意味着把一切人的收入都降到完全平均的水平——至少在现阶段不是如此。在苏俄，较之于其他人，一个有才干的成功人士拥有较高的收入，生活也过得要相对宽裕些。一个人民委员每周有5镑收入（外加其他各种免费供

应、一辆汽车、一套住房、剧院里的一个包厢等），日子过得很不错，但与伦敦的富翁相比却毫无共同之处。有成就的教授或文官每周有 6 镑或 7 镑的收入（除去各种捐税），其实际收入水平也许三倍于无产阶级工人，六倍于较贫困的农民。在农民中，有的人的收入是其他人的 3 倍或 4 倍。失去工作的人可以获得部分收入。但是在俄国的高物价和严格的累进税制下，以这种收入水平，没有人能够积蓄下任何值得积存的东西，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是艰难的。如此的累进税制以及征收房租和其他费用的方式实际上对每周的公开收入超过 8 镑乃至收入 10 镑的人是极为不利的。这里也不存在任何可以获得大笔进款的机会，除非冒与在别的地方进行贪污、贿赂一样的风险。贪污、贿赂在俄国并没有绝迹，甚至也不是稀有现象，然而任何被自己的奢靡铺张或本性所驱使而走上此途的人，都面临着被发觉的巨大危险以及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惩罚。

在现阶段，对于为牟利而进行的买卖行为实际上也并没有加以禁止。在政策上并不绝对禁止这些职业，但却使它们变得危险和不体面。私商是一种被允许存在的歹徒，他们没有特权，不受法律保护，就像中世纪的犹太人一样——这为那些在天性上特别倾向于这方面的人提供了出路，但对正常人来说却不是正当、合意的工作。

我认为这些社会变迁的结果，已经使人们对金钱的（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而当丝毫没有受到旧风气浸染的新一代成长起来后，很可能会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俄罗斯的人民，也许只是由于他们的穷困，追逐金钱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至少同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强烈。不过赚钱和聚财，对于接受了苏维埃统治的有理性的人来说，是不能像我

们一样把它们列入人生计划之内的。一个这样的社会，即使只是部分真实的，其变化也已经是翻天覆地了。

所有这一切也许会被证明只是“乌托邦”，或者对真正的福利是破坏性的，虽然，当以一种强烈的宗教精神来追求这一切时，也许不如以一种务实的精神来孜孜以求显得更为“乌托邦”。我们一向都把它看作是虚伪的、邪恶的，然而这种看法真的是恰当的吗？

二、苏俄的经济学

如果我们在把列宁主义看作是一种进行迫害和传道的宗教的同时，不把它作为一种实验性的经济技术来观察，那么将不能真正地理解它。关于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这种经济技术是不是效率低得足以带来可怕的灾祸呢？

苏俄的经济制度已经和正在经历极为迅速的变化，要对之进行准确无误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被广泛地使用。再没有比列宁更为坦率的实验主义者了，已经尝试过的每件事物都不曾触及过他信仰中的核心真理。首先，关于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非本质的，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例如，这一学说在一开始主张要废除货币的大多数用途，而现在这种观点则被看作是错误的。继续利用货币作为分配和计算工具，这与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协调的。政府也回心转意，认为对于留在祖国的旧知识分子、私商，甚至外国资本家，实行一种将有限的容忍与周期性的戏弄和折磨结合起来的政策，要比试图把这些成分全部一扫而光更为明智得多。这是由于他们相信，通过全面控制教育机构和对青年的培养，同时逐

步改善国营企业的技术，增加国家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不再需要这些异己分子来充当辅助者。因此，几乎所有接受过战前教育的旧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现在都在政府中服务，而且常常占据重要的、责任重大且薪水较高的职位。私商再次成为合法的，虽然是危险而艰难的。而那些给予苏俄政府以短期进口信用的外国资本家，在我看来，暂时多少可以肯定地认为，他们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得到回报。由于苏俄对这些权宜之计的追求是如此起伏不定，以致使得要对苏俄的任何事情进行概括都是十分困难的，一个人关于苏俄任何事物的说法，可以同时是亦真亦假的——这就是为什么友好的批评和恶意的指责，都可以非常确切地描绘出关于同一事物截然不同的图景的原因。

伴随苏俄早期的恶劣物质条件——这对任何经济制度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使得对这种经济制度的效率的估计变得困难了。世界大战给它造成了惨重的物质损失和经济崩溃，随后它又面临一系列的内战，而且被世界的其余部分所放逐，还遭遇了几次农业歉收，这些歉收部分是由于糟糕的管理造成，但部分也应归因于坏运气。不过，我想苏俄的实验主义者仍然可以公正地宣称，在只以结果来评判优劣之前，他们肯定已经有至少 5 年和平而风调雨顺的时间。

如果要对现状作任何概括，那么只能是这样的——这种制度是在一个低效率的水平上发挥其作用，但拥有能够使之得以持久延续的要素。我对俄国现阶段经济状况的真实情况的估计大致如下所述。

俄国现在是一个大约有 1.4 亿人口的国家，其中的 6/7 居住在农村，以农业为生，1/7 是城市居民，从事工业。以一个

过客的眼光来看，其城市和工业人口是不能够自给的——也就是说，从这些人口所提供的产出来看，他们的生活水平是超高的。城市居民消费的超额部分是通过对农民的剥削来补足的，这种做法之所以行得通，不过是由于城市人口只占其总人口数的一个很小比例。因此，共产主义者的政府对于其理所应当特别加以关照的工人阶级，能够通过剥削农民来予以特殊的优待；而农民，尽管受到了剥削，但由于得到了自己的土地，对政府也别无所求。这样，某种平衡就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内建立起来了，这给予苏俄政府一个呼吸空间，使之能够腾出手来进行一场认真的经济调整。

对农民进行剥削的正式途径主要是通过价格政策而不是税收制度——虽然土地税是预算中颇为重要的一项——来实现的。对进出口贸易的垄断和对工业产出的实际控制，使得当局能够维持对农民极其不利的相对价格水平。他们以远低于世界价格的价位从农民手中收购小麦，而以明显高于世界价格的价位把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售卖给农民①。这种差价所提供的资金，能够对其高昂的企业管理费用、普遍低效的制造业和分配制度提供财政支持。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垄断，把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相分离，从而能够以一定的方式来操作，即使在货币购买力下降的时候，也能维持外汇平价。人们都承认，

① 国内贸易委员会在9月份报告，北高加索地区的农民由于在工业品的价格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开始在玉米的供应上有所保留，不再像以前那样倾尽所有。农民们宣称："谷物价格还算不错，但服装的价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委员会认为农民的一普特(36磅)谷物应换得三码的布料，而实际上他们得到的还不到一码。

卢布的真实价值，与以目前汇率来衡量的国际价格相比，其国内价格要低得多。

这些手段，虽然目前对于实现其意图是有效的，而且也许暂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包含着两个灾难性的、导致低效率的因素。农产品相对于工业产品的低价格是对农业的一个严重阻碍因素，而农业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苏维埃政府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获得足够雄厚的财力，从而能以更为接近产品真实价值的价格向农民购买——这无疑将激励农民去努力实现一个高得多的产量，而且也能为他们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同时，城市无产阶级工人的真实收入大约是农民的两倍，并且据说如果将各方面因素都算进去，已经差不多达到了战前收入水平的 80%，这种特别优待使得城市生活远比农村生活更富吸引力。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压力远远大于设备落后、生产资金缺乏的工业吸收新工人的能力。如果不是由于现在城镇中住房困难和工作机会缺乏，那么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种移民——一个初到莫斯科的农民会被告知，他将无事可做、无处安身。不过这些阻碍因素只有在城镇已变得拥挤不堪和失业人数达到空前的比例之后才能发挥作用。两年来就业形势一直很严峻，并在继续恶化，我相信现在俄国有20%～25%的产业工人失业——亦即 600 万总数中的 150 万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但不是全体，能够从其职业中获得相当于他们正常工资 1/3 的救济品，甚至即使如此，与较贫穷的农民的工作收入相比也不会差得太多，其结果是失业大军成为国有企业财力的沉重负担。这种情况不过是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教训对于共产主义国家也同样适用，也就是说，耗费财力去干预相对价格或相对工资的正常水平，会使得某些职业的吸引力

过分强烈，而其他职业则相形见绌。另外这也启示我们，相似的恶果可以由截然不同的原因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造成，因为俄国在相对工资和相对价格上的毛病与我们的问题有类似之处。

因此，俄国农民的真实收入不超过原来的一半，而俄国产业工人则遭受着空前的过度拥挤和失业。然而，这里无疑仍然有某种保持政治、经济稳定的措施。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无能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它经受过比目前状况严峻得多的考验。苏俄已经建立起一种涵盖经济生活中一切活动的组织，虽然按正常标准看它是低效的，但已逐渐摆脱了虚幻和混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发挥着作用。俄国的生活水平与我们相比虽然是很低的，但却已经逐渐摆脱了饥馑和死亡，并确实提供了某种安适。每个人都赞同去年的改善是巨大的，今年的收成也还不错，情况正明显地发生好转。新社会制度的一些宏大规划正开始成形。一个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发电站，不久就将向列宁格勒供应电力和照明。分布广泛、装备良好的作物种植企业，很快将向农民供应用最新的孟德尔法培育的更优良的种子。

在与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编者注）进行了长久辩论后，陪伴他的两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眼中充满了信仰的狂热，最后上来对我说道："我们可以预言，十年以后，俄国的生活水平将高于战前，而欧洲其他地区的生活水平则将低于战前。"想一想俄国的天然财富和旧体制的腐朽无能，再看一看西欧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我们在对付这些问题时显示出的束手无策，难道我们能够断言这两位同志的预言只是夸夸其谈吗？

三、共产主义的生命力

我的第三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随着时间的进展，当热烈程度被充分淡化、不纯洁的因素与日俱增，此时共产主义还能够抓住群众吗？

对于这个只有时间才能知道的问题，我无法作出回答。但对于这样一个结论，我的确有把握，即如果共产主义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那么它将不是作为一种改进了的经济技术而是作为一种宗教而有所成就的。我们惯有的批评倾向会造成两个相反的错误：一方面当我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宗教时，由于对它是如此深恶痛绝，以至于夸大了其在经济上的低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它在经济上的低效率是如此印象深刻，以至于低估了它作为一种宗教所具有的作用。

在经济方面，我看不出俄国共产主义对于我们的经济问题，在智力发展或科学价值上会有所贡献。我不认为它含有或者可能含有任何有效的经济技术，这种技术用之于我们的社会——我指的是保留了英国中产阶级所有理想特征的社会，而不是 19 世纪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取得同样的或更大的成功。至少在理论上，我也不相信有任何必须以革命作为必要手段的经济上的改善。与此相反，我认为剧烈的变革方式将使我们失去一切。在西方工业条件下，采取红色革命的方式，会把全体人民都抛进赤贫和死亡的深渊。

但是作为一种宗教，俄国共产主义的力量又如何呢？或许这种力量是相当大的。抬高普通人的地位，这是一条在抓住群众方面屡见成效的教理。任何宗教，或者团结同一教派信仰者

的纽带，都有力量对抗非宗教主义者自我中心的原子论。

现代资本主义是绝对不信仰宗教的，它缺乏内聚力，没有几分热心公益的精神，它经常是，虽然并不总是一群财富的占有者和追逐者的集合体。这样一种制度，必须取得巨大的而非仅仅是过得去的成就，才能生存下去。在19世纪，这种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些理想主义的；但无论如何，它曾是一种团结一致、满怀信心的制度。那时，它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充满了蒸蒸日上、前途无量的希望；然而在今天，它只取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就。不信宗教的资本主义要战胜信仰宗教的共产主义，仅仅靠较高的经济效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高出许多倍的效率才有希望。

我们过去一直相信，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可以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而且能够逐渐引导我们进入经济天堂，到那时，我们就差不多可以摆脱经济上的牵累了。但现在我们却开始怀疑企业家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如果把企业家作为一种手段来看待，还算是差强人意；而如果把企业家当作是一种目标，那么就不太让人满意了。人们现在开始怀疑，把企业与宗教一分为二，让它们各就各位、井水不犯河水，这样所得到的物质利益是否能够弥补由此造成的道德上的损失。新教徒和清教徒能够心安理得地把企业和宗教割裂开来，因为在他们看来，前者的活动是属于尘世的，而后者则与天堂有关，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发展论的信仰者能毫无愧疚地把两者分开则是因为他们认为企业是建造未来尘世天堂的手段。然而，这里还有第三种思想状态，在其中我们无论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天堂，还是对把发展作为建设未来尘世天堂的当然手段，都心存怀疑；而如果天堂既不在另一个世界，也不可

能在未来降临，那么它肯定只能出现在此时此地或者纯属子虚乌有。如果在经济发展中不存在道德上的目标，那么结论是我们决不能为了物质利益牺牲道德，哪怕是一天也不行——换句话说，我们就再也不可能在心灵中将企业与宗教一分为二了。一旦一个人的思想进入这样一条轨道，那么他就将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到共产主义的内核中去探究求索，与我们的报刊所描绘的表面图景相对照，他会发现那里是另一番景象。

无论如何，对我来说似乎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时代的道德问题，与我们对金钱的爱好有关，与对生活活动中无处不在的金钱动机的习惯响应有关，与普遍地把为获得个人经济上的安全而奋斗作为努力的首要目标有关，与把对金钱的社会认同作为建设性成就的衡量尺度有关，也与把储藏本能作为家庭和未来的必备基础的社会响应有关。在我们周围尽是些日益衰落的宗教，大多数人民对它们越来越没有兴趣，除了作为一种令人愉快的传道仪式或社交礼仪，它们已经失去了在道德上的重要意义。这只是因为，不同于这些宗教的早期形式，它们与现代人的基本问题毫不相干。现在人们日益强烈地要求针对我们与金钱有关的思想感情，在头脑中进行一场革命，这也许是理想在当代的具体体现。因此，也许俄国共产主义的确代表着一种伟大宗教所掀起的第一阵令人头晕目眩的狂澜。

一个访问俄国的外来者，如果试图不存偏见地去感受其环境气氛，那么我想他肯定将徘徊于两种心境之间——沉闷压抑和欢欣振奋。马丁·康威爵士在他的《苏俄的艺术珍品》一书中，对此作了真实贴切的描述。在叙述到他离开俄国时，他这样写道：

“在一段很长的停留以后，列车继续前行了大约半英里。来到芬兰边境。在这里护照、签证和行李都再次受到了检查，不过这次要马虎得多。这个车站是新建的，简朴、清洁、方便，服务得很周到，是个舒适的地方。这儿还有一个很不错的茶点室，里面在殷勤好客的气氛中，供应一些简单但烹调得很好的食品。

“在俄国受到如此友好的接待之后，如果还想对此说三道四，似乎显得有点儿不近人情；但如果要我毫无保留地说出事实真相，那么在此我得补上一笔，即在这个芬兰边境的小车站，我体验到一种感受，觉得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压迫着我的沉重包袱终于卸了下来。我不能解释我究竟是怎样感觉到这个包袱的存在的。在初到俄国时我并没有这种负重感，但慢慢地它与日俱增，自由感渐渐消失了。虽然每个人都很友好，但仍能感觉到一种压力的存在，这不是施加于某一个人的，而是无所不在的。我从未像这样觉得自己完全是在异乡为异客；起初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以后逐渐清晰起来并凝聚成一种越来越能被意识到的压抑感。我猜想人们在沙皇俄国时期，也许会有同样的体验。美国人经常夸耀他们的‘自由空气’，并称之为他们国家的特征。这是他们与讲英语的地区所共有的东西。俄罗斯的道德空气是一种极为不同的感情化合物。

“现在我们正在穿越的芬兰的这部分地区，在物质特征方面与俄国边境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却感到自己正通过‘小康’之境，并看到了安乐甚至繁荣的先兆……”

这种压抑的心境是难以言传的。这一方面毫无疑问地归因于红色革命——俄国有许多情形让人看了觉得应该祈祷，但愿自己的国家在实现其目标时不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另一

方面，这也许是由于俄罗斯人天性中的粗鲁、残暴，或者是由于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的天性像现在这样糅合在一起所致。然而，这也是红色俄国无限的热情以及高度的严肃认真的一种表现，从别的角度看则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没有人能够比革命中的俄罗斯人更为严肃认真，严肃到甚至在纵情狂欢之时也不会失去这种态度，认真到甚至于有时候忘记了明天，有时候又忘记了今天。这种严肃认真常常是粗鲁的、愚蠢的，让人极端厌烦。一般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些单调乏味的人，恰似任何时代的卫理公会教徒。这种空气的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人们通常所能忍受的限度，令人不由得向往起伦敦的逍遥自在来了。

然而，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旦被人们感知，则是非常伟大的。在这里，尽管人们不时会感觉到它的贫困、愚昧和压抑，但却是一个生活的实验室。在这里，化学药品按照新的配方混合起来，正发生着剧烈的反应。某些东西——只要有机会——也许会从中产生。给正在俄国发生的一切一个机会，也许要比给（比如说）正在美国发生的一切一个机会更有意义一些。

那些为《泰晤士报》撰稿的绅士们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对俄国的恐惧之情，我想也许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如果俄国能够在外部世界形成一股势力，那么这将决不是季诺维也夫先生用金钱收买的结果。除非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否则俄国决不会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现在俄国的一切已是木已成舟，因此我愿意给她一个机会，助她一臂之力，而不是从旁加以阻挠。因为要是我是个俄国人，在作了周详的考虑之后，无论如何我也更愿意把自己的一份力量贡献给苏俄而不是沙俄！我对于新

旧官方信仰都同样地嗤之以鼻；对于新旧专制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同样深恶痛绝，但是我仍然觉得，我的眼睛应当正视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并始终予以关注。从旧俄国的残酷与愚昧中，什么好东西都不可能产生；而在新俄国的残酷与愚昧中，却可能潜藏着理想世界的萌芽。

第二篇　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一

人们对于公共事物的倾向，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这两者是由许多各不相同的思想溪流和感情源泉汇集而成的。上百年来，哲学家们统治着我们，因为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们不可思议地达成了或似乎达成了共识。我们甚至不能在一支新的曲子下跳舞。然而，一种变化已经悄然降临。我们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它的脚步声，它一度是在政治上指导过人类的最为清晰响亮的声音。那种拥有各种乐器的乐队和字正腔圆的合唱团正渐渐重新出现在地平线

上。

在 17 世纪末，君主的神圣权利让位于天赋自由论和契约论，教会的神圣权利让位于宽容原则以及这样一种观点，即：教会是“一个人们自愿组成的团体”、是以“绝对的自由和自发”①的方式结合起来的。50 年后，关于责任的神圣源泉和绝对呼声已让位于功利的计算。洛克和休谟在这些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个人主义。契约论假定权利是存在于个体身上的，这种新的伦理学把个体作为其学说的核心，一开始它不过是针对合理自爱的后果所进行的一种科学研究。“美德所要求的唯一麻烦只不过是计算的麻烦以及对更大幸福进行可靠的优先选择的麻烦”②。这些思想是与保守主义者以及律师们的日常观念相一致的。对于财产权利以及个人拥有随心所欲地处置自身及其所有物的自由这样一些观念，洛克和休谟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理性依据。这是 18 世纪的贡献之一，今天我们仍然呼吸着这种空气。

这种抬高个体的意图，废黜了君主和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结果是赋予了契约以新的伦理价值，从而使财产权利和事实权利获得了支持。然而时隔不久，社会上再次响起反对个人的呼声。佩利和边沁从休谟及其继承者手中接过了功利享

① 洛克：《关于宽容的一封信》。

② 休谟：《有关道德原则的研究》，第 60 节。

乐主义①,但却把它扩展到社会功利范畴。卢梭从洛克那里继承了社会契约论并从中抽出了“公意”。这两种转变都是借助于把平等作为新的重点来强调而完成的。“洛克用他的社会契约论来修正人类的天然平等,考虑到他关于公共安全的论述、那么早在这个阶段就已隐含着财产平等和取消特权的思想。在卢梭那里,平等不仅是起点,而且成了目的。”②

佩利和边沁是殊途同归。佩利通过设计一个上帝的存在,从而避免从其享乐主义中推出利己主义的结论。他说:“美德、就是为人类造福,遵从上帝的意愿,以及追求不朽的福祉。”佩利以这种方式使自我和他人恢复了平等。边沁则通过纯粹的推理得出了同样的结果。他论证说,把个体福利乃至自我利益置于其他任何人的福利之上的做法,不存在合理的根据。因此,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唯一合理的行动。边沁接受了休谟的功利概念,而摒弃了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推论:“有时候人们宁愿让全世界毁灭也不肯损及自己的一根毫毛,有时候人们则为了消除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最微不足道的痛苦而情愿殒身以恤,我的观点与这两者都不矛盾……理智不过是也应该是感情的奴仆,除了听从感情的召唤并为之服务外,理智决不应企图去越俎代庖。”

---

① 阿奇迪肯·佩利说:“我不怎么关心一般人所振振有辞地宣称的,人类的天性有高低贵贱之分,说是精神要比肉体更优越,人格中的理性部分要比动物性部分更高级。我也不怎么关心所谓的某些满足是有价值的、细腻的和微妙的;而另一些满足则是卑贱的、粗俗的和下流的,因为我认为所有的快乐除了持续时间和强烈程度外是毫无差别的。”(《道德的原则和政治哲学》,第一卷,第六章)

② 莱斯列·斯蒂芬:《十八世纪的英国思想》,二、第192页。

卢梭是从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推出平等概念的，而佩利从上帝的意志、边沁从中性的数学法则，得出了同一结果。平等和利他主义从此开始进入政治哲学，而民主和功利社会主义则同时滥觞于卢梭和边沁的哲学。

这就是第二种思潮——它搅起了沉寂已久的争论，并以早已被戳穿的诡辩为自己鸣锣开道——这种思潮至今仍弥漫在我们周围。不过它并没有排挤掉第一种潮流，而是与之搅和在了一起，在19世纪早期形成了不可思议的联合。这种联合把洛克、休谟、约翰逊和伯克的保守的个人主义同卢梭、佩利、边沁和戈德温[1]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平均主义融合起来。

然而，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的努力，这两个对立面是难以达成这种和谐的。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个时候崛起，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的。关于私人利益和公众福利可以达成非凡和谐的思想，在佩利那里已是显而易见，但正是经济学家赋予这种观点一个良好的科学基础。想像一下，在良好的自由条件引导下，通过自然法则的运作，个人在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同时，总是趋向于增进公共福利！我们的哲学难题就此被解决了——至少对讲求实际的人来说，现在他能够把他的力量集中在保障自由的必要条件上了。在政府无权干涉

---

① 戈德温在自由放任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他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邪恶的，边沁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同他相差无几的。他的这种关于平等的学说成为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接近于无政府主义。“一种个人判断的广泛运用，是一种如此美好的学说，以致任何真正的政治家都必将不能再容忍任何对其进行干涉的想法。”（参见莱斯列·斯蒂芬：《十八世纪的英国思想》，二，第277页）

私人事务的哲学学说以及政府没有必要干涉私人事务的神圣信条之外，现在又增加了一条科学上的依据，即干涉是得不偿失的。这就是第三种思潮。这种思想在亚当·斯密那里不过是初现端倪，他大体上倾向于赞同把公共福利的增进建立在“每个人为改善其自身状况而进行的自发努力”的基础之上。直到19世纪初，这种思想才得到了全面而自觉的发展。自由放任主义原则达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即把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融合，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反对休谟的利己主义。政治哲学家们屈尊来支持企业家，因为后者能够仅仅是通过追求其私人利润来获得哲学家所谓的“至善”。

然而，要做出这道菜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配料。首先是18世纪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其遗毒有不少流布到了19世纪。政治哲学家的个人主义是指向自由放任主义的；私人利益与公共福利的神圣的或科学的联合（如果可能的话）也指向自由放任主义。不过，首先是公共管理机构的无能使注重实际的人对其怀有强烈的偏见，这是一种从来未曾消除过的情绪。在18世纪，政府越过其最低职责范围所做的一切，都似乎是有害的、不成功的。

另一方面，1750年至1850年间的物质进步是来自于个人的积极性，而作为一个整体组织起来的社会，对此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因此，实际的经验进一步印证了先验论的推理。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根据种种深奥的道理，解放了的私人事业将会促进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还有什么样的环境能比这更让企业家们舒畅呢？而一个注重实际的观察者，在环顾四周之后，对于成为我们时代特征的进步与发展，难道能够否认这一切应当归功于“追名逐利”的个人活动

吗？有一种学说认为，对政府行为应当加以严格的限制，而经济生活则应尽可能听其自然地交付给个体公民，让他们凭借其熟练技巧和良好的辨别力去处理，这些个人是由力求出人头地这样一种令人敬佩的动机来驱动的。现在，这一学说无论是在神学、自然，还是科学方面都获得了充分的根据。

在佩利及其同路人的影响日渐衰落的时候，达尔文的革命正动摇着信仰的基础。再没有比新旧两种学说更为水火不相容的了——一种学说把世界看成是那个神圣的钟表匠的杰作，而另一种学说则似乎认为一切都是源自偶然性、混乱和远古世界。不过，正是在这一点上，新思想有力地支持了某些旧思想。经济学家教导我们说，财富、商业和机器都是自由竞争之子，是自由竞争建造了伦敦。而进化论者则更进了一步——他们认为自由竞争创造了人。人眼不再是某种设计——这种设计据说是出于好意，并不可思议地创造了一切事物——的见证，而是在自由竞争和放任主义条件下运作的偶然性登峰造极的成就。"适者生存"的原则，可以看作是李嘉图经济学极其普遍的推广。按照这种崇高的综合性，社会主义式的干预，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邪恶的。我们人类的进化，就像阿芙罗狄蒂从海洋的远古淤泥中冉冉升起一样，是个壮观的奇迹，而这种干预是企图故意地阻碍这一非凡的进程。

因此，我认为19世纪日常政治哲学的特殊统一性，是来自于成功地兼收并蓄各种相互冲突的流派，并把所有的精英都团结在一个单一的目标之下。休谟与佩利，伯克与卢梭，戈德温与马尔萨斯，科贝特和赫斯金森，边沁与科尔里奇，达尔文与牛津主教，实际上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在宣扬同一种东西——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这就是英国国教及其传道

者的观点，而同时一群经济学家也论证说，哪怕是稍微的离经叛道也定然会导致财政崩溃。

为什么我们对自由放任主义会持有强烈的赞同倾向？为什么政府对币值、投资过程、人口的管理行为，会在许多正直的心胸中激起如此不可遏制的怀疑？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因和那种环境即是解释，无论我们对这一点是否清楚——在今天这样一个颓废的时代，我们大多数人对此知之甚少。我们不曾阅读过这些作家的著作，就算这些书到了我们手里，我们也注定会把他们的论点看成是荒诞不经的。然而，我相信，如果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佩利、亚当·斯密、边沁和马蒂诺小姐，并非是按照他（她）们的所作所为来思考和写作的话，那么我们也不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所作所为来思考。对思想观点进行一次历史考察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我不知道是哪种情况会使一个人变得更加保守——是仅仅知道现在而对其他全然不晓，还是只懂得过去，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二

在利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在18世纪的哲学讨论中，在暴露了真实面目的宗教的衰落中，这种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我已经提到过，正是经济学家为注重实践的人提供了解决这一矛盾的科学依据。不过这只是一种简便的说法，我得赶快加以修正。这些话正是人们期望经济学家们说的。以最高权威形式纂修出来的这样一种学说，实在是绝无仅有。这就是那些普及者和庸俗化者所宣扬的货色。这就是那些同时赞同休谟的利己主义和边沁的平等主义的功利主义者——如

果他们能实现某种综合的话——所被迫信仰的东西①。经济学家的语言被借用来解释自由放任主义。不过，这种学说的甚嚣尘上，更应归咎于那些恰逢其时的政治哲学家而非政治经济学家。

"自由放任主义"的法文原意是俗语"让我们自己干"，传统的说法认为这是在17世纪末的某个时候由商人勒让德在致科尔伯特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②。不过，首先使用这一习语的作家无疑是马克·D·阿让松，他在1751年明确地把这一习语与自由放任主义的学说联系起来③。马克也是热情鼓吹政府对贸易放任自流有经济好处的鼻祖。他说，管得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④。他声称，工业衰落的真正根源正是在于政府对它们的保护⑤。"随着世界的文明进步，自由放任代

---

① 如同莱斯列·斯蒂芬所概括的那样，科尔里奇的观点是值得赞同的，"功利主义者破坏了凝聚力的每一种要素，把社会变成了私人利益的斗争场所，并且打击了一切秩序、爱国主义、诗歌和宗教的真正根基"。

② "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科尔伯特问。

"一切让我们自己干"，勒让德答道。

③ 下面的语录大多引自奥肯的著作。马克·D·阿让松的主张长期被人忽视，直到奥肯把它们重新发掘出来才引起巨大反响。这一方面是由于阿让松生前发表的有关短文是匿名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著作直到1858年(《马克·D·阿让松未出版的回忆录和日记》)才完整地出版(虽然在他生前这些手稿很可能私下地被传看过)。

④ "要管理得更好，必须管理得更少。"

⑤ "我们可以说：我们工业衰落的根源在于我们给予它们的保护。"

表了大多数公众的心声。”

在此，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说得到了完全的阐明，这是对自由贸易感情色彩最为强烈的表达方式。从那时起，这些词语和思想在巴黎一定极为流行。但这些概念在文献形式上的确立却是缓慢的，那种把它们同重农学派，特别是德·古尔内和魁奈联系起来的传统观点，在这一学派的著作中很少能得到支持，虽然他们都是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基本协调一致的观点的支持者。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或马尔萨斯的著作中也找不到“自由放任主义”这个词语。甚至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曾以一种教条主义的形式表达过这一思想。当然，亚当·斯密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和18世纪诸多限制贸易措施的反对者。然而，他对航海法令和高利贷法律的态度又表明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甚至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段落也更多地反映了佩利的哲学而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正如西季威克和克利夫·莱斯列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所宣扬的“天赋自由的简明制度”，更多地是源于他对世界秩序的有神论的和乐观主义的看法——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而不是来自于任何政治经济学的陈词滥调①。我认为，“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这个词语在英国的广泛使用，是由富兰克林博士众所周知的段落带来的②。事实上，直到边沁——他根本算不上是经济学家——的后期著作中，自由放任主义这一原则才开始出现，这种原则以一种我们的祖父辈所熟悉的形式，被借用来为功利主义者的哲学服务。例如，在

①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0页。

② 边沁使用的是“laissez-nous faire”(《文集》，第440页)。

《政治经济学手册》一书中①，他写道："政府不应当去做或试图去做任何事，这是普遍的原则；在这些场合，政府的座右铭或格言应当是——无为而治……农业、工业和商业对政府所提出的要求，就像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提出的要求一样合情合理、毫不过分：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从这时起，争取自由贸易的政治运动，所谓的曼彻斯特学派和边沁功利主义者的影响，第二流的经济学权威的鼓噪以及马蒂诺小姐和马塞特夫人的教育性读物，正是这些使自由放任主义作为正统政治经济学的实际结论，深深地扎根于大众头脑中；而同时，调子大相径庭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观点也被这同一思想流派所接受，所以，18 世纪后半期乐观的自由放任主义，在 19 世纪上半叶被悲观的自由放任主义所取代②。

在马塞特夫人的《政治经济学漫谈》(1817 年)一书中，卡罗琳一直坚持认为对富人的消费进行限制是值得赞同的。但到了第 418 页，她不得不认输：

"卡罗琳：我对这个论题了解得越多，就越确信，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远远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完全一致的。

"B 夫人：只要进行自由开放的思考，总是可以得出与此相似的结论，并教导我们珍惜相互之间普遍的怜恤之情。因

① 写于 1793 年，其中的一章发表在 1798 年的《大英图书》上，而全书收录在《文集》中，由布林出版社第一次出版。

② 参看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22 页。"甚至那些大体上坚持亚当·斯密限制政府职责范围观点的经济学家，在实施这些限制时，也更多地感到无可奈何而不是得意洋洋。他们并不是目前这种产生于'天赋自由'的社会秩序的仰慕者，而只不过是相信这种秩序至少要比任何可能为政府所替代的人为秩序要更为可取一些。"

此,科学要比单纯的实际知识更为优越。"

惠特利大主教写于1850年的《给青年人使用的简明教程》一书,曾被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广为散发,书中甚至对B夫人曾经允许卡罗琳偶然持有的怀疑态度,也不容许其存在。"政府对任何私人金钱事务的干预,无论是对借贷还是买卖,几乎都是弊多利少。"真正的自由是"每个人都应当有以他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处置自己的财产、时间、精力和技能的自由,前提是不对其他人造成任何损害。"

简而言之,这种教义已经掌握了教育机构,并成为习字帖上的箴言。17世纪和18世纪为了推翻国王与教士而锻造的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婴儿的乳汁,并且确实已进入了幼儿园。

最后,在巴师夏的著作《经济和谐论》中,可以看到这种政治经济学家的宗教的最极端、最狂热的表述:

"关于上帝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的和谐性,我愿意承担起为之作出证明的责任。使得这些法则和谐一致的,是所有的本性、所有的动机、所有的行为源泉、所有的利益,都相互配合而实现一个伟大的最终结果……这个结果是,所有阶级都在一个不断提升的水平上无限地相互接近;换句话说,即普遍进步过程中的平等。"

像其他教士一样,巴师夏也拟定了他的"信条":

"我相信,上帝对物质世界的安排并未妨碍他对人类社会安排的考虑。我相信,他把自由动因和无活动力的分子结合起来,并使之和谐地运动……人们在一般的道德、智力和体力水平上不断地接近,同时这种水平又无限地提升进步,我相信这是一个势不可挡的社会趋势。我相信,不干扰这种趋势,不破坏这种运动的自由性,是人性循序渐进的发展所必需的。"

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起，权威的经济学家一直强烈地反对上述思想。“几乎没有任何一位有名望的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教授写道，“会加入对社会主义的泛泛的正面攻击”，虽然他补充说，“几乎每一位经济学家，不管他有没有名望，都喜欢对大多数社会主义方案吹毛求疵”①。经济学家已不再与产生社会和谐教条的神学或政治哲学有任何瓜葛，而从他们的科学分析中，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克恩斯，也许是对自由放任主义进行全面的正面攻击的第一位正统经济学家。他于1870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发表了题为“政治经济学与自由放任主义”的演讲，在开场白中他宣称，“自由放任主义这一箴言，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便于在实际中运用的原则而已。”②这一观点，40年来已成为所有主要的经济学家的共识。举例来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某些最重要的著作，其主旨就在于阐明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和谐的最主要情形。不过，这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们谨慎但又并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仍然没有战胜那种关于个人

① 《生产和分配理论》，第494页。

② 克恩斯在这次演讲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流行观念”：“流行的观念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证明财富可以最为迅速地积累和最为公平地分配；也就是说，人类福利可能通过让人们自行其是这一简单过程而得到最有效的改善；换句话说，让个人听凭其自我利益的驱使，不受国家和舆论的限制，只要他们能够避免使用暴力和欺诈手段。这种学说即是众所周知的自由放任主义。我认为，相应地，政治经济学非常普遍地被看作是对这一箴言的一种科学表述。私人事业的自由和契约被认为是一切产业问题唯一的并且是绰绰有余的解决办法，政治经济学则被看作是对这一观点的辩护。”

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的普遍看法，即认为这是他们应该教授并且事实上的确在教授着的东西。

三

经济学家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出发点并展示给初学者的假设前提，是由于这一假设是最为简单明了的，而不是因为它最接近事实。由于这个原因——不过并非唯一原因——我承认，由于受这一学科传统偏见的影响，经济学家们总是以假设一种理想状态的存在而开始立论，在这种状态中，个人以试错、摸索的方式独立行动，实现生产资源的理想配置。在这种试错、摸索中，通过竞争，向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个人将击败误入歧途的那些人。这意味着，对那些把资金和劳力投入到错误方向上的人，不应该给予丝毫的怜悯和保护。这种方式，通过无情的生存竞争，淘汰那些低效率者而选择效率最高的，并把这些最成功的牟利者抬上社会的顶层。这种方式并不计较斗争的代价，而只看到被假设为永恒不变的最终结果所带来的好处。生活的目标成为不断啮取树叶，直到可能够得着的最高枝干，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能的方式，是让脖子最长的长颈鹿活下来而饿死那些脖子较短的。

与在不同用途之间实现对生产工具的理想配置相对应，另一个相似的假设是如何使可获得的消费品实现理想的分配。首先，通过试错法，每个人都可以在可能的消费物品中找到他“在边际上”最需要的那种，以这种方法，不仅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实现其消费品的最有利分配，而且，每个消费者都将设法获得最能满足其独有口味的那种消费品，因为他将为此出

最高价。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是让长颈鹿自行其是,那么:(1)最大数量的树叶将被吃掉,因为脖子最长的长颈鹿借助于其他脖子较短者的饿死,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些树叶;(2)每头长颈鹿都将冲向那些它所能够得着的树叶中最为新鲜的部分;(3)对于某一片最合口味的树叶,长颈鹿以最大的努力,伸颈抬头去够它。以这种方式,更多、更新鲜的树叶将被吃掉,而每一片树叶都将被那张认为它最值得努力啮取的嘴所吃掉。

然而,自由放任主义有两根支柱,这是两个被作为确凿事实的临时性假设,其中一个假设是,不断改善的环境是由不可阻挡的自然选择产生的;另一个假设是,存在着无限的供私人赚钱牟利的机会,其效验和必要性激励着人们去尽力而为。在自由放任主义下利润的自然增长,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他的生产性资源在合适的时间投入了合适的场所,无论这是靠他的技能还是靠好运气。这种制度允许技巧熟练的或运气好的个人收获在这种情形下的全部果实,它无疑为审时度势的实践艺术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因此,对金钱的爱好,作为人类最强有力的动机之一,被利用来完成按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方式配置经济资源这一任务。

正如赫伯特·斯宾塞首先认识到的那样,上面所简要提及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与达尔文主义之间,事实上是非常接近的。达尔文求助于性爱,把性选择行为作为通过竞争进行的自然选择的助手,来规定进化的方向,使进化沿着一条合乎需要的、有效率的路径前进;与此类似,个人主义者则求助于对金钱的爱好,把牟利行为作为自然选择的助手,来实现人们最强烈期望的目标,以及按交换价值来衡量的最大规模的产出。

这样一种理论，是如此的优美和简洁，以致人们很容易忘记，它不是以实际的事实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为了简洁而引入的不完善的假设之上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行为可以带来财富的最大程度的聚集，这一结论，除了将提及的其他反对理由外，是建立在一种不真实的假设之上的。这种假设大意是说，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根本不是有组织的，对于环境和必需条件有充分的预见，并且存在着获得这种预见的充足的机会。经济学家们在论证其观点时、后半阶段常常涉及到复杂性，此时他们通常就对上述假设有所保留。这些复杂性是由以下情况引起的：(1)当高效率的生产单位相对大于消费单位时；(2)当存在企业一般管理费用和合作费用时；(3)当内部经济趋向于使生产发生聚集时；(4)当调整所需的时间较长时；(5)当愚昧盛行、知识匮乏时；(6)当垄断和联合干扰了交易的公平性时。这就是说，经济学家们为了在后半阶段分析实际情况而对起初的假设作了保留。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即使认识到了这种简化的假设不能准确地与事实相符合，仍然推论说，这种简化的确代表着某种"自然的"因而是理想的、完美的东西。他们把这种简化的假设看作是健康的，而把深一层次的复杂性看作是病态的。

然而，除了这个与事实有关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情况值得加以考虑，这些情况恰好涉及到对竞争性斗争本身代价的计算，以及对这一斗争的性质的分析，还有财富被分配到并非是最受珍惜的地方的趋势。如果我们能对长颈鹿的福利心中有数的话，我们就决不会忽略那些被饿死的短脖子长颈鹿所遭受的痛苦，以及那些在争斗中落到地上并被践踏掉的甜嫩树叶，还有脖子较长的长颈鹿由于过量摄食

而引起的不适，乃至在这种原本温和的动物脸上所浮现出来的贪婪、焦灼等种种不愉快表情。

不过，自由放任主义原则除了经济学教科书外，一直还有别的同盟者。必须承认，由于两个主要的对立方案——一个是保护主义，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而使得自由放任主义在有判断力的思想家和通情达理的大众心中已是根深蒂固。这两种学说的共同特征，不仅在于它们都违反了自由放任主义这一普遍赞同的前提，还在于两者都只不过是逻辑上的谬误。两者都是思想贫乏以及在分析推论上无能的范例。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原则加强了反对这两种学说的论点，但对这一原则本身，却没有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在这两者之中，保护主义似乎至少还有些道理，而且使之得以盛行的那股力量也没有什么让人迷惑不解之处。然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历史学家们看来，肯定始终是个不解之谜——为什么一种如此不合逻辑、如此沉闷的学说能够对人们的心灵施加如此有力、如此持久的影响，并通过这些人来影响历史的进程？无论如何，这两个流派在科学上的明显缺陷，极大地抬高了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声誉和权威。

关于大规模的集中化社会行动——这是在最近的战争中的举动——的引人注目的意见分歧，并没有使改革者得到鼓舞，也没有消除过去的偏见。事实上，争论的双方都不无道理。在战争期间组织社会化生产的经验，使得一些目光短浅的观察者，急于在和平的环境中也实行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战时社会主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大规模生产，虽然它所提供的这些物资和服务注定要化为乌有，但也仍然算是财富。不过，精力的浪费也是巨大的，而且这种浪费和不计代价的气氛

是令任何一个节俭或有远见的人厌恶的。

最后，尽管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的政治和道德哲学中是根深蒂固的，但如果不是由于迎合了当时商界的需要和希望，它将很难确保其对公共事务的持久的影响力。我们从前的英雄，伟大的商人们，获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西方世界中最精明强干的人，至少有一半热衷于从事商业活动。”在那个时代，很大一部分“较为高明的创造力”被运用在了这方面。我们正是把进步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的活动之上。

“(马歇尔写道)① 为了发现通往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的各种道路，为了清除大自然设置在每一条道路上的障碍；为了找到他们所希望的能够从大自然的这种对立中谋求较好结果的方法，这一阶层的人们必须不断地变换眼光、更新头脑。这种创造力几乎没有取得过人们的信任，因为肆无忌惮地滥用它是不允许的，它的力量被一种更为强大的意志所驾驭，它的最高荣耀是以如此简洁的手段实现如此伟大的目标，除了经济学家，没有人清楚这种手段到底是什么样的。但经济学家也只能猜测，为什么众多其他的权宜之计——对于草率的观察者来说，这些权宜之计也同样是光芒四射的——被弃置一旁，而独独对它加以青睐？这些商人们就像高明的棋手一样，运用他们的想像力，预测那些对他们所深谋远虑的胜利结局可能造成威胁的种种障碍，并且屡屡拒绝那些高明的建议，因为他们总是自己设计粉碎这些障碍的方法。那些在精神上不负责的人，总是幻想草率的乌托邦方案，他们像那些技艺欠佳、总是

① “经济骑士制度的社会可能性”，《经济学杂志》。

鲁莽行事的棋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高明的棋手则在人性的另一个极端上。他们具有强健的精神力量，能够跟自己较劲，周详地考虑到对弈双方的落子变化，从而迅速地解决最为困难的棋局。”

这是对那些工业界巨子、杰出的个人主义者们的精彩描述，他们像艺术家那样，在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为我们大家提供了服务。不过，这也是一座日渐黯淡失色的偶像。我们现在越来越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经济天堂。

流行的理智上的偏见、精神上的矫揉造作、当代的正统观念，造成这种种情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许多作为最初动因的推动力量已经消失了，不过，照例，这些结论的生命力要比产生它们的动因更为持久。60年前，表示关心伦敦商业区公共利益的社会行动，是同一位主教讨论《物种起源》。最初的反应并不是理智上的，而是道德上的。正统观念是有问题的，其论点越具说服力，引起的反感就越严重。然而，无论如何，我冒险进入这头昏睡的怪物的巢穴，追溯它的主张、起源和历史，为的是最后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更多地是凭借其世袭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功绩来统治我们的。

四

让我们来彻底清理一下那些时常被作为放任自由主义依据的抽象或一般原则。假定个人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拥有约定俗成的“天赋自由”，这是不真实的，世上也不存在赋予那些权利的拥有者和获得者以永恒保证的“契约”。宣称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定会相互一致，这是没有根据的，上天并非是如

此来统治世界的。说两者在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不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是照此来管理社会的。断言开明的自利必定会促进公共利益，也不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得出的正确推论。而所谓自利一般是开明的，同样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个人在追求他们各自目标的实现时，常常是太愚昧、太懦弱，以至于甚至在这方面都难以如愿以偿。经验也并未表明，当人们组成一个社会单位来行动时，会总是不如他们各自单独行动那样目光敏锐。

因此，我们不能在抽象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应当具体地根据其长短利弊来加以处理。伯克在论及这个问题时称之为“立法中最为微妙的难题之一，即决定哪些事务是政府应该在群众智慧的指导下来负责管理的，哪些是政府应当尽可能不加干涉而留给个人自己去努力解决的。”①边沁曾经使用了两个已被人遗忘但却很有用的术语来区分这种情况，他称之为“任务”与“非任务”。我们也应对这两者加以区别，但却不必接受边沁原先的假定前提，即认为政府干涉“大体上是不需要的”和“大体上是有害的”②。也许目前经济学家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将政府的“任务”与“非任务”区分开来；而政治学的共同任务则是设计出在民主政体下能够完成“任务”的政府形式。我将在下面通过两个例子来阐明我的主张。

（1）我相信在许多情况下，管理单位和组织单位的理想规模是处在个体与现代政府之间的那种规模。因此，我建议应

① 麦卡洛克：《政治经济学原理》。

② 边沁：《政治经济学手册》（生前未发表），鲍林出版社 1843 年版。

当重视和发展国内的那些半自治团体，它们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这些团体，在它们自己的领域内，其行动准则纯粹是为它们所理解的公共利益服务，而谋求个人利益的动机是排除在其考虑范围之外的，但在人们的利他主义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之前，对于多个特殊的集团、阶级或派系的个别利益，还是有必要留有考虑余地的。这些团体，在其自身限定的限度内，对于一般事务的处理主要是自治性的，但必须服从议会所代表的民主的统治权，以之作为最后的凭藉。

可以说，我提出的是一个回到独立自治团体的中世纪概念。然而，无论如何，在英国，法人团体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并且与我们的制度是协调一致的。这类独立自治组织已经与我所提出的自治方式相吻合或相接近，要从实际情况中举出这类例子是很容易的。例如大学、英格兰银行、伦敦港务局，甚至一些铁路公司。在德国也有不少极其类似的实例。

然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趋势，当股份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其在社会地位上更接近于公共法人团体而不是个人主义的私人企业。最近几十年中，最有意义而又被人忽视的变化之一，就是大企业使自身社会化的趋势。一些庞大的组织，特别是大铁路公司和公用事业企业，以及大银行、大保险公司，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公司资本的所有者，即股东，几乎已彻底地与公司的管理相分离，其结果是股东的谋求巨额利润的直接个人利益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当机构发展到这一阶段时，管理部门更看重的是组织的整体稳定和信誉而不是股东利润的最大化。必须给予股东例有的适当股息以使他们满足，而一旦这方面得到了保障，管理部门的直接利益往往就在于避免来自公众和企业顾客方

面的批评。当企业由于其巨大规模或半垄断地位而特别引人注目且易招致公众的批评时，就更是如此。关于组织的这种倾向，一个极端的例子也许是英格兰银行。在理论上，它是属于私人所有的不受限制的财产；而实际上，几乎可以说，英格兰银行的总裁在考虑国内各阶层的利益以进行决策时，其中考虑得最少的就是其股东的利益。股东的权利，除了享有其例有的股息之外，几乎已减少到接近为零。许多其他大组织的情况，大致与此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组织是在逐渐地使自身社会化。

这并非是一个纯粹有利无弊的过程。同样的原因也造成了保守主义的抬头和企业的衰落。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上述情形中发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许多优点和缺陷。不过，我仍然认为在此我们看到了一条演变进化的自然路径。社会主义反对无限制的个人私利的斗争每时每刻都在逐一地取得胜利。这种斗争，虽然在别的地方仍然是尖锐的，但在此所涉及的特定领域内，已不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举例来说，在所谓的重要政治问题中，再没有比铁路的国有化对大不列颠的经济生活的改革更无关紧要的了。

的确，许多大企业，特别是公用事业和其他需要大量固定资本的企业，仍然需要以半社会化的形式存在，但我们对这些半社会化的形式必须持灵活变通的态度。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自然趋势，在半自治的公司和由部长们直接负责的中央政府机关之间，我们宁取前者，这也许要更明智些。

我批判教条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因为它试图引导人们的利他主义冲动来为社会服务，不是因为它背离了自由放任主义，不是因为它剥夺了人们牟利赚钱的天赋自由，也不是因

为它有大胆试验的勇气。所有这些，都是我所欢迎的。我批评它，是因为它没有抓住当前事态的重要意义；是因为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一项用来解决50年前问题的计划的陈旧残余，而对某个人在100年前的言论的误解，又是这项计划得以建立的基础。19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发源于边沁和自由竞争等等，而且它是19世纪个人主义哲学基础的变体，这一点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比较清楚，而在某些方面则比较模糊。两者都竭力强调自由，不过一个是消极地避免对现存自由的限制，一个是积极地清除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两者是对同一理性气氛的不同反应。

（2）其次我将谈到政府“任务”的判别标准，特别是关于那些紧迫的、值得在不久的将来付诸实施的“任务”。我们必须着眼于把那些“在技术上是社会的”事业同那些“在技术上是个人的”事业区分开来。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与那些个人已经在着手处理的事务无关，而与那些超出个人活动范围之外的职能有关，与那些如果不由政府来作出决定就无人过问的事务有关。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越俎代庖，做那些个人已经在做的事，也不在于它是否做得更好或更差，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无人去做的事情。

如何去制定实际政策，不在这里的讨论范围之内。因此，我只限于针对我碰巧思考得比较深入的几个问题，举一些例子来阐述我的想法。

我们时代许多最为严重的经济弊病，都是起因于冒险、不确定性和无知。这是由于某些居于优越地位、能力较强的个人，能够利用这种不确定性和无知来牟利，也是由于在同样的原因下，大企业常常是前途难卜，并造成财富分配的严重不

均。同样的因素还造成了失业、合理的企业预期的落空、效率和产出的滑坡。然而，治疗的措施正在这些个人活动之外。对个人利益的孜孜以求，也许甚至加重了病情。我相信，治疗这些病症的良方，在于一方面由一个中央机构来对货币和信用实行审慎的控制，另一方面大规模地收集和传播有关企业状况的资料，包括在必要时制定法律，规定把企业的一切实际情况，只要是公开后对社会是有利的，统统予以完全的公开。这些举措将使社会能够通过适当的行动机构，运用直接的聪明才智来监督企业内部错综复杂的情况，而又不会打击个人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即使这些措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可以使我们掌握比现在丰富得多的知识，以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我的第二个例子与储蓄和投资有关。整个社会的储蓄应该以多大的规模为宜？以对外投资形式流出境外的储蓄规模应该有多大？目前投资市场上的组织，是不是沿着最有利于国内生产的路线来分配储蓄的？我相信，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建立在明智的判断基础上的协调行动。我认为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把这些事情完全置于个人判断和私人利益的偶然性摆布之下。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人口问题的。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有关人口规模的深思熟虑的国家政策，来决定在目前状况的基础上，是应当有所增加还是加以缩减，或者是保持不变，以及到底多大规模的人口对国家最为有利。现在正是制定这种政策的时候。而当政策被制定出来之后，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将其付诸实施。也许不久之后，整个社会对于其未来的成员，将不仅仅是关注其数量问题，而且会更注重其先天质量问题。

五

以上这些思考都是与利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来改进现代资本主义技术的可能性有关的。在我看来，这些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即依靠个人赚钱和嗜财本能的强烈吸引，以此作为经济机器的主要动力——似乎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本篇行将结束，我也不准备再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不过，也许我最好还是提醒您，今后最激烈的斗争和最深刻的观点分歧将不是围绕着技术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的争论主要都是经济性的——展开，而是围绕着另一些问题，如果这样表达恰当的话，也许可以称之为心理方面或者道德方面的问题。

我们这个社会，是建立在对个人的金钱动机进行培养、鼓励和保护的基础上的，它到了如此根深蒂固的地步，以至于在欧洲，至少在欧洲的部分地区——不过，我认为在美国不是这样一种态度——对此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潜藏的反感。希望在对我们事务的安排中，尽可能少而不是尽可能多地借助金钱动机的吸引力，这种选择，不完全是逻辑推论的结果，也许是以实际经验的对照比较为依据的。不同的人，由于他们选择的职业不同，金钱动机在其日常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也不同。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在社会组织的其他发展阶段，金钱动机所起的作用要比今天小得多。多数宗教和多数哲学，对于一种主要由个人的金钱利益考虑来左右的生活方式，至少可以说，都是持不赞同态度的。另一方面，当代大多数人都抛弃了禁欲主义观念，而对金钱的真正好处毫不怀疑。在他们看来，似乎显而易见的是，除金钱动机外，人们不可能根据别的动机来行

事，而除了某些公认的流弊外，这一动机也胜任其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普通人不再关注这个问题，而他们也不清楚对于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自己到底是怎么想、怎么看的。

混乱的思想和混乱的感觉导致混乱的言论。有许多人，他们实际上反对的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接受，但在辩论中，他们的反对理由听起来却似乎是认为资本主义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是低效无能的。相反，资本主义的信徒却往往固步自封，拒绝接受技术上的改进，认为这会成为背离资本主义道路的开端。而实际上，这些改进是有助于巩固和保存资本主义的。不过，也许不久之后我们就能更清楚地区分，什么时候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效率高低的技术问题来讨论的，什么时候是把它作为一种其自身是否可取的生活方式来谈论的。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得到明智的管理，也许能够提供比其他任何已知的可供选择的制度更高的效率，来实现经济目标；不过就其本身来看，有许多方面是极为不可取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出一种社会组织，它能够尽可能地提高效率，但又不会与我们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相抵触。

促成下一步行动的，不应当是政治鼓动或草率的实验，而应当是思想。我们需要通过精神上的努力来澄清自己的感情。目前我们的同情心和判断力往往倾向于分裂，这是一种让人心力交瘁的痛苦心境。在这个行动领域，改革者们除非能够以和谐的理智与感情来矢志不渝地追求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否则是难获成功的。到目前为止，在这个世界上，我尚未见过哪个政党能够以正确的手段去追求正确的目标。物质上的匮乏刺激着人们去寻求变革，但恰恰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用来做

实验的余地是极小的。物质上的丰裕提供了一个风险较小的尝试机会，却又同时消除了变革图新的动机。要把这种变革付诸行动，欧洲缺乏的是手段，而美国缺乏的则是意志。我们需要一套新的信心，应当通过对我们与外在事物有关的内心情感进行坦率的自省，自然而然地树立起这种信心。

第三篇　我是不是一个自由党人？

一

如果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却又不归属任何一个党派，那么这将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会让人感到百无聊赖、孤独寂寞，觉得自己无足轻重。而如果你所加入的党派是强大的，其党纲和宗旨是值得赞同的，又能同时满足你合群的、实践的和理性的本能需要，那将是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值得为之投入大量的捐助和所有的空闲时间——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动物的话。

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动物，如果不想让自己说出这样一句丢脸的话，即

“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那么他宁愿随便投靠任何一个党派也不愿成为无党无派的人。如果他不能根据引力原则找到归宿，那么就得根据斥力原则寻得安身之所，拣一个比较起来他最不厌恶的党派，这总比孤零零地站在圈子外要好些。

现在说到我自己。在后面这种消极的检验标准下，我将落脚于何方呢？让我自己成为一个保守党人如何？他们既不能给我面包，也不能赠我美酒；既不能在理智上给我释疑，也不能让我在精神上感到宽慰；既不能让我欢欣振奋，也不能给我任何启发。他们那种与某些——算了，其名称姑且不必提及——习气、思想习惯、人生观如出一辙的精神状态，既不能增进我的个人利益，也不能促进公共福利。它们固步自封，没有理想、不遵从任何理性的标准，甚至对于现在我们已达到的文明程度，它们也没有能力或不打算去防止其退化。

那么，我是否应当加入工党呢？从表面上看，它有着较大的吸引力。但进一步观察后会发现，这种选择也同样是困难重重。首先，这是一个阶级党派，而这个阶级并不是我所属的阶级。如果我非得要追求局部利益，那我就要追求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利益。谈到这样的阶级斗争，我那种狭隘的、个人的爱国心，也像其他任何人——除了某些令人讨厌的狂热分子——一样，是跟我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的。我能够接受那些在我看来似乎是公正、有益的观念的影响，不过，在阶级斗争中，我将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

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我不相信工党会一直由其有理智的分子来实行恰当的控制；太多的事情总是由那些对自己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来决定的。而如果——这是很有可能的——党的支配权一旦被党内的独裁集团所攫取，那么这种

支配权就会被用来为党的极左翼的利益服务。对于工党的这一派别,我称之为“破坏派”。

按照消极的检验标准,我倾向于认为自由党是谋求未来进步的最好工具——只要它有坚强的领导和正确的纲领。

然而,当我们从积极方面——也即从引力方面而不是从斥力方面——来考虑政党问题时,无论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党的举措上还是其成员身上,都会发现每个政党的面貌是一样的黯淡无光;而造成它们这种状况的原因,也是毫无二致的。19 世纪有历史意义的政党问题,今天已成为陈年旧事,而关于未来的问题正赫然凸现,它们已越过旧的政党路线,但还没有成为政党问题。

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选举权、爱尔兰问题、自治领地的自治、上院的权限、差别极大的所得税率和财产税分级税制、财政收入在“社会改革”方面(如社会医疗保险、失业与老年退休、教育、住宅和公共卫生等等)的过度耗费,所有这些自由党曾经为之奋斗的目标,有的已成功地实现,有的已经过时,有的则已成为所有党派的共同事业。那么还剩下些什么问题呢?有的人会提出土地问题。但我却不这样想,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其传统形式下,由于实际情况的悄然变化,目前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在我看来,自由党的传统政纲中,只有两个要点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禁酒问题和自由贸易问题。在两者之中,自由贸易问题,由于偶然的原因,仍然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政治问题。关于自由贸易,一直存在着两种论调——一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在过去和现在都吸引着自由党内的个人主义者;另一种是经济论调,其依据是,通过自由贸易,各国能够利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而获

益。我已不再相信自由贸易学说所信奉的政治哲学。我相信自由贸易,是因为从长期趋势和一般效果看,它是唯一在技术上正确、在道理上无懈可击的政策。

但是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自由党在土地问题、禁酒问题,以及意见一致的自由贸易问题上,即使对于前两者也制定出了一致的、立场鲜明的政纲,难道它就能靠这三个问题支撑下去吗?成为一个自由党人的积极方面的理由,从目前看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其他党派按这个积极标准来看又如何呢?

保守党始终是顽固分子的老巢。然而在建设性上,它不见得比自由党更糟,两者不过是半斤八两。保守党内年轻的进步分子跟一般的自由党人比较起来,在政策主张和理想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之所以党派不同,往往只是由于气质上或过去交往关系上的偶然原因。那些陈旧的战斗口号已经降低了调门,或者沉寂无声了。教会、贵族、地主利益、财产权利、帝国的荣耀、军队的自豪,甚至啤酒和威士忌酒问题,将再也不会成为英国政治的主导力量。

保守党应当关心如何发展出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以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困难的是在伦敦商业区和议会中的资本家巨头们,对于何者是捍卫资本主义的新举措,何者是他们所谓的布尔什维主义,根本分辨不清。如果旧式的资本主义能够在智力上保护自己,那么就可以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历经百代而不衰。然而,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幸运的是这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认为那种使个人主义在智力上江河日下的种子,是来自于一种惯例,这种惯例与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征毫不相干,而是源于在它之前的封建主义制度——这就是世袭原则。在财

产转移和企业管理中的世袭原则,是资本主义事业的领导愚昧无能的原因,它过多地由创业者的后代,尤其是第三代人来支配。要使一个社会制度日趋衰退,再没有比坚持世袭原则更为有效的了。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是教会,它是我们一切制度中最为源远流长的一种,这种制度始终没有受到过世袭思想的侵蚀。

正如保守党内始终存在着顽固派一样,在工党内也总是存在着这么一个"破坏派"——或者称之为雅各宾派、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管你喜欢叫它什么。这个派别憎恨或鄙视现存制度,而且相信仅仅是推翻它就可以获益无穷,或者至少是把推翻现存制度看作是取得任何巨大进步的必要前提。这一派别只有在社会受到压迫,或者是对顽固派的统治怨声载道的环境中,才会大行其道。在英国,这一派的极端形式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在我看来,这一派的哲学观点以一种淡化了的形式,已经渗透了整个工党。在破坏派那里得到充分发展的狂热和猜忌的情绪,是广泛存在着的,不管工党的领袖们的内心如何稳健温和,他要赢得选举上的胜利,总是不得不对这种情绪多多少少作些迎合。我认为工党所可能施行的任何建设性政策,好比是迎风破浪的航船;而对破坏派的这种暗中的同情态度,则是啃噬着船身、降低了其适航性的蛀虫。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甚至于他们自己团体中的)抱着嫉妒和仇视的恶毒情感,是与建立真正社会共和国的美好理想格格不入的。然而,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工党领袖,就必须在言行上带些粗鲁、暴烈的味道,或者至少在表面上应该表现得如此。仅仅表现出对他同胞的爱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表现出对他同胞的恨。

那么，我所认为的自由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一方面，保守党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实体——顽固派作为其右翼，赋予它力量和热情；而那些也许可以称之为保守党中“最好典范”的受过教育、通情达理而又保守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作为其左翼，则予以其道德上和理智上的威望。另一方面，工党也是立场鲜明的——破坏派作为其左翼，赋予它力量和热情；而工党中的“最好典范”，即受过教育、通情达理的社会主义改革者，作为其右翼，则予以其道德上和理智上的威望。那么在这两者之间还有游刃的余地吗？是不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只需要决定一下自己是打算成为保守党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这种“最好典范”，还是成为社会主义的改革者这种“最好典范”就算是了结了这个问题呢？

也许我们应该就此止步。但是我认为在各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着可供某个党派回旋的余地。这个党派将是不偏不倚的。它在建设未来的过程中，将不受极端顽固主义和破坏主义——两者只会相互破坏对方的建设——的影响。对于我所设想的这样一个政党，下面极为简略地勾勒一下其理论和实践的内容。

首先，这个政党必须把它自己从过去的累赘中解放出来。依我看，除了保守党的左翼外，那些顽固不化地坚持旧式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虽然它们为19世纪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现在已经丧失了他们的位置。我这样说，并非是因为认为这些学说在当时它们得以产生的那种条件下就是错误的（如果我早生100年，也会希望自己加入这样的党派），而是因为它们在现代条件下已经不再适用了。我们的政纲必须不再纠缠于自由主义的历史争端，而应针对那些

当前人们所关注的、紧迫而重要的问题——不管它们现在是否已经成为党派问题。我们必须敢于冒不受欢迎和遭人嘲笑的风险。到那时，我们的集会就会吸引群众，我们的团体就会力量倍增。

二

我把当前的问题分作五个方面：(1)和平问题；(2)政府职责问题；(3)性问题；(4)毒品问题；(5)经济问题。

且让我们抱着极端和平主义者的态度来讨论和平问题。关于大英帝国，除了印度以外，我认为不存在任何重大问题。在别的地区，就统治权问题来说，友好分离的进程已差不多完成，这对有关各方都大有好处。不过，关于和平主义和军备问题，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我愿意为了和平的利益而冒险，就像过去我们为了战争的利益而冒险一样。但我不想冒下面这种形式的风险，即为着种种假设的情况而发动战争。我反对订立盟约。押上我们的全部军力来保护解除了武装的德国，使之不致受到军事力量正达到顶峰的法国的袭击，这是愚蠢的；设想在西欧未来的任何一场战争中，我们都不会置身事外，这也是不必要的。不过，我赞成在国际仲裁和军备裁减问题上，即使冒削弱自己力量的风险，也要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接下来要谈的是政府职责问题——一个沉闷但重要的问题。我相信未来的政府将不得不承担起它过去惟恐避之不及的许多职责。在这些方面，部长们和议会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的任务是必须尽可能地分散和转移这些职责，特别是要建立一些半独立性质的团体和管理机构，可以把一部分政府原有

的和新承担的职责委托给它们。不过,这同时又不能使民主原则和议会的最终统治权受到削弱。这些问题在将来的重要程度和困难程度,与过去的选举权问题和两院关系问题相比,是不相上下的。

我把一些问题归纳起来,称之为性问题。这类问题在过去从来没有成为过党派问题,但这是由于它们过去没有或很少成为公众讨论的主题。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再没有别的议题能像这类问题那样,使广大群众发生极大的兴趣并被广泛地讨论了。这类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们必定会激起人们真实而坦白的意见分歧。其中的一些问题还与某些经济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我毫不怀疑性的问题不久将登上政治舞台。妇女参政权运动所体现的,只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开端,它不过是表象之下更深刻、更重要问题的一种预兆。

节育、避孕用具的使用,婚姻法,对性犯罪和性变态的处理,妇女的经济地位、家庭的经济状况——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法律和正统观念的现存状况仍然是中世纪的,与文明的思想和文明的行为,与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私下相互谈论的内容,是全然脱节的。让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地认为,在这类问题上的观念变化,只会影响到沸腾的人海表层的少数受过教育的阶层。我们常常以为关于节育或离婚法修正这类思想会让女工们听了大吃一惊,这不过是臆想。事实上对她们来说,这些事情意味着新的自由,是从令人最难堪的虐政下获得的解放。如果某个政党能够公开而明智地在其集会上讨论这些问题,就可以引起选民们新鲜活跃的兴趣——这是因为政治再次触及到了人人都需要了解并且与其自身生活密

切相关的问题。

这些问题也与不可回避的经济问题密切相关。节育，一方面关系到妇女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也关系到政府的职责，政府对于人口规模的关心，正像对军队规模和预算额度大小的关心一样，是同等重要的。妇女工薪收入者的待遇和家庭工资收入的计划，不但影响到妇女的状况（首先影响到有酬劳动的绩效，其次影响到无酬劳动的绩效），而且牵涉到整个有关工资的问题。即：应当按照自由放任主义的正统理论，让供求力量来决定工资水平；还是应当在考虑到各方面因素之后，照顾到“公平”和“合理”原则，对供求力量的自由发挥开始予以限制。

毒品问题在英国实际上只限于禁酒问题；不过，我还想把赌博也包括在内。我希望禁酒和禁赌能对社会有所裨益。不过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倍感沉闷压抑、饱受痛苦磨难的人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不时地有一些逃避、一丝兴奋、一点刺激和变化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既不损害健康，又不过度耗费的情况下，适度地纵情狂欢，庆祝嘉年华会，而又不致陷入在美国被人们称为“瘾君子”的那一类人难以摆脱的不幸境地，这样的情形是否可以容许其存在呢？

我不能停留于此静候回音，而必须赶紧转到所有政治问题中最为重大的那一类，也是我最有资格谈论的问题——经济问题。

一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教授，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变迁的早期阶段，是能最透彻地认识其性质的人之一。他把这一阶段划分为三个时代，即三种经济秩序，我们正进入其中的第三个时代。

第一个是匮乏时代,"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由于低效率、暴力、战争、风俗习惯还是迷信"。在这样一个时期,"个人自由降到最低限度,而共产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或政府的控制达到最高限度"。除了某些作为例外情况的短暂间歇,这是(大约)直到15世纪或16世纪为止世界的正常经济状态。

其次是丰裕时代。"在高度丰裕的时代,个人自由达到最高限度,而政府的强制管理降到最低限度,个人交易代替了定量配给"。从17、18世纪起,我们艰难地摆脱了匮乏的束缚,进入了丰裕的自由境界,在19世纪,凭借自由放任主义和历史的自由主义的胜利,这个时代达到了光辉灿烂的最高峰。自由党的老前辈们对这个比较顺遂的时代总是念念不忘,这是不足为怪的,也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但是现在我们正在进入第三个时代,康芒斯教授称之为稳定时代,并合乎实际地将其特征描述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真正替代物"。在这个时代,"个人自由再次受到了限制,这一方面是通过政府制裁来实施的,但主要是由经济制裁来体现的。这种经济制裁是通过秘密的、半公开的、公开的或仲裁的各种协会、团体、联盟的一致行动,以及工商业者、工人、农民和银行家们的其他集体行动来实现的"。

这一时代特征在政治领域内的极端形式,一方面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表现为布尔什维主义。社会主义并没有提供一条中间路线,因为它同自由放任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经济力量的自由运动一样,也是发源于丰裕时代的那些前提条件的。对于上述的后两者,报刊上商业金融栏目的编辑先生们——可以说是人类中独一无二的一群,都是些残忍无情、鼠

目寸光之辈——仍然战战兢兢地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向一种为了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利益而对经济力量进行审慎控制和指导的制度转变，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政治上都会遇到巨大困难。然而，我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真正使命，正是去寻求解决的办法。

今天我们在煤炭工业问题上的态度，正好可以作为一个由当前所流行的思想引起的混乱的实例，从中吸取教训。一方面，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仍然追随19世纪的正统政策，建立这种政策的假设，是供求力量的自由运动能够完成、并且也应该由它来完成对经济的调节。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仍然相信，或者无论如何直到一两个星期前还相信，自由竞争和资本、劳动力流动性假设条件下的那些事情，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一定会发生。

另一方面，不仅是事实，而且舆论也向着康芒斯教授所说的稳定时代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工会已具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干扰供求力量的自由运动，而舆论虽然对工会怨声不绝，深恐其逐渐变得危险起来，但对工会的主要论点，即认为煤矿工人不应成为残酷的经济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由*他们*发动的——的牺牲品，仍然是表示赞同的。

旧世界政党的一些观点认为，我们可以变更币值，然后听其自然地让供求力量发挥作用，完成对经济的调节。这类观点，只适用于50年前或100年前的时代，那时，工会尚没有什么势力，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可以在发展的道路上毫无阻碍地横冲直撞，甚至还为人们所欢迎和赞许。

政治家们所信奉的那些浅薄的教条，其中半数所依据的那些假设，曾一度是正确或部分正确的，但现在正一天天地变

得站不住脚了。为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去创造一种新的智慧。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有所作为的话，就必须要做一些在我们的前辈们看来是离经叛道、不可容忍、危险而难以把握的事情。

在经济领域内，这意味着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去寻求新政策和新工具，去适应和调整经济力量的运转，使之对于与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利益相适应的当代观念不致横加阻挠。

这一政治斗争才刚刚拉开序幕，这一阶段会拖得很长，并表现为种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一阶段，斗争的焦点无疑将集中在货币政策上。因为对稳定和公正最猛烈的破坏，恰恰是由价格水平的变化造成的，对这一点，19 世纪因为相当满意于丰裕哲学而对此表示容忍。然而，这种变动的结果，对现代观念和现代制度来说则是无法忍受的，特别是当官方把它们作为一剂良药，以比 19 世纪曾经服用过的更大的剂量强加于我们时，就更加令人难以下咽了。

我们已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关于经济生活的哲学观点，而对于何者是合理的，何者是尚可忍受的，我们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技巧以及浅薄的行动准则，却在原地踏步，为此我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一个政党的政纲，其具体内容必须在实际事变的压力和刺激下，逐渐发展变化，预先地把它确定下来是毫无价值的，除非用极为笼统的词句。但如果自由党想要东山再起，就必须有一种态度、一种哲学、一个方向。我已经尽力表明了自己对于政治的态度，至于我开头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我是不是一个自由党人——就让别人根据我所说的这些东西，来替我作答吧。

第四篇　自由主义与工党

最近几周,《民族》周刊编发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的都是当前政治问题中的最热点,即自由党和工党的未来关系。至于此事所涉及的双方的领袖人物,我们尚未看到他们的明确态度。不过,劳埃德·乔治先生已经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在某种条件下他不会拒绝在两党之间作出某种运作上的安排。而斯诺登先生也会在某种条件下对此表示欢迎。奥克斯福德勋爵,正热衷于四处发表声明,说尚未进行过任何会谈,以此来暂时回避这个问题。这样做也许是明智的。

奥克斯福德勋爵认为这并非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也就是说,用不着草率匆忙地作出决定。他也许是对的。

不过，对于我们这些不担负任何责任的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坦白地说出自己在这个事件上的想法。无论自由党员们在何处聚会，这都是一个迫切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

我不希望未来 20 年生活在保守党政府的统治之下。我认为国内的进步力量已截然分裂成自由党和工党两派。我不相信自由党在任何可能的或可预见的条件下，能够赢得 1/3 的下院席位。除非保守党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造成经济上的灾难——这并非天方夜谭——否则我也不相信工党会获得下院席位的 1/2 。然而，如果工党要靠国家发生不幸来获得掌权的机会，那么这并不值得向往，因为这只会助长破坏派的气焰，而这一派已成为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不过，事已至此，除了让保守党政府继续统治下去，我们已别无指望。如果保守党只犯下不太严重的错误，这在从前也许会打破政治势力的均衡，但在今天却无关大局，除非他们一错再错，日积月累，以致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我不愿选择这样的替代方案。

所有那些希望看到进步原则付诸实施的人们都必须面对这些实际的政治问题。不管是属于哪个党派，他们都相信，如果在这方面的行动耽搁得太久，会把国家推向极端的选择，没有回旋的余地。

工党的雄辩家们惯用的反驳之辞是呼吁自由党人解散自己的党，转而投奔他们的阵营。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自由党实际上有可能从政坛上彻底销声匿迹，对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将来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任何人在政治生活中只能有两种选择而不是三种。不过我相信，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个人行为上为实现这种前景推波助澜，都是不可取的；而

如果在两方面都奋力抵制这种倾向，则是值得赞许的。

在政治方面抵制这种倾向之所以是明智的，乃是因为如果自由党不复存在，选民的进步动机就会削弱而不是加强。国内的许多地区，以及选民中的不少阶层，在今后许多年内将不会有足够的人数或充分的热情去投工党的票，使之赢得选举。不过一旦政治气候发生变化，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投自由党的票。工党的领袖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就是没有以清晰的眼光来看待事实。

在行动上抵制上述倾向之所以是值得推崇的，是因为当今多数活跃的自由党人，虽然间或也愿意投工党的票，或与之一起行动，但却不会像正式的工党成员那样，感到心安理得、真心诚意。拿我自己来说，我敢肯定，与一般拥护工党的选民相比，我的保守倾向还要更少一些。我相信，我所设想的可能的社会改革方案要比包含在当前某些哲学——比如说，悉尼·韦伯先生、托马斯先生或惠特利先生的哲学——中的社会改革方案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我的想像力所翱翔的范围是在天空的极左边。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只要自由党能给予我寸土片瓦，它就还是我真正的归宿。

自由主义的传统，既然落到了如此失意窘迫的地步，为什么还具有这样的魅力呢？工党是由三种人组成的。第一种是“工会主义者”，他们曾一度遭受压迫，但现在却成了暴君，对他们那种自私偏狭的主张必须予以大胆的反对。第二种人是那些鼓吹运用暴力手段来进行激烈变革的人，由于词语上的误用而被称为“共产主义者”，他们固守着那套不破不立的信条，但由于不敢公开制造灾难，他们不得不借助于阴谋诡计，并故弄玄虚以掩人耳目。第三种人则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

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极为糟糕的，不过尚不是无可救药。

现在有许多自由党人在与被我称作“社会主义者”的第三种人打交道时，常常会觉得与他们意气相投。不过，在弄清楚他们所要走的道路、所要实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之前，我们是不能和他们并肩同行的。他们的历史信条是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它的新变种——行会社会主义，我不相信现在他们对这些信条的兴趣会比我们要更浓厚些。这些学说已经不能再鼓动起任何人，工党和自由党中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们正试图以某种更好、更合用的东西来取代这些陈旧信条。双方在这方面的想法目前虽然还不很清晰，但他们之间同感甚多，并且有相似的思想倾向。我相信这两类人物会逐渐成为建设上的志同道合者。不过，进步的自由党人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不必借助于对工会主义暴君的奉承、对阶级斗争的美化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空谈，不必借助所有那些他不相信的东西。

在实际政治领域内，必须促成两件事的发生——两者也都很有可能发生。一件是必须再来一次大选，以使工党内的乐观主义者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在独立情况下的政治力量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另一件事是同时自由党也必须发生某种变化。如果被迫进行选择，自由党将分裂成两派，在同样的条件下，一派会投保守党的票，另一派则将投工党的票。历史地看，根据过去的贡献，两派都有权称自己为自由党。不过，在自由党内，有些人和温斯顿·丘吉尔先生、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一样，认为最好把此后的政治斗争看作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并据此认为应当为捍卫资本主义而战斗到最后一息。我认为如果这些人全部离我们而去，对自由党的健

全是大有裨益的。保守党的头脑和性格总是从自由党那里补充过去的，而我们则应根据我们的历史使命，供给他们最好的材料，不可有所吝啬，以使他们不致发生智力上的饥荒。这部分人对我们来说过于衰老、过于顽固，但如果保守党由这些忠实而明智的前自由党人来掌握，要比由顽固派来把持好得多。也许自由党除了为保守党政府提供内阁成员，为工党政府提供思想之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来为国效力了。

丘吉尔先生和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直到前些日子还是自由党成员，而现在自由党内仍然有好几位同样性格的人。工党拒绝与这样一个党派合作，在我看来是情有可原的。不过这个困难正在迅速地自行冰消瓦解。当这个困难被解决以后，自由主义与工党的关系，无论是在议院还是在选区，不必借助于任何契约、协定或其他正式形式，都将会变得更为密切，而且要超过我们当中有些人所愿意看到的程度。

保守党应从自由党的老一辈成员中获取新鲜血液，这是正确的和合适的。然而，如果自由党仅仅是落伍的或软弱的工党分子的归宿，那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将找不到容身之地。自由党在进步性上不应落后于工党，必须对新思想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在建设新世界的进程中，它不应甘居人后。我不相信以保守党和工党所采用的方式，自由党能像前两者一样，成为一个大的政党机构。不过，它可能在铸造未来的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没有工党的积极协助，任何重大的变革都将难以实现。然而，如果没有自由党的审慎和批评，那么这些变革就不会是稳妥和持久的。某种像奥克斯福德那样冷静沉着的气质，在我看来正是自由党所特有的风格，也是比感情上的狂热更勇敢无畏、更值得推崇、更为宝贵的政治资质。

人类的政治问题是要把三种要素结合起来，即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第一种要素需要批评、审慎和技术上的知识；第二种要素需要无私而热忱的精神和对群众的热爱；第三种要素需要忍耐、宽容、对各种美德的欣赏和独立精神，在任何一方面，对那些表现卓越者和有抱负者，都愿意给予发展的机会。第二种要素是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最大长处。但第一种和第三种要素则要求政党具有这样的品质，即由于该政党的传统和源远流长的赞同之情，它是经济个人主义和社会自由的发源地。

第五部分

未来展望



第一篇　评《克利索尔德》

威尔斯先生和他的出版商采用了别出心裁的方法，使得他的最新作品[①] 被反复评论了三次，现在要想对此再发表意见，也许为时太晚，有画蛇添足之嫌。然而，在先是阅读了这些评论，其后又拜读了这部大作之后，我对这些职业评论家所说的话深感不满。现代批评家的一个弱点是缺乏辨别力，不能将不同的事物区分开来。甚至威尔斯先生所选择的写作形式也使他们困惑不解。这些评论者弄不清威尔斯先生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好比买椟还珠，留下了自以为不可割舍的宝物，却把威尔斯先生奉献给英国读者的精

① 《威廉姆·克利索尔德的世界》(三卷)。

华给抛弃了。也许他们的感受力过于单薄，无法体会作者丰富复杂的情感和广博的胸襟、浩大的气魄。作者以粗犷洒脱的笔触勾勒出这幅巨作，想吸引住千百万读者的目光，并推动他们的思想的前进。

威尔斯先生在此所展示的，并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观点，也并不局限于他个人的经历和生活方式，而是转换了角度，持有一个与他自己的阅历迥然不同的观点：这是一个事业成功、思想开放、粗通科学知识而又不自命清高的英国企业家的经验。结果，这部书主要地并非是一件艺术作品；思想，而不是形式，才是其主旨。这是一件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称之为宣传品，它是企图把已为少数人所熟知的那种思想态度传达给广大群众的一次尝试。

这部书是一盘大杂拌儿，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我将选择两个突出的、半经济性质的主题来谈谈。除此之外，书中的另一主要话题是妇女问题，即关于在现代世界中妇女与她们自身以及与克利索尔德式的男性所可能发生的关系。作者是以高度的坦率、深切的同情和敏锐的观察力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它给读者留下了——这也是作者的意图所在——辛酸苦涩的回味。

上述两个主题中的第一个是对保守主义的猛烈抨击，并反复强调了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留恋过去的愚蠢以及僵化因循的危险。就像威尔斯先生的某些早期浪漫文学一样，这部作品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通过在巨大的时间跨度中凝神注视，回首过去，眺望未来，给人以一种悠闲从容的印象（如果人能永生，当然用不着匆匆忙忙）。而一旦来到今天，时间机器的运转就加速了，结果是现在我们不得不飞速前进，再也没有

成百上万年的时间来供我们悠然徘徊了。我们生活中的保守势力，正面临着像恐龙一样的命运，其确确实实灭绝的日子已为时不远。我们的思想、习惯和成见并没有跟上物质进步的步伐，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围环境的变化要远远快于我们自身的变化。时代的列车前进得太快，我们在车厢中东倒西歪，要是不赶紧挤上去，就会被摔下来。保守主义看来比自杀好不了多少。唉，不幸的恐龙啊！

这是事情的一方面：我们裹足不前，正在自取灭亡，而时光飞逝如箭。不过同一件事情还存在另外一面——克利索尔德正是在此出现了。如果一个人在他活跃的职业生涯中与时代并进，而其习惯和生活方式却还在原地踏步，这将使他何等的苦恼！那些伦敦用来褒奖成功者的宴会和庆典，又会让他感到何等的厌烦！这些东西经过社会的矫饰，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乐趣，变得多么的无聊！现代商业巨头精力充沛的建设性活动与他在办公时间之外的无所适从，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在孜孜不倦地赚钱牟利的生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枯燥乏味和毫无建设性的。在该书第一卷中对于实业家们那种无可解脱的极度苦闷的心情，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克利索尔德的父亲，公司的发起人，也是投机商，由于烦闷，先是陷入了自大狂妄，后来又卷入了欺诈活动。因此，我们应当用两只手来把社会生活这块胶泥塑造成我们自己的当代形象。

我们不仅是属于现代的，而且与我们的先人们比较起来，当我们成熟和掌握事权时，从字面意义上说，我们的年纪要比先人们更大一些。威尔斯先生着重指出了现代生活的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特征，即我们可以活得比前人更长久，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以前是健康和精力衰退的年纪，现在我们却可

以继续在这两方面保持良好的状态，结果是，在今天一般人可望获得以前只有个别人才能指望的活跃持续期。实际上，我可以进一步补充（我认为）被威尔斯先生所忽视的一点，即在一个规模迅速增长的人口当中，其平均年龄要比规模稳定的人口低得多。这一特点在今后50年中，与过去50年相比，将会更为突出。例如，在今后两代人的时间内我们可能在人口规模上达到稳定状态，而下面这种情况将会比较迅速地出现，即与最近几年相比，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老年人（比方说，65岁及65岁以上者）将增加约100%，而中年人（比方说，45岁及45岁以上者）将增加大约50%。19世纪掌握实权的那些人与16世纪的这类人相比，在平均年龄上要高出不下15岁；而在20世纪结束之前，这个平均年龄也许还会再增加15岁；除非我们能在明显的体力和脑力衰退理由之外，找到使高级职位空缺的其他有效方式。克利索尔德（注意，他当时的年纪是60岁）对于这一趋势的看法与我不同，他看到了较多的好处、较少的弊端。当人们年老力衰时，他们大多会更加看重金钱和生活的安定，而创造和建设之心则日渐淡漠；并且在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理性判断力显著衰退之前，这一过程就早已开始了。威尔斯先生喜欢年长者的世界甚于年轻人性欲色彩强烈的世界，这也许不无道理。但是这个年长者的世界与中年人金钱气息浓厚的世界之间，不过是一墙之隔。即使从最好的方面考虑，我们也会被体魄强健的“退休者”这一骇人问题所吓倒。关于过一点，威尔斯先生自己对里维埃勒地区①常住的外来居

① 在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滨海风景区，是著名的疗养、旅游胜地。——译注

民的绝望描写，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活生生的镜子。

因此，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而又令人难以称心如意的时代。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站在时代的浪尖潮头的人，发现他们自身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难以协调：在天真朴素上，他们不及前人；而在世故圆滑上，他们又比不上后代。因此，他们远远不如这两者快乐。威尔斯先生对那些热衷于实际行动的人所下的诊断，与埃德温·缪尔先生在他那部非常有趣的批评性著作《转变》中，对那些投身于艺术生涯或沉浸在冥思默想的生活中的人所下的诊断，是如出一辙的。根据缪尔先生的说法，我们时代的第一流作家们都是郁郁寡欢的。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不能满怀信心地加以支持或予以反对，结果他们的作品未能充分地反映出他们的天赋和才能，与那些在较为快乐的时代所产生的作品相比较，更是相形见绌——枯燥无味、捉襟见肘、苍白无力，正像他们自己对天地万物的感觉一样。

总之，我们不可能止步不前，而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不一定是变得更好，也不一定是变得更差，可能只是在趋向一种平衡。然而，为什么不能够变得更好些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开始从物质的丰裕中去收获精神的果实呢？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那么这种值得一试的变化，其动力又当从何而来呢？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威尔斯先生的第二个主题上。

威尔斯先生在《克利索尔德》的第一卷中描写了书中主人公对社会主义感到幻灭的情形。在第三卷中，他开始探寻究竟还有没有别的出路。要“变更这个世界的法律、习俗、规章和制度”，我们应当从何处获取力量来推进这场变革呢？“革命者应

当从哪个阶级、什么类型的人中产生?怎样才能够使他们齐心协力、真诚合作?他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推动变革?”工人运动被看成是巨大而危险的毁灭性力量,其领导者是一些“用感情代替思想”的感情用事者和伪知识分子。一场建设性的革命不可能由这些人来发动。人类当中富有创造力的智者不可能在这个角落里找到,而只能在科学家和现代大企业家中发现。除非让具有这种类型的头脑、性格和气质的人来担当这项重任,否则决不可能有所成就,因为这是一项在实践上高度复杂、在智力上极其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从右派而不是左派中吸取革命者。有一类人,他们现在是以创建巨大的实业为人生乐事,我们必须说服他们,告诉他们还有更伟大的事业在召唤着他们,从中他们可以获得更大的乐趣。这就是克利索尔德所谓的“公开的阴谋”。克利索尔德的方向是向左的,并且是左得不能再左的;不过他却试图从右派中唤起创造的力量和建设的意志,这种策略将使他能够成功地实现其目的。他认为自己在气质上基本上是个自由党人,但是政治上的自由党人必须脱胎换骨,以“更坚定的面貌和更明确的意志重生”。

克利索尔德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社会党的反感。这种反感是许多人,包括社会党人自己在内都觉察到了的。对世界的改造需要有创造力的梵天的妙手一触,但是现在这位创造之神正在为科学和实业尽力,还没有为政治和政府效劳。用克利索尔德的话说,世界的极大危险是,“在有创造力的梵天能够着手开始工作之前,湿婆,换句话说即工人阶级,现在由于觉悟到它现在无需忍受压迫和贫困而进行的热情破坏,可能使得梵天的任务难以完成”。我认为对这一点大家都有同感。我们

都明白，当务之急是及时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以使梵天能够开始工作。因此，无论在哪个政治阵营，其积极的、建设性的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多数都会愿意参与这个“公开的阴谋”。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举步维艰呢？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克利索尔德》有些美中不足，显然有些缺乏洞察力。为什么那些实干家们更乐于去赚钱牟利而不是去参加“公开的阴谋”呢？我认为这与他们星期天更乐意玩桥牌而不是上教堂是一样的道理。他们完全缺乏这样的动机，如果他们有的话，那就可以说，他们抱有一种信念。但是他们并没有信念，这些潜在的“公开的阴谋者”根本就没有任何信念。因此，除非这些人有幸成为科学家或艺术家，否则他们将不得不把身心寄托在一种伟大的替代动机、一个完美的代用品上。事实上，他们的这种安慰剂不是别的，不过是——金钱。克利索尔德指责工人中的狂热分子是以“感情代替思想”，不过他并没有否认他们毕竟还有感情。可怜的科克先生不是有一些也许克利索尔德先生所没有的东西吗？克利索尔德和他的兄弟狄根，一个广告商，四处奔走，想要寻找某种东西，以使他们充沛的里比多(libido)能有用武之地，然而却未能找到。他们也极力想要成为传道者，但却终究无法做到，结果他们依旧只是商人。

这里我只是从该书所涉及的诸多主题中挑选了两个。那些主题的处理并非全都像这两个一样精彩。关于大学的情况，我就知道得比威尔斯先生更清楚，我认为在他的叙述里所包含的真理成分并不比一幅漫画所能包含的更多。他完全低估了大学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大学也许能够成为梵天的殿堂，对这种梵天，甚至是湿婆也要敬让三分。不过，总的说来，《克利索尔德》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是出自大手笔的意蕴深

远的鸿篇巨制，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机智、真挚而豁达的精神。

尽管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谈论过纯艺术，但是今天对纯艺术家们来说并非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要想在艺术上臻于第一流的完美境界，这个时代也是不相宜的。我们今天最有才华的作家，其作品也充满了缺陷，他们陷于批评的包围中，看上去似乎并不像是会流芳百世。因此，我们，作为这些作家的同时代者，如此对待他们是不公平的，对他们是欠了债的。每个有理解力的人，对肖伯纳欠下了多大的债！而我们对H.G. 威尔斯又欠下了多大的债！他的精神世界，似乎是和他的读者们的精神世界肩并肩地慢慢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在从童年到壮年的各个相继而来的阶段中，都能够从他的作品中不断获得享受，并由此使我们的想像力不断发展。

第二篇 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

一

现在，关于经济前景的悲观论调正不绝于耳。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作为19世纪特征的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一度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也开始放慢了脚步——无论如何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在未来十年中，经济的繁荣程度将会衰退而不是高涨。

我认为上述说法是对目前状况的一个粗暴的误解。现在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不是老年性风湿病，而是由于发育过速引起的发育性阵痛，是两个经济阶段之间重新调整的过程所引起的

痛苦。技术效率的提高速度超过了劳动力吸收问题的解决速度；生活水平的提高，步子也稍大了一些；世界的银行和货币制度阻碍了利率的下降，使得货币的供求平衡不能迅速恢复。而即使如此，由此所产生的浪费和混乱，其后果也不过涉及国民收入的 7.5%；即我们在每一镑中浪费掉了 1 先令 6 便士，只得到了 18 先令 6 便士，而如果我们明智一些的话，本来可以得到整整 1 镑；然而，虽然如此，现在的 18 先令 6 便士抵得上五六年前的 1 镑。我们忘记了，在 1929 年英国的工业实际产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我们的国际收支余额在偿付了所有的进口商品后可用作新增对外投资的净顺差额，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相应余额都高，与美国相比，甚至超出了 50%。为了便于比较，还可以再假设我们把工资降低一半，把国家债务削减 4/5 并停止清偿，将剩余的财富以不能生利的黄金形式贮存起来，而不是按 6%或更高的利息贷放出去，那么我们就会与现在人们羡慕不已的法国的情况相差无几。但是这能算得上是一种改进吗？

普遍性的世界性大萧条、在一个充满贫困的世界里产生的异常巨大规模的失业、我们曾犯下的灾难性错误，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失去了洞察力，对于在表面现象下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对于事物发展趋势的真实解释置若罔闻。悲观主义有两种相反的论调：一种是革命者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事态已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有进行激烈的变革才有一线生机；另一种则是反动分子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我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平衡已是如此岌岌可危，因此不能再冒险进行任何尝试。我认为这两种论调都是错误的，这一点，在我们这一代就会得到证实。

不过,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详细探讨当前或即将出现的情况,而在于使我们能够摆脱短浅的目光去眺望遥远的未来。对于 100 年后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可以作出一些什么样的合理预期呢?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经济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发展前景呢?

从有史以来,比如说,从公元前 2000 年开始,到 18 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然中间是时有起伏的。瘟疫、饥荒、战争等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其间还有若干短暂的繁荣时期,但总的来看,不存在渐进或激进的变化。一直到公元 1700 年为止的 4000 年间,某些时期的生活水平也许比别的时期要高上 50%,但不会超过 100%。

这种缓慢的发展速度,或者说发展的停滞,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极其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再就是未能进行资本积累。

从史前时期到比较晚近的时代这一漫长期间,始终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这一现象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凡是在近代初期人们所拥有的那些真正至关重要的事物,几乎每一样都在历史的原始时期就已广为人知:语言,火,与我们今天一样的家畜,小麦、大麦、葡萄和橄榄,耕犁、车轮、桨、帆、皮革、麻布和织物,砖瓦和罐壶,黄金和白银,铜、锡和铅——铁是在公元前 1000 年前被发现的——银行学、治国术、数学、天文学和宗教。至于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首次开始拥有这些事物的,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

在史前的某些时期——也许是在最近一次冰河期以前某个比较安乐的间歇期——一定曾经有过一个充满进步和创新

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相媲美。但是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却未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

我认为近代时期是从资本积累开始的，而资本积累又始于16世纪。我相信——我不能在此详述其原因，以免喧宾夺主——这最初是由于西班牙把黄金财宝从新大陆带到旧大陆，从而引起了物价上涨，并带来了利润的增长。从那时起到今天，按复利计算的资本积累的力量，在仿佛沉睡了许多年以后，又苏醒过来并重新恢复了活力。而200年来复利的力量所起的巨大作用简直是超乎想像的。

为了能说明这一点，在此我给出一个我所作的计算。英国现在的对外投资总额估计大约有40亿镑，这每年能为我们带来大约6.5%的利息收入，这笔收入的半数，我们把它带回国享用；另一半，即3.25%的利息收入，则在国外按复利计算积累起来。这样的事我们已经进行了大约250年。

我认为英国对外投资的始端可追溯到1580年德雷克从西班牙盗窃的大批财宝。在那一年他带着从富庶的印度劫掠来的数量惊人的战利品回到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是资助这次远征的辛迪加的一个大股东。她把自己所获得的一份用来清偿了英国的全部外债、平衡了自己的预算，最后手里还剩下4万镑。她又再把这4万镑投入到东方公司，这个公司也是生意兴隆，大发利市。东印度公司就是靠这个公司的利润起家的，而东印度公司这个巨型企业的利润又为日后英国的对外投资打下了基础。把4万镑按3.25%的复利累积起来，其数额恰巧与英国在各个时期对外投资的实际总额相差无几，算到今天这个数额总计应为40亿镑，而这就是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英国目前对外投资的总额。因此，德雷克在1580年带

回来的财宝中，每一镑现在已变成了 10 万镑。复利的力量就有如此之大！

从 16 世纪起，科学和技术发明的伟大时代开始了，在 18 世纪后这个势头日益强劲，而从 19 世纪初开始，更进入了鼎盛时期——煤炭、蒸汽、电力、石油、钢铁、橡胶、棉花，化学工业、自动机械、大规模生产的方法，无线电、印刷术，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还有其他家喻户晓的人和物，成千上万，不可胜数。

那么这一切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尽管世界人口有了巨大增长，同时这些人口还必须有相应的住房和机器设备与之相配合，但是我认为，欧洲和美国的平均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将近 4 倍。而资本的增长所达到的规模，比之于以前所知的任何时代，要远远超过上百倍，而且今后人口未必会再次出现如此巨大的增长。

如果资本每年增长，比方说 2%，那么世界的基本固定资产将会在 20 年里增加 50%，而在 100 年里将增加 7.5 倍。可以从物质方面，比如说住房、运输之类，来想像一下这种发展前景。

同时，近十年来，在工业和运输方面的技术改进，其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国 1925 年的人均工业产值比 1919 年提高了 40%。在欧洲我们被暂时的障碍所阻滞，但即使如此，仍然可以肯定地说，技术效率的增长率总体上每年至少在 1% 以上。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尽管革命性的技术革新迄今主要是发生在工业领域，但很快将冲击到农业方面。粮食生产效率的进步，将与矿业、工业和运输业所取得的进步同样巨大，而我们也许正处在这种巨变的前夜。在好些年以后——即在我们

自己这一代——也许可以只付出原来一向使用的人力的1/4，就能够完成在农业、矿业和工业上的操作了。

目前，这些变革的高速度正使我们苦恼不已，它们带来了不少有待解决的难题。那些不是处于进步队伍前列的国家，也遭受着同样的痛苦。一种新的疾病正在折磨着我们，某些读者也许还没有听说过它的名称，不过在今后几年内将听得不想再听——这种病叫做“由技术进步而引致的失业”。这意味着失业是由于我们发现节约劳动力使用的方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而造成的。

但这只是经济失调的暂时阶段。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从长远看，**人类终将解决**其经济问题。我敢预言，100 年后进步国家的生活水平将比现在高 4—8 倍。即使是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看，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而且即使是作更乐观的估计，也并非异想天开。

二

为了便于讨论，且让我们设想，100 年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的经济境况平均要比现在好上 8 倍。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不足为奇的。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不过，人类的需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的需要，即是说，不管周围的其他人境况如何，我们都会感到这种需要的存在；另一类是相对的需要，即是说，只有当这种需要的满足能够使我们凌驾于他人之上，产生一种优越感时，我们才会觉察到这种需要的存在。这第二类需要，即满足优越感的需要，也许才真正

是不知餍足的，因为当一般的水平有了提高之后，这种需要也会水涨船高。不过，绝对的需要也许将很快达到，其实现的时间也许要比我们大家所意识到的还要早得多，而当这些需要得到了满足，那时我们就愿意把精力投放到非经济的目的上去。

现在谈谈我的结论。我想，您对这个结论思考得越深入，就会发现它是越发的超乎想像、令人惊诧。

我得出的结论是，假定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那么，“经济问题”将可能在 100 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

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这样就让人惊诧?这的确值得令人惊奇。如果我们不是眺望未来，而是回首过去，就会发现，迄今为止，经济问题、生存竞争，一直是人类首要的、最紧迫的问题——不仅是人类，而且在整个生物界，从生命的最原始形式开始莫不如此。

因此，显而易见，我们是凭借我们的天性——包括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最深层的本能——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进化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人们就将失去他们传统的生存目的。

那么这对人类到底是福还是祸呢？如果你完全相信生命的真正价值，则这一远景至少为我们展示了从中获益的可能性。不过，那些经过无数代的培养，对于普通人来说已是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本能，要在几十年内加以悉数抛弃，以使我们脱胎换骨、面目一新，是难乎其难的。虑及这一点，我仍然不能不感到非常忧虑。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会不会引起普遍的“精神崩溃”呢？对此，我们已有了些许体会。我所说的这种精神崩溃现象在英国和美国富裕阶层的家庭妇女中，已是极为寻常。这些不幸的妇女，她们中的许多人被自己的财富剥夺了传统的任务和工作，由于经济上的必需这一刺激已经消失，所以她们从烹调、洒扫和缝补这类活动中已不能得到足够的快乐，而又难以找到更愉快的消遣。

对那些为了每日的面包而辛勤劳动的人来说，闲暇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乐事；而当这种向往成为现实时，他们才发现原来是另一番滋味。

据说有这样一段墓志铭，是一位打杂女工为她自己写的：

别为我悲伤，
朋友们，
别为我哭泣。
现在我什么也不用干了，
而将永远永远地休息。

这就是她的天堂。如同其他渴望闲暇的人一样，她想像要是让别人来歌唱而她在一旁倾听，这样打发时光的方式将是多么美妙，因为在她的诗中还有这样两行：

天空中回荡着圣歌和甜美的音乐，
而我在一旁倾听，什么也不做。

然而，只有对那些不得不歌唱的人来说，生活才是差强人意的——可是我们当中又有几人真正能够放声歌唱呢！

因此，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

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

那些孜孜不倦、一心一意的图利者，也许会把我们大家带上通向经济丰裕的跑道。但当这种丰裕实现以后，只有这些人才能在这种丰裕中获得享受：他们不会为了生活的手段而出卖自己，能够使生活的艺术永葆青春，并将之发扬光大，提升到更高境界。

我认为，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能够在期待这种多暇而丰裕时代的同时，不怀有丝毫的忧惧。在国内，长久以来，我们都是被训练着去奋斗而不是去享受。对那些没有特殊才能来寄托身心的普通人来说，这是件可怕的事，特别是当他再也不能在传统社会的温床和他所珍视的那些风俗习惯中找到自己的根基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严重。从今天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富裕阶层的所作所为和取得的成就来看，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景是非常黯淡的！因为这些人可以说是我们的先锋，他们在为我们探寻希望之地并在那里安营扎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所以在我看来，似乎只有那些有独立收入而又没有社会关系或职责来约束的人，才有可能解决这些困扰他们的问题。

在以后的许多年间，我们的劣根性仍然会如此的根深蒂固，所以，任何人如果想要生活得舒心畅意，那么他就必须得干一点工作。比起现在的富人们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为自己多做些事。如果有些什么细小的任务要担当，或者有些日常琐事要料理，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不过当工作量超过这一限度时，我们将努力减轻每个人的负担，对于到那时仍然必须完成的一些工作，我们将尽可能广泛地进行分配。3 小时一轮班或每周 15 小时的工作，也许会使上述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得以缓解。因为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每天工作 3 小时，已足以使我们的劣根性获得满足。

此外，在其他领域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必须预料到这一点。当财富的积累不再具有高度的社会重要性时，我们原先的道德准则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将可以摆脱 200 年来如恶梦般困扰我们的那些虚伪的道德原则，在这些伪道德原则下，我们一直把人类品性中某些最令人厌恶的东西抬举为最高尚的美德。到那时，对于金钱动机，我们将有胆量按照其真实的价值来加以评价。对金钱的爱好作为一种占有欲——它区别于作为享受生活、应付现实的手段的那种对金钱的爱好——将被看作是某种可憎的病态，是一种半属犯罪、半属变态的性格倾向，人们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把它交付给精神病专家去处理。那些影响财富分配和经济上的酬报和惩罚的各种社会习俗及经济惯例，不管它们本身可能是多么地令人憎恶、有失公平，由于它们对促进资本积累有极大的作用，因此现在我们得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持；但是到那时我们将从中解放出来，并终将摒弃它们。

当然，到那时将仍然有不少人怀着强烈的、贪得无厌的意图，盲目地追求财富，除非他们能够找到某种可能的替代目的。不过，我们其余的人将不再有任何义务对这类意图表示赞许和鼓励。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大自然赋予了这种“意图”，不过，到那时我们可以在比今天更为稳妥自如的情况下，更加细致深入地探索这种“意图”的真正性质。所谓意图，其含义是，我们更关心自己的行动在遥远的将来所导致的结果，而非行动本身的性质和对我们自己周围环境的直接影响。那些“有意图”的人，总是企图通过把他们对行动的兴趣向后

推延来确保他们的行动具有一种假想的和虚妄的永恒性。他所喜欢的并不是他的猫，而是他的猫所生的小猫；实际上，他喜欢的也不是小猫，而是小猫的小猫。这样无穷无尽地递推下去，到最后，他所追求的不过是抽象的"猫"的概念。对他来说，果酱并不是果酱，即决不是今天这听实实在在的果酱，而是想像中的明天的那听果酱。因此，通过把他的果酱不断地推向未来，他竭力想要从他的行动中升华出一种永恒性来。

让我们回忆一下《西尔维亚和布鲁诺》中的那位教授：

门外的人低声下气地说："只是一个裁缝，先生，是来收账的。"

"啊，我可以很快解决他的事情，"教授对他的孩子们说，"你们只需等一小会儿。今年的账是多少，我的朋友？"他正说着，裁缝已经走了进来。

"你晓得，这笔账是每年翻一番的，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裁缝有点生硬地回答道，"我现在就想拿到现钱。已经有2000 镑了！"

"喔，这不算什么！"教授满不在乎地说，一边在口袋里摸索着，仿佛他总是随身带着那样数目的一笔款子似的。"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为什么不再等上一年，让它滚成4 000镑呢？想想看，那时你会多么富裕！要是你愿意，你简直可以成为一个'国王'！"

"我可不清楚我是不是想成为国王，"裁缝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笔款子听起来的确数目不小！好吧，我看我还是等一等吧……"

"你当然会这么办的！"教授说，"我知道，你是个精明的人。再见，我的朋友！"

“你真的打算付给他 4000 镑吗?”等那个债主离去,关上门以后,西尔维亚问。

“那怎么会,我的孩子!”教授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会让这笔钱一直滚下去,直到他死为止。你看,只要再等上一年,这笔钱就会变成现在的两倍,这件事总是值得去做的啊!”

我们这个民族,曾经不遗余力地让“不朽”的允诺成为自己宗教的核心和本质,但同时又最热衷于对复利原则的运用,并且对这一“最有意图性”的人类制度抱有特殊的眷恋之情,这一现象也许不是偶然的。

因此,我认为当达到这一丰裕而多暇的境地之后,我们将重新拾起宗教和传统美德中最为确凿可靠的那些原则——以为贪婪是一种恶癖,高利盘剥是一种罪行,爱好金钱是令人憎恶的。而那些真正走上德行美好、心智健全的正道的人,他们对未来的顾虑是最少的。我们将再次重视目的甚于手段,更看重事物的有益性而不是有用性。我们将尊崇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分分秒秒都过得充实而美好,这些心情愉快的人能够从事物中获得直接的乐趣,既不劳碌如牛马,也不虚度岁月,逍遥如神仙中人。

可是要注意!谈论上面所说的这一切现在还为时尚早,至少还得等上 100 年。而现在我们必须自欺欺人地把美的说成丑的,丑的说成美的,只是因为丑的有用而美的不能带来实惠。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仍然还得把贪婪、高利盘剥和谨慎奉为神明。因为只有这些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要性的沼泽中带出,走上康庄大道。

因此,我盼望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能够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不过,当然这个巨变将是渐进

的，而不会一蹴而就。实际上，这个巨变现在已经拉开了序幕。这一变化的进程将只是意味着，那些经济必需问题已经得到实际解决的阶层和集团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当这种状况有了普遍的发展从而使得“对邻人之爱”的性质发生变化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其间的关键性差别。因为当经济上的意图对你来说已不再是合情合理的时候，对别人却可能仍旧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迈向经济上的这一极乐境地的速度，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我们对人心的控制力量，避免战争和内讧的决心，把理应属于科学领域的事务交付给科学来处理的自觉意愿，以及由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额所决定的积累的速度。只要前三者不出问题，最后一点也就会迎刃而解。

我们在进行经济性目的活动的同时，也应当提高生活的艺术水平，并进行一些试验来为我们的终极目标作些适当的准备，我看这是没有什么坏处的。

但首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过高估计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不能为了它假想的必要性而在其他具有更重大、更持久意义的事情上作牺牲。经济问题应该成为由专家来处理的事务——就像牙病应由牙医来处理一样。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作出努力，使得社会把他们看成是平凡而又胜任其职的人，就像牙医的地位一样，那就再好不过了！



第六部分

后期论文



第一篇　繁荣之路

一、问题的性质

如果我们的贫困是源于饥荒、地震或战争——如果我们缺乏物质条件和资源来进行生产，那么，除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发明创新外，没有别的通向繁荣的道路。实际上，我们是陷于另一类令人尴尬的困境。我们在头脑中进行无形的设计，作出决定，产生行动的意愿和动机，这些活动都是资源和技术手段发挥作用必不可少的东西，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而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困境。这就好像两个在公路上相遇的汽车司机，由于双方谁都不清楚交通规则，因而相持不

下，不能顺利地错车而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自己的膂力没有用武之地，汽车技师也爱莫能助，道路状况再好也同样无济于事。除了一点明确的认识之外，其他什么也不需要、不起作用。

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一个有关人的体力与耐力的问题；不是一个工程问题或农业问题；甚至不是一个企业问题，如果我们的意思是指借助于企业，那些可以使个别企业家发财致富的计算、安排和组织行为。这也不是一个银行业问题，即借助于银行业，可以培养起持久的往来关系，避免不适当托付的那些作出精明判断的原则和方法。相反，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这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更好的表述是，作为经济理论与治国艺术的混合，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我提请人们注意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因为它可以给我们指明其解决办法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恰当的解决办法应该来自某种可大致称为“设计”的东西。然而，许多人对设计并不信任，本能地怀疑其功效。有人仍然认为，勤奋工作、忍耐、节俭、改善经营方式、更谨慎的银行业务，以及首要的、避免对事情作任何事先的设计，这些才是摆脱困境的唯一道路。然而，这些人的卡车恐怕永远也不会顺利通过。他们将通宵不眠，雇用更多清醒的司机，装备新的发动机，加宽路面；但他们仍将永远难以通过，除非他们能够停下来想一想，和对面的司机一起商量，作出一个小小的设计，让双方同时靠各自的左边一点行驶。

从现状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相矛盾之处。但在下面的建议中，却不存在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它只需要进行某种无形的调整，可以说，只需进行某种“纸面上的”改变，就能够创造奇

迹。在英国有25万建筑工人失业，而同时修建更多的住房正成为我们最大的物质需要，这真是一件怪事。有人对我们说，如果要始终坚持稳妥的财政政策和政治智慧，就没有办法能让一个人就业而同时又不使另一个人失业。对这种判断我们应该本能地加以怀疑。那些受到失业者支持的政治家告诉我们，如果他安排这些人去修建住房，那么无论是在目前还是将来，都会使他背上沉重的包袱，因为国家对此负担不起。对于这种考虑，我们难以苟同。这类政治家还认为，增加用来供养失业的造船工人的国家财富，要比把这些失业者现在所耗费财富的一部分用来安排他们去建设人类最宏大的工程，更为节约、更为合算。这种想法是否明智，对此我们也抱有疑问。

相反，我认为财富的创造将增加国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任何增长中，很大一部分都将逐渐充实到国库中去；支付失业者的生活费用是国库的最大支出，而其收入则来源于就业者收入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对这一观点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不管读者是否认为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值得商榷，我都希望他会发现这正是他所期待的答案——这一答案与他的常识是不谋而合的。

我还认为，税收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损害了它所要实现的目标，而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去收获果实，那么税收的减免将带来比预算平衡的增加更好的机会。对这一观点也不应大惊小怪。因为从相反的角度看，今天的情况就如同一个厂商由于经营发生了亏损而决定提高其产品价格；而当销路每况愈下、亏损日渐扩大时，由于对那种简单算术的正确性执迷不悟，他认为再次提高价格是精明的决定；最后，当他的账本收支两栏都变为零时，他仍然振振有辞地宣称，在已经发生亏损的情况

下降价无疑是一种赌博行为。

无论如何，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对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加以考虑。首先从英国国内事务出发，进而利用世界经济大会所带来的良机施行一项积极的政策，对于这样做所能带来的诸种好处我在此重新作了一番审视。尽管这次大会姗姗来迟，不过它也许仍然可算适得其时。因为这次大会正是在许多国家历经痛苦磨难之后，更加愿意考虑这样一项计划的时候来临的。世界正越来越少地寄希望于“守株待兔”，即相信只要我们袖手旁观，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重新走上正轨。

二、国内的扩张

这类方案把发展国内资本作为恢复繁荣的手段，人们不情愿对此加以支持，一般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人们认为一个给定总额的支出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极其有限的，二是因为这类方案通常要求大量的财政补贴，从而会引起国家和地方预算的紧张。这里有许多问题不易予以准确周密的解答。不过，我将努力阐明这一信条，即对以上这两点疑虑的回答要比人们一般所设想的更为令人赞同。

据说，英国在公共工程上，每人一年的工作量所耗费的资本支出大约是500镑。这是根据在工作现场直接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来计算的。然而，公共工程所需要的物资和运输也创造了就业，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考虑进来，以建筑业为例，每位就业者每年工作量所需要的资本支出，估计是200镑。

然而，如果这种新增的资本支出是追加的，并且不是对其

他支出的替代，那么就业的增加将不会到此为止。追加的资本所付出的追加工资和其他收入将花费在追加的购买上，从而顺次地引起进一步的就业。如果该国的资源已得到了充分的利用，那么这些追加的购买将主要地反映在价格的上涨和进口的增加上。不过，在目前的状况下，只有一小部分的追加消费会确实地推动价格上涨和进口增长，因为国内资源存在大量闲置，大部分的追加消费可以在价格不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获得满足；而且，由工人阶级购买力增长而引致的食品需求的增长，既会推动国内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会促进其销售量的增加，对此，我们应该报以积极的欢迎。通过增加需求来提高农产品价格要比人为地限制其产量来提价的办法更胜一筹。

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达终点。雇佣来生产追加资本品的工人会带来追加的购买，而为满足这些追加购买所雇佣的新增劳动力也会进一步带来追加的购买，从而增加其他行业的就业；以此类推。某些热心者注意到了这种连锁反应的事实，但却过分夸大了其总的结果，甚至认为如此创造出来的新增就业量仅仅受制于收入与支出之间必要的短暂间歇，换句话说，只受货币流通速度的限制。不幸的是，它并非如想像的这般尽善尽美。因为，可以说在这一效应的每一阶段上都存在着一定比例的泄漏。在每一阶段上，都有一定比例的新增收入不再传递到下一阶段的新增就业者手中。在这些泄漏的收入中，一部分将被收入的领受者储蓄起来；一部分会使价格提高，因而缩减在其他方面的消费，除非消费者花费的是其作为生产者而获得的利润；一部分将用于购买进口商品；一部分则只是替代了先前的救济品、私人赈济形式的消费或从个人储蓄中提取

的支出;还有一部分收入由于没有对纳税人作同等程度的减免而上缴国库。因此,为了加总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净就业效应,对于以上述各种方式损失的那部分收入的比例,必须作出合理的假定。如果有读者对这种加总的技术方法感兴趣,我建议他参阅 R.F. 卡恩先生 1931 年 6 月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

显而易见,恰当的假定应当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几乎不存在闲置资源,那么就像我上面提到的那样,增加的支出将大部分耗费在抬高价格和增加进口上(事实上,在新增建设所带来的景气的后期,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特征)。如果一个人在失业时得到的救济品与他在工作时赚得的工资收入一样多,并且救济品是以借贷的方式来支付的,那么将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的连锁反应。另一方面,目前救济品是用税款而不是贷款来支付的(因此,削减救济品也许可以提高纳税人的购买力),对于这个问题,在此不再做大量的推导。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在目前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最后结果的某些具体方面。

让我们把由追加的借贷所提供的总支出额称为"初始支出",把由这笔支出所直接创造的就业称为"初始就业"。我在前面已经根据他人的计算估计出,200 镑的原始支出将提供的初始就业量是一年一人。为了说明所涉及问题的重要性而把这一估计作为大致的依据,对此没有理由怀疑其合理的准确性。至于这笔贷款的目的,是为公共工程筹资还是资助私人企业,都无关宏旨。在任何一种情形中,这笔初始支出都将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引致可以方便地称为"次级就业"的效应。我们的问题是要把初始和次级就业者加总起来,得出

由给定的追加贷款支出所创造的就业量，即要确定关于总就业量和初始就业量之间的乘数。

由贷款提供的100镑初始支出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够成为英国人手中的新增收入的资金（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美国人）。这部分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构成：（1）在进口物资上的花费；（2）用于购买这类产品的资金，即不是新近生产的、而只是被转手的产品，例如土地，或来自库存（这些库存不再加以补充）的产品；（3）用于购买从其他工作中抽出来的人力、设备等生产性资源的资金；（4）变成工资，并且替代了从用于救济的借贷资金中转移而来的收入。第二部分，是那些在英国人手中成为追加收入的资金，根据是用于储蓄还是开销（开销在本文中包括收入领受者所有直接的支出，包括用于耐用品生产的支出），这部分资金又可分为相应的两块。

为了得出乘数，我们只消简单地估计一下这部分资金的比例，即是说，在代表性的支出中，有多大的比例可以转化为人们的收入；而在这部分收入中，又有多大比例用于开销。把这两个比例相乘，我们就可以得到初始支出流与次级支出流之间的比率，也即初始作用与第一次连锁反应之间的比率。第二次连锁反应与第一次连锁反应之间的比率也同样可以照此推出，以此类推。因此，我们就可以加总出整个系列的连锁反应的效果。

对这一抽象的论证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两年前，当时英国的救济是用贷款来补贴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在计算支出中转化为追加收入的比例时，必须作大量的扣除，不过这一点今天已无必要。而两年以后，如果就业状况比现在好得多，

那么也许有必要对耗费在仅仅是从其他用途中抽出来的资源上的支出作大量扣除，因为闲置资源的储备越小，就越可能是由于支出的增加而产生的结果。我并不准备在任何时候都对取自库存的物资作大量的扣除，因为库存一般来说都很少，而且被提走的部分很快会得到补充。对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使收入增加的支出部分作30%的扣除，剩下70%累积在人们手中作为现时收入，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估计。

在这部分追加的收入中又有多大比例会转化为追加的支出呢？对于靠工资为生的阶层，可以有把握地设想，这笔收入中的绝大部分会被他们花费掉；而如果这部分收入是增加的利润、薪金、专业技能报酬，那么其中的大部分将被储蓄起来。我们不得不确定一个大致的平均数。例如，在目前状况下，我们可以假定：在增加的收入中，至少有70%会用作开销，而有不超过30%的收入会被储蓄起来。

按照上述假定，第一次连锁反应将是初始作用的49%（因为，$7\times7=49$），或者（大约）1/2；第二次连锁反应将是第一次的1/2，即初始作用的1/4；以此类推。如果读者会小学算术的话，他就可以算出：$1+\frac{1}{2}+\frac{1}{4}+\cdots\cdots=2$，因此，乘数是2。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总效应的7/8来自初始支出和前两次连锁反应，所以时滞效应在此对结果的影响并不太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由增加的需求所带来的任何价格上涨，都没有额外的补贴。价格的提高很可能是剩余资源在某些方面不再是那样充裕的征兆，这样，新增支出中由其他用途转移而来的部分就越来越大，而变成新增收入的部分则逐渐缩减。更高的价格也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利润，这样，新增收入

中表现为利润形式并被储蓄起来的部分也就越来越大，而表现为工资形式的部分则越来越小。因此，随着人们逐渐重新就业，以及与此同时价格逐渐上涨，则乘数也将逐渐缩小。而且，就工资的提高来说，显而易见的是相应于一定工资支出的就业量也将逐渐减少。然而，这种修正只有当我们的解决方案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时才是恰当的。在现阶段，由于很多原因，一定量的支出对于就业所产生的影响，要比将来闲置资源的余额缩减以后更为巨大。

为了说明乘数的合理估计范围，让我们考虑一下在其他假设条件下的结果。如果假设初始支出转化为收入的比例和收入中用于开销的比例都是60%，则可以得出乘数为$1\frac{1}{2}$，由于这两个比例似乎不可能比今天的70%更低，所以$1\frac{1}{2}$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乘数的最低限值。相反，如果假设上述两个比例都是80%，则乘数大约是3(读者可以亲自计算来核实一下)。我认为，在估计支出中转化为追加收入的比例时，首先得谨慎从事。而根据这样的一些假定得出的估计值是，在英国追加支出(无论是新增资本品还是新增消费)中转化为追加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6%，而这部分收入中用作开销的比例则不低于75%。对这个结果我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我更乐意把后一个比例提高到80%，而不太情愿把前一个比例提高到70%。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以上面这些估计值为依据，其乘数也是2。美国读者也许有兴趣考虑最符合美国当前条件的假定，我个人推测美国的乘数肯定会大于2。

三、预算紧张的缓解

我在前面的章节力图证明上述假设的合理性。根据这些假设，在英国，一笔 100 镑的初始支出的 2/3，也即 66 镑，将直接转化为新增收入。而包括次级作用在内的总的收入增加量为：£66(1＋⅔＋4/9＋……)，即 200 镑。为了确定这些乘数效应对预算状况的总的缓解作用，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加以估计：首先是这些效应对原先用于失业的开支的节省，其次是对新增收入征税所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增益。

这笔追加收入并不会全部落入以前靠救济品为生的人的手中。一部分会变成利润，一部分成为薪金和专业阶层的收入，一部分则成为新增工人的工资——这些人由于已经部分地就业或其他某些原因，原先并不领取救济。

然而，我认为可以相当有把握地假设，先前靠救济品为生的人可以获得这笔直接的新增收入的 2/3，即 44 镑。这意味着在每周 50 先令的平均工资下，每年可以增加大约 1/3 个人的就业量。

按照我们所采纳的假设，100 镑的初始支出将产生 66 镑的新增收入，而这笔收入中的 75％将用作开销。在这第二级支出中，只有 66％将再次转化为新增收入，以此类推。这样，100 镑的初始支出迟早会为那些领取救济者创造出每年 2/3 个人的就业机会。同时，它将带来 200 镑的新增收入。不过，如果读者认为另外一组数据更为可能，那么我在此提供的注释可以使他能够按自己的假设来算出他的答案。

现在，我们来估算一下这种乘数效应对预算状况所产生

的总的缓解作用。为了使计算简单明了，通常把供养一个领取救济者一年所需的开支定为50镑①。因此，一笔100镑的贷款支出，通过为领取救济者提供每年2/3个人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失业救济开支减少了33镑②。

不过，由于100镑的贷款支出可以使国民收入增加200镑，因而预算还可以从这事实中获得进一步的好处。因为税收收益的增减多多少少是与国民收入成比例变化的。今天我们在预算上的困难主要是由于国民收入的下降造成的。现在，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且假设它只与国外进行单边贸易，则其收入正好与其支出（包括消费支出和新增资本支出，但不包括转手的中介性变换）相等——我的支出即是你的收入，这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名称③。

现在，大约平均20%的国民收入作为税收上缴财政。确切的比例须视新增收入在不同范围内的分布而定：较高的收

---

① 对于成年男工，这是个保守的数字。在1932年，包括青少年和妇女在内，完整的平均数是48.3镑（即一个失业者每年平均花费的44.2镑再加上雇主和雇员每年对失业者平均捐助的4.1镑）。

② 这个例子在内容上与英国版是一致的，但在表述上略有差异。

③ 在英国版中，接下来还有一段："因此，新增的300镑资本支出，如果是由追加的贷款来支付而不是来源于对消费支出或现存资本支出的削减，并且把连锁反应考虑进来，则将使国民收入的增加超过300镑。要计算出在这种情况下的恰当的乘数，其方法与就业的例子大同小异；不过，由于计算国民货币收入不必对价格的上涨作同样的扣除，因此这一乘数可能要大一些。但是，为了更有把握一些，姑且让我们像前面一样，把这个乘数值也取为1.5。这样，300镑的资本支出将增加作为税源的450镑国民收入。"

入范围是直接税的税源,而较低的收入范围是间接税的税源。另外,某些税种的收益增减与国民收入的变化没有密切的关系。考虑到这些存疑之处,我们姑且把上缴财政的新增收入的比例定为10%,即200镑新增收入有20镑转化为新增财政收入。事实上,这种税款的征收存在着某种时滞,不过我们可以不必为此劳神费脑,虽然有的人赞同对我们刻板的预算计划进行修正,主张为了便于作出这些估算而把预算期间延长到一年以上。对于他们,时滞效应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增加税收会导致国民收入的减少,但由于这一过程存在着时滞效应,因此我们现存的预算程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被认为是顾此失彼:平衡了今年的预算,却同时打破了明年的预算;反之亦然。

因此,100镑的追加贷款支出给财政部所带来的好处,至少是33镑加上20镑,总共53镑,即相当于贷款支出的一半多一点①。在此我们看不到任何自相矛盾之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即国民收入的每一次下降,其相当的比例都将通过救济品的增长和税收收益的减少来惩罚财政部。因此,很自然地,这些增加国民收入的措施将使财政部获益匪浅。

今天,至关重要的贷款支出计划正获得支持。有的观点认为人们将在增加就业的方案和平衡预算的方案之间进退两难,对前一个方案的实施必须是渐进而谨慎的,否则就会损及后者。如果我们应用上面的推理来考察这种意见,就会发现它

---

① 英国版用了一组不同的数据,不过是以同样的原则来运算的,然后接下来还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取的乘数为2,则是贷款支出的2/3"。

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要使预算得以平衡，除了增加国民收入外别无选择，而这与增加就业是同一件事情。

人们提出了一项建议，准备花费 700 万镑修建新的刚纳塔(Cunarder)，可以把这项计划作为例子。我认为财政部从中获得的好处至少是这个数额的一半，即 350 万镑，大大超过了它答应资助的最高金额。

或者，以 1 亿镑的住房建设支出为例，无论它是用于改造贫民区，还是由国家住房委员会来支配，都将使预算获得巨大的好处，大约是 5000 万镑——这一数据远远超过了任何必要的补贴。如果读者对这一结果感到怀疑，认为它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么我提请他再回想一下导出这一结论的论证过程。而如果他连自己的判断也不相信，那么，我不得不指出，企图推翻这一观点的基础的那些尝试①，至今还不值得让我认真对付。我是在《泰晤士报》的讨论会上，第一次向公众阐述这一观点的。

实际上，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税收减免的情形。要实现税收的减免，可以暂时停止积累偿债基金，同时恢复把贷款作为筹资方式的习惯做法，那些适合此种筹资方式的公共事业，例如以公路基金来承担的新建公路的费用，以及一部分救济品的费用，如果以贷款的方式来加以筹集，那么它们最终可以赶在我们所期望的好光景到来之前就恢复平衡。因为与贷款支出所增加的购买力一样，纳税人购买力的增加正好可以产生同样有利的连锁反应；而且这种增加支出的方法会以某种形式更健康、更良好地扩展到整个社会。如果财政大臣通过暂停

① 在英国版中，这个句子指的是可能的、将来的尝试。

积累偿债基金的提议，以及为上面我们考虑过的合适的项目贷款，那么就可以使税收减免5000万英镑，而实际上，通过对救济品的节省和在一定水平下获得更高的税收收益，他可以使这笔减免额的一半再回到自己手中——虽然，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不一定是在同一个预算年度内回到他手中①。

我还必须补充一点，对于以削减等量的政府开支（例如，削减教师的薪金）来平衡的税收减免，这个特殊的观点是不适用的，因为这只是意味着国民购买力的再分配而不是净增长。对于所有那些不是其他支出的替代，而是来自于储蓄和借贷的追加支出，这一观点是完全适用的。无论这种支出是由私人还是由公共机构来进行的，无论它是用于购买资本品还是消费品，也无论它是通过税收减免还是其他方式来获得的②。

如果这些结论是成立的，那么照此而行不是十分明智吗？那种力图通过征税、限制和谨慎来平衡预算的相反政策，是肯

① 在英国版中，接下来是："因此，我强烈支持这一建议，即应把下一年的预算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应该包括那些在目前状况下适合作为贷款支出的支出项目"。

② 在英国版中，接下来是："人们经常指出，在政府鼓励下的大规模贷款支出，未能阻止失业的增长。然而，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外汇收支状况恶化的速度要比贷款支出增长的速度更为迅速，这些贷款支出的作用被部分地抵消了。大致说来，贷款支出增减1000万镑的效用与外汇余额增减1000万镑的效果相等。所以，以前我们没有从贷款支出中获得明显的好处是因为它被外汇收支状况的恶化抵消了。而最近我们没能从外汇收支状况的改善中得到明显的好处则是因为它被贷款支出的减少抵消了。今天，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将是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同时使这两个因素变得对我们有利。"

定不会成功的，因为它必定降低国民购买力，从而降低国民收入①。

当然，上述观点对于支出增减变化的两种相反情形都是同样适用的。初始支出的增加可以对就业、国民收入以及预算状况以上面所描述的那种方式产生乘数倍增效应；同样，初始支出的减少则可以以相同的方式产生乘数倍减效应。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难以解释英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衰退（美国则更甚）。正如人性中节制的一面的最初冲动产生了破坏性如此之大的连锁反应一样，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适当地刺激人性中相反方面的冲动，那么也将会带来惊人的复苏。这并不是魔术，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而是一个可靠的科学预言。

为什么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会在那么多人的眼中显得新奇、古怪和自相矛盾呢？我只能从下面这一事实中找到答案：不管我们意识到没有，通过教育、环境以及传统的灌输，我们头脑中所有关于经济的那种思想，都充斥着理论上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只有在一个没有任何闲置的生产性资源、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中，才可以恰当地适用。许多人都企图依据一个假定不存在失业的理论去解决失业问题。显而易见，如果一国的所有生产性资源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那么在目前条件下，我所预言的那些可以从贷款支出的增加中获得的好处，都将是子虚乌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的贷款支出将仅仅是消耗在价格和工资的提高上，以及使资源的使用发生转移。换句话说，它将引起纯粹的通货膨胀。这些观点，虽然在合适的

① 在英国版的这一章中，没有下面的段落。

背景下是完全正确的，但却与现状相去甚远。对于目前的这些问题，只能通过上面我所力图解释的那种人们还不太熟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四、价格的提高

正是英国政府以及那些聚集在渥太华的帝国代表们所宣布的政策主张提高价格。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从财政大臣的某些言论来判断，他似乎被这一想法所吸引，即通过限制供给来提高商品价格。这样，某一特定商品的生产者就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好处，从而联合起来限制产量。同样地，通过限制那种能够加以操纵的商品的供给，某一特定的国家也可以从中渔利，虽然是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如果在世界范围内某种商品的供给与其他商品的供给严重失衡，那么，通过有组织地限制这种商品的产量，甚至可以使整个世界获益，不过这种情形极其少见。然而，把限制产量作为包治百病的药方，不仅可能毫无效验，甚至还会贻害不浅。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那些缩减产量的生产者终将自食其果，使自己的收益蒙受损失，而由此带来的需求的减少正好与供给的减少同样多，所以，限制产量远不是一种减少失业的手段，而是一种以多少增加失业为代价来更平均地分配失业的手段。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提高价格呢？如果把我所要说的东西概括成一系列非常简单但却很重要的命题，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思考这个问题。

(1) 因为所有商品作为一个整体，要提高它们的价格，只

有使对它们的消费增加的速度快于其市场供给增长的速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2）支出的增加，只能通过大众把他们已有的收入中一个更大的部分花费掉来实现，或者以其他方式增加他们的总购买力。

（3）从现存收入中增加开支的余地是很小的——无论是减少储蓄还是增加资本性的个人开支。在今天，由于收入剧减而税收猛增，致使许多人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而把储蓄减少到了健康的习惯所要求的限度之下。对任何尚有余力增加开支的人，特别是如果他有机会在新增资本或半资本性的用途上增加开支的话，应该鼓励他们去这样做。不过，如果认为仅仅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避重就轻。因此，结论是我们必须以增加总体购买力为目标。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它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价格，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就业。

（4）有些人可以通过实际地生产黄金来挣得他们的收入，撇开这种特殊情况，在一个国家中总购买力的增加大致只能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① 增加社会的贷款支出；②改善外汇收支状况，以使目前支出中更大的一部分能够再次成为国内生产者的收入。英国工党政府以公共工程的方式尝试了第一种途径，虽然是半心半意地，并且相关条件也不利。政府已成功地尝试了第二种途径。然而，我们尚没有同时尝试过这两种途径。

（5）不过这两种途径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只有第一种途径才是对于整个世界有效的，第二种方法仅仅意味着一个国家从其他国家抽取就业和购买力。因为当一个国家提高其外

汇结余时，结果是某个其他国家的外汇结余缩减。所以，我们不能以这种方法来增加总产量或提高世界价格，除非是作为一种副产品，通过增加像英国这样的金融中心的信心，使之更愿意在国外发放贷款，从而有助于增加贷款支出。

直到最近，英国还把货币贬值和关税作为自我保护的武器。当我们被迫使用这些武器时，它们的确非常有效。然而，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和竞争性的关税，以及用来改善个别国家外贸状况的更加违反自然之道的那些手段，例如兑换限制、进口禁令和配额等，当它们被各国广泛地运用时，只能造成相互的损害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中获益。

因此，除了增加整个世界的贷款支出外，没有其他任何有效的方法来提高世界价格。美国在国内外广泛地运用贷款支出加速了其信用的崩溃，事实上，正是这种崩溃成为引发这次萧条的导火索。

一些流行的解决方案之所以能够流行，恰恰在于它们倾向于促进贷款支出。不过，在增加贷款支出的工作中有好几个阶段，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出了问题，我们的目的都将难以实现。因此，下面我将进一步尝试对问题进行有条理的分析，请读者稍安勿躁。

(1)首要的一点是，银行信用应该是易于获得的、充裕的。只有当每个中央银行都觉得自己拥有充足的国际货币储备，从而解除了后顾之忧的时候，这一点才可能实现。由于丧失了对银行信贷平衡的信心，使得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为了这个目的而构建国际货币的努力举步维艰，并使储备的短缺状况雪上加霜。世界黄金储备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这种情况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引起的。另一方

面，我们都极力赞成提高金矿的产量，或者是减少印度深藏不露、不能发挥作用的积财，因为储备货币的数量将会由此而增加。根据黄金价格来使本国的货币贬值，是这类解决方案中的又一种办法。或者，放弃固定不变的黄金平价可能也会对此有所帮助，因为如果必要的话，一国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允许用外汇兑换黄金来缓解紧张局面，从而只需要一个较小规模的国际货币储备。降低银行发行纸币所必须掌握的国际货币的法定比例，也可能会在较小程度上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在复苏的早期，能够可靠地以短期银行信用形式筹得的贷款支出并不太多。只有当企业确实开始有了起色以后，银行信用才会开始在资助企业恢复流动资本方面发挥作用。在平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指望第一个阶段自动地引导出随后的几个阶段，不过在今天的条件下却不可能实现。

(2) 因此，当长期利率对所有明智、稳健的借贷者来说都比较低时，那么就一定达到了第二个阶段。这要求政府和中央银行协同动作，其形式可以是银行在公开市场上的操作，可以是财政部制定适时的兑换方案，还有得到舆论赞同的预算方案来恢复对金融的信心，以及其他一些方法。不过，在这一阶段上还存在着某种困境，因为由于心理上的原因，要转向较低的长期利率，也许确实需要把暂时减少贷款支出作为必要的手段。然而，既然政策的总体目标是促进贷款支出，那么显然我们必须谨慎从事，这种暂时的缩减只应以我们所需要的时期为限，哪怕是稍微延长一天也不好。

一些国家已经达到了第一个阶段，但是只有英国才达到了第二个阶段。这是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的巨大成就，他

们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转变；对法国和美国来说，完成这一任务要容易得多，直到最近也还是如此，但他们却做得一塌糊涂。

(3) 不过，还有第三个阶段。因为即使我们已经达到了第二个阶段，单靠私人企业的积极性，不可能承担起足够规模的新增贷款支出。只有当开始重新获得利润之后，企业才会寻求扩充；只有当产量增加以后，企业才需要增加流动资本。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正常的贷款支出项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公共或半公共机构来承担的。商业和工业在一年中所需要的新增贷款支出，即使是在生意景气的时候也比较小。建筑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则在任何时候都占用了当前贷款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

因此，第一步必须调动起公共权力机构的积极性。因为如果要打破恶性循环、阻止进一步的衰退，那么很可能不得不采取大规模行动，这就要求我们下决心组织起来，并日益坚定地抛弃消极回避的态度，丢掉那种所谓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幻想。

某些愤世嫉俗者有一种非常偏颇的观点，他们断定，唯有战争才能终止一场较大的衰退。因为，迄今为止战争是大规模政府贷款支出的唯一目标，而这一规模在政府看来是相当庞大的。但他们在一切与和平有关的问题上，却都是畏首畏尾、谨小慎微且三心二意的，全无半点坚韧不拔和毅然果断的精神，并且把借贷看作是一种负担，而不是社会剩余资源向有用资产转化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这种转化，它们就将被白白地浪费掉。

我希望即使是在与和平有关的任务上，英国政府也能够表现得干劲十足。10 万套住房是国家的资产，而 100 万失业

者则是国家的责任，要理解这一点应该并没有什么困难。

（4）然而，我们的主题是提高世界价格，要实现这一点，还必须有第四个阶段。必须把贷款支出的良好影响扩散到全世界，如何促进这一过程是下一章的论题。

五、给世界经济大会的建议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要提高世界价格，除了增加整个世界的贷款支出外别无他途。我建议，应该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作为世界经济大会的中心议题。我认为，有且只有三种方式能够为完成这一任务提供帮助。

（1）第一种方式也许是最为明显的，即由那些外汇收支状况良好或者黄金储备过剩、有较强金融实力的国家，向那些实力较弱的债务国提供直接的外国贷款，这是一种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方式。

今天也许有机会再恢复这种传统的政策。但是，如果现在指望这种外国贷款支出能够在复苏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则是一种空想。最有能力提供贷款的那些国家提供贷款的可能性最小。而当私人投资者过去已经承担的风险落得如此糟糕的结果时，期望他们再来承担这种风险也是毫无道理的。

（2）更有希望的是第二种方式，即金融实力较强的那些国家，可以按照前面第二章所介绍的几种方法，在国内增加贷款支出，因为这种支出将带来双重的好处。就花费在国产商品上的支出来说，初始的贷款支出对于就业会产生有利的乘数效应。至于由此所引致的进口支出的增加，也将在国外产生类似的有利效应，并且会加强出口国的地位，增加他们自己的贷

款支出，从而带来相互的购买。这样雪球就越滚越大。

因此，对于由国内贷款支出这项大胆政策所可能带来的进口增长，利用国内有效资源来为之提供资金，这种方式也许要比向国外告贷略胜一筹。此举同样有利于外部世界，并且肯定要比进一步增加国际债务更为有益。

（3）然而，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论的种种解决方案，它们在量上的效果再次显得好像与提高世界价格这一主题难以相称。除非许多不同的国家差不多同时大量减免税收和增加贷款支出，否则我看不到任何可靠的前景，表明在一段适当的时期内世界价格能够得到充分的提高。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增加支出的同时性。因为每个国家都担心增加自己的国内贷款支出会增加其外汇平衡的压力，而如果其他国家也同时实行相同的政策，则这种压力就可以相互抵消。孤立的行动是鲁莽的，共同行动则不会有任何危险。

现在，我们的观点又前进了一步。在这里，联合的国际行动成为政策的核心。这就是说，我们已经触及到了世界经济大会所讨论的议题领域。我认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设计出某种联合行动，以减轻中央银行的焦虑，缓解其储备的紧张，或者消除对这种紧张的恐惧和预期。这将使许多国家能够达到我在第四章曾指出过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银行信用是充裕的、易于获得的。然而，通过国际行动，我们可以把马领到河边，但是却不能强迫它喝水，那是这些国家自己的国内事务。不过我们至少可以为他们提供水源。这次世界大会的首要任务是释放出千万条购买力的溪流以滋润干涸的世界，使之恢复生机和活力。

世界大会如果只是忙于制定有关减免关税、取消配额和

放松外汇管制的善意决议，那么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因为这些措施实际上并非是英国或英帝国审慎政策的体现，而一直是作为一种自卫的手段被勉强采用的，它们只是外汇紧张这一病症的征候，而并不是其病根。仅仅通过一张善意的决议来哀叹种种病征而毫不触及其病根，这对国际会议的精神来说代价是高昂的。英国应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样一项任务，即提出能够治本的具体建议，从而使这次大会能够具有实际的意义。

为了获得一个较好的机会来实施这些积极的治疗方案，某些事情必须预先予以解决。首先，我们都赞同战争债务和战争赔偿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因为对严重的外汇紧张的恐惧正是由此而起，可以说这是首要的原因。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为我们的联合行动创造良机。不过，我们有没有一项积极的行动计划来抓住这一机会呢？

如果不通过向各国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供给更充足的国际货币储备以减轻他们的忧虑，那么任何方案都不可能很快地见效。为了所考虑的这一目标而设计的计划有许多种，它们相互之间是极其类似的，颇有些相通之处。在经过多次私下讨论并借鉴了他人的想法之后，我相信下面所要提到的计划是最好的一个。如果还有其他的计划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则不妨把它作为最佳选择。

任何增加国际货币储备的计划都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增加的储备必须以黄金为基础。因为在迅速地停止将黄金作为国家货币使用的同时，黄金却正成为最普遍持有的国际货币储备，被用来对付外汇的外流。第二，它不应该是施舍性的，不仅特别贫穷的国家能够得到，而且所有符合一般原则的参与国都应该能够得到。事实上，今天只有极少数国

家——如果有的话——可以高枕无忧，不再需要对自己的地位作任何加强。第三，未完成的增加储备的数量应该具有灵活性，这样，它们就将不是作为世界货币供应的永久性净增长来运作，而是作为一种平衡因素来起作用，当世界价格像目前这样不正常地低落时，可以把它们释放出来，而当价格涨得过高时，又可以把它们收回去。这些条件能够通过以下几方面得到满足：

（1）应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发行金本位纸币，其面值应当按照美元的黄金含量来表示。

（2）这种纸币发行的最高限额应当是50亿美元，每个参与国可用自己政府的黄金债券来兑换面值相等的纸币，直到各自的最高限额为止。

（3）确定每个国家的份额比例所依据的原则，应当是其在最近某个标准时期，比如说，1928年末，所持有的黄金储备数量；其前提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份额都不应超过4.5亿美元，并且不能动用管理委员会的权力来对这一原则的严格性加以变通，除非它能够提出不必严格坚持这一原则的特殊理由（例如，对那些使用白银的国家，应该规定某些特殊条款）。这一原则的作用在于，使每个国家能够增添到其储备上的份额都服从于上述最高限额的约束，即与其在1928年所持有的黄金数量大致相等。在本章的附录中，给出了每个国家的份额的具体分配比例。

（4）每个参与国的政府都应承担起这一任务，即通过立法来规定这些黄金债券应该被当作等值的黄金来接受，并且不进入实际的流通，只由财政部或中央银行来掌握，或者作为国内纸币发行的储备。

(5) 这机构的管理委员会应由参与国政府来选举,这些政府应当完全把其权力委托给它们的中央银行,每个代表都有与其份额相称的投票权。

(6) 这种黄金债券是带利息的,一开始这种利息是非常低的,并由管理委员会根据下面第(8)条规定,不时加以变更。担保这些黄金债券的政府,必须保证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可偿付的,或者由管理委员会根据第(8)条予以警告。

(7) 这些利息在偿付了开支以后,应以黄金形式作为保证基金存留起来。另外,每个参与国都必须保证承担与其最高限额相称的、由于违约而造成的任何最大限度的损失。

(8) 管理委员会应致力于运用他们的处理权限来修正纸币发行量或黄金债券的利率,以实现一个唯一的目标,即对于进入国际贸易的初级产品尽可能地避免其黄金价格上涨到某个约定的标准之上,这个标准应当在当前的价格水平和 1928 年的水平——也许是 1930 年的水平——之间。

附　　录

在前面,提出了分配 50 亿美元黄金本位纸币的原则,则按各国在 1928 年末所持有的黄金储备来确定比例,并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最高限额是 4.5 亿美元,下面是由此制定的分配比例:

七个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阿根廷和日本)有资格获得每国 4.5 亿美元的最高限额。

单位：百万美元

意大利	266	匈牙利	35
荷兰	175	捷克斯洛伐克	34
巴西	149	罗马尼亚	30
比利时	126	奥地利	24
印度	124	哥伦比亚	24
加拿大	114	秘鲁	20
澳大利亚	108	南斯拉夫	18
瑞士	103	埃及	18
波兰	70	保加利亚	10
乌拉圭	68	葡萄牙	9
爪哇	68	芬兰	8
瑞典	63	希腊	7
丹麦	46	智利	7
挪威	39	拉脱维亚	5
南非	39	立陶宛	3
新西兰	35	爱沙尼亚	2

除了智利的情况值得特别考虑以及希腊和加拿大的情况也需略加斟酌外，这个特定的日期对任何国家都是公平的。如果我们取从 1925 年到 1928 年任何一年年末时持有的黄金储备的最高数字，则上面全部国家中只有如下几个的份额比例发生了变化：

单位:百万美元

	1928年	1925—1928年间的最高储备量
丹 麦	46	56
希 腊	7	10
荷 兰	175	178
加拿大	114	158
新西兰	35	38
爪 哇	68	79
南 非	39	44

六、国际纸币发行与金本位

在上一章我提出了发行国际纸币这一举措,以此来减轻各国中央银行的忧虑,使他们能够腾出手来促进贷款支出,从而提高价格、恢复就业。这一政策的必要性来自我反复加以强调的那个结论,即要提高世界价格,除了增加贷款支出以外别无他法。不过,应该试着给出一些具体内容,以进一步充实这一意义深远的建议,我觉得这是值得一做的。

如果这一建议能够获得充分的赞同,那么它的施行将提供一个良机来确保实现下面这些承诺,即由此得到的援助应当首先用于减少某些由于环境恶劣而在国际上变得通行起来的不合理做法。例如,外汇管制应当取消;停顿协议和外汇结存的冻结应当被逐步清偿的切实计划所取代;旨在保护外汇结存而不是致力于长期国家政策的关税和配额应予废除;较有实力的金融中心应重新开放其外汇信贷货币市场;应当在延续偿债基金和根据价格指数降低利息和本金等手段的辅助下,停止对国外持有的公债的延期偿付,那些即使是在新环境

下也无力偿付的国家必须得到一个独立的专家团的认可。我个人的观点是应当拒绝那些不履行其国际协议和义务的国家参与这个计划。

受这些外部条件制约,让各国去自行选择使用其份额的最佳方式也许是明智的,因为不同国家的需要是千差万别的。一些国家要解除紧迫的外汇负担;一些国家要恢复预算上的平衡;一些国家想重建商业信用;一些国家要为兑换计划做准备;一些国家则想实施国家发展计划;等等。不过所有类似的用途都将趋向我们所期望的方向。

然而,还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我尚未提及。这种国际纸币应当是金本位纸币,并且参与国必须同意把它们作为等值的黄金来接受。这意味着每个参与国的本国货币必须与黄金保持某种特定的联系。也就是说,这涉及到金本位制的某种有限的恢复。

近来我一直把黄金说成是“野蛮时代的遗物”,但在我国政府为恢复金本位制而规定了他们自知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之时,我却成了这一政策的鼓吹者。在某些人看来这也许是件怪事。这可能是由于我从未迷恋过黄金,因而也不那么容易感到幻灭。不过,这主要是因为我相信在黄金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挫折之后,现在应当为它将来的管理规定一些条件,否则它就将不再为人们所接受。无论如何,我所提倡的政策是服从于下面这些限制条件的。

采纳发行国际货币这一建议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每个参与国应当在黄金和其本国货币之间实行事实上的平价政策,同时黄金输送点之间应该有不超过5%的幅度。我断定,由于有了新增的黄金和新发行的等量纸币,各国所承担的这一义务将是安全而适当的。如果有必要,则这种事实上的平价应当

和银行利率一样，根据形势的需要时常变动——尽管人们希望只作小幅度的变动。在对国际价格的未来走向以及新的国际权威机构影响这一走向的成败得失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前，贸然实行固定不变的平价是不明智的；而且，这种做法需要长期保持某种能够在国内和国外环境之间作出逐步调整的力量。另外，管理委员会应该有对紧急情况和例外情况的某种自由处置权。根据最近的经验，黄金输送点之间保持5%的幅度是必不可少的，这对于流动资金在各个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任意游荡是一种抑制因素和保护措施，并且可以让银行利率和信贷政策获得合理的独立性以适合不同的国情——虽然，在正常的实际运作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中央银行把它的本国货币的黄金平价维持在一个更狭窄的幅度之内。

在这些预防措施之下，外汇收支状况将具有更大的稳定性，由此带来的好处甚多而损害极少。汇率波动只是用来抵消国际价格水平的偶然变化，或者针对某一国家临时的或永久性的特殊情况，以最小程度的摩擦来进行一定的调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用途；但不允许以其他任何理由进行这种变动。

我们的当局为在这个国家即使是有限地恢复金本位规定了先决条件，即世界黄金储备必须有更平均的分布。在此提出的这个计划可以使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我认为这可以说是该计划的一个相当大的附带好处。事实上，我想像不出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在一段适当的时期内满足这一条件。因为，如果这一条件意味着法兰西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将和那些穷国均分它们的黄金储备的话，那么很清楚，这是白日做梦，在今天尤其如此。同样地，如果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向国外提供大大超过其外汇结存的巨额贷款，以至于引起严重的黄金外流，

那么任何明白事理的人都不会对此抱有希望。而且,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由于把外汇结余作为储备货币的做法已经登峰造极,同时根据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中心的经验来看,考虑到能够流动的外汇结余规模,这不仅仅是一个黄金分配不均的问题。在最近这场国际信用震荡之后,维持一定的世界价格水平所必需的储备货币的绝对数额要比以前巨大得多。这并不一定是个永久性的要求。不过,在今天这一要求却无可回避。而且,如果我们希望中央银行能够神定气闲,免于担惊受怕,就必须满足这个要求,因为这是中央银行放心大胆地鼓励增加贷款支出以提高世界价格的一个条件。因此,像我前面所提出来的这一类计划,已经成为世界复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我们只是对提高世界价格的必要性喋喋不休而对唯一能实现这一结果的措施却置之不理,将是于事无补的。

所有国家的通货根据黄金储备同时贬值,这一建议有时也被作为一种备选方案提出来。虽然这一措施也能够带来某些好处,但却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即它只会锦上添花,提高那些已经拥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因而相对强大的国家的地位。

七、结　论

我一直力图以寥寥数语涵盖这样一个内容广泛的领域。不过我的主题在实质上是简单的,因此我希望我已经把它传达给了读者。

许多当前流行的建议实际上与这本小册子中的计划意旨相似。一些建议涉及到这一领域中的一部分问题,一些建议则涉及到其中的另一部分问题。如果我们想采取足够的行动来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计划就不止一个。在对那些甚至在景气时期也会导致大量失业的因素作了全面适当的考虑之后，英国负有使至少100万人重新就业的任务。前面我把推动一个人工作一年需要150镑的初始支出作为我论述的假设前提，根据这一数字，我们需要的新增贷款支出加上新增外汇结余总额为1.5亿镑①。在世界的复苏来临之前，我们不能指望从外汇结余中获得更进一步的援助来达到这一总额。因此，我们应该谨慎一些，假定每年能从增加的国内贷款支出中获得的迫切需要的追加初始支出为1亿英镑。

要实现这一数额是非常困难的，但并非完全不可能。暂停偿债基金和为了某些合适的用途而借贷可以使一部分税收得以减免。通过这一途径也许至少能够顺理成章地获得5000万镑；在此基础上，私人企业追加（比方说）6000万镑的贷款支出，这将是重建就业的重要步骤。对这一步骤，地方当局、公共机构和中央政府可以给予帮助，也可以放手不管。

由于以前努力的效果被相反的力量所抵消，我认为对于按照这些方针采取富有成效的行动所具有的潜力，我们是过于悲观了。贷款支出和外汇结余的效果是紧密相关的，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与1929年相比②，1930年的外汇结余下降了

① 美国版在此处还有一句："如果我们取更为乐观的、也是我倾向于赞同的数字，即每人100镑，那么所需要的初始支出将是每年1亿英镑。"

② 这一数字是商务部的估计结果，其中不包括1932年以黄金形式向美国偿付的债务。我个人认为在所有这几年中，确切的数字也许要比商务部的估计值高出2500万，不过这并不影响上面给出的比较数字。

7500万镑,1931年则下降了2.07亿镑。因此,正是外汇结余的迅速减少使得工党政府增加就业的努力付诸流水,他们所承担的追加贷款支出与上面外汇结余的减少相比,其规模要小得多。不过,虽然1932年的外汇结余与1931年相比增加了7400万镑,但却同样没有带来就业的增加,因为其效果被多党联合政府大幅度削减贷款支出的措施抵消了。天知道如果把工党政府对外汇结余不加保护的政策和多党联合政府削减贷款支出的政策结合起来,会使我们陷入什么样的困境!企业的亏损将急剧增加并与美国公司的惨境不相上下①,我们的铁路公司将会破产,整个国家的工业实际上将陷入停顿。另一方面,英国至今尚未尝试过另外一种政策结合的方案——在实行保护外汇结余的政策的同时倾尽全力刺激贷款支出的增加。

因此,我恳请政府在确定我们的国内政策时,对于这项尚未被尝试过的结合方案不妨一试;我们出席世界经济大会的代表们也应该大力宣扬按照前面所提出的一般方式来扩张世界的储备货币。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紧急关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前途的确是迷雾重重。不过,至少还能够清楚地看出当前这条道路正把我们带向深渊。没有人怀疑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提高世界价格,否则我们将看到现存

① 与1932年以前一样,美国没有通过发放贷款来获取救助,并且也未能运用我们在1931年9月以后所采取的那些方法来改善外汇收支状况,我认为美国的恶劣形势主要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失误共同作用的结果。

协议框架和债务文件的崩溃，以及正统领导对财政和政府的完全不信任，最终结果将是无法预料的。

当局已经宣布赞成提高世界价格。因此，采取某些积极的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他们有这样一种政策，我们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我一直试图指出，如果要使他们的政策取得成功，就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并且提出了一种也许能够实现这些条件的计划。

第二篇　如何为战争付账

兄弟们，朋友们，同胞们，子民们：

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与你们对上帝的义务，与你们对灵魂拯救的关切，与你们对自己及子孙后代的顾念，都是息息相关的，你们的衣食，以及每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都完全有赖于此。因此，我以最大的热忱劝诫你们，做为人，做为基督徒，做为爱国者，请全神贯注地来阅读这篇文章，或请他人为你们诵读。为了减少你们的花费，我已谕示出版商以最低价格来销售这本小册子。

作者撰写这篇文章别无他意，只是为了你们好。而如果你们不用心读一读他的建议，那简直是一种罪过：只消花几个小钱买一本，就可以使你们

一打人受益。如果你们对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样的问题没有共同的或普遍的兴趣，甚至连你们当中最明智的人也对此不闻不问不关心的话，那么简直可以说是愚不可及的了。

（摘自德雷珀的第一封信——1724）

序　言

在此所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协调战争的需要与私人的消费需求。

我在去年11月发表于《泰晤士报》的三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被称为“强制储蓄”的建议草案。我不奢望这种性质的新计划会被人们热情地接受。不过，无论是专家还是公众都没有对这个计划弃置不顾。因为还没有人提出过任何更好的建议。迄今为止，对这一计划通常的批评舆论还没有为此类想法做好准备。显然，这是事实。然而，人们肯定将很快认识到战争经济的必要性，并且我们极有理由相信公众并不是如此的落后和保守。

在由此引起的多方面的评论中，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得益于此，我在此提出来的修正草案有了更为充实的具体内容。在第一草案中，我主要关注的是财政技术，并没有保证这种技术能够充分地增进社会公正。因此，在这第二个草案中，我竭力要从岌岌可危的战争状态中去争取积极的社会进步。现在提出一项全面的计划，包括广泛的家庭现金津贴、在工人阶级控制下对其财富进行的积累、生活必需品的廉价配给，以及在战后征收资本税，从而在实现经济平等方面取得更

大的进步。这其中并没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必须把战争所要求的牺牲尽量地从能够节省的地方节省出来，人们现在已经开始比以前更为迫切地关注这一问题。

要公平地评价这样一项计划，必须把它与另一个可选择的方案相对照。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出现这样一种备选方案。财政大臣最近对下议院解释说，他正试图通过对生活费用进行补贴来阻止工资的提高。作为综合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明智的举动，下面也将推荐一些诸如此类的措施。作为一种争取时间的临时性安排，这类做法是精明的。不过，单独地看，这种措施却与问题的真正解决背道而驰。由于获得了这笔额外的收入，人们手中的购买力与用来满足他们消费的供给之间的失衡问题就更为严重。

财政大臣已经表示同意这一结论。因此，我希望他也能抱着赞同的态度来看待对于这种试图把其政策与其他措施逐渐融合成一个连贯整体的努力。为了获得对这些建议的支持，我已经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游说，听取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评论。我确信，这些建议如果以自认为权威的形式提出来，将是不受欢迎的。没有哪一个建议可望逃避批评。我的这项计划的缺点恰恰不是要求得太多，而是太少。未来是任重而道远的，一年以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项计划只不过是迈出了软弱无力的第一步。

既然没有人能够排除我们对这个问题放任自流或者采取折衷办法的可能性，那么我可以大胆地预言，事情的结果将正是如此。我在下面讨论了通货膨胀的机制。我猜想，如果我们想逃避责任的话，这将是大多数人所希望采用的方法。然而，通货膨胀并不是我的直接期望，除非它是作为衰退的第二个

阶段出现，此时价格以缓慢的速度提高。在《金色的树枝》一书中，作为一段有趣的描述，对于原始人根据极少的经验而推出一般性结论的盲人摸象式的倾向，人们太容易形成“条件反射”。这一点与狗很相似，当铃声响起时，它们总是盼望会有和上次一样的经历。不过今天引起价格上涨的因素与昔日不同。对于未能满足的需求，消费者不愿为此支付更高的费用，而厂家和零售商非但没有提高价格的自然倾向，反而同样不情愿要价更高，除非成本有了实际的上升。他们并不想藐视舆论和当局的意图。对于《反暴利法》的出台，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由于要缴纳超额利润税，他们追求最大利润的积极性比平常低落了不少。总之，他们宁愿卖光商品，使后来的消费者得不到满足，也不愿把价格提高到使供求得以平衡的水平。他们并不会多花分毫，却能够让他们摆脱烦恼，良心安宁。

因此，我建议，在第一个阶段宁肯出现供给短缺，也不要出现势如脱缰的物价上涨。这种限制消费的方法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低效、非常让人不愉快的。如果这种方法引起——极有可能如此——更为广泛的定量配给，由于下面所要解释的原因，即由于人们需要与喜好的多样性，将会进一步地加重浪费、降低效率。正确的计划应该是将购买力限制在适当的数额之内，同时又允许人们能够作出尽可能多的选择来决定如何花费这笔钱。而且，购买力的压力会逐渐地推动通货膨胀，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解决办法，也是唯一名副其实的备选方案。

然而，这还可能进一步造成更加不如人意的后果。相对于消费者购买力而言的供给短缺将对我们的贸易平衡施加不利的压力，因为这将转移原本准备出口的商品，并且促使把进口商品和国内产品用于当前的消费，本来这些物资可能会用于

战争目的。这样，我们就难以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并且会草率匆忙地耗尽我们的外汇储备。

我们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并努力去克服它是懦弱无能的表现。不过，在英国并没有这种情绪，只是需要有人来告诉它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但这也是愚不可及的，因为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能这样组织起自己的经济力量，从而把顽固不化的敌人无限期地驱逐出国际社会和世界贸易之外，这也许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J.M. 凯恩斯
剑桥　　国王学院
1940 年 2 月

一、问题的性质

要把一个自由社会为了战争目的而组织起来殊非易事。我们不习惯于倾听专家或预言家的意见，我们的力量来自临时速成这样一种能力。然而，对那些未经试验的思想保持开放的心态也是很必要的。没有人敢说战争即将结束，人们逐渐认识到，做好长远的打算是及早结束战事的最好保证。对于我们目前正在着手处理的经济事务，如果企图从一个不同的假设出发来把它进行下去则是荒谬可笑的。用雷纳德先生的话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所缺乏的并不是物质资源而是洞察力和勇气。

如果各派意见的领袖们能够让他们的头脑摆脱战争的疲

愈和混乱，唤起足够的洞察力来了解自己，并向公众解释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那么勇气是唾手可得的。然后他们就可以在社会公正精神的指导下提出一个计划，对于迄今为止我们为减少不平等现象所作的努力，这一计划能够将现在这个人们普遍乐于作出牺牲的时期作为进一步推动此项工作的良机，而不是相反，把这个特殊时期作为借口来推迟应当进行的改革。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做到头脑清醒，但这并非易事。因为经济问题的所有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任何一方面可以单独地加以解决，资源的每一种用途都是以放弃它的另一种用途为代价的。而且，即使我们对于用多少资源来生产民用消费品已经作出了决定，也还不得不去解决另外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最明智地分配这些消费品。

我假设：我们将把产量提高到我们的资源和管理水平所容许的最高限度，把所有节余下来的物资用于出口，在考虑到可利用的船舶吨位以及在谨慎的限度内耗尽我们外汇资产的最快速度之后，我们将进口一切买得起的商品。从我们自己的总产出和进口商品的总额中，必须扣除出口商品和战略物资，剩下的即是民用消费品的数量。显然，这一数量取决于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政策。只有削弱我们的战争努力，或者耗尽外汇储备，才可以使这一数量得以增加。

要保证众多个别政策结合起来能有一个正确无误的结果，是极其困难的，这取决于在各项政策之间如何进行利弊权衡。要在供应部门范围内作出不影响这一结果的决定是难以想像的。是让陆军部保有大量的制服库存储备好呢，还是把这些布料用于出口以增加财政部的外汇储备好？我们的造船厂

是制造战舰好呢，还是制造商船好？一个20岁的农业工人是继续务农好，还是从军好？我们打算把军队扩充到多大的规模？为了加强空袭预防措施而减少工时和效率是否合理？人们可以提出成百上千个这样的问题，而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与留给民用消费的物资数量有重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确定平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来得出留给公务部门和用于出口的产品的数量，或者把后者的需求加总起来得出留给平民大众消费的产品的数量。把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加以折衷，也许就是实际的数量。目前，很难说有什么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最终结果似乎很大程度是出自偶然而不是预先的计划。这不过是一场拔河游戏，或是甲方占强、或是乙方更优、或者相持不下——不过，现在某一方，比如说甲方，大大地占了上风。

不过，不管这种结果是出自先见之明还是由于愚蠢而造成的，是出自偶然还是预先计划的，与我们在此所讨论的问题都无关。以我们所能组织起来的最大规模的总产出这一设想为根据，将能够获得一定的剩余用来满足民用消费。全体平民大众的合理要求，无疑会对这一剩余的数额产生影响。如果在某一特定方面的尖锐短缺局面愈演愈烈，那么，此时乙方就会力量倍增，而甲方则颓势渐显，而为了缓解这种短缺，就势必要采取某种措施。我们可以让大众持有的货币量对民用物资的数量产生重大的影响，不过，从其他方面来考虑，这是不合理的。而且除非大大削弱我们对战争全力以赴的劲头，否则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基本主张，即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产品留作民用消费。这一数额可能与经过周详考虑、高瞻远瞩地确

定的数量有些出入。这一主张的要点是，留作民用消费的产品数量只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大众持有的货币量以及他们花费这笔钱的意愿。

这与和平时期的经验有天壤之别，这就是我们在面对战争的经济后果时感到棘手的原因。我们一直习惯于一种生产能力尚有闲置的产出水平，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们花费得越多，就会生产得越多，从而购买得越多，虽然不一定是以相同的比例增加。满足直接消费的供给的增加可能小于需求的增长，因此，价格会出现一定的上涨。不过，如果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就会挣到更多的钱，从而能够增加他们的消费，跟上价格上涨的幅度。

这就是说，在和平时期蛋糕的大小取决于工作量，而在战争时期，蛋糕的大小则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我们加倍努力工作，就会有更强的战斗力，但却不可能增加消费。

在民主国家，大街上的人们都必须学会了解他们国家的行动是否是明智的——分给平民百姓的蛋糕大小是固定不变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么从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大致地说，这意味着当把大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不可能通过增加货币收入来增加其消费。然而，我们大多数人总是试图增加自己的收入，认为可以由此增加自己的消费——在通常情况下的确如此。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在当前也仍然是真实的。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他有更多的钱来开支，那么他的确可以增加自己的消费份额。不过，既然蛋糕的大小是不变的，并且难以进一步扩大，那么这个人消费份额的增加只能是以另一个人消费份额的减少为代价。

因此，有些事情，对作为单个个体的每一个人有好处，但对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却是不利的。如果人人都同样地支出更多，那么就没有人能够从中获益。这就为制定一项共同的计划以及实施一种人人都须遵守的规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我希望能够证明，通过实施这样一项计划，工薪阶层的消费量可以像以前一样多，此外还能够有余钱存入银行以便将来取利或备不时之需，要不然这笔财富本来会落到资产阶级手中。

如果没有这样一项计划，我们就会罄尽钱囊来消费，直至不剩分文，除此之外不会出现别的情况。因为，我们所要购买的产品，由于成本上升而引致的价格提高将足以耗光我们为此而支出的货币。如果对于所有的收入，其中的每一镑都增加两先令，而购买到的商品却与原先的数量相同，那么这就意味着价格也每一镑上涨了两先令；并且没有人能够多买到一只面包或一品脱啤酒，大家的境况与以前相比并不会有什么起色。

除非依靠税收来筹集全部的战争经费——这是不切实际的——否则，其中的一部分就得靠借贷来偿付。换一种说法，即某些人必须延期支出货币。如果允许价格上涨，那么这只是意味着消费者的收入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后者所获得的这笔收入，大部分将以较高税率上缴国库；一部分会用于自己的消费，由此仍然会引起对其他消费者不利的价格上涨；而剩下的就会被贷放出去，所以，仅仅只有他们才会成为新增国债的主要债权人，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在战后开支这笔资金的权力。

工会方面提出增加工资的货币价格以补偿生活费用的节

节上升，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一要求是毫无益处的，反而会对工人阶级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就像寓言中的狗一样，他们目瞪口呆地凝视着阴影，却错过了实体。组织得较好的部门也许能够以牺牲其他消费者的福利为代价而获益，这是事实。然而，除了作为一种谋求集团利益的努力、一种把他人排挤出队列的手段外，这不过是一种流氓游戏。工会的领袖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他们并不想要他们所要求的东西。然而，在知晓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之前，他们不敢撤回这种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直没有人告诉过他们一个自成一体的计划。

我一直被指责为企图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运用极权主义方法，再没有比这更为牛头不对马嘴的批评了。在极权主义国家中，不存在对损失进行分配的问题。这是其进行战争的首要有利条件之一。只有在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任务才由于社会公正的权利要求而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在奴隶制国家，生产是唯一的问题。穷人、老人和婴儿必须听天由命，没有其他的社会制度能够像奴隶制那样更适宜为统治阶级提供特权了。

因此，本文的主旨在于试图设计出一种在战争条件下与自由社会的分配制度相适应的分配手段。在此考虑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提供更多的报酬，作为一种激励，并对那些与奴隶迥然不同的自由人所加倍付出的努力、所冒的风险给予表彰；每个人，对于如何使用他收入中可自由开支的部分享有最大程度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完全只属于那些独立存在的个体，而不属于极权主义蚁群中的那些蚂蚁；对于那些连必要的牺牲也负担不起的人，则要减轻他们的负担。

二、解决办法的性质

由于在军队服役和在民用部门就业的、加入了人寿保险的人员规模的扩大，由于加班时间的延长，以及由于妇女、儿童、退休者和其他以前的无业人员纷纷找到有报酬的工作，即使是工资率没有提高，货币收入的总额也会有相当程度的增长。

在下一章将证明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即在像这样的战争时期，用以消费的商品量将不得不有所缩减，并且肯定不可能增长到和平时期的消费量之上。

这样，消费者手中可用来开支的货币数量增加了，而相应的消费品数量却没有增加。因此，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来限定出售的商品，规定每种消费品的最高价格，其结果只能使商品被抢购一空。除此之外，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必须找到某些办法把购买力从市场上收回来，或者必须把商品的价格提高到足以吸收新增支出的水平——换句话说，即通货膨胀的方式。

因此，我们的解决办法的一般性质必须是把一部分新增收入从支出中收回来。撇开商品短缺或较高的价格水平不说，这是我们能够确保在货币开支和待购商品之间达成平衡的唯一方法。

自愿储蓄如果充足，则可以满足上述目的。无论如何，在我们的问题范围内，自愿储蓄总是有好处的。现在人们正开展运动来促进自愿储蓄，对于他们的宣传热忱以及那些信从者的自我克制和公益精神应当予以鼓励。在下面提出的计划中，

并没有排斥自愿的个人节约，没有否定其作用和必要性。我所追求的是一个能够勉强实现最低限度目标的方案。而到目前为止实践已经证明，即使是要勉强地实现最低限度目标，单单靠自愿储蓄也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对个人消费在规定份额之外所作的任何进一步的节约，都有助于改善其他消费者的境况或加强我们为战争所作的努力。

然而，在下面两章中，通过分析国家潜力和国家收入的分配，我将十分清楚地证明充分的自愿储蓄是如何的不大可能实现。那些宣扬其他观点的人，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已成为他们自己宣传的牺牲品。而且，我认为许多人都会欢迎这样一项可以为他们指明最低限度职责的规定计划。而那些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参加储蓄的人也可以放下心来，因为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一项最低限度计划不会像我们的税收制度那样，阻塞个人为了公众和国家的利益而自愿地作出自我牺牲的道路。国家仍然迫切地需要更多的个人节俭的果实——然而在摘取这些果实的同时，人们又总是在究竟哪一种形式的节约更有价值这样一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不过，我也认为这项计划的一个优点是：减少了普通人长久以来在到底应该节约多少这个问题上的困惑，并使得他们对这类事情所能起的作用不抱过高的期望。过度地沉迷于节俭也许是有用的，但却并不令人愉快。而那些决定要节俭的人并不总是真正作出牺牲的人，公共需要有时不过是一个自圆其说的托辞，借以纵容那种仍旧贪婪的本性。

因此，在我们的基本计划中（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一条措施是确定在个人的收入中必须从直接消费中收回并推迟其支出的那部分收入的比例，也就是说，这部分收入只有在战后才

能用于消费。如果能够公平确定每一个收入集团的这一比例，那么这种方法将带来双重的好处。这一方面意味着与其他任何计划相比，这一计划与战时直接消费权利的分配及相应的牺牲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同时，这也意味着战后延期消费的权利——这是国债的另一个名称——将广泛地分布在所有那些放弃了直接消费的人们当中，而不是像上次战争那样主要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

第二条措施是在战后广泛征收资本税，从而在不增加国债的同时提供延期消费。

第三条措施是对那些生活水平很低、难以提供足够余裕的人们予以保护，不让他们的现有消费量有任何减少。可以通过确定应当予以豁免的最低收入水平线、规定差率极大的累进等级以及建立家庭津贴制度来实现这一点。这一建议的最终结果是，年轻的家庭成员每周将增加不超过 75 先令的消费量，低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达到每周 5 镑或略低于战前水平（同时，作为对他们额外工作的回报，给予他们战后延期消费的权利），而每周超过 5 镑的高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会平均减少大约 1/3。

第四条措施（第八章），是要将工资、退休金和其他津贴货币价格的进一步变动与有限几种定量配给商品的成本变化联系在一起。正如人们一直所要求的那样，这种配给量是很严格的，并且当局将以种种方式来防止其价格的上涨。前面几项措施的存在使这一条成为可能，不过后者对于前几项措施却并非必不可少。

在根据批评进行修改和进一步的反思之后，这里所提出来的这个方案与去年 11 月我在《泰晤士报》专栏中提出的收

入延期支付计划相比，更为全面一些。不过，最初的那个计划是整个方案的关键，如果归于失败则其余的措施也就难以施行了。要是没有这一计划，那么家庭津贴的费用就会推动消费的全面增长，从而使得消费问题雪上加霜，并且只会使通货膨胀的蔓延更加势不可挡。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严格的廉价定量配给。除非我们首先从市场上收回过剩的购买力，否则对消费的补贴费用将会使财政部在财政泥潭中陷得更深。不过，如果对收入的延期支付能够获得支持，那么整个结构就可以牢固地建立起来。

这样一项总体计划要求所有的人都遵照执行，它就像交通规则一样，人人都能从中得益而又不会损及他人。把这种规则视为对自由的侵犯是愚昧无知的。如果强制施行这种交通规则，那么人们仍将同过去一样能够四处旅行而不会感到有丝毫不便。在这一计划之下，人们的消费水平也仍将同过去一样。交通规则允许人们自由选择沿着哪条路旅行，这与不存在交通规则时没有什么两样。而在这一计划下，人们所能选择的消费品种类也仍将同以前一样多。

把这一计划与交通规则相比较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这一计划正是要打算防止人们误入另一条花费其钱财的歧途。

三、我们的产出能力和国民收入

为了计算留作民用消费的蛋糕的大小，我们必须对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估计：

（1）我们能够从人员、工厂和物资这些资源中组织起来的最大限度的产量；

(2) 由于入超而产生的外汇流出，其速度应该多快才是安全的；

(3) 所有这些财富将被我们的战争努力耗去多少。

用来进行这些估计的统计资料极为缺乏。自上次战争以来的每一届政府都是些蒙昧主义者，没有任何科学知识，他们认为收集基本的事实材料是浪费钱财。今天，任何人，无论他是否来自政府机关，在这方面都不能不主要依靠科林·克拉克先生杰出的个人努力(在他的《国民收入和支出》一书中，增补了一些后期论文)。不过，由于缺乏那些只有政府才能收集到的统计资料，他经常几乎是在作大胆的猜测。下面的观点所依据的资料在附录(第 466 页)中给出了更为详细的内容，那是在 E. 罗宾斯先生的帮助下制定出来的。

当然，测量产出能力的货币标准是根据工资和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不时加以调整的。为了简单起见，下面的数字都是根据战前价格得出的。

到 1939 年 3 月 31 日为止，包括无形输出在内，我国这一年的产值以成本来衡量大约是 48 亿镑。在这一数额中：

37.1 亿镑	大众消费的当前费用(包括工厂的日常维修费用)；
8.5 亿镑	政府服务的当前费用(包括日常维持费用)，不包括对领取退休金者以及国债持有者的“转移”支付，因为这些产出只是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但包括资本支出；
2.9 亿镑	以建筑、工厂和运输形式用于增加我们的私人基本固定资产；
48.5 亿镑	以上三项合计数。

可以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增加这一产出：(1) 当年有12.75%加入了社会保险的工人失业，可以吸收这些工人中的相当一部分重新就业；(2) 吸收未加入社会保险的人口如儿童、妇女、退休者、无业人员等就业；(3) 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例如，把工时延长半小时就可以使产出增长7.5%）。另一方面，脱离生产的武装力量（假定其产出与投入相平衡，则可以用军饷、津贴和给养的费用来估计其本应创造的产出），原材料的短缺和船舶运输的紧张，以及空袭预防措施的施行，这些都会使效率受到损失。总的说来，如果我们的组织能够正常运转，那么增加15%～20%的产出应当是切实可行的。取17.5%这个中间数值，可以设想，按战前价格计算，将增加8.25亿镑的产值。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过这样的产出增长，补充这一点也许并非多余。

政府的需要可以从另外两个源泉得到满足。在公共和私人消费的费用中，除用于新增资本的3亿镑外，还包括4.2亿镑可实现的经常性折旧费用。在这一产出中，有一部分可转用于政府目的，其价值总共约7.1亿镑(4.2亿镑+2.9亿镑)。从折旧基金中取出1.5亿镑，从正常的新增投资中取出3亿镑，我估计总共可以从这一源泉获得4.5亿镑。

第二个源泉，也是剩下的最后一个源泉，是出售我们的黄金储备和在国外的投资以及借外债。如果我们要为一场长期的战争作准备，就必须严格限制我们耗费这些资源的速度。我估计我们能够有把握地从这一源泉中取得的最大收获是每年3.5亿镑①。

① 证明这一数字合理性的具体依据见附录（第471页）。

通过上述种种方式，我们的资源每年可以提供16.25亿镑(8.25亿镑+4.5亿镑+3.5亿镑)的产出，从而满足增加的政府需要和当前私人消费。

这与当前的现实情况有什么关系?财政大臣在1939年深秋宣称政府支出的速度已接近于每年15亿镑左右。因此，如果能够实现上面所设想的产出增长速度，则我们就可以稍有余裕(大约1.25亿镑)，从而可以用来增加私人消费。然而，人人都明白，直到现在我们还远远不能以这样的规模来组织生产。事实上，照我看来，现有的政府支出速度无疑没有为私人消费的增长留下任何余地；而对消费水平的勉力维持则已经导致商品库存和外汇储备的迅速减少，其消耗的速度快于上面我们所设想的限度——也就是说，要快于安全的速度。

而且，我们的战争支出无疑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如果要对前景作乐观的展望，我们不妨假设与去年秋天的估计水平相比，明年的政府支出将仅仅再增加3.5亿镑，并且成功地把产出提高到上面所建议的最高限度，这就要求按战前价格计算的整个社会的消费要减少2.25亿镑。因此，8.25亿镑新增收入加上原先支出的2.25亿镑收入是我们必须从消费中收回的总额。

上面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是相当平实的。某些人会说这一表述大打了折扣，对于需要为战争所作出的努力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这话也许不假。此外，除非我们能够迅速修复道路、恢复交通，否则上面的估计就相当地夸大了我们的生产速度。不过，要使我现在的论点得以确立，这些简单明白的表述实际上已经足够，没有必要作更为复杂的论证。如果事实证明需要对消费作更大的压缩，那么这也只会加强上面我所说的一切。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产生的了。在前面的假设条件下,人们可以从新增产出的生产中挣得8.25亿镑,也就是说,即使工资率没有提高、价格没有上涨,收入也会增加8.25亿镑。然而,尽管这部分人的收入增加了,但他们却肯定会比以前消费得更少,也即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消费反而肯定会减少。这个结论是切中要害的,大家对此也没有异议,而且这一点正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不过,由于我们一向对失业和资源闲置问题习以为常,因此当面对充分就业和资源短缺问题时就不得不换一换脑筋,调整我们的态度以适应新的情况。在战争时期,我们从丰裕时代倒退到了匮乏时代。

此外,由于在近6个月的战争之后,仍然存在着大量统计上的失业,这一事实遮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新问题的紧迫性。这应归咎于组织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时间仓促而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投入的精力太少、用心不够所致。不过,任何人如果还立足于我们仍然处于丰裕时代这一假设来论证其观点,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在今天,总的说来失业的性质已与一年前大不相同,它不再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我们所需要的那些物资不再有潜在的剩余供给。当前有两个障碍阻滞着向充分就业阶段的过渡:第一个障碍是由于难以把劳动力转移到需要的地方去而造成的。第二个障碍——在眼下也是首要的障碍——与劳动力的短缺不同,它是由于在把现存需要变成有效需求的过程中存在着重重困难而产生的。例如,也许出口商和国内消费者都需要布料,而在毛纺业中尚未实现充分就业,如果制造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够获得用以满足需要的羊毛原料,那么这些需求就仍

然是无效的。

不过，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还处在丰裕时代。相反，这意味着在可利用的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之前，匮乏的时代就已来临。我并不是说我们的产出不可能在现有的水平上再有所增加。如果我们的组织管理得到改善，则可以进一步增加产出。我们已经和正在着手让大家明白如何去增加产出，但我们不得不去学习如何生产得更多，而这需要时间。

目前，使得我们对于向匮乏时代过渡的趋势视而不见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利用库存的能力。毫无疑问，在战争的第一个月，私人消费的增加速度就大大超过了我们的产品剩余库存，但这一规模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猜想私人消费已经得到足够的压缩是没有根据的。通过利用商品库存和外汇储备以及周转资本，供给不足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因此，把私人消费调节到与有效供给相适应的水平，比表现出来的要紧迫得多。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一行动推迟到充分就业实现以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阐明。读者会理解，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某种程度的猜测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前面给出的那些数字也只是粗略的估算。如果任何人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那么他的批评意见将更受欢迎。不过，我相信这一结果大体上是正确的，而更精确些的细节也不会改变这幅图景的主要轮廓。

四、富人能为战争付账吗？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把因战争而导致的工资率上涨的

因素完全撇开，仅仅是产出和就业的增加就会使整个国民收入增加8.25亿镑。同时，私人消费根据适中的估计也将减少至少2.25亿镑。因此，总共必须把10亿镑的私人收入从消费中收回。按战前的工资和价格水平计算，这一数字现在已经达到。不过现在工资和价格水平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提高，因此所有数据都应该根据现行工资和价格水平相应地或多或少作一些调整。到1940年1月底为止，批发价格上涨了27%，生活费用（按季度加以修正）上涨了10%，而工资大约增长了5%；这意味着我所给出的总和数字应当增加10%，以与现行的工资和物价水平相适应。

我听到过这样一种观点，以为尽管这些数据也许是准确的，但并不能证明工人阶级有必要作出任何牺牲。另一方面，人们也公认工人阶级的工作更加辛苦。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消费也就必须成比例地增加。如果生活费用上涨了，那么不仅是总收入还有工资率也必须作相同程度的提高。这种观点宣称，富裕阶层应该承受战争的全部实际费用。由于战争而增加的对劳务的需求，为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

难道工人真的认为他们应该成为战争的唯一获利者，借战争之便增加自己的消费并且不承担丝毫的战争责任，抑或这只不过是他们的某些领袖代表他们所宣称的观点？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讨论这类问题并非我之所长，而我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因为从政治观点看，我怀疑上述见解能否算得上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无论如何，这并不是那种不用采取任何措施、只要袖手旁观就可以自动产生出来的东西。如若我们没有一项

全面的计划而放任自流，那么结果只会出现通货膨胀或供应紧缺，而不是上述情形。而我们将看到，通货膨胀完全是有利于富裕阶层的，只会减轻而不会加重他们的负担。在本文结束之前，我将不得不多次强烈地要求应该把我的建议与那些正在实施或即将付诸实施的、实际的可能方案相比较，而不要同那些虚无缥缈的方案相比较。

不过，让我们再检查一遍这些论据。我所使用的数据只是粗略地近似于实际情况。我们并没有确切地弄清楚国民收入是如何在各个不同的收入集团之间分配的，虽然这是件最为重要的事情。关于年收入在 250 镑以下和 2000 镑以上阶层的情况，有比较好的统计资料；但对于重要的中间阶层所拥有的国民收入份额则缺乏资料。不过，尽管下面的许多细节可能是不精确的，我认为这并不会使人们对国民收入分配的整体状况发生误解。像前面一样，我们将使用战前价格和工资水平作为计算标准，因为如果我们撇开这一标准，就会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而无所适从。

我们将以战前个人收入的总额为基数[①]，加上预期会在战争中增加的那部分收入，并减去在战前已经支付的费用和税款。

最后一行数字给出了现有收入的余额，在考虑到现存资本所能提供的支持之后，我们必须以追加税收或公债形式从中筹集资金以满足增加的战争支出（这一计算方法引人注目地显示出，年收入在 250 镑至 500 镑的收入集团目前所负担的税额极不合理。他们的实际税负在其战前收入中所占的比

① 这一总额的出来参见附录（第 466 页）。

例，比年收入在250镑以下的低收入集团还低，后者为13.4%，而前者仅为7.8%）。

单位：百万英镑

收入集团①	250镑以下	250—500镑	500镑以上	总额
战前收入	2910	640	1700	5250
战时所增加的收入	425	100	300	825
战时总收入	3335	740	2000	6075
战前所缴税费	390	50	780	1220
	2945	690	1220	4855

我们在第三章给出的新增政府支出为18.5亿镑，不考虑正常的储蓄，其中的1.5亿镑是来自在国内无法实现的那部分自然积累的折旧基金，而有3.5亿镑则来自于出售海外资产和外国贷款。剩下的13.5亿镑则将从追加的税收和新增的自愿或非自愿储蓄（包括正常储蓄）中筹集。

在现有条件下，即使税收水平大幅度提高以及下面提出的延期支付收入建议得到采纳，我们也至少可以指望有4亿镑的自愿储蓄。事实上，我认为这一数字与最有可能实现的估计值相比要低得多，大约少了1.5亿镑。我留下这一差额是为了预防在相反方面可能出现的其他计算错误。这一数字还包括政府手中积累的1亿镑失业基金、健康保险和退休基金、战争风险基金及其他类似基金。既然这笔资金难以分清是来自哪一个收入集团，那么不妨把它看作是相应减少的政府对公

① 这些集团中的人员是按他们战前的境况来划分的，尽管战时所增加的收入也许使他们上升到更高的收入集团。

共工程的净需求。即使个人除了其他的需求外不作任何的自愿储蓄，另外的3亿镑也全部可以通过建筑协会、人寿保险公司、退休基金会、公司中未分配的利润（单是这一项估计在战前就有3亿镑）及其他社会性渠道来筹集。如果对这一总额在各个收入集团间的分配作稍有些武断的估计（因为缺乏精确的资料），那么就有如下的结果：

单位：百万英镑

收入集团	250镑以下	250—500镑	500镑以上	总额
扣除了战前税费的战时收入	2945	690	1220	4855
最低限度的自愿储蓄额	50	75	175	300
	2895	615	1045	4555

从中可以看出，剩下的余额仍足以为政府提供9.5亿镑资金。甚至在为计算错误留下更大的余地之后，上述数据也表明，如果年收入在500镑以上者每人都把他们超过500镑的那部分收入作为税款全数上交，也只有6.25亿镑，仅能满足政府需要的2/3①。

然而，上述建议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大大超过了我们的财政系统可望筹集到的资金数额。事实上，如此大规模的征税将会导致现存合同和协议的大量违约，从而使可征税的收入急剧减少。这些收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花费在并非用来增加个

① 年收入在500镑以上的家庭大约有84万户，他们战时收入的总额在扣除战前税收和最低限度储蓄后，即是上面的10.45亿镑，在每户扣除500镑以后，总共还剩下6.25亿镑。

人消费的各种费用和其他用途上，投入到现存资源最有价值的用途上，以及用于交付对受赡养者的津贴。由此，我们可以推出政府支出的相当部分必须以种种方式从年收入低于250镑的收入集团中筹得。

把豁免界线定在年收入250镑上也是不可行的。大约有243万人在这一收入水平以上。如果把他们超过250镑的剩余收入即10.5亿镑[1]全部取走而又不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收入减少的话（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样筹得的资金用于满足政府的需要是绰绰有余的。如果战争经费由年收入在250镑以上的收入集团来支付，则意味着要以储蓄和税收（包括原有的和新开征的）形式从他们的战时总收入中取走约3/4，而只留下稍多于1/4的部分用于他们自己的消费。

根据这些数据，如果设想对于每周收入在5镑或5镑以下阶层所增加的战时收入可以不动用分毫就能支付战争费用，也是不可行的。这一收入集团占总人口的大约88%，由于产出增加而工资率不变，在把战时增加的收入考虑进来并扣除了战前税费后，其收入占英国个人收入总额的60%还多，并且其消费量占当前总消费额的2/3。而且这一集团的收入将由于战争而平均增加大约15%。难道我们真的希望，允许收入低于每周5镑的人平均增加15%的消费，而那些每周收入高于5镑的人则只能把他们收入的1/4用于消费？因此，唯一的问题是，这一阶层应该作出多大的贡献，以及如何以最小的牺牲、最大的公正来筹集这笔资金？

---

① 这一数字是该集团的可得总收入16.6亿镑减去6.1亿镑（即243万人每人250镑的总和）而得到的。

要是我们有一项深思熟虑的计划，那么就能对社会公正问题加以权衡。而如果没有这样一项计划（正如目前这样），这一问题就会被人们漠然置之。

我在下面两章中提出了一项建议作为讨论的基础，在这一建议中体现了这一原则，即比其他任何计划都更有利于实现更大的社会公平。尽管该建议的无数细节都有待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但我希望，这一原则能够始终得到贯彻。要评价这一计划，应当把它同那种实际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替代方案相比较，而不应同某些不切实际的、虚无缥缈的“完美”计划相比较。

五、关于延期支付、家庭津贴和廉价定量配给计划

在阐述下面的观点之前，我不得不考虑是将我的想法和盘托出还是有所保留。如果我提出一项内容详细的具体建议，那么我就将暴露在无数的批评之中，而这些批评又与这项计划的基本原则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我进一步利用这些数据来阐明该建议，那么就会越来越多地陷入猜测，并且有使读者陷入琐碎细节的危险。而这些细节也许是不准确的，完全可以在不对此计划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加以修正。然而，如果我只限于笼而统之地谈论这个计划，那么就不能提供足够的东西供读者咀嚼，并且，既然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的轻重缓急并非是无关紧要的，那么我实际上就是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因此，我宁愿冒陷入琐碎细节的危险，也不愿语焉不详，但这有赖于读者对我这种做法予以善意的理解。不过，如果我首先在这一章中进行某种概括说明（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数

字），而把蓝图留到下一章，那么也许会有助于读者弄清基本原则和说明性的具体内容。

在考虑到战时的产出增长、战前的税收收入以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指望的那部分储蓄等几方面因素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私人手中保留的大约 9.5 亿镑，不能用于消费而必须转而用来资助战争。

我认为，也许这笔资金的一半，即 5 亿镑，可以通过税收形式来筹集。实际上，约翰·西蒙爵士的紧急预算中所开征的战时税，撇开征收中的时滞，全年也许可以提供 4 亿镑资金。即使我们能够避免明显的通货膨胀，在这部分税额中也包括至少 1 亿镑的超额利润税。当然，通货膨胀可以极大地增进赋税收入。不过，即使没有这种偶然性的帮助，这笔税收也是丰裕的，它一方面是作为更高产出水平的反映，另一方面是由于利润在各个企业间的分配与基数年比大不相同。依靠其他一些财政手段，包括对非必需类商品征收销售税，可以再筹集到 1 亿镑。除了广泛征收销售税、工资税以及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税收手段外，在适当考虑到公平和效率后，要想靠我们的财政机器来筹集一笔更大的资金将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我们已经取得的 4 亿镑信用贷款，想不借助通货膨胀的任何帮助，只通过自愿储蓄来弥补剩下的 4.5 亿镑缺口是不切实际的。必须记住，我们已经假设，对于 9 亿镑政府贷款（3.5 亿镑来自出售海外资产，1.5 亿镑来自折旧基金，4 亿镑来自新增储蓄），公众每年愿意提供的资金数量，比之于从投资政府基金、向国外借款和出售黄金储备的过程中所能得到的收益，要少得多。因为，按照我们的假设，总的新增政府支出不是 9.5 亿镑而是 18.5 亿镑。由于我们已经看到的种种原

因，这笔追加储蓄将不得不主要来自每周收入 5 镑或 5 镑以下的收入集团，而这就要求改变他们那种尚不清楚的开支习惯。

由于同样的原因，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对低收入集团的影响都是大同小异的，都会缩减低收入集团的潜在支出。通货膨胀是代价最高的一种选择，因为这无疑会对企业家阶层有利，却可能会使工人失去其真实收入的 20%。通货膨胀还有一个与一般销售税相同的缺点，即对最低收入阶层来说都是不堪负担的。像从通货膨胀中获益的原有税种一样，新开征的税种，例如销售税、工资税，最终都会加重工人的劳动负担，掠走他们的一部分收入。工人将不得不更加辛苦地工作，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决不可能从中获取任何个人利益。如果财政部和工会领袖在他们所能最容易达成一致的地方不谋而合，即没有明确的政策而放任自流，拒绝新思想而因循旧例，那么上述结果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一方面要增加对战争的投入，一方面又想同时增加等量价值的消费，这无疑是异想天开。投入战争的资源只能用于战争而不能同时用来增加消费。因此，那些为战争而努力的人们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他们完全放弃这一数量的消费；要么把这一消费加以推迟。

保留对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即使他必须推迟对这些果实的享受。这样，他的个人财富就增加了，因为这种财富意味着对延期消费权利的掌握。

这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即每个人收入的适当比例都必须采取延期支付的形式。

随着这条一般原则的确立，实现我们这一任务的种种困难也开始接踵而至。即使我们以最粗陋的可能方式，对扣除战前税费后所有的剩余收入实行延期支付，比如说延期20%，这也仍然要比采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好得多。不过，舆论要求一项深思熟虑的计划，特别是一项新计划，不应当只是比无所作为要好一些，而应当是要好得多，尽管新计划也得同样面对原先那些计划所受的批评。不过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人们期望这项新计划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

我们对这一要求表示欢迎。这一计划也许打乱了财政部所急需的既定安排，但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扰乱变成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的良机，那是再好不过了。

考虑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在延期支付计划的第一条原则之后，再加上第二、第三条原则。我们上面已经建议过，所需资金中大约一半可以通过即刻征收税费来筹集，另一半则可以通过对收入的延期支付来获得。所以，我们的第二条原则是，新增税收的大部分应由年收入在250镑及250镑以上的收入集团来承担，而低收入集团的贡献则主要采取延期支付的形式，即并不要求他们完全放弃消费而只是推迟消费。

第三条原则是必须致力于维持足够的最低生活水平——至少不逊于迄今为止的现存水平。因此，在第二条原则加重了富裕阶层负担的同时，第三条原则又特别减轻了贫困阶层的负担。

要贯彻这两条原则需要两个截然不同的计划。我最初在《泰晤士报》上提出来的那个方案，试图定下一条最低限度的收入豁免线，而对于已婚者则根据其家庭人口的多少作相应的上调。批评意见认为这一计划所能带来的最终津贴太少，这

是不无道理的。接下来将提出的新方案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我敢说它能带来更大的改善。

在过去的几年中，舆论的重心已倾向于赞同实行家庭津贴。在战争时期我们自然会比平时更加关注生活费用问题。并且，一旦出现生活费用上涨的势头，人们就会要求相应提高工资，而家庭津贴问题也肯定会被摆上桌面，因为生活费用上涨对家庭负担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规模的大小。要在战争期间进行这样一项社会改革，其代价将是高昂的，甚至在和平时期我们也不一定负担得起。所以乍一看，这种建议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事实上在这样一个时期，社会改革的需要是如此之迫切，以至于可能为进行这场改革提供了最佳时机。

其他许多人也持有类似观点。因此，我推荐这样一种家庭津贴方案，即对 15 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提供每周 5 先令的现金补助。我估计实施这一方案的净费用是 1 亿镑，得出这一数字的根据见附录(第 475 页)。

那么是不是有了这条措施就足够了呢？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有相当大一部分低收入阶层，其收入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增长，或者无论如何跟不上生活费用上涨的步伐。即使工会同意实施延期支付或类似的计划，他们也会要求采取某种保障措施来防止价格上涨到工资水平之上。

这个重要的意见受到了亚瑟·索尔特爵士、R.H. 布兰德先生和希克斯夫人的大力支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建议对消费品实行最低限度的固定廉价定量配给，虽然这一措施也许需要进行一定的补贴。如果我是财政部的咨询顾问，我将不无忧虑地看待这一措施的实施，因为在一定条件下财政

部也许会因此而背上难以负担的包袱。不过，这一建议如果是包括延期支付在内的全面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得到了工会的赞同，那么我也将对此表示欢迎。

生活费用指数所涉及的那些商品不应该都包含在最低定量配给计划中，而应限制在战时能够获得的少数几种必需品的范围内。对于配给品的未来价格也不应作出绝对的保证。不过，应该同意，如果最低限度配给品的价格出现任何上涨，工会都有权敦促相应地提高工资。

不过，这样一种安排必须以同时接受延期支付计划为绝对条件，而且工会必须同意，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只是服从于上述防护目的，而不能得寸进尺，以生活费用上涨为借口要求进一步提高货币工资。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么消费者手中的巨大购买力将使得任何企图固定价格的尝试变得极其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最低限度的廉价定量配给只会导致购买力更多地在其他用途上释放出来，并且将把其他商品的价格抬高到与配给品的固定价格过分悬殊的水平上。试图固定消费品价格而同时却让消费者手中的购买力无限膨胀，这无疑是一个错误。

这样一个方案，与渐进的通货膨胀或工资税相比，能为工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尽管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工人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但他们肯定迟早都将享受到与他们的贡献完全相当的消费水平。而同时，即使是在战争时期，家庭津贴和廉价定量配给也将实实在在地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地位。我们将成功地把这场战争变成促进积极的社会进步的良机。有的人徒劳无益地企图逃避这样一场正义战争的合理负担，结果却陷入了渐进的通货膨胀。相比之下这项计划可以获

得更大的好处!

六、具体内容

在上一章中,对于应予以延期支付的收入的比例,以及应免于延期支付的最低收入标准,我并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对原则表示赞同的人也许会在细节上意见相左,因此,尽可能地把这两者分开来谈要好些。我提出下面的看法作为讨论的基础。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与程度和评价相关的问题。如果这些计划误入歧途,那么可能是因为对每周收入在 5 镑以下的收入集团让步过大,以至于使这些计划难以维持下去。我认为,在产出充分增长和政府支出不超过前述估计数额的假设下,这些让步仍然是可行的。但如果这两个假设都失效了,则这些让步也无从谈起。

这些具体细节是以下面几点为基础的:

(1) 收入在每周 5 镑或 5 镑以下的收入集团的真实消费总额应当尽可能长期地维持在接近战前的水平上。

(2) 在这一收入集团下层的那些人,可能从战时收入的总增加额中获益甚少,甚至一无所得。因此,如果要维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水平,那么其当前收入中的任何一个重要部分都负担不起延期的支付。

(3) 既然生活费用相对于工资率(虽然不是相对于总收入)出现某种上涨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在任何计划下都难以消除个人待遇的不平等,那么我们应当确信,通过家庭津贴形式来对家庭成员提供支持,可以抵消这种不平等,从而使他们的境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4) 既然与高收入集团相比，低收入集团新增的战时收入也许在更大程度上代表着工作量的增加，那么后者的贡献就应该主要是采取延期支付收入的方式，而前者的贡献则应主要采取新增税收的形式。

(5) 在现存的津贴和补助下，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带动生活费用相对于工资至少上涨5%。

剩下的一个问题是，依靠税收和延期支付，我们是否能够筹集到全部所需的9.5亿镑，或者更确切地说，包括家庭津贴费用在内的10.5亿镑资金。我在《泰晤士报》和《经济学杂志》上提出的这些计划，对于这一点也存有疑问，并且公开承认难以达到所需的数额。现在我似乎最好提出一个可以绰绰有余地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案作为出发点，即使它可能有些过于理想化。因为随后的让步肯定会削减其最终结果，所以，如果从一个适中的、不是满打满算的方案出发，最后的结果将与我们的目标相差甚远。由于下一章所介绍的种种让步可能会耗去至少5000万镑，所以我打算以总额为6亿镑的延期支付规模为目标。

我们不可能精确地预测下面我所提出的这些实际规模事实上是否能够实现其目标。它们的目的在于贯彻前面那些原则。如果这些规模被证明是难以达到的，那么可以进行相应的修正。下面是旨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负担分配情况：

单位:百万英镑

收入集团	200镑以下	250镑以下	总额
新增税收①	150	350	500
延期支付的收入	250	350	600
生活费用相对上涨所造成的损失	125	50	175
合计	525	750	1275
新增战时收入的扣除	425	400	825
	100	350	450
家庭津贴的扣除②	100	--	100
减少的真实消费	0	350	350

① 包括战前税种的新增收益。

② 为了简单起见,我假设,为儿童提供的现存所得税津贴已经花费在对年收入250镑以上集团每个儿童平均5先令的补助上,这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也许稍有夸大。因为这笔津贴已经耗费在对收入250镑至400镑的家庭的儿童每人3先令9便士、后来逐渐提高到7先令6便士的补助上。

考虑到生活费用比战前高10%,而工资只提高了5%,因而工资的提高只是部分地抵消了生活费用的上涨。上面所估计的损失则主要是由于生活费用相对于工资上涨过速造成的。大致地说,这就是现状。上面的估计假设,这一因素对高收入集团的影响要比对低收入集团的影响小一些。

从战前真实消费水平看,上述最终结果大致意味着,高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减少了整整1/3,而低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则毫无变化。不过,读者可以看出我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统计困境,我大胆地、也许是过分大胆地给出了这些数据,因

而在细节上某些严重的错误也许在所难免。

这种分配负担的方案也许会招致批评，认为要求高收入集团所作的相应牺牲过重。这一计划当然是利用战时财政的机会来进行广泛的收入再分配，以实现更大的公平。难道任何认真负责的工人阶级领袖相信，徒劳无益地追随生活费用的上涨而提高工资，或者任何其他可能的方案将会比这项计划更公正、更有利于低收入集团？

在此所提出的建议是强有力的。每周 3 镑或 3 镑以下的最低收入集团不能从战时的收入增加中获益。对有的家庭成员来说，他们已经取得的任何改善都是弥足珍贵、难以割舍的。上述建议为这些人提供了特别的保护。

实现这一结果的最佳方案是什么？我在《泰晤士报》上所提出的方案，其优点是能够向纳税人显示直接税和延期支付的综合结果。这一方案在具体内容上易于招致各种无损其主旨的批评。不过，在经过多次反思之后，我尚未发现一项可以更好地表达这种一般目的和结果的计划。因此，我对这一方案有所保留，准备进一步加以修正。例如，对于以家庭津贴形式在低收入集团内进行的再分配，以及这一方案与直接税负担的相互关系，都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考虑。在附录中（第 475 页）给出了经过修正的方案，其具体的效果展示如下。

（1）儿童津贴。现存所得税下的那种儿童津贴制度，仔细地检查其内容会发现它是极为不合常理的。一个年收入 250 镑的人，他的第一个孩子可以获得每年 7 镑的津贴，但接下来出生的那些孩子却一无所获。这笔津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渐提高，其最高限额是每个孩子 18 镑 15 先令。不缴纳所得税者一般不享受儿童津贴，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给他们发

放津贴。我提出一个统一的津贴方案来替代现存儿童津贴制度，在这一方案中，每名儿童有每周 5 先令或每年 13 镑的津贴，凡是缴纳所得税的家庭和加入了人寿保险的人口都同样可以获得这种津贴。

（2）基本的最低收入线。关于应该免于延期支付的基本的最低收入线，我建议，对于未婚者是每周 35 先令，已婚者是每周 45 先令。如果有更好的不同数字，可以通过改变超过基本最低线的那部分收入中应当上缴的百分比来进行调整。

（3）超过基本最低线的收入。超过基本最低线的所有收入，其中的一定比例，一部分作为直接税；一部分作为延期支付上缴政府，这个综合百分比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迅速提高。计算这个百分比的准则见附录（第 476 页），不过，在下表中更为清楚地列出了其在各个收入水平上的计算结果。把已婚但尚未生育的人作为标准，其收入中应用来负担延期支付（以及他应缴的所得税和附加税）的百分比见下表：

收入	百分比
每周 45s 及 45s 以下	0
50s	$3\frac{1}{2}$
55s	6
60s	$8\frac{3}{4}$
80s	$15\frac{1}{3}$
100s	$19\frac{1}{4}$
每年 £300	21

续表

收入	百分比
每年£400	25
£500	27
£700	29
£1000	35
£2000	$37\frac{1}{2}$
£5000	$53\frac{1}{2}$
£10000	64
£20000	75
£50000	80
£50000 以上	85

注：£：英镑，s：先令

在接下来的表格中所给出的家庭津贴，与上面的方案相比、对低收入集团中有幼儿的人更为有利。在到每周 75 先令为止的各个收入水平上，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孩子，则他将从中获益匪浅。

（4）在税收与延期支付间的分配。按上述方式扣留的收入的适当部分将用来缴纳所得税和附加税（如果有的话），最后的收支余额将以下一章所介绍的方式作为储蓄记入纳税者的贷方账户。所有这方面的最终结果按不同的个人情况见下表：

	每周的收入	延期支付的收入	(当前的)所得税
未婚者	35s	0	0
	45s	3s6d	0
	55s	5s9d	1s3d
	75s	9s9d	4s3d
	80s	10s9d	5s
	100s	14s3d	8s6d
已婚者	35s	0	0
	45s	0	0
	55s	3s6d	0
	75s	10s6d	0
	80s	12s3d	0
	100s	15s10$\frac{1}{2}$d	3s4$\frac{1}{2}$d

注:S:先令,d:便士

	每周的收入	延期支付与所得税	家庭津贴	用于消费的剩余现金
有两个幼儿的已婚者	35s	0	10s	45s
	45s	0	10s	55s
	55s	3s6d	10s	61s6d
	75s	10s6d	10s	74s6d
	80s	12s3d	10s	77s9d
	100s	19s3d	10s	90s9d
有三个幼儿的已婚者	35s	0	15s	50s
	45s	0	15s	60s
	55s	3s6d	15s	66s6d
	75s	10s6d	15s	79s6d
	80s	12s3d	15s	82s9d
	100s	19s3d	15s	95s9d

注:s:先令,d:便士

因此,一个有两个幼儿的已婚者,在不到 75 先令为止的各个收入水平上,实际获得的现金存留要多于其收入;而有三个孩子的已婚者在到大约 95 先令为止的各个收入水平上,实际得到的现金存留要多于其收入。家庭成员用于即时消费的现金增加了,另外还有大量的延期支付的收入记在他们的存款账户上。

对一个每周收入在5镑以上的已婚者[1]，有如下结果：

单位：英镑

总收入	应缴付的所得税和附加税	延期支付的收入	剩余的收入
300	15	49	236
400	31	68	301
600	93	76	431
1000	218	135	647
2000	562	285	1153
5000	2055	630	2315
10000	5268	1156	3576
20000	13018	1896	5086
100000	80768	4133	15099

在高收入范围内，延期支付的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下降了不少。但不能认为这一百分比已经太低，因为用来支付庞大津贴的资金很大部分是来自他们所上缴的所得税和附加税。例如，在每年10万镑的收入水平上，延期支付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4%，但在缴纳了这些税费以后，在剩下的收入中延期支付的比例就上升为21.5%。

（5）征收方式。对于加入了社会保险的人口，延期支付收入的征收方式与社会保险的征收方式相同。每个加入了保险的工人都应持有一张延期支付卡，并由雇主加盖印戳。对所得

① 他也享受对每个孩子每年13镑的补助。一个已婚者要多缴13镑到16镑的所得税以及稍少一些延期支付，也许应该增加对收入在这一范围内的已婚者的津贴。

税的缴纳者，延期收入的征收方式与所得税相同。对于年收入750 镑及 750 镑以下的阶层，考虑到对所得税的补贴之后可以予以相应解决。对于附加税的缴纳者，延期收入的征收方式也与附加税相同。因此，延期收入的估算和征收工作都无须启用任何新的方式——这在战争时期是个很大的好处。

在收入波动的情况下，适合每个支付期间的延期支付比例最初可能难以理顺。不过，可以按照季度或其他方便的间隔把这一比例调整为与平均收入相适应的水平，而这样做所需的一切资料都记载在卡片上面。

(6) 延期支付收入的保管。应该允许个人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机构来保管他的延期支付收入。他可以选择他所支持的团体、他的工会或者其他任何为了医疗保险目的而批准设立的机构；或者，当上述选择都不合意时，可以考虑邮政储蓄银行。因此，应当鼓励工人自己的机构来掌握他们的资源；而且，如果工人们希望如此，则应当给予这些机构相当的自由处置权，决定在何种条件下，这些资源可以提取出来以解个人的燃眉之急。在下一章将介绍这种方案。

通过降低所得税的最低豁免线，以及把不同收入水平的所得税和附加税税率有效地提高到附录(第 476 页)所列出的百分比上，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这一点是易于理解的。对于那些讨厌空想的方案而喜欢明白易懂的方法的人，这一计划是个可靠的选择。如果该计划能与家庭津贴方案一同实施，我看不出任何可以在财政上加以反对的理由。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我更喜欢那种新颖的建议，它所保有的奋斗精神更强烈，而包含的牺牲意识更少，并且实际上所要求的牺牲也较少，可以让生活安全的好处泽及整个社会。这种安全是由节约下来

的资源来承担的，但其范围却比以前广泛得多。

七、延期支付收入的发放和资本税的征收

在这一计划中，延期支付的那部分收入应当作为限制其所有者使用的存款以 2.5%的复利储蓄起来。像上面提到的那样，他可以选择自己所支持的社团、机构，或者当这些选择不可行时，考虑邮政储蓄银行来保管这笔资金。如果上面计划中的征收目标得以实现，那么以此种方式积累的总金额合计大约每年有 6 亿镑。实际上，由于存在各种合理的让步，积累总额也许要少于这个数字。

首先，对于某些战前签订的确定的储蓄协议，例如，给建筑协会的分期付款、向人寿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分期付款的购买协议，也许还有银行贷款协议，应当允许个人用其限制使用的存款来偿付。这样做也许是合情合理的（我已经预留了 5000 万镑作为回旋余地，如果还不够，我相信，在延期支付计划之外我对所能指望的自愿储蓄的估计作了大量潜在的保留）。用延期收入来缴付遗产税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其次，应当允许人们使用其延期支付的收入去购买新的人寿保险或人寿定期保险单。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与特殊环境相适应的方式来制定鼓励这类行动的方案。

第三，既然这些储蓄是个人自己打算用来增加其安全感，以备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不时之需，因此只要能征得他所支持的社团或邮政储蓄银行的同意，就应当允许他使用其存款来应付诸如疾病、失业或家庭的特殊开销。

然而，总的来说，这类存款应当在战后才能提取出来使

用。政府应当确定一系列日期来分期发放这些储蓄，以免出现过分的拖延。但同时，这些日期也不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算而得出的结果，这些计算的根据则是对养老金和类似下面所提出的资本税所作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或纳税资格评审。

最终发放这些储蓄的适当时间将是在战后第一次衰退袭来之时。因为到那时经济形势将与现在截然相反。那时我们将有能力生产出超过目前需求的供给，而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给。因此，延期支付制度将带来双重的好处，而且将来它在防止通货紧缩和失业方面所起的作用，与现在它在防止通货膨胀和紧缺资源的耗竭方面所起的作用，差不多是同样卓有成效的。因为，在战后我们极有可能像现在急于对消费需求进行压缩一样，急于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私人支出有时难以用来增加消费，而有时则能使闲置资源得到利用，因此，把私人支出从前一个时期推迟到后一个时期无疑是明智之举。

如果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发放这种储蓄，那么这一制度无论是在真实资源还是在财政方面，都可以迅速获利。在真实资源方面，它能迅速获利是因为劳动力和生产能力可以被充分利用起来满足消费；在财政方面，它之所以能迅速获利则是因为有了这一制度，要防止失业就不必通过筹集其他形式的贷款来发放失业救济、兴建公共工程了。

不过，根据我的体会，计划的这一部分比其他任何部分都更易引起人们的疑虑。人们担心这种限制使用的存款最终的偿还会困难重重，我对这种批评感到吃惊，因为对我来说它似乎不合情理。如果自愿储蓄也有类似的偿付问题，那么国债所遇到的困难跟它是大同小异的。而且财政部保留了确定发放日期的自由处置权，因此与战后可能留下的大量短期债务相

比，这一部分特殊的国债实际上是易于处理的。我想，这种怀疑的根据是，与正常的储蓄相比，当以延期支付方式形成的储蓄到期以后，人们更有可能倾向于立即把这笔存款提取出来花费掉。我不能确定这一猜测离实际情况有多远。也许这种限制使用的储蓄有助于更广泛地传播进行小笔储蓄的习惯，也许人们会像对目前的银行储蓄存款一样，对这种存款的大部分有节制地支取。不过，我并不指望这些。实际上，如果在这些存款发放之时人们并不把它们花费掉，那么我前面所预测的这种存款对于就业的好处也不会兑现。无论如何，社会救济和改善就业状况都需要资金，因此在发放这种存款的同时，必须寻找新的款项来替代它。我在此所做的不过是设想我们可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防止在找到替代的贷款之前就把这种储蓄支取花光。

然而，无论舆论对这个问题如何地放心不下，人们仍将会发现这个困难能够自行得到解决。如果这场战争持续到两年以上，国债就会急剧增加，让人穷于应付，并且将在未来几年拖累国家的财政。照我看来，正如上次战争结束之时一样，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能在战后第一次衰退到来之前就实行对资本征税的政策，那么无疑是明智之举。因此，这也许是一个把延期支付和征收资本税联系起来的极好时机。

因此，我建议我们应当承担起这项任务，即在战后征收资本税，这样将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以摆脱对延期支付收入的依赖。我仍然坚持发放延期收入和征收资本税这两项措施最好不要同步进行。在严重的失业状况出现之前，我不愿放弃扣留延期支付的收入所能带来的巨大好处；而当衰退到来之时，又恰恰是最不宜征收资本税的时期。如果这种资本税要求一次

全部缴清，那么最好选择战争结束后最早的可能日期。特别是当暂时的繁荣即将出现之际，就更应及早缴付。不过，也许选择在一段时期内分期缴付更好，因为这样能减少麻烦，方便征收工作。这种做法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即可以为征收永久性的资本税在管理方面铺平道路，而这种资本税将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新增的财政手段，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大大胜过所得税。无论如何，战后将有大量的国债券等待结清，因此在技术上也没有理由让资本税的征收与延期收入的发放同时进行。

劳工集团常常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资本税应当直接构成当前战时财政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理由是，战争应当成为减少当前财富不平等状况的良机，而不应加剧这种不平等。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并且上述计划完全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同时，对于在战时征收资本税真正坚定有力、无可辩驳的反对理由，人们又避而不谈。我所关心的主要地并非是管理上的困难，虽然这些困难也许是难以克服的。问题的要点在于资本税现在几乎无助于解决当前的难题。一项值得征收的资本税不可能从富裕阶层的当前消费中抽取。人们只能通过把他们的资产转交给政府来缴付这项税款，而这种资产的资本价值对于当前的财政任务并无多大助益。这样做除了缩减当前收入下的消费外不会有别的作用。而且，由于我在第四章曾提出过的那些原因，没有什么权宜之计足以使低收入集团能够在他们的消费中实现新增购买力的相应增长。对这一收入集团而言，除了推迟他们的支出外，别无选择。通货膨胀虽然使他们得以把这笔钱花销出去，但同时又掠走了这笔花销所能获得的果实。不过，在此所提出的计划可以确保他们最终能够完全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

在延期支付收入的基本管理原则确定以后，也许另外还有一些好机会来应用这种设计。尤其对现役军人来说，在这一制度下，他们的经济地位与在民用部门就业的人相比也许能够更平等一些，他们可以把与其服役年限成比例的适当部分的收入作为被限制使用的存款储蓄起来。通过对财产征收资本税来支付“退伍军人津贴”是一项特别合适的义务。

这一制度对于超额利润问题的处理也是非常有用的。一项理想化的建议往往要求在战争期间不允许存在任何超额利润。这无疑不是一项明智可行的建议，因为它将打击企业家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上次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铺张浪费。财政部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地扩大税前超额利润的总额，而如果企业家们全然丧失从事经济活动的兴趣，那么要获得尽可能大的税基只能是水中捞月。当前的超额利润税是 60%，包括所得税在内就增加到 75%，而对附加税缴纳者来说这一百分比就更高。如果这种计算的根据是公正的，因而法定的超额利润也是实事求是的，那么这就为某种适度的增长留下了余地。不过，如果这项计划能够使超额利润在扣除了超额利润税和所得税后的余额以限制使用的存款形式储蓄起来，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八、定量配给、价格管理和工资控制

工资水平徒劳无益地追随生活费用的上涨而提高，两者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平衡的机制将在下章描述。不过，从所有的方面来看这都是一种最糟糕的解决办法。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通过税收或延期支付方式从市场

上收回足够的购买力，消除推动价格上涨的这种势不可挡的力量，是避免陷入恶性循环的唯一出路。不过，还有不少人相信存在着另外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即通过定量配给和固定价格双管齐下来控制生活费用，如果这种措施取得成功，那么对工资的控制也将是轻而易举的。

有的人认为仅凭这些措施就足以实现均衡，我相信这是一种危险的空想。不过，定量配给和价格管理应该构成综合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许可以成为主体方案的一个有价值的补充。所以，在此讨论这个问题是恰当的。

有两个主要的反对理由，认为实行定量配给和价格管理这样一种措施并不会同时带来购买力的回收。第一个反对理由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之间的消费是千差万别的。如果我们的需要和爱好是千篇一律的，那么取消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也不会造成任何真正的损失。实际上，把完全相同的配给品分配给我们每一个人，这种方式会造成资源和效用的极大浪费。对于某些消费品——面包、糖、盐，也许还有熏肉——这种配给制是没有什么害处的，虽然甚至在这里事实上也还存在着个人消费习惯的广泛差异。不过，一旦涉及这样一些消费品——牛奶、咖啡、啤酒、烈酒、鲜肉、服装、鞋类、书籍、衣着用品、家具——爱好和需要的多样性在此就居于突出的地位。强制要求每个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他的不同支出项目之间作出这样的划分是荒唐可笑的。而且，要求对所有需要的物品都进行配给也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有某些商品不受控制，那么购买力的压力就会促使生产转到这些方向上来，虽然这些商品也许是人们最不需要并且其本身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最好，如果有奇迹出现，这一措施取得巨大的成功，消费得到了彻底

的控制,那么将有相当大一部分收入留在消费者手中不能够再花销出去。倘若一开始实施延期支付也能产生同样的结果,那么上述措施不过是一种精心设计、拐弯抹角而又费力耗时的方法。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防止一定比例的收入被花销掉,那么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从目标本身开始,即通过延期支出或税收方式来扣留一部分收入,并且允许消费者对于其可支配的收入如何在不同的消费项目间分配能够作出自由的选择。这样就可以避免巨大的麻烦和惊人的浪费,并且使消费者得到更多的满足。戴维·罗在最近的一幅画中,把约翰·西蒙爵士描绘成拿着一条皮带苦苦思索、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该勒紧"他的肠胃还是他的口袋",这幅漫画传神地表达出了对于这件事的深刻评论。一个自由社会更应该把勒紧口袋作为它的选择。在现实中,个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差异,赞同实行全面的定量配给、取消选择的自由,便是对这种差异进行粗暴践踏的典型产物,有时这被称作布尔什维主义。

一项精心构思的定量配给政策,其目的与此迥然不同。这项政策的目的并不是要控制消费总量,而是试图尽可能公正地把消费从某种由于特殊原因而不得不对其供应加以控制的物品上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例如,由于中断了与丹麦及波罗的海国家的贸易,有必要把熏肉的供应限制在正常水平以下,唯一可能的替代途径是从美国进货,但这又会造成同其他更重要的项目争夺我们有限的美元储备;或者,不可能分配足够的船舶吨数来运输能够满足当前需求的食糖。因此有必要促使人们减少对熏肉和食糖的消费,转而购买其他东西——与减少人们的支出总量相比,这是个大不相同的问题。如果这种我

们希望限制消费的商品不是日常的必需品或一般消费品，那么通过提高价格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这一目的。然而如果是必需品，对它的特别提价则是不受欢迎的，此时这种限制消费的办法只能弃而不用，而定量配给则有了用武之地。

实行固定价格，对价格提高进行立法限制，而同时又不对购买力加以任何控制，这种做法难免会招致非议。因为这一政策确实能够增加消费压力，促进货币收入的使用和宝贵资源的消耗。如果当局准备用于民用消费的资源数量受到严格限制，那么固定价格的实施就可能以出现商店供应紧缺和排队抢购而收场。

然而，固定价格的付诸实施和反对价格提高的宣传无疑要比过时的通货膨胀更能迎合当今的时尚。这一政策在政治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这一政策的批评是，与旧式的通货膨胀一样，它在实现平衡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然而事实却与此截然相反。我确信，如果在今后 6 个月不采取适当的步骤来缩减消费者的购买力，那么我们最后更有可能看到的将是供应的短缺而非势如脱缰的物价上涨。无论是大众还是厂家、零售商，都对提高物价抱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这种心理过去常常导致迅速的通货膨胀，而今天却逐渐被一种不同的观念所取代，无论这种观念是出自私意还是公心。因此，我相信一场典型的通货膨胀在今天与我们相距甚远。我对这种新的态度表示欢迎，因为这意味着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之前，我们可以有更长的时间来实施一种能够真正实现平衡的政策。不过，这并非是一项万全之策。供应短缺和排队抢购将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和巨大的浪费，并且会毫无必要地加剧公众的紧张情绪。俄国和德国长期以来都对这样一种方式情有独钟，而我

已经说过，这种选择是合乎时尚的。然而，我们要寻找第三种可能的选择，这是一种真正的解决办法，能够在增进普遍利益的同时维持消费者个人的选择自由。

我并不想直接处理工资问题。我认为间接地解决这个问题更为明智一些。如果不能把消费者购买力的必要部分从市场上收回，那么即使不出现奔腾式的通货膨胀，物价的大幅上涨也将不可避免。政府试图控制一部分一般消费品的努力迟早都需要进行大量的补助，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预算的不平衡(财政大臣最近宣称，在这方面的临时性举措每周要花费国库100万镑)。而且，生活费用的大幅上涨肯定会引发提高工资的要求，这种要求多少可以如愿以偿。

另一方面，如果通过收回购买力就可以间接地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提高工资的做法就毫无必要了，因为工资的提高会带动价格的上涨，进而引起恶性循环。劳工阶层对于待遇的改善已经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但当进口商品的价格提高而引起物价上涨时，对他们也应该给予某种补贴，或者把工资稍加提高以部分地补偿他们的损失。不过，这可以消除使尖锐的工资问题趋于激化的主要因素，并且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把在战争期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更为合理这一问题，交给工会主义者，让他们凭借自己的常识和公心去作出判断。

不过，如果延期支付计划能够得到采纳，那么就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缓解工资问题。因为如果能够收回足够的购买力，那么实施一项审慎的政策来对有限几种必需品的价格进行控制，其风险和代价就不会再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了。因此，我建议(以采纳延期支付计划为先决条件)，应该对基本必需品的有限范围作出规定，这一范围要比劳工部生活费用指

数所涉及的消费品范围窄得多;并且政府(用不着作出任何特别的保证)应当尽力防止以这些必需品为基础的生活费用指数出现任何上涨;而且工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也用不着作出任何特别的保证)也应该同意,除非政府未能成功地制止生活费用指数上涨,否则他们将不会以此为理由来强求工资的任何提高。这一建议决不是我们主要计划的核心,而是这些计划的进一步发展。

九、自愿储蓄和通货膨胀的机制

对于我们前面几章所提出的计划,还有一些替代方案。这些方案在激烈程度上不比前者弱,如果它们能够付诸实施,其效果也不会逊于前者。例如,征收50%的零售税或20%的工资税;或者,如我在前面指出过的,提高所得税,使之取得与延期支付完全一样的效果。在这些激烈而效果相同的替代方案中作出的选择,必须根据对公众心理、社会公平以及管理上的方便等种种考虑而定。

然而,那些反对延期支付计划的人,通常来说,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偏爱上述某一种激烈的替代方案,而是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常规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说,按当前的方式实行严厉的税收,以及通过积极的宣传来促进自愿储蓄。

现在的这种政策意味着两种可能。首先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是在重复上次战争中的政策(虽然在细节上做了必要的修正),即通过足够程度的通货膨胀把税收和自愿储蓄提高到所需的水平之上。这一过程的机制就是本章的主题。

不过,这一政策还可能意味着——这也正是其鼓吹者所

声称的——某种比它本身更胜一筹的东西，即不借助通货膨胀而实现供求平衡。

很清楚，要实现如此美妙的结果，其可行性只是个程度问题。例如，如果与1938--1939财政年度相比，财政支出的增加不超过10亿镑，或者也许是12.5亿镑，那么我们自然可以认为仅靠"常规的"方式就足以满足需要（当然是以可获得的资本资源为补充）。另一方面，如果支出的增加在17.5亿镑或更多（按战前价格计算），回顾一下我们在第三、四章所给出的统计背景，实际上可以肯定此时单靠常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对常规方式作用限度的不同估计引起了意见的分歧。我则倾向于把以常规方式能够可靠地应付的最高支出额定在12.5亿镑左右，而且我相当确信这种方式对于15亿镑的新增支出力有未逮。

接下来我们必须对一种极其重要但又常常被忽视的考虑加以强调。让我们设想，在缺乏激烈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指望的自愿储蓄（比方说）有5亿镑，但却需要7.5亿镑来平衡战争预算。因此，我们总得借助于眼前这些激烈方式中的一种来筹集资金，弥补2.5亿镑的缺口。这正是目前我们不得不面对却又易于忽视的基本困难。只要我们限于"常规"方式范围内，就总可以指望能够获得这一数量的自愿储蓄；而一旦我们采用激烈的方式，就不能再得到同一数量的自愿储蓄了。因为在我们通过激烈方式获取的资金中，有一部分必定是以牺牲先前所获得的自愿储蓄为代价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自愿储蓄的数额是与所得税的水平密切相关的。如果提高所得税，那么该项税收总收入的增加并不意味来自税收和自愿储蓄的总收入增加，因为更高的税收不可能完全靠减少消费来缴付，而

是至少有一部分要靠减少储蓄来满足。

因此，只要支出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常规方式所能应付的最大限度，那么激烈的方式就必须足以提供高于这一超支额的收入，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指望有以前那样多的自愿储蓄来源。因此，不同于公共机构的储蓄和契约性储蓄，我对私人自愿储蓄不抱任何希望，虽然我希望这一论调能够被证明是过于悲观了。

顺便提一下，显而易见，战时储蓄运动所取得的不凡业绩对于储蓄这一方式的前景并不能在统计意义上给出任何有用的提示。与邮政储蓄银行和股份银行的储蓄率相比，战时储蓄提供了更为优厚的条件，因而自然吸引以前存放在其他地方的原有储蓄。而且，雇主为了取得营业执照而预付的支出也常常有助于储蓄集团的形成，这些支出是通过将来从收入中扣除而逐步偿还的。因此，公开发表的这种储蓄总额的数字中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的储蓄，而且在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已经预先认同了这一名义上的总额。因此，如果当前储蓄的含义是当前收入超过当前支出的余额，那么在这一意义上，很难说上述总额中哪一部分是当前储蓄。

在我看来，这个一般理由有力地证明了，诸如依靠现行政策下的税收并以自愿储蓄为补充的常规方式，就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战争努力这一类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激烈的方式而一味依赖自愿储蓄，就有不知不觉滑到用通货膨胀来刺激自愿储蓄的泥潭中去的危险。这样就引出了本章的主题。

用自愿储蓄来筹集战争经费并不存在任何困难——前提是把其后果撇开不谈。而这正是危险之所在。一个掌握了银

行业和货币发行体系的政府总是可以筹集到足够的现金来购买国内产品。在把用税收和外汇储备来清偿的进出口贸易的逆差计算进来以后，政府支出的余额必定会以自愿储蓄的形式存留在大众手中。这在算术上是确凿无疑的，因为政府已经购买了大量商品，大众收入的一部分正是从中赚得的，而这部分却无处可花。这笔额外的进款增加了人们的收入，如果出现物价上涨，那么存留下来的收入将刚好与从前一样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但又很少为人们所理解，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仔细探究一番。

让我们设想，按战前价格计算，国家的产值①是 55 亿镑，个人收入（包括转移支付）约为 60 亿镑，税收收入是 14 亿镑，用来支付进出口逆差的外汇储备或国外借款是 3.5 亿镑，而政府支出，也按战前价格计算，是 27.5 亿镑，即除转移支付外是 22.5 亿镑。在扣除用来支付税收的 14 亿镑后，剩下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是 46 亿镑。不过，既然政府已经购买了 22.5 亿镑的产品，那么只有 32.5 亿镑（55 亿镑－22.5 亿镑）的商品（按战前价格计算）留给大众去购买。现在，如果大众自愿地储蓄了 13.5 亿镑，也就是说，按战前价格计算，在他们的 46 亿镑收入和 32.5 亿镑可获得的商品价值之间的差额总共有 13.5 亿镑，显然，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用不着对价格作任何提高，商品的供应就恰好能与需求相平衡。

不过，如果在这些条件下，大众不愿意储蓄像 13.5 亿镑这么大的数额，那么以自愿储蓄来筹集战费的制度是否就失

① 这些大概数字是与事实相近的。不过为了简化说明，对耗费资本来满足政府开支这样一种情况，在此不予考虑。

效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在上次战争中我们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制度。然而，因为价格上涨的速度要比工资提高的速度快，这样，大众进行储蓄的意愿就不可能满足上述条件。那么到底问题何在？如何解释这个悖论？

首先，让我们假设，大众的自愿储蓄不是13.5亿镑，而只有7亿镑，并且他们试图用剩下的39亿镑来购买按战前价格算只值32.5亿镑的商品。显然只有把价格提高20%才能使供求平衡，因为那时这些商品将值39亿镑（32.5亿镑+6.5亿镑），正好与人们所打算支出的收入金额持平。而且，那些卖出39亿镑商品的人实际上只花费了32.5亿镑，因此他们将获得6.5亿镑的差额作为额外的未开销收入，这恰好是政府所需资金的数目。

然而，很快我们会发现这种办法只能暂时地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期望这6.5亿镑未开销的额外利润将全部转化为永久性的储蓄。这笔资金落到被授权使用它的人手中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打个比方说，在这盘棋的下一个回合中，这笔资金将加入到潜在的可开支的收入总额中去，这样我们将有52.5亿镑收入（46亿镑+6.5亿镑），而把20%的价格上涨算进来，待购商品的价值也只有39亿镑。而且，如果公开市场的价格已经上涨了20%，那么政府也很难在进行自己的购买时控制价格。因此，我们将很快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在大众准备支出的货币数量和他们能够买到的商品的价值（按照新的物价水平计算，比以前高20%）之间又出现了巨大的差额，这样就不得不要求暂时停止进一步提高价格。情况就是这样。

幸运的是，上面只是不完全地描述了这个故事的第二章。

如果情况像上面那样，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面临失控的通货膨胀。不过在上次战争中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而这一次我们实行相同的自愿储蓄政策，这种通货膨胀也同样不可能发生。

那么，这件事的实际过程是怎样的呢？最初的价格上涨将涉及那些以较低的战前价格生产出来的商品，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其最终利润将属于这些商品的所有者。这就是说，总收入将实际增加 6.5 亿镑（除去政府所购买的商品价格上涨而产生的效果），不过并不是每个人的收入都会以同样的比例增加，最初增加的收入主要属于个人、商业和制造公司的少数阶层，可以把他们简称为“暴发户”（这并没有任何恶意，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而他们也并非有意为之）。现在这些暴发户应该缴纳的税率是非常高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要缴纳超额利润税，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达到了必须缴纳高额所得税和超额所得附加税的水平。因此，打个比方说，这些暴发户就成了财政部的税务员。在新增的 6.5 亿镑中，超过一半（某些情况下，超过 3/4）① 的收入将作为税款上缴国库。而且，可能有相当大一部分余额将被自愿地储蓄起来。由于相对地富裕起来了，这部分就会更加愿意进行储蓄，但是这些利润大部分是属于公司的，而由于种种原因，公司不愿意以更高的股息把大部分利润分配给股东，而宁愿在这种形势下代表股东把它们储蓄起来，因此并非是全部 6.5 亿镑都会成为个人的自愿储蓄。因此，实际上在 6.5 亿镑中（当政府以高

① 超额利润税(E.P.T)＋所得税，即新增收入的 75%，而 E.P.T＋所得税＋附加税（超额所得为 5000 镑），其结果是新增收入的 83.5%。

价进行自己的购买时，这一数字还会更大）只有一小部分资金会在第二回合中投放到消费市场上去。这样，要维持供求平衡就用不着把物价再提高20%，而只需提高2%或3%就足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适度增加一般大众所需缴纳的税赋就足以抵消暴发户们新增的消费，并避免必需品（要不是由于下面马上要提到的原因）在最初提价20%以后，出现任何进一步的价格上涨。

很不幸，这个故事尚未结束，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陷进了一个远比实际情况简单顺当得多的假设。我们一直假设，尽管物价上涨了20%，但工人仍然会满足于与以前同样多的货币工资。这样，暴发户们在第二回合就可以继续赚得6.5亿镑的利润，并继续充当财政部的税务员，不借助于任何价格上涨而缴纳与原先同样多的税额。不过，事实上工人将会强烈要求提高工资——而且多多少少能如愿以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与平时相比，雇主将更不容易对提高工资的要求加以拒绝。由于劳动力短缺，如果他想要留住他的工人，那么就不得不被迫作出让步，同意调整工资；而且，既然政府要通过税收形式取走他们70%的超额利润，那么同他的雇工和职员分享他牟取的暴利也不会让他破费太多。事实上，如果工资和其他货币费用完全与生活费用成比例地提高，我们将像以前一样面临势如脱缰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以每一级20%的速度持续攀升——这个过程就是众所周知的恶性循环。

然而，我们手中还有一张牌。某些费用是由法律和契约固定下来的，这样，那些依靠地租、利息以及养老金等固定货币收入的阶层势必遭受损失。工资的调整等等需要时间，甚至当

工人的压力强大到足以使这种调整迟早不可避免之时，要将其付诸实施也需要时间，有时甚至是相当长的时间。正是这种时滞和其他阻碍因素使得上述政策绝处逢生。战争不会无休止地打下去。工资和其他费用会紧随价格之后节节上升，但是物价水平仍然将一直（在前面的假设条件下）保持超出它们20%的上涨速度。不管工资增加多少，花销这些收入的行为都将再次把价格相应地抬高。如果6个月后工资和其他费用平均提高了10%，物价就将上涨32%（110%×120%－1）。如果两年后成本提高了40%，那么价格将上涨68%（140%×120%－1）。因此，自愿储蓄制度最终会顺利地发挥作用。换句话说，这笔资金可以"自愿地"筹集起来而不会引起急剧的物价上涨。应当让价格相对于工资上涨到一个必要的水平以使工人阶级的工资和其他收入有一个适当的部分转移到暴发户们手中，从而再大部分以税收形式、一部分以额外的自愿储蓄形式转入国库，这是该方案取得成功的唯一条件。

在每一个阶段的自愿储蓄量越大，当然对每个人就越有好处。如果全民储蓄运动能够成功地增加自愿储蓄量，那么价格相对于工资的必要提高幅度就可以相应小一些。让我们再次用数字来说明。假设（按战前价格计算）与可获得的消费品供给的价值相比，可开销的收入超出了13.5亿镑，而其中的7亿镑被自愿地储蓄起来。这样还剩下6.5亿镑，即比可获得的商品供给（按战前价格计算）多出20%。不过，如果全民储蓄运动成功地又增加了（比如说）1亿镑自愿储蓄，这样自愿储蓄的总量就是8亿镑而不是7亿镑，那么可开销的收入的超出额就减少到5.5亿镑，即比可获得的供给（按战前价格计算）多出17%。此时，价格的上涨只需比工资和其他费用的增

长高出17%(而不是20%)就可以实现供求平衡。

因此，自愿储蓄的增长有百利而无一弊。除了嫌其不足之外，对于这一政策的实施人们毫无异议。对个人来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延期支付收入计划，由此他可以增加2镑收入，并且丝毫不受任何物价飞涨的威胁；另一种是自愿储蓄方案，由此他可以增加1镑收入，但却必须忍受通货膨胀的恶劣社会后果。对个人来说(除非他属于赚取利润的阶级)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选择前者他无疑会获益匪浅。这就好像有两种交通规则，一种是强制遵守的规则，一种是自愿遵守的规则，当人们选择前者时，就可以免遭交通事故和道路拥挤之苦；而当人们选择后者时，就会陷入事故频生的窘境。

然而对财政部和未来的纳税人来说答案就不那么明显了。按照真实价值来计算，与不完全成功、以通货膨胀为补充的自愿储蓄相比，延期支付收入制度——同样地，高度成功的自愿储蓄制度——将会留给我们更多的国债，因为通货膨胀是一位威力无比的收税官。不过，财政部和未来的纳税人仍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应当把通货膨胀所达到的物价水平永久地维持下去。因为按货币计算，在通货膨胀制度下的国债可能要比在强迫储蓄制度下的数量更为庞大；这样如果物价随后回落，那么通货膨胀的好处甚至对财政部来说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此，千真万确的是，在把税收收入计算在内之后，作为最后一着，需要用来平衡政府支出的储蓄数量总是能够通过“自愿的”储蓄来筹得。至于这个名称是否贴切，只不过是个喜好问题。这种方法是把工人手中他不愿储蓄起来的收入中的适当部分“强制地”转变成企业家的自愿储蓄(以及税收)。“我

们将依靠自愿储蓄制度”不过是“我们将依靠必要程度的通货膨胀”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罗伯特·金德斯利爵士在他的储蓄运动中可以公正地以下列说法作为辩解：

“政府需要资金。然而这是一个自由国家，因此，某些人必须自愿地进行储蓄。如果你（以及你的朋友）不这样做，那么就不得不通过提高物价来强制地从你的真实收入中拿走必要的一部分并转交给暴发户；而他则将自愿地把这笔钱储蓄起来（当他不缴纳强制性的税赋时，这样数目的一笔收入就会完全变成他的自愿储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免对自愿制度的背离，这种背离对国家来说是不祥之兆。”

作为对自由原则的辩护，上面这段话虽然也许有点模棱两可，对于那些赞同增加储蓄的工人来说，要不是由于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不失为一种合乎常理、令人信服的观点。对于进行自愿储蓄的个人，如果其他人并不群起而效仿他的做法，那么他就不可能通过进行更多的储蓄来保护自己不受通货膨胀后果的影响；正像如果别人对交通规则漠然置之，那么他也不可能通过遵守规则来确保自己不出车祸一样。

以上是对通货膨胀运作机制的基本分析。这一分析是相当简明的。不过，它仍然没有被每个人所理解——由于这个缘故，通货膨胀的机制对许多人来说是相当新奇的，这也许多少有点让人吃惊。经济学家们仅仅是在最近 25 年才把它弄清（虽然这要比发生在和平时期的情形简单得多，在和平时期，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是就业波动对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固定的最大产出），因此，也就是说那些现在成为权威的人由此树立起了他们的教条。在上次战争期间我在财政部供职，但在那时

我从未听说过我们的财政问题是按照这些方式来加以讨论的。

因此，根据上面的分析，再回过头来想一想那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将是非常有意思的。

	货币工资率：这是下面所提及的工人的大致指数①	生活费用		真实工资率	
		劳工部公布的指数	修正后的指数②	劳工部公布的指数	修正后的指数
7月					
1914	100	100	100	100	100
1915	105～110	125	(120)	84～88	87～92
1916	115～120	145	(135)	79～83	85～89
1917	135～140	180	(160)	75～88	84～88
1918	175～180	205	180	85～88	79～100

① 砌砖工人、砌砖工人的雇工、排字工人、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棉纺工人、毛纺和精纺工人、工程匠人、工程雇工、造船工人的计时工资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采煤业和农业。

② 经过修正的指数是根据萨姆纳委员会在1918年的调查结果得出的。它与官方指数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对服装、食糖、黄油、人造黄油等商品的处理上。当不能在市场上获得战前的品种时，萨姆纳指数就把其替代品计算进来，而官方指数则没有这样做。

这样，劳工部公布的生活费用指数每年上涨约25个百分点，而经过修正的指数(1918年编制)每年上涨约20个百分

点，实际情况可能是两者的折衷；到战争结束前，货币已经贬值了大约一半。与此相反，货币工资率在战争的前半段平均每年提高了大约10个百分点，而在后半段大约每年提高了30个百分点。其净结果是在到1917年7月为止的战争的头三年中，工资率的购买力比战前下降了15%左右。在战争的后半段和最后一年，形势颇有好转，这是由于美国的参战减轻了财政压力的缘故，但其影响程度难以精确地计算出来；在引入严格的定量配给和固定价格以后，由于制度发生了变化，消费方向也出现了转移，从而导致了统计上的失真。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结果。可开销的收入量（由于就业状况的改善和加班工作等，这一数量要比工资率增加得更快）相对于消费品的供应增加了15%（在战争初期要比这少得多，而在末期则要比这多得多），这一点可以从物价相对于工资上涨了15%的情况看出来。生活费用的上涨引起了工资率的相应提高，不过工资率的提高有正好一年的时滞，因而同时被相同程度的物价的进一步上涨所抵消。工资率在每一年正好提高到前一年的物价水平上，因此这样长的时滞足以防止灾难的发生。如果物价能够保持一直高出工资15%，并且在第一年工资只提高到这一数字的一半，然后以一年的时滞跟随物价的上涨而作相应的提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安然挨过这四年战争，而物价则差不多只翻了一番。下页的图表显示了这一粗略估计与事实的近似程度：

	理论指数		实际指数①	
	物价	工资率	物价	工资率
1914	100	100	100	100
1915	$122\frac{1}{2}$	$107\frac{1}{2}$	$122\frac{1}{2}$	$107\frac{1}{2}$
1916	141	$122\frac{1}{2}$	140	$117\frac{1}{2}$
1917	161	141	170	$137\frac{1}{2}$
1918	$185\frac{1}{2}$	161	$192\frac{1}{2}$	$177\frac{1}{2}$

① 这是两种估计的平均数。

然而，工资和物价轮番追赶攀升的机制是何等的荒谬！除了暴发户外，没有人能够从中获益。这一过程为随之而来的众多麻烦播下了种子。而最后按货币计算，我们将背上沉重无比的国债包袱，这些国债已大大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并且在整个社会中的分配极不合理。我们可以把这种制度与延期支付制度相比较。平均征收15%的延期支付收入就可以使得货币工资率和生活费用像以前那样建立同样的关系；这样，前者追赶后者上升的压力就能够消除。工人阶级的真实消费水平在总体上与通货膨胀制度下的消费水平不相上下。如果按照原有的工资率，平均收入因为充分就业和加班工作（实际情况大致如此）而比以前高15%，那么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就将维持在战前的水平上，并且除了要完成更艰苦的工作外，无需作出任何牺牲。这种艰苦的工作也将得到回报，工人将成为很大一部分国债的债权人。因为到战争结束之时（这里给出的数字是非常保守的），国债总量将减少20亿镑，甚至更多，而在余下

的国债总量中，至少有5亿镑将属于工薪阶层而不是暴发户。也就是说，在上次战争中，借助于“自愿”储蓄方式，有大约25亿镑落入了企业家的腰包。

在上次战争中我们实现了这一奇迹，即把工人阶级的总消费量维持在(或接近于)战前的水平——真实工资率的下降被就业的增加和工作时间的延长所抵消。我还不能肯定，这一次是不是就不能实现同样的结果。只有完全弄清楚战争在经济上的需要才可能得出答案。不过，如果按当前的工资率，总收入由于加班工作和充分就业而增加了，那么基本工资率的提高将足以抵消价格的上涨，从而会给我们的国民经济提出一项可望而不可及的任务，即把消费水平提高到战前水平之上。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来酬报工人，任何试图勉强为之的尝试都只会诱发通货膨胀。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把原本可能属于企业家的国债所有权分配给工人来回报他们。

十、法国所采用的制度

值得指出的是，这本小册子里的建议，与另外两个交战国(一个是敌国，一个是盟国)所采用的措施相比较，是非常温和的(而且也许实际情况会很好地证明，该建议比我们必须做到的还要温和得多)。

有一种传言，说德国采用了一种与上面所提到的延期支付在表面上很相似的制度。然而，如果这种报道属实，那么这种措施就要胜过目前已经付诸实施的其他措施，而这些措施又要比在此所提出的任何方案都要激烈得多——例如对工资、工时和物价完全加以固定，全面地实行定量配给制，并以

商店供应的短缺和广泛的禁令为补充、以及对工资的一系列克扣等；这些措施与任何延期支付制度相去甚远，它们合起来意味着低收入集团将承受可怕的负担，其总额比延期支付所要求的规模高出好几倍。我希望能够给出更确切的、数量上的详情。对一般消费品的控制在德国已经取得成效，然而，如果在我们这个国家以同样的激烈程度来实施这种政策，我猜想完全可以使我们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增长 50%，也许还要更高。因此，我们应该至少在这里所建议的规模上拒绝承担我们最初的那些措施或其他同类政策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德国的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是作为一种权宜之策，正是我们无论如何所要避免的，只要这样做不妨碍我们取得最终的胜利。既然如此，也许引用法国所采用的制度更为相宜。法国所发生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总像是雾里看花，而且比笼罩在德国上方的雾还要浓。这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并不完全是检查制度的缘故。我相信，英国的舆论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法国对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控制有多么广泛。

法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并在 1939 年 11 月 16 日达到了顶点，完全确立起了对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官方控制。与其他行业相比，这种控制在军工行业中更为广泛。在非军工行业中，工资不准通过集体协议或需劳工部批准的个人协议来加以调整，而必须保持战前的水平。在军工行业中，工资则由劳工部和军工部（或其他公务部门）来规定；禁止雇主支付超过最高规定限度的工资（大体相当于战前工资水平）；未经允许雇员不得擅自脱离他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并且应服从当局的任意调遣。因此从一开始起，任何提高工资水平的动向都被明令禁止。

除此之外，法国还建立起了所谓的"国民团结基金"，用来在民用范围内偿付由于战争而引起的任何特殊支出，我认为，这包括由于官方控制生活费用的措施所造成的任何损失。超额利润税和一般工资税被用于充实这项基金。对工资税的征收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1) 对于那些本当服役，但由于他们从事某种预定保留的职业而得以豁免的工人，征收其工资的 15%。这一政策我们也应加以借鉴以从中获益。

(2) 所有每周工作 40 小时到 45 小时的工人，他们在这 5 小时内挣得的收入全数上交，对于每周工作时间在 45 小时以上所挣得的那部分收入，征收 1/3(由于目前在许多情况下工作时间是每周 50 小时或更多，这样就又差不多是再征收 15%的工资)。

在此基础上，法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以把生活费用维持在战前水平上，不过，迄今为止他们仍然避免使用定量配给制度。我不清楚法国这种制度实际运作的详细情况，不知道它是否使法国财政部在对进口商品和农产品的补贴上所费不菲。

由于目前我所能获得的资料有限，因此，作为对最新情况的报道，这里的描述或许是不完全、不准确的。我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够促使某位法国人出来对法国后方战线的情况给予更全面的报道。

M. 达勒迪尔 1940 年 1 月底在对法国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赞扬了这些严厉的措施，并呼吁法国民众心甘情愿地加以接受：

"当我们的孩子们出发去边疆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

的转变。那些留守后方的人们，不用去犯难涉险、无需忍受同样的煎熬磨难，他们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必须牺牲个人利益，放弃对某些商品的消费。必须把所有的力量和能动性集中到法国军队中去，这是当前的首要之务，没有军队他们将一无所有。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令人生畏的物质力量，企图隐瞒这一点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一种犯罪。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我们整个的生活面貌……今天我的话是讲给那些留守后方的法国人听的。我希望能够直言不讳，哪怕是有些残酷无情……一句话，那些留在后方的人们，只有通过克勤克俭和严守纪律才能赢得前方将士对他们的尊敬。”

在讲话即将结束之际，他把德国人如山坦之流所作的宣传概括如下：

“他对富人说，‘你将失去财富’。他对工人说，‘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他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说，‘你所热爱的一切将遭到灭顶之灾。’他对宗教信徒说，‘你的信仰怎么能接受这样的大屠杀？’他对投机分子说，‘像你这样的人可以从你的国家的灾祸中大捞一把。’”

以这样一位领袖——他的国家也正陷于战争的泥潭中——的雄辩之辞来结束这本小册子是恰到好处的，即使这会使本书中谨小慎微的人道主义观点和辩护性质的温和建议相形见绌，显得可怜兮兮、软弱无力。

附　　录

一、国民收入

目前在对国民收入所作的各种估计之间存在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对这一概念的含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不单由于纯粹的统计上的差异——虽然有许多基本的统计估算也许是靠不住的。下面的注释采用了科林·克拉克先生的统计数据，但并没有接受他的国民总收入概念，在此我也无意去探究批评这些估计。这里所给出的实际数据是罗思伯斯先生对克拉克先生的估计加以修正的结果，以根据当年价格反映 1938 年 4 月 1 日—1939 年 3 月 31 日财政年度的最新情况。

这里有两个适用于一般目的的基本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根据货币费用计算的当前总产出，在正文中已经给出其结果，即：

单位：百万英镑

3710	私人消费的当前价值，不含间接税，并扣除了当前货币的真实贬值；
290	在建筑、工厂、运输和存货上的新增净投资的当前费用，即当前资本支出，并扣除了当前资本的真实贬值；
850	政府行动计划的当前费用，不包括对养老金领取者、国债持有者等的“转移”支付以及已经包含在上面项目中的支出。
4850	以上三项合计数。

我建议把这个结果称作国民产值。

第二个概念是应征税的那部分收入，即个人收入的总和（包括慈善团体、私人机构和公司）。与上面的国民产值不同，它包括5亿镑的"转移"收入，但政府从贸易利润中获得的非税收入不在其中。这样其总额是53亿镑（48.5亿镑+5亿镑－5000万镑）。这一收入还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单位：百万英镑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私人消费（包括6.7亿镑间接税费和扣除当前货币的真实贬值的37.1亿镑当前消费支出的价值）	4380
私人储蓄（包括上面提到的2.9亿镑新增投资和借给政府用来偿付其行动计划的费用超过税收和贸易利润收入的8000万镑差额）	370
直接税	550
合　计	5300①

下面补充列出用以构成上述及其他收入概念的最主要要

① 我在《经济学杂志》上的估计数字是57亿镑。两者的差异是源于以下几点：在克拉克先生的数字中对3.8亿镑的货币贬值作了两次扣除（总的当前贬值为4.2亿镑，减去4000万镑政府的养路费即为3.8亿镑，其中3.8亿镑在我的估计中没有被两次扣除）；政府的5000万镑贸易利润原先是包含在私人利润项目中的；还有修正估计后3000万镑的政府赤字。我在1940年3月的《经济学杂志》上（《凯恩斯全集》，第22卷）详细讨论了在这些数字背后存在的某些逻辑上的困难。

素也许不无裨益。

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包括中央和地方)

单位:百万英镑

政府收入:	直接税	550
	间接税	460
	各种杂费	210
	政府贸易利润	50
	来自民间的净贷款	80
	合　计	1350
政府支出:	转移支出	500
	政府服务	850
	合　计	1350

上面的政府支出中不包括政府在新建住房和道路等项目上的支出(约有5000万镑到1亿镑),因为这已包含在对投资的估计数字中了(由于这一数字是根据生产普查而得出的,因而必然把所有的投资都包含在内,而不管它是来自政府还是私人机构)。为了与此相平衡,对上表中政府从民间筹借的贷款作了相应的扣除,低于政府实际借贷的数量。因此,政府支出这一数字只代表用来偿付当前净赤字的款项,而不包括政府的投资支出。

私人收入的支出

单位:百万英镑

私人收入	
来自当前产出的工资和利润	4800
转移收入	500
合　计	5300

私人支出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消费	4380
储蓄	370
直接税	550
合　计	5300

国民产值

扣除真实耗损和货币贬值后的私人和政府消费	4140
真实损耗和货币贬值	420
新增投资	290
合　计	4850
来自上述项目的私人工资和利润	4800
政府利润	50
合　计	4,850

总　投　资

净增投资	290
真实损耗与货币贬值	420
合　计	710

储　　蓄

新增投资	290
政府赤字	80
合　计	370

私人收入的分配

250镑以下的个人年收入总和	2910
250镑以上的个人年收入总和	2340
慈善团体的收入	50
合　计	5300

公司的未分配收入等在此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包含在拥有这笔资金所有权的个人的收入中。

年收入250镑以下阶层的收入来源

单位:百万英镑

工资和薪金	2390
非工资收入	240
转移收入	280
合　计	2910

年收入250镑以下阶层的支出

消费的价值①	2420
税费	390
储蓄	100
合　计	2910

年收入250镑以上阶层的收入来源

薪金和利润	2170
转移收入	220
合　计	2390

① 扩展到私人消费和政府服务时,真实损耗的费用是8.5%。这包含在上面的消费价值中。

年收入250镑以上阶层的支出

消费的价值①	1290
税　费	830
储　蓄	270
合　计	2390

上述数字的来源见1939年11月的《经济学杂志》，第638页。

二、对我国国外资产的估价

依靠我们战前以黄金和国外投资形式积累起来的资源为贸易逆差提供财政支持，这种能力是我们军事力量的重要源泉，特别是与敌国的军力相比较，这一源泉的作用尤显重要。

在1939年3月31日，英格兰银行的外汇平衡户所储备的黄金总共有7995万盎司，按当前黄金价格（每盎司168先令）计算共值6.7158亿镑。从3月31日到9月1日，为了偿付从伦敦提取的外汇结余，黄金储备大量减少，但在此之后的数字尚未公布。不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战争前夕（1939年8月底）发表了对各交战国黄金储备的一个估计，根据这一估计，到那时为止英国的黄金储备已下降到5亿镑左右。在一同公布的类似估计中，到8月底为止，法国的黄金储备为7.5亿镑，加拿大是5400万镑。这一估计没有把帝国的其他黄金储备和每年帝国新开采的黄金算在账上，这两部分估计有1.87亿镑。

① 见第470页脚注。

关于英国在同一时期所持有的美元结余，权威的估计大约是1.5亿镑。法国的美元储备约为8000万镑，加拿大约为9000万镑。对英国的其他外汇结余尚未有可靠的估计。

罗伯特·金德斯利爵士估计英国国外投资的名义资本总额在1938年末约为37亿镑，不过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易于变现的。在这一总额中有大约30亿镑是英镑贷款和在大不列颠注册的公司的股票，其中的大部分是不能出售变现的。不过这些资产每年都大约有4000万镑到5000万镑按常规程序得到偿还；而且在这一总额中，还有一些巨额贷款可以安排在当前条件下偿还（一笔巨额的加拿大贷款已经用这种方式处理，这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也许我们可以照此用三年的时间从总额中变现至少2.5亿镑。

罗伯特·金德斯利爵士估计，在国外注册的公司资产将近7亿镑，这些资产据认为要容易变现得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在战争爆发之时，英国所持有的易于出售的美国证券大约有1.85亿镑，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加上2.25亿镑的其他证券，包括英国在美国直接拥有的财产。有意思的是，据美国的报告，以上可出售的证券中大约有10%，即1800万镑，实际上在战争的头两个月就已变现。

由于在战争初期外国人撤走他们在英国所拥有的资产，上面的数字随之被抵消了一部分。现存的兑换限制对英国国民是有效的，但是由于一种奇怪的疏忽（除非这是为了伦敦工商界的利益而作出的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以使伦敦在战后能够继续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种限制对外国资产的撤走却袖手旁观。对此我并没有看得太重，部分是因为目前自由兑换的水平（上述交易即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并没有兆示

出这种撤资所产生的任何严重的压力，而部分则是因为我们难以想像，如果这种压力日益发展，人们还会更看重伦敦工商界的战后利益甚于赢得战争这一刻不容缓的任务。战争爆发之初，外国投资者仍然在伦敦持有的、也许是表面上的外汇结余和其他资产中，有很大一部分严格地说并不是闲置的资产，而是以英镑形式来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债务和当前业务所需。

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多地顾虑外资撤走的问题。我认为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与英帝国或英镑区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指望英帝国或其他国家存留在伦敦的收支余额每年会有相当的增长。在上次战争中，甚至是在其间最黑暗的日子里，这种增长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并且到战争结束之时已经达到了一个巨大的数目。我推测每年至少可以从这一源泉中获得 1 亿镑，也许还会更多。

为了对可以获得的外汇资源作出一个最终的估计，把上面所有这些难免包含着错误的数字加总，我认为这是一种草率的做法。不过，在作了周详考虑之后，我建议把我们还算容易变现的资产的概数估计为至少 10 亿镑；并且考虑到我们的外债在逐渐增加，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能够为三年以上的收支逆差提供财政支持，其概数为每年 3.5 亿镑。

我们的黄金和美元资源比 1914 年有了明显增加（参见 474 页表），尽管我们的美元证券已大量减少；而且由于现在其中大部分是黄金，因此变现更为容易，流动性也大为提高。法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比 1914 年增加了将近两倍，而加拿大则增加了大约 10 倍。把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加在一起，美元和

黄金资源也比 1914 年增加了近两倍。相反，德国的美元和黄金储备在 1914 年大约是我们的一半，在今天则不到我们的 1/25，并且不到盟国总储备的 1/50。而且，上次战争中在美国参战之前债务问题是压倒一切的财政任务，但在今天我们对盟国的债务问题相比较之下则是微不足道的。既然今天所有的金融协议的规模都要比 25 年前大得多，既然无限的忍耐力是始终一贯的，那么当前的首要之务是尽量节约使用外汇储备，以及全力以赴地通过出口增加这种储备。不过，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我不赞成以比 1914 年还差的财政持久力为基础。英镑区和法郎区偿付持续的贸易逆差的能力，作为一个整体看是极其巨大的；而敌国的外汇储备已化为乌有，并为债务所代替。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1939 年 8 月底）

单位：百万英镑　汇率：4 美元＝1 英镑

	中央银行黄金储备	美元结余	在美国持有的易于出售的证券	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	每年的黄金产量(1938)
英国	500	149	184	225	—
法国	750	79	46	20	—
加拿大	54	89	125	140	41
其他英联邦国家和法语国家	135	—	—	—	146
总计	1439	317	355	385	187

黄金和美元资源比较(1914 和 1939)

(以百万美元为单位的大概数字)①

	黄金和美元资源总量		中央银行黄金储备	在中央储备之外用作货币的黄金	美元资源
	1939	1914	1914	1914	1914②
英　国	4230	3365	165	600	2600
法　国	3580	2045	680	965	400
加拿大	1630	115③	115	—	?
总　计	9440	5525	960	1565	3000
德　国	160	1505	330	475	700

① 美国:《联邦储备公告》。

② 《经济学统计评论》所给出的估计。G. 佩利爵士在 1910 年为美国国家金融委员会提供了一个高得多的估计。不过上面的数字考虑到了更新的资料,因而更为可靠。

③ 只含黄金。

三、家庭津贴的费用

在英国,15 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大约有 1000 万。因此,对每个孩子每周补贴 5 先令,也即每年补贴 13 镑,总共需花费 1.3 亿镑。更精确的估计为 1.32 亿镑。然而,由于下列几点这一数字被抵消了不少:

(1) 上述费用中大约有 2000 万镑是与所得税缴纳者的孩子有关的。作为大概的近似,我们在前面一直假定,现存所得税补贴所花费的费用与这种将要取代它的新补贴所需要的费用量一样多,因此在这一项上无需追加费用。

(2) 如果在1937年对于现存的各种补贴能加以节省，则现在可筹得如下的资金额：

普通退休金	250万镑
失业救济金	275万镑
失业援助	850万镑
合　计	1375万镑

(3) 在1940年对失业者的孩子的救助可能要比1937年少。另一方面，用以支付被疏散的儿童的补助和分居津贴这部分资金将形成额外的战时储蓄。

因此，把各种因素计算进来，最后的费用为1亿镑，这个估计应该是可靠的。

如果只对第二个孩子及随他之后出生的孩子予以补助，那么这笔津贴的费用将减少一半多，可以有把握地估计为不超过5000万镑；如果给他们的津贴是每周每人3先令而不是5先令，那么费用将不到3000万镑，更确切地说是2700万镑；如果津贴只限于第三个及随他之后出生的孩子，那么费用将再减少一半多，在津贴为5先令时，总计大约有2000万镑；如果只限于第四个及随后出生的孩子，则费用还会再减半，下降到约900万镑。

四、计算延期支付和直接税的准则

在第六章所给出的结果是从下面的计算准则得出的。对于年收入750镑的人，其收入中超出最低基本收入线（对未婚者是每周35先令，已婚者每周45先令）的那部分占35%。当然，这并非是一个唯一的比率，因为正如第六章的图表所显示的那样，固定津贴相应影响在低收入范围内要大得多，按照这

一计算原则。在表中被提留的收入比例，从每周收入 50 先令的 3.5%上升到年收入 700 镑的 29%。对于高收入集团，其超过最低基本线的部分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有了下面的提高：

收入(英镑)	超过基本收入线的百分比
750～2000	40
2000～3000	45
3000～5000	55
5000～10000	65
10000～15000	70
15000～20000	75
20000～50000	80
50000 以上	85

以上所尝试提出的这种津贴制度，并非像所得税制度一样是精心设计的。尤其是它没有将挣得的收入和转移的收入区别对待。由于这一点，某些在所得税方面受到特别照顾的人，则可能会比那些没有享受这种照顾的人上缴更大比例的收入提留。对于这些例外情况，在一个足够详尽的计划里是容易加以解决的；但如果我试图在此处理所有这些细节，那么只会喧宾夺主，使主要问题混淆不清。也许对已婚者的津贴是不足的，也许应该引入更多的等级来对各种不同情况更细致地加以分类从而避免突然的跳跃。有些人的收入水平与战前相比大幅下降，制定一项与最近的《财政法》中的条例相类似的条款，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无疑是值得一为的。